

仰止集

纪念邓广铭先生



仰止集

——纪念邓广铭先生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7.5 印张 415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 定价:26.20 元

ISBN 7-5434-3428-8/G·2598



邓广铭先生

目 录

1 / 臧克家	深交七十年
6 / 熊正文	痛悼恭三先生
7 / 张中行	忆邓兄恭三
13 / 萧 乾	忆广铭兄
15 / 杨向奎	山东自古多英才 恭三走去不复回
20 / 季羨林	悼念邓广铭先生
24 / 何兹全	怀念恭三兄
28 / 邢其毅	忆邓公
31 / 金克木	送指路人
37 / 周一良	纪念邓先生
41 / 罗继祖	邓恭三先生悼词
43 / 王铁崖	恭三，你走了
45 / 杨宪益	悼念邓广铭兄
47 / 杨志玖	对学长的追念
49 / 鲍正鹄	伉俪六十年
50 / 李 锐	几面之交怀邓老
53 / 饶宗颐	感皇恩（挽邓恭三教授）

邓广铭教授语即题其纪念文集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犹生

一九九八年四月 顾廷龙



- 54/李 新 无限的哀思
62/程光裕 怀念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
66/徐 规 高山仰止
71/王瑞明 春风化雨五十五年
77/穆 欣 理解与合作
85/柳田节子 追忆邓广铭教授
88/漆 侠 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
94/姚瀛艇 悼念邓广铭先生
99/彭志齐 永远不会淡去的印象
107/田余庆 邓师周年祭
李克珍
112/王云海 悼念邓广铭教授
116/何 聪 缅怀一代学人、宋史专家
邓广铭教授
123/黄永年 记我和邓恭三先生的交往
130/邓锐龄 听邓恭三先生讲课
135/张传玺 教诲、指导，永记不忘
142/王汝丰 邓老谈往
149/夏应元 我所接触的晚年的邓先生

- 154/安作璋 春雨润物细无声
160/袁良义 怀念邓师恭三先生
165/张必锟 青年人的导师和朋友
169/常国武 永远的怀念
172/祝总斌 回忆邓广铭先生在历史系
“拨乱反正”
176/郑必俊 在历史科学中永生
185/丁伟志 不求强同 不惧独异
193/陈 振 纪念中国宋史断代史研究的
主要奠基人邓广铭先生
200/张广达 师恩难忘
208/裴汝诚 谆谆的教诲 无私的帮助
213/李范文 邓老精神 与世长存
216/马克垚 忆邓广铭先生对青年教师的
关怀和培养
222/高增德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227/杨渭生 邓广铭先生的最后二十年
235/王德毅 悼念邓广铭教授

- 240/傅璇琮 独立不阿的人品
沉潜考索的学风
- 247/何龄修 含泪忆邓恭三师
- 254/陈智超 崇高的责任感
- 259/梁太济 邓门问学杂忆
- 267/郝斌 为邓先生祝寿
- 273/周宝珠 忆邓广铭师二三事
- 277/刘凤翥 恩师恭三先生为我的学术研究
指路
- 282/杨讷 走近邓先生
- 286/林被甸 邓先生鼓励我当好北大图书馆
馆长
- 292/许怀林 道德文章 长为师法
- 300/郭正忠 “画疆自守”与复兴宋学
- 307/陈学霖 忆念邓广铭教授
- 316/李锡厚 恭三师指导我研究辽宋夏金史
- 323/耿云志 学人本色 史家风范
- 329/佐竹靖彦 追忆邓广铭先生
- 335/王曾瑜 缅怀邓广铭师

- 346/黄葵 永远的老师
- 353/龚延明 壁立千仞 海纳百川
- 362/李裕民 忆恩师
- 369/张邦炜 风范永存
- 372/管成学 贤师风范 嘉惠后学
- 377/胡戟 温馨的忆念
- 381/张惠芝 告慰先师 以飨读者
- 388/田浩 与邓广铭教授对话
- 398/李弘祺 邓先生与第一次两岸学术交流
- 400/张希清 恭三师与辽宋西夏金史研究
- 409/李孝聪 邓先生留下的一把钥匙
- 415/梁庚尧 悼念邓广铭教授
- 420/刘永翔 也曾遥沐邓林霞
- 427/木田知生 追悼恭三邓广铭先生
- 432/黄宽重 缅怀恭三先生
- 438/臧健 难以忘却的思念
- 445/杨若薇 言有终而恩无尽,
吾师可知也耶?

- 240/傅璇琮 独立不阿的人品
沉潜考索的学风
- 247/何龄修 含泪忆邓恭三师
- 254/陈智超 崇高的责任感
- 259/梁太济 邓门问学杂忆
- 267/郝斌 为邓先生祝寿
- 273/周宝珠 忆邓广铭师二三事
- 277/刘凤翥 恩师恭三先生为我的学术研究
指路
- 282/杨讷 走近邓先生
- 286/林被甸 邓先生鼓励我当好北大图书馆
馆长
- 292/许怀林 道德文章 长为师法
- 300/郭正忠 “画疆自守”与复兴宋学
- 307/陈学霖 忆念邓广铭教授
- 316/李锡厚 恭三师指导我研究辽宋夏金史
- 323/耿云志 学人本色 史家风范
- 329/佐竹靖彦 追忆邓广铭先生
- 335/王曾瑜 缅怀邓广铭师

- 346/黄葵 永远的老师
- 353/龚延明 壁立千仞 海纳百川
- 362/李裕民 忆恩师
- 369/张邦炜 风范永存
- 372/管成学 贤师风范 嘉惠后学
- 377/胡戟 温馨的忆念
- 381/张惠芝 告慰先师 以飨读者
- 388/田浩 与邓广铭教授对话
- 398/李弘祺 邓先生与第一次两岸学术交流
- 400/张希清 恭三师与辽宋西夏金史研究
- 409/李孝聪 邓先生留下的一把钥匙
- 415/梁庚尧 悼念邓广铭教授
- 420/刘永翔 也曾遥沐邓林霞
- 427/木田知生 追悼恭三邓广铭先生
- 432/黄宽重 缅怀恭三先生
- 438/臧健 难以忘却的思念
- 445/杨若薇 言有终而恩无尽,
吾师可知也耶?

450/王小甫	回忆邓广铭先生
459/沈乃文	关于《岳飞传》与胡适藏书
466/韩小蕙	与邓广铭先生初识十分钟
473/马 力	怀念邓先生
476/包伟民	邓门从师杂忆
481/罗家祥	深切怀念导师邓广铭教授
490/胡海帆	邓广铭先生与北大藏拓片的整理
494/荣新江	重读敦煌书序 追念恭三先生
500/沈建中	永远的回响
504/刘浦江	不仅是为了纪念
512/欧阳哲生	邓广铭先生与他的精神世界
522/刘玉才	求实求是 学者风范
526/祝晓风	冬日里的告别
529/邓可因 邓可蕴 邓小南	深切的怀念
548/	编后记

深交七十年

——追念恭三

臧克家

恭三^{*}离开人世快五个月了，一提起，我就热泪盈眶。这位硕果仅存的1923年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七十多年来互通心声、互诉衷情的老朋友，遽然去世，对我这个卧病多年、已经93岁的人，打击之重，实难承受。虽然老伴郑曼已经告诉过我：“恭三患的是绝症。”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但在我的感情上总希望能出现奇迹。去年11月15日，郑曼去医院探视，恭三见到她，泪流双颊，对她说：“我要孩子去电话，劝你不要来，你还是来了，克家病着，谁照顾！？想不到我这样的好体质，竟躺在这里养起慢性病来了，还有多少事没有完成，等着我去做啊！”他哪里知道自己患的是现代医学尚未攻克的绝症！站在他对面的小女儿已泪流满面，怕他察觉，背过身去了。今年元旦，郑曼再去，他已经有点糊涂了。1月10日，他就走了！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与哀伤！

(一)

恭三在“一师”时，功课很好，他记忆力强，思维敏捷，

* 恭三，是邓广铭的字，自1923年以来，我一直这样称呼他。

反应快，校内请名人演讲，大多由他记录。当时“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比较开明。“一大”代表王尽美是我们的学长，校内党团员不少，革命活动频繁。受“五四”新思潮影响，新文艺空气浓厚。设有书报介绍社，从北平、上海购进不少新书刊，恭三就是这个社的负责人之一。1936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从此，一生研究中国古代史，潜心专攻辽宋金史，很有成就，被誉为中国宋史泰斗。

1933年，使我跻身诗坛的处女诗集《烙印》在北平自费印行时，全靠之琳、恭三、广田承办了全书的设计、用纸、印制、校对等等，才得以问世。我永远感谢他们！

1942年秋，我和郑曼抵达重庆的第三天，恭三就赶到张家花园65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来看望我们，并援我出手，为郑曼谋得一工作，解决了我们当时最困难的生活问题。不多久，他的夫人窦振鲁带着两个女儿自北平辗转来到重庆。他们纯朴、敦厚的家风和我们很相投，从此，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3月，我们到北平后，首先看望的，就是住在东厂胡同的恭三、振鲁夫妇和住在翠花胡同的羡林。可惜振鲁去世得太早了！

高校院系调整后，北大迁西郊，我身体不好，他要车不便，就以书信、电话互通心声。1975年3月25日，我想念他，就以诗抒怀，题为《寄邓广铭同志》：

前夜梦中见，
觉后一怅然。
春色满西郊，
提笔问忙闲？

进入新时期，大家心情比较舒畅，好多年春节，恭三常与羡林同来我家欢聚。正如1982年2月他来信说的：“我们已是近六十年的老友，平时见面虽不是太多，然而每次促膝相谈，总都是上下古今，合‘纵’连‘横’，无所不谈。”

彼此都迈入耄耋之年后，行动更不便，终年不得一面。1991年7月11日，忽得他一函，述生平，诉心情。因手颤，字为之失形。满纸云烟，入目心伤。12日，我走笔遂成一绝以赠，题为《寄恭三》：

一纸书来动我情，
少年伴侣两衰翁。
交深六纪为兄弟，
入目心伤字失形。

(二)

恭三做学问，很踏实，精益求精，又谦虚谨慎。他的大作《岳飞传》、《王安石》，五十年代由我介绍给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十年来，他反复修改增订，把自己的研究所得，溶入书中，使原来不太厚的两本书，成为今天很有份量的大部头著作。这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常以各自的偶有所得，互相切磋、鼓励。1982年前，曾有人撰文否定《满江红》词系岳飞所作。我痛心于岳飞的《满江红》词著作权之被剥夺，很希望恭三能为文反驳。1982年2月5日，我在《文史哲》杂志1982年第1期上读到恭三写的《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很兴奋，连夜给他写信：“你作的堂堂大文，给以科学上的论证，甚得我心，

反应快，校内请名人演讲，大多由他记录。当时“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比较开明。“一大”代表王尽美是我们的学长，校内党团员不少，革命活动频繁。受“五四”新思潮影响，新文艺空气浓厚。设有书报介绍社，从北平、上海购进不少新书刊，恭三就是这个社的负责人之一。1936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从此，一生研究中国古代史，潜心专攻辽宋金史，很有成就，被誉为中国宋史泰斗。

1933年，使我跻身诗坛的处女诗集《烙印》在北平自费印行时，全靠之琳、恭三、广田承办了全书的设计、用纸、印制、校对等等，才得以问世。我永远感谢他们！

1942年秋，我和郑曼抵达重庆的第三天，恭三就赶到张家花园65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来看望我们，并援我出手，为郑曼谋得一工作，解决了我们当时最困难的生活问题。不多久，他的夫人窦振鲁带着两个女儿自北平辗转来到重庆。他们纯朴、敦厚的家风和我们很相投，从此，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3月，我们到北平后，首先看望的，就是住在东厂胡同的恭三、振鲁夫妇和住在翠花胡同的羡林。可惜振鲁去世得太早了！

高校院系调整后，北大迁西郊，我身体不好，他要车不便，就以书信、电话互通心声。1975年3月25日，我想念他，就以诗抒怀，题为《寄邓广铭同志》：

前夜梦中见，
觉后一怅然。
春色满西郊，
提笔问忙闲？

进入新时期，大家心情比较舒畅，好多年春节，恭三常与羡林同来我家欢聚。正如1982年2月他来信说的：“我们已是近六十年的老友，平时见面虽不是太多，然而每次促膝相谈，总都是上下古今，合‘纵’连‘横’，无所不谈。”

彼此都迈入耄耋之年后，行动更不便，终年不得一面。1991年7月11日，忽得他一函，述生平，诉心情。因手颤，字为之失形。满纸云烟，入目心伤。12日，我走笔遂成一绝以赠，题为《寄恭三》：

一纸书来动我情，
少年伙伴两衰翁。
交深六纪为兄弟，
入目心伤字失形。

(二)

恭三做学问，很踏实，精益求精，又谦虚谨慎。他的大作《岳飞传》、《王安石》，五十年代由我介绍给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十年来，他反复修改增订，把自己的研究所得，溶入书中，使原来不太厚的两本书，成为今天很有份量的大部头著作。这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常以各自的偶有所得，互相切磋、鼓励。1982年前，曾有人写文否定《满江红》词系岳飞所作。我痛心于岳飞的《满江红》词著作权之被剥夺，很希望恭三能为文反驳。1982年2月5日，我在《文史哲》杂志1982年第1期上读到恭三写的《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很兴奋，连夜给他写信：“你作的堂堂大文，给以科学上的论证，甚得我心，

甚得我心！”同时把我对《满江红》词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与众不同的见解告诉他：“尘与土——风尘奔波之谓也，非视功名为尘土也。”与他商榷。他马上复信：“你对‘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的解释，确实是至当不易之论。”并戏称，“拜”我为“三字师”。而对自己的《再论》则谦虚备至。他写道：“一个正在讨论中的问题，我的论断究竟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否，毕竟还得看看有怎样的反应，不能遽尔视为定论。”

他在修订《王安石》一书中有所得，也来信告诉我：“其中有两节，自己甚觉得意（未到忘形），便改变为可以独立的专题论文，一篇已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刊出，另一篇于十天前刚寄往该刊，大概得明春刊出了。”（1996年12月2日信）

（三）

四五年前，我对他说：“你快90岁了，得给你做大寿了。”他说：“我身体不错，不到100岁，不做寿。”我开玩笑说：“到那时，我一定亲来祝贺！”两个人都笑了。他又说：“我还想在这几年内修改我的四部旧作哩！”这几年，他确实是全力以赴地在修改，由于手抖，不听使唤，进度慢，露出相当着急的情绪。他在1996年12月2日来信中说：“要修改四部旧作，已经叫喊了两年，到今，连第一本《王安石》还未改完，争取春节前一定把它改完。”在他临终前，《王安石》增订本的样书，人民出版社给他赶印出来了。在此之前，为修订《辛弃疾传》作准备的《辛稼轩年谱》增订本，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但是计划修改增订的《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

疾传》，终因疾病的突然袭击而未能完成，以致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念念不忘的，还是他那几部未修改完成的旧作。想不到他这样好的体质，竟未能如他所承诺的，活到100岁，而走在我的前面！他的去世，不单是我失去了一位老同学，好朋友，确实是我国史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呜呼，痛哉！

1998年6月2日

附记：克家同志年高久病，体弱神衰，无力写作，最近又腰椎骨折，只得由我代笔。——郑曼

忆邓兄恭三

张中行

邓广铭先生字恭三，山东临邑人，1936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他生于1907年，长于我两岁，所以文题称为兄是实事求是，不是客气。我上北京大学，念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毕业。恭三兄年长而毕业在后，原因之一是他1931年来北京考大学，报北京大学未录取，入了辅仁大学，也许身在辅仁，心仍在北大红楼吧，次年再考，录取了，入学时期就成为1932年，比我晚了一年。还有长我两岁的问题，为什么不早两年甚至早三五年来北京投考？可惜多次面对都没问他，现在想问，他已经远去了。还是说昔年，北京大学文史是近邻，同出入红楼，自然见面的机会不少。现在还记得，恭三兄那一班，除恭三兄之外，如王造年、王崇武、白宝瑾、张政烺、崔得清、刘斗魁等，或则在校时有同桌吃张先生豆腐之谊，或则离校后有多种形式的交往之雅，总之是时间流逝很多而印象的清晰不减。诸人之中，有三位，印象清晰，还有另外的原因，是学业有大成就。一位是王崇武，曾留英，攻明史，五十年代在历史研究所，不幸天不假以年，未能躬逢“大跃进”就离开此岸了。另一位是张政烺，主要治古代史，并通金石文字，著作不少，成为有大名的专家。今健在，听说身体不好，已经很少动笔。再一位就是邓恭三，主要治宋史，也是著作不少，还

痛悼恭三先生：

回眸初见在红楼，同学同教六十秋，五斗

折腰松菊府，两度流放鲤鱼洲；政闹幸得

清平日，史学共宗法业优，著作等身款

不朽，难寻笑免淚雙流。

辛亥熊正文敬挽



忆邓兄恭三

张中行

邓广铭先生字恭三，山东临邑人，1936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他生于1907年，长于我两岁，所以文题称为兄是实事求是，不是客气。我上北京大学，念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毕业。恭三兄年长而毕业在后，原因之一是他1931年来北京考大学，报北京大学未录取，入了辅仁大学，也许身在辅仁，心仍在北大红楼吧，次年再考，录取了，入学时期就成为1932年，比我晚了一年。还有长我两岁的问题，为什么不早两年甚至早三五年来北京投考？可惜多次面对都没问他，现在想问，他已经远去了。还是说昔年，北京大学文史是近邻，同出入红楼，自然见面的机会不少。现在还记得，恭三兄那一班，除恭三兄之外，如王造年、王崇武、白宝瑾、张政烺、崔得清、刘斗魁等，或则在校时有同桌吃张先生豆腐之谊，或则离校后有多种形式的交往之雅，总之是时间流逝很多面印象的清晰不减。诸人之中，有三位，印象清晰，还有另外的原因，是学业有大成就。一位是王崇武，曾留英，攻明史，五十年代在历史研究所，不幸天不假以年，未能躬逢“大跃进”就离开此岸了。另一位是张政烺，主要治古代史，并通金石文字，著作不少，成为有大名的专家。今健在，听说身体不好，已经很少动笔。再一位就是邓恭三，主要治宋史，也是著作不少，还

痛悼恭三先生：

回眸初見在红楼，同學同教六十秋，身斗

朽腰松辭府，兩度流放鯉魚洲；改闢辛得

清平日，史學共宗法業優，著作等身欽

不朽，難尋笑兒淚雙流。

學友熊正文敬挽



深钻而岔入文学的角落，用大力研究辛稼轩。他生于山左，体型也是山左的，粗而壮。1994年及以前我住北大朗润园11公寓二楼，他住10公寓三楼，我们可以隔着院里的长杨南北相望。面对闲谈是在湖边的路上，大多是他到历史系去取《参考消息》，问他为什么不送家里，他说为的是锻炼。他身体很好，常出外开会，1994年秋天我迁往北郊，见面机会少了，但确信他必仍是健壮，能够入门治学，出门开会，取《参考消息》。由去岁（1997年）起，为母校过百岁生辰，学校派专人筹备，设计各种庆祝花样，我曾有个想法，是划定一个地方，接待七七事变前毕业返校的。我的私心是想看看，彼时出入红楼、出入二院大门的人，到1998年5月4日，还能来几个。如果只是十几个甚至更少，则面对白发，追想昔日的红颜以及零落殆尽，总不免要“执手相看（读平声）泪眼”吧？其时还想到我熟识的必来的几个，如杨向奎、何兹全、金石和我，其中就有邓兄恭三。万想不到，他迈入1998年，却未能参加校庆，于1月10日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得病住院，我不知道，也就未能去看他，这样，应该垂泪的最后一面竟也化为空无，念及不禁为之凄然。

人往矣，幸而给生者留下的事物不少。生者如我，曾同出入红楼，曾同住朗润园，单说存于记忆中的就更多。其中当然有不少是学术，我不想多说，因为内容太重，而且，对于恭三兄的专业，我是门外汉，不该强不知以为知。那么，还能说些什么呢？想了想，决定以怀念为纲，由记忆的仓库里选一些印象特别鲜明的，说说，以期能够约略表现恭三兄的成就和为人。

第一次闻恭三兄的大名，也许竟早到1932年，他入北京大学史学系那一年。以何因缘而知之？是看周作人讲的《中国

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9月出版），书的版权页注明讲校者是周作人，记录者是邓恭三。周作人在“小引”里说：

本年（案为1932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其时任辅仁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所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周作人讲话虽然基本上是北调，却也掺合一些南腔，就说是慢条斯理吧，其中不少专业知识，用笔追，而且成条理，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可是恭三兄却像是轻而易举，不只记了，而且接着就印成书！现在还记得当时的观感，是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其后若干年就陆续看到他的著作，几种成本的和更多的论文。我估计他用力最多的是《稼轩词编年笺注》，我也最感兴趣。说用力最多，是因为由1937年动笔，1939年初稿完成，中间经过出版、重印，多次修改、补充，直到1993年增订本出版，时间延续了半个世纪以上。恍惚记得1956年初版本出版之后，我就粗略看了一些，印象是不愧为史学家，材料丰富而条理清楚，凡有所判断，都表现为言而有据并有史识。治稼

深钻而岔入文学的角落，用大力研究辛稼轩。他生于山左，体型也是山左的，粗而壮。1994年及以前我住北大朗润园11公寓二楼，他住10公寓三楼，我们可以隔着院里的长杨南北相望。面对闲谈是在湖边的路上，大多是他到历史系去取《参考消息》，问他为什么不送家里，他说为的是锻炼。他身体很好，常出外开会，1994年秋天我迁往北郊，见面机会少了，但确信他必仍是健壮，能够入门治学，出门开会，取《参考消息》。由去岁（1997年）起，为母校过百岁生辰，学校派专人筹备，设计各种庆祝花样，我曾有个想法，是划定一个地方，接待七七事变前毕业返校的。我的私心是想看看，彼时出入红楼、出入二院大门的人，到1998年5月4日，还能来几个。如果只是十几个甚至更少，则面对白发，追想昔日的红颜以及零落殆尽，总不免要“执手相看（读平声）泪眼”吧？其时还想到我熟识的必来的几个，如杨向奎、何兹全、金石和我，其中就有邓兄恭三。万想不到，他迈入1998年，却未能参加校庆，于1月10日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得病住院，我不知道，也就未能去看他，这样，应该垂泪的最后一面竟也化为空无，念及不禁为之凄然。

人往矣，幸而给生者留下的事物不少。生者如我，曾同出入红楼，曾同住朗润园，单说存于记忆中的就更多。其中当然有不少是学术，我不想多说，因为内容太重，而且，对于恭三兄的专业，我是门外汉，不该强不知以为知。那么，还能说些什么呢？想了想，决定以怀念为纲，由记忆的仓库里选一些印象特别鲜明的，说说，以期能够约略表现恭三兄的成就和为人。

第一次闻恭三兄的大名，也许竟早到1932年，他入北京大学史学系那一年。以何因缘而知之？是看周作人讲的《中国

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9月出版），书的版权页注明讲校者是周作人，记录者是邓恭三。周作人在“小引”里说：

本年（案为1932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其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所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周作人讲话虽然基本上是北调，却也掺合一些南腔，就说是慢条斯理吧，其中不少专业知识，用笔追，而且成条理，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可是恭三兄却像是轻而易举，不只记了，而且接着就印成书！现在还记得当时的观感，是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其后若干年就陆续看到他的著作，几种成本的和更多的论文。我估计他用力最多的是《稼轩词编年笺注》，我也最感兴趣。说用力最多，是因为由1937年动笔，1939年初稿完成，中间经过出版、重印，多次修改、补充，直到1993年增订本出版，时间延续了半个世纪以上。恍惚记得1956年初版本出版之后，我就粗略看了一些，印象是不愧为史学家，材料丰富而条理清楚，凡有所判断，都表现为言而有据并有史识。治稼

轩词的人不少，恭三兄是用史学家的眼看，顾随先生是用文学鉴赏家的眼看，都可以成一家之言。这样说，恭三兄的这本大著就确可以称为寿世之作，用旧话说是应该藏之名山，用新话说呢，应该入图书馆之库，供无限多的后人研读。可是恭三兄却不停止于已有的成就，是1994年3月，他给我送来一本新印成的“增订本”，我看看“增订三版题记”，才知道由初稿完成，几十年来，他一直在搜集新材料，改正不妥当的，补充缺漏的，总之是求能够完美无缺。这是勤勉加认真的精神，不要说今人，古人中也是不多见的。

再说他的另一本力作《岳飞传》。这本书初问世是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我看到的是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本。何以如是之迟迟？是因为我不钻断代史，又对于“精忠报国”云云一向兴趣不大。记不清一个什么偶然的机，我查北宋、南宋之际的什么事，翻看保存多年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册）。这本书记述靖康、绍兴年间事，观点与历代所传不同，差异大到说秦桧主和乃时势使然，并非意在卖国；另一面，南宋的军队战斗力不强而扰民严重，岳家军也不像传说的那样好，进兵朱仙镇云云是胡吹。吕思勉先生是史学家，也是凡有所论断，都举史实为据。可是历代所传与爱国的感情结合，力量就大到绝不容许有异说。于是据说，不少人大哗之后，书也不能流通了。是非究竟如何？一时感到惶惑，才想看看恭三兄的《岳飞传》。去信讨，扉页记赠书的时间，是1997年5月。我大致看了一遍，所得不少之外，却留了两个疑莫能明的尾巴。这是一，南宋初年，不和而战，就真能直捣黄龙，收复失地吗？二，《满江红》词是否岳飞所作？前一个问题有怀疑派，可能还不只吕思勉先生一个人。后一个问题也有怀疑派，余嘉锡、夏承焘之外，新近还有

冒舒诤。恭三兄属于不怀疑派，当然也不是空口说白话。左袒右袒呢？我只当遵圣训，“不知为不知”。但有一点我自信是有所知的，这是恭三兄写这本《岳飞传》笔虽不离史部，心却无时无刻不充满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的。

由恭三兄的为人，我想再说两件小事，都是他光顾我的蜗居，送些文章给我看的。一篇来于某大学的学报，主旨是《红楼梦》非曹雪芹所作。这类的奇谈怪论不自这位作者始，可是有了这一篇，其他形形色色的鸿文只好自承不得不退居下位。何以故？是因为立论之妙简直非常人之力所能想象。具体说是这样：《红楼梦》必非曹雪芹作，证据是甲戌本脂批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试想，如果是曹雪芹作的，为什么让他删改？我看完，哭笑不得，本陶渊明“奇文共欣赏”之义，寄给周汝昌先生。这里应该着重说，恭三兄送此文时说了这样一句：“我是红盲，不知道所说对不对，送给你看看吧。”显然，以他的学力，不会看不出来立论的荒唐可笑，可是他谦逊，不愿意到宋（包括辽、金）史以外说三道四，此之谓有十分把握说八分话，纵观今日，具这样美德的人恐怕不多了。

另一篇是他的自作，刊于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二期的《胡适与北京大学》。文章所记由1917年暑后胡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授起，一直到1949年12月（其时胡先生任校长，恭三兄任校长秘书）飞离北平止，大事小事讲了不少。我看了，印象是（以下抄拙作《流年碎影》176页）：“邓先生确是不愧为史学家，一，旧事记得一清如水，二，间或寓褒贬，都本诸良心，三，未抄五十年代的批判八股，挑拣一言一行，继以大骂。显然，这样的态度是不合时风的，也许会带来不利

吧？忘利而不忘义，我深以有这样一位同学为荣幸。”

可是这样的一位同学竟先我而去！《论语》有“畏天命”的话，人莫名其妙地有了生，终不免一死，此天之命也，我们又能怎样？还是应该多想“尽人力”一面，在这方面，恭三兄的学业可钦，为人可法，成就超过一般人，如果还有所谓九泉之下，也就可以安息了。

1998年7月1日于元大都北鄙

怀广铭兄

萧 乾

我和邓广铭先生是1932年在辅仁大学相识的，当时我们都是英文系的学生，平时比较接近，互相很要好，很谈得来。

在我的印象中，邓广铭为人非常纯朴厚道。当时辅仁大学有些学生很洋气，衣着穿戴、言行举止都很洋气，有人甚至穿着溜冰鞋来上课（因学校对面有个溜冰场）广铭兄却不是这样，他穿戴朴素，待人诚恳，非常用功，学习成绩一直优秀。

那时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邓山东》（发表于1934年6月2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77集，后收入《篱下集》），写的是我上崇实中学时校外一个挑挑子卖杂货糖食的老头，但我给他和小说取名为“邓山东”，是和广铭兄（他是山东人）开了一个玩笑，也是为了纪念我们之间的一段友谊。

后来邓广铭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我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我俩就分开了。1935年我到天津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报》的文艺栏。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广铭兄曾写过几篇文章寄给我，我给发表了。如《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一文（发表于《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四十三期。1935年11月4日），指出这一辑丛书的“计划之草率、选本之不当、标点之谬误”三点。后丛书主编写文章为自己辩解，于是鲁迅写了《文人比较学》（见《且介亭杂文末编》），批评了主

编的辩解，支持了邓广铭的意见。《国闻周报》还发表过广铭兄的《〈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第十四卷第七期，1937年2月8日），这篇文章很有分量，得到了胡适、陈寅恪等专家的赞许。

后来我去了香港，又去了英国，和他的联系就不多了。

在我的友人中，我觉得广铭兄是底子厚、很有成就的学者。我俩近几十年很少见面，不料他于今年1月逝世，我很悲痛，深切怀念这位老友。在我心目中，他一直都是那个厚道、朴实、勤奋、用功的“邓山东”。

山东自古多英才 恭三走去不复回

——纪念老友邓广铭先生

杨向奎

我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人，在许多有关文章中，我总是说，“中国有五千年的优良文化传统，而齐鲁文明是这种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内容。不必多举例证，广饶的武圣孙武，曲阜的大成至圣孔子，滕州的科圣墨翟，都是俎豆千秋不朽的人物。亚圣以下更是数不胜数。”到了近现代，山东也是我国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我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北大史学系毕业的人，在我的同班中，或者是稍后稍前的同学中，山东籍而有成绩的史学家，就有何兹全（现北师大历史教授）、邓广铭（北大已故历史教授）、傅乐焕（已故民族大学历史教授）、张政烺（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与林冠一（已故原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不是历史系而成名的学者，更有许多，如物理系的郭永怀，外文系的李广田，哲学系的任继愈，他们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以上都是我熟悉的人，我不熟悉的人可能更多，所以我说“山东自古多英才！”

我和恭三自1932年起相熟，以后逐渐变成好友，以至无话不谈，彼此相知甚深。恭三的年龄比我们同时的同学都大一两岁，而小于林冠一。他在中学毕业后曾教过书，继愈同志就是他当时的学生，而林冠一更长于恭三，因为冠一更是恭三的小学老师，后来他们都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同学。三代师生变

成同学，只有在过去的老北大有，因为那时的北大招生不限年龄，冠一毕业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恭三在考北大时，还有一次挫折，他第一次考北大是在1931年，他说这次他没有被录取，遂考入私立辅仁大学英文系，第二年，1932年又考北大，才上了北大史学系。所以恭三的外文基础是好的。

三十年代中期的北大是北大历史上的复兴时期，蒋梦麟先生是校长，他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颇有蔡风，胡适先生是文学院院长，而傅斯年先生主管史学系。那时的北大无论文理各科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如文科的张颐、贺麟、熊十力、汤用彤、钱穆、顾颉刚、孟森、罗常培、刘复、钱玄同、蒙文通；理科的李四光、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曾昭伦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大师，名师才能教育出出色的门徒。抗战时，北大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三个有名的大学合组成一个大学，的确是全国精英的荟萃，所以造就出一批更出色的人才，如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等先生。

抗战后北大复原北京旧地，胡适之先生为校长，胡先生自美未回前，由傅斯年先生代理校长，而恭三为校长室秘书。恭三是学者，但也是一位管理方面人才。孟真先生是任人有方的，他的学生每人长于什么，他心中有数，当他代理北大校长几个月的时间中，把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北大，又恢复成辉煌灿烂的高等学府，得力于孟真先生的才华，也得力于恭三的援助。当时我也在北京，经常到傅先生的住处去看望他们，当傅先生闲暇时，他全家就带着我、苑峰，有时还有毛子水或杨振声先生，一同到北海茶亭去吃茶谈天。当时我还是东北大学教授，假期间没有去东北，傅先生就问我：“你下学期到哪儿去教书？你愿到什么地方，告诉我，我介绍你去。”傅先生好意，我至今感谢不已。我知道他正在为北大史学系物色教授，恭

三、苑峰（张政烺）都在内，傅先生大概也想把我留在北大，但他要我自己说出，因为他和顾颉刚先生既是老友，又是各立门户的学者，他知道我和顾先生接近，也许不愿与他共事，所以傅先生要我自己提出。但我同样有顾虑，傅先生既是代校长，不提出留我，我不能自己提出，所以说要到山东大学，结果由他与杨振声先生介绍到山大，一去就是十年！我怎么知道傅先生要留我在北大，是当胡适之先生回来任校长后，有一次他遇到我，责备我说：“你为什么一定到山东青岛去？你以为青岛有美国兵，安全，美国兵说走就走的！”我听到这种责备后有点莫名其妙，我不知道青岛有美国兵，安全不安全，我并没有考虑过，我过去到过青岛，喜欢那地方干净、美丽，所以愿意去，我也不知道北大要请我来，胡、傅两先生都是校长，又是我的老师，打算留我，一句话就可定下，何必一定要我提出。

这些过程恭三都知道，通知我到青岛山东大学，也是恭三给我的信。在几年的校长室秘书职务中，恭三说，并没有聘书或者什么委任状。几年的辛苦，无偿的劳动，只是靠师生的感情互相信任上，在政治上无任何牵连，而在学术事业上，却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虽然如此，恭三还是著作等身，是我国中古史，尤其是宋史的一代大师，权威学者。我读过他许多文章与著作，最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论文，是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集）一文。我不研究宋史，但因研究宋代理学思想，我必须接触宋史，而那些人物的一系列官衔，我始终弄不清他们的职责是什么，看《宋史职官志》也搞不清，而恭三的文章解决了此一复杂问题，好像一堆乱麻，被他理出头绪来。我和恭三见面，就说他作了一件大好事，使我读懂了《宋史职官志》。看好这篇文章的人不在少

成同学，只有在过去的老北大有，因为那时的北大招生不限年龄，冠一毕业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恭三在考北大的时候，还有一次挫折，他第一次考北大是在1931年，他说这次他没有被录取，遂考入私立辅仁大学英文系，第二年，1932年又考北大，才上了北大史学系。所以恭三的外文基础是好的。

三十年代中期的北大是北大历史上的复兴时期，蒋梦麟先生是校长，他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颇有蔡风，胡适先生是文学院院长，而傅斯年先生主管史学系。那时的北大无论文理各科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如文科的张颐、贺麟、熊十力、汤用彤、钱穆、顾颉刚、孟森、罗常培、刘复、钱玄同、蒙文通；理科的李四光、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曾昭伦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大师，名师才能教育出出色的门徒。抗战时，北大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三个有名的大学合组成一个大学，的确是全国精英的荟萃，所以造就出一批更出色的人才，如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等先生。

抗战后北大复原北京旧地，胡适之先生为校长，胡先生自美未回前，由傅斯年先生代理校长，而恭三为校长室秘书。恭三是学者，但也是一位管理方面人才。孟真先生是任人有方的，他的学生每人长于什么，他心中有数，当他代理北大校长几个月的时间中，把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北大，又恢复成辉煌灿烂的高等学府，得力于孟真先生的才华，也得力于恭三的援助。当时我也在北京，经常到傅先生的住处去看望他们，当傅先生闲暇时，他全家就带着我、苑峰，有时还有毛子水或杨振声先生，一同到北海茶亭去吃茶谈天。当时我还是东北大学教授，假期间没有去东北，傅先生就问我：“你下学期到哪儿去教书？你愿到什么地方，告诉我，我介绍你去。”傅先生好意，我至今感谢不已。我知道他正在为北大史学系物色教授，恭

三、苑峰（张政烺）都在内，傅先生大概也想把我留在北大，但他要我自己说出，因为他和顾颉刚先生既是老友，又是各立门户的学者，他知道我和顾先生接近，也许不愿与他共事，所以傅先生要我自己提出。但我同样有顾虑，傅先生既是代校长，不提出留我，我不能自己提出，所以说要到山东大学，结果由他与杨振声先生介绍到山大，一去就是十年！我怎么知道傅先生要留我在北大，是当胡适之先生回来任校长后，有一次他遇到我，责备我说：“你为什么一定到山东青岛去？你以为青岛有美国兵，安全，美国兵说走就走的！”我听到这种责备后有点莫名其妙，我不知道青岛有美国兵，安全不安全，我并没有考虑过，我过去到过青岛，喜欢那地方干净、美丽，所以愿意去，我也不知道北大要请我来，胡、傅两先生都是校长，又是我的老师，打算留我，一句话就可定下，何必一定要我提出。

这些过程恭三都知道，通知我到青岛山东大学，也是恭三给我的信。在几年的校长室秘书职务中，恭三说，并没有聘书或者什么委任状。几年的辛苦，无偿的劳动，只是靠师生的感情互相信任上，在政治上无任何牵连，而在学术事业上，却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虽然如此，恭三还是著作等身，是我国中古史，尤其是宋史的一代大师，权威学者。我读过他许多文章与著作，最初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论文，是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集）一文。我不研究宋史，但因研究宋代理学思想，我必须接触宋史，而那些人物的一系列官衔，我始终弄不清他们的职责是什么，看《宋史职官志》也搞不清，而恭三的文章解决了此一复杂问题，好像一堆乱麻，被他理出头绪来。我和恭三见面，就说他作了一件大好事，使我读懂了《宋史职官志》。看好这篇文章的人不在少

数，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黼，当他已经作官后，一次看到傅孟真先生，还称道这篇大作。原来恭三研究《稼轩词编年笺注》时，也曾经得到陈寅恪先生的好评。

现在在我手头的还有恭三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岳飞传》，这是一部名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1985年4月第二次印刷时是176000册。学术著作，一次印刷十七万册，这是少见的数目，从数目上看，也可以知道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恭三在1982年1月为这部书改写后作的序言中说：

我的愿望是，通过这本书，能把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勾画出来，把他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都能如实地、真切地描绘、表达出来，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我恳切盼望亲爱的读者，直接了当地以我的这种愿望作为衡量的尺度，把我所写的这部书加以衡量，看看其中与我的愿望相符合或不相符合各有几多，而凡是其不相符合的地方，都请给予指明和教正。

这部书的写作是成功的，他的确给予“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

另一部是在恭三逝世前不久改写的《王安石》。在七十年代，恭三曾写出过“王安石”；这次是他在重病前改写，他在改写过的版本内附志中说：

我从今年（1997年）七月初至今一直住在医院内，本书得以顺利面世，实有赖于多方帮助。

恭三是本年（1998年）1月10日离开我们，而他在此前的半年间始终在病中，在病中他也没有忘却学术研究。这给人们一种启示，研究学问是终身事业，恭三的行为给人们树立了榜样。

但我对恭三这部大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他对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的评价过低。我在学术事业上敬佩司马光，在中国史学史上，前后两司马，司马迁与司马光的《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不朽的著作，是史学领域内的“经典”，因之我对于他们的人格也敬礼有加，不愿意看到对他们的贬辞。我曾把这种意见向老友何兹全教授说：“我不同意恭三对司马光的评价，不能那样贬低他。”兹全兄答复得好：“司马光不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位学者，不必在政治上对他有过多的要求。”我同意这种意见，心中也就“释然”了。

数，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黼，当他已经作官后，一次看到傅孟真先生，还称道这篇大作。原来恭三研究《稼轩词编年笺注》时，也曾经得到陈寅恪先生的好评。

现在在我手头的还有恭三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岳飞传》，这是一部名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当1985年4月第二次印刷时是176000册。学术著作，一次印刷十七万册，这是少见的数目，从数目上看，也可以知道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恭三在1982年1月为这部书改写后作的序言中说：

我的愿望是，通过这本书，能把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勾画出来，把他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都能如实地、真切地描绘、表达出来，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我恳切盼望亲爱的读者，直接了当地以我的这种愿望作为衡量的尺度，把我所写的这部书加以衡量，看看其中与我的愿望相符合或不相符合各有几多，而凡是其不相符合的地方，都请给予指明和教正。

这部书的写作是成功的，他的确给予“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

另一部是在恭三逝世前不久改写的《王安石》。在七十年代，恭三曾写出过“王安石”；这次是他在重病前改写，他在改写过的版本内附志中说：

我从今年（1997年）七月初至今一直住在医院内，本书得以顺利面世，实有赖于多方帮助。

恭三是本年（1998年）1月10日离开我们，而他在此前的半年间始终在病中，在病中他也没有忘却学术研究。这给人们一种启示，研究学问是终身事业，恭三的行为给人们树立了榜样。

但我对恭三这部大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他对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的评价过低。我在学术事业上敬佩司马光，在中国史学史上，前后两司马，司马迁与司马光的《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不朽的著作，是史学领域内的“经典”，因之我对于他们的人格也敬礼有加，不愿意看到对他们的贬辞。我曾把这种意见向老友何兹全教授说：“我不同意恭三对司马光的评价，不能那样贬低他。”兹全兄答复得好：“司马光不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位学者，不必在政治上对他有过多的要求。”我同意这种意见，心中也就“释然”了。

悼念邓广铭先生

季羡林

我认识恭三（邓先生之字）已经颇有些年头了。因为同是山东老乡，我们本应该在二十年代前期就在济南认识的。但因他长我四岁，中学又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在那里竟交臂失之，一直到了三十年代前期才在北京相识，仍然没有多少来往。紧接着，我又远适异域，彼此不相闻者十余年。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来北大任教，当时恭三是胡适之校长的秘书。我每到沙滩旧北大子民堂前院东屋校长办公室去找胡先生，当然都会见到恭三，从此便有了比较多的来往，成了算是能够知心的朋友了。

恭三是历史学家，专门治宋史，卓有建树，腾誉国内外士林，为此道权威。先师陈寅恪先生有一个颇为独特的见解。他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复振”的希望有一部分他就寄托在恭三身上。他接着写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学力。“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恭三就属于这仅有的“几人”之列。对于《宋史职官志考正》一书，陈先生的评价

是：“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是极高的评价。熟悉陈先生之为人者，都知道，陈先生从不轻易月旦人物，对学人也从未给予廉价的赞美之词。他对恭三的学术评价，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

近些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者，大都有后继乏人之慨叹。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确实值得人们的担忧。阻止或延缓这种危机的办法，目前还没有见到。有个别据要津者，本应亡羊补牢，但也迟迟不见行动，徒托空言，无济于事。这决非杞人忧天的想法，而是迫在眉睫的灾难。我辈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虽然知之甚悉，忧之极切，也只能“惊呼热中肠”而已。

在这样的危机中，宋史研究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恭三是有福的。他的最小的女儿邓小南，女承父业，接过了恭三研究宋史的衣钵，走上了研究宋史的道路，虽然年纪还轻，却已发表了一些颇见水平的论文，崭露头角，将来大成可期。恭三不出家门，就已后继有人，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或九天上了。我也为老友感到由衷的高兴。

恭三离开我们时，已经达到九十岁高龄。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我还想不起，哪一个学者曾活到这般年纪。但是，从他的身体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上来看，他本来是还能活下去的。他虽身患绝症——他自己并不知道——，但在病床上还讲到要回家来写他的《岳飞传》。我们也都希望，他真能够“岂止于米，相期以茶”。即使达不到108岁的茶寿，但是99岁的白寿，或者100岁的期颐，努一把力，还是有希望的。可是死生之事大矣，是不能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含恨同他告别了。

回忆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让我时有凄凉寂寞之感。解放前在沙滩时，我们时常在一起闲聊，上天下地，无所不聊；但

悼念邓广铭先生

季羡林

我认识恭三（邓先生之字）已经颇有些年头了。因为同是山东老乡，我们本应该在二十年代前期就在济南认识的。但因他长我四岁，中学又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在那里竟交臂失之，一直到了三十年代前期才在北京相识，仍然没有多少来往。紧接着，我又远适异域，彼此不相闻者十余年。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来北大任教，当时恭三是胡适之校长的秘书。我每每到沙滩旧北大子民堂前院东屋校长办公室去找胡先生，当然都会见到恭三，从此便有了比较多的来往，成了算是能够知心的朋友了。

恭三是历史学家，专门治宋史，卓有建树，腾誉国内外士林，为此道权威。先师陈寅恪先生有一个颇为独特的见解。他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复振”的希望有一部分他就寄托在恭三身上。他接着写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学力。“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恭三就属于这仅有的“几人”之列。对于《宋史职官志考正》一书，陈先生的评价

是：“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是极高的评价。熟悉陈先生之为人者，都知道，陈先生从不轻易月旦人物，对学人也从未给予廉价的赞美之词。他对恭三的学术评价，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

近些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者，大都有后继乏人之慨叹。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确实值得人们的担忧。阻止或延缓这种危机的办法，目前还没有见到。有个别据要津者，本应亡羊补牢，但也迟迟不见行动，徒托空言，无济于事。这决非杞人忧天的想法，而是迫在眉睫的灾难。我辈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虽然知之甚悉，忧之极切，也只能“惊呼热中肠”而已。

在这样的危机中，宋史研究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恭三是有福的。他的最小的女儿邓小南，女承父业，接过了恭三研究宋史的衣钵，走上了研究宋史的道路，虽然年纪还轻，却已发表了一些颇见水平的论文，崭露头角，将来大成可期。恭三不出家门，就已后继有人，他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或九天上了。我也为老友感到由衷的高兴。

恭三离开我们时，已经达到九十岁高龄。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我还想不起，哪一个学者曾活到这般年纪。但是，从他的身体状态，特别是心理状态上来看，他本来是还能活下去的。他虽身患绝症——他自己并不知道——，但在病床上还讲到要回家来写他的《岳飞传》。我们也都希望，他真能够“岂止于米，相期以茶”。即使达不到108岁的茶寿，但是99岁的白寿，或者100岁的期颐，努一把力，还是有希望的。可是死生之事大矣，是不能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含恨同他告别了。

回忆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让我时有凄凉寂寞之感。解放前在沙滩时，我们时常在一起闲聊，上天下地，无所不聊；但

是聊得最热烈的,却是胡校长竞选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和传说蒋介石放出风来有意推胡为总统的事。我们当时政治觉悟都不够高;但是,以我们那种很低的水平,也能够知道蒋介石之心是路人皆知。可笑或可悲的是,聪明如胡先生者竟颇有相信之意。我们共同的结论是,胡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的,是一个书呆子。

以后不久,我同恭三等一批也是书呆子的人,迎了解放,一时心情极为振奋。1962年以后,朗润园六幢公寓楼落成,我们相继搬了进来。在风光旖旎的燕园中,此地更是特别秀丽幽静。虽然没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却也有茂林修竹,翠湖青山。夏天红荷映日,冬日雪压苍松。这些当然都能令人赏心悦目,这已极为难得。但是,光有好风景,对一些书呆子如不佞者,还是不够的,我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陶渊明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这正是我所要求的,而我也确实得到了。当年全盛时期,张中行先生住在这里,虽然来往不多;但是早晨散步时,有时会不期而遇,双方相向拱手合十,聊上几句,就各奔前程了。这一早晨我胸中就暖融融的,其乐无穷。组绀是清华老友,也曾在这里住过。常见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头儿,独自坐在湖边木椅上,面对半湖朝日,西天红霞。我顾而乐之,认为这应当归入朗润几景之中。“素心人”中,当然有恭三在。我多次讲过,我是最不喜欢拜访人的人,我同恭三,除了在校内外开会时见面外,平常往还也不多。四、五年前,我为写《糖史》查资料,我每天到北大图书馆去一趟。回家时,常在路上碰到恭三,他每天上午十一点前必到历史系办公室去取《参考消息》。他说,他故意把《参考》订在系里,以便每天往还,藉以散步,锻炼身体。两个耄耋老人每天在湖边相遇,这也可以算是燕园后湖一景吧。

然而,光阴荏苒,时移世异,曾几何时,中行先生在校外找到房子,乔迁新居。虽然还时通音问,究亦不能在清晨湖畔,合十微笑了。我心头感到空荡荡的,大发思古之幽情。但是,中行先生还健在,同在一城中,楼多无阻拦,因此,心中尚能忍受得住。至于组绀和恭三,则情况迥乎不同。他们已相继走到了那一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永远,永远地再也不回来了。此时,朗润园湖光依旧潋滟,山色依旧秀丽,车辆依旧奔驰,人物依旧喧闹。可是在我的心中,我却感到空虚、荒寒、寂寞、凄清,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概,真想“独怆然而涕下”了。默诵东坡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聊以排遣忧思而已。

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四大发明,震撼寰宇,辉煌千古,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我只谈一个词儿:“后死者”。这在世界上其它语言中还没有碰到过。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儿。但仔细一探究,却觉其含义深刻,令人回味无穷。对已死的人来说,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个“后死者”。可这个词儿里面蕴含着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已死者活在后死者的记忆中,后者有时还要完成前者未竟之业,接过他们手中曾握过的接力棒,继续飞驰,奔向前方,直到自己不得不把接力棒递给自己的“后死者”,自己又活在别人回忆里了。人生就是如此,无所用其愧恨。现在我自己成了一个“后死者”,感情中要承担所有沉重的负担。我愿意摆脱掉这种沉重的负担吗?我扪心自问:还不想摆脱,一点摆脱的计划都没有。我愿意背着这个沉重的“后死者”的十字架,一直背下去,直到非摆脱不行的时候。但愿那一天晚一点来,阿门!

怀念恭三兄

何兹全

恭三是我北大史学系同学，也是我山东同乡。我是1931年考进北大，他是1932年考进的，晚我一年。

恭三聪明，很有才华。1930—1931年他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周作人到校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恭三作了详细记录。讲完后，恭三整理他的笔记，由周作人校阅后出版。稿费，周作人没有收，送给了恭三。后来恭三告诉我，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廿四史。我在他屋里看见过这部书，纯白的书皮，非常雅。我很佩服他的写作能力。当时我想，这记录，我记都记不下来，别说出版了。

后来再见面，已是1939年后在重庆了。国民党CC派的刘百闵，主持“中国文化服务社”。山东同乡窦子洪作副社长。他们要办个杂志《读书通讯》。不知谁推荐了我去作主编。我和刘百闵不认识。在武汉时（1938年），我主编《政论》半月刊。因为《政论》是陶希圣支持下办的，我在国民党宣传圈里小有名气，刘百闵就请了我。我只作了些筹备工作，约人写稿，我也写了一篇如何读书的文章，因小儿芳川生病，我就丢下《读书通讯》离开了中国文化服务社。接我的手去主编《读书通讯》的就是恭三。《读书通讯》的第一期创刊号上还有我那篇文章。

他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教书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作编审，他有时到重庆，我们还见过面。大约也是这时，他送我一本他写的《宋史职官志考正》。这篇文章引起我很大感慨。同时代的北大同学，很多都在研究单位作研究，或在大学教书。读书，写文章，学问一日千里。而我却在衙门里混饭吃，写总理（孙中山）说了总裁（蒋介石）说。（我在训练委员会作编审，写了两三本《地方经济建设》、《乡镇财政》等书，供地方训练团作教材用。书中引孙中山、蒋介石的话作依据。）同在训练委员会作编审的还有好友北大同学萨师炯（1936年政治系毕业）。每逢遇到恭三，我们两人都要感慨一番。

1947年我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我需要的证件、成绩单，都是通过恭三给我要出来的。那时他正一面在北大史学系教书，一面任胡适之校长的秘书工作。适之师还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古德瑞赤（Goodrich）教授，这也是恭三给我办的。

1950年我从美国回国，联系工作。我去东厂胡同近代史所宿舍去看恭三。他告诉我顾颉刚先生刚到北京，说顾先生和北师大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关系很好，北师大也正需要教师，要我去看顾先生。顾先生为我向白寿彝主任写了信，我于是进了北师大。当时我也正联系着去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工作，都无头绪。饮水思源，能留在北京，到北师大工作，不能不想到恭三指我一条明路。

解放后，史学界常常有会。因此，和恭三碰头见面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运动也多，越运动胆越小。除却会上谈问题外，朋友间话越来越少。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间的私人来往越来越少了。

1967年夏，“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已经受过一次冲击，进入解放状态，受命去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标点工作。那时中华书局在翠微路。我到的时候，恭三、苑峰（张政娘）、邵循正、唐长孺等已先到了几天。

这群釜中游鱼，虽然心情都很沉重，不知明日命运如何，但老知识分子在经过轻重不等的冲击之后，又忽然聚头一处，自不免特别亲热。有一天我的眼镜坏了，我没有带备用眼镜，去恭三屋里求助。恭三和山大高亨教授坐对面，争着把他们的备用眼镜拿出来给我用。

我们在中华书局大约有半年左右。不久就一个个的由各校往回揪了。最早被揪回的，我记得是武大的姚薇元教授。其后不久，就是北大的邵循正教授和恭三，再不久，就是我。恶鬼，地狱，在向我们召唤。我和恭三还有那几位朝夕相处的老知识分子（其实我们那时都只是五十多岁的人，并不太老），都是命运相连的苦命人，是一堆别有意义的“生死之交”。

再见面，好像是80年代初了。教育部召开招收博士生的会议。会是在京西宾馆开的，郑天挺（毅生）师是历史组的召集人。恭三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四人帮垮台后（1976年），也许已见过面，但印象不深了。这次会开的是很欢畅的。我们都住在京西宾馆，会前会后，早早晚晚，聊天的机会很多。会上要评审博士生导师，全国各高等院校都送来很多材料，要一份份的看，一人一人的讨论。我那时刚刚由副教授改为教授不久，我的材料封面还多有副教授的痕迹。恭三很奇怪，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你不知道？我作了三十年副教授了！

在这次会议上，恭三和我都被评审投票通过为第一批历史学博士生导师。

恭三研究宋史，我学魏晋南北朝史、社会经济史。专业不

同，学术上交流不多。我问过他两个问题：岳飞出身农民，可能没有读过书，他如何能写出《满江红》和“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我记得他告诉我：《满江红》是岳飞写的，他从军作官后，自学的学问。“还我河山”是清末民国初年才传出来的，以前没有记载也没人说过。

但我也读过恭三的一些宋史著作，如《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岳飞传》等。我在历史方面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北宋之差役与雇役》，我对宋史还是有兴趣的。我觉得恭三在宋史研究方面，造诣是很高的，既博且深。1991年，我去日本访问，东京大学教授尾形勇介绍我去东洋文库，称我为中国历史界“长老”。我对这两个字很欣赏。回国后还特请人给我制了一方“长老之印”。我实在不够格称“长老”。恭三治宋史，桃李满天下，是堪称“长老”的。特别应使他安慰的，是他的小女儿小南，聪明，有才华，继承父业，在宋史方面已是为人称赞的新秀。他年，定能青出于蓝。我愿小南努力，恭三兄在天有灵，也一定高兴。

1998. 4. 10

忆邓公

邢其毅

我和邓先生既非同行，又非同学，我们相识是在五十年代三校合并初期。北大由沙滩迁到燕大旧址并新建了中关园教职员宿舍，其中有两幢楼房中间有一个小食堂的公寓（北大称之为第一公寓）。我当时住在最东侧，邓先生住在西侧。我们有时同在一桌用餐，因此逐渐相识。他比我长四岁，他学历史，我学化学。两个学科虽毫无共同之处，但历史知识却是每人都有点的。在化学上，他没有问过我什么，但是就历史常识而论，我可以称他为老师。我们年龄相差不多，彼此称先生，就觉得太客气一点，若称广铭，似乎不太亲切，后来不知不觉地彼此都以邓公或邢公相称，并且觉得这样很合适，比较风趣。

在第一公寓我和他比邻相居，仅一厅之隔，后来他迁到朗润园，我迁到燕东园，彼此一墙之隔，但须绕路，因此见面的机会就少了。真有点咫尺天涯之感！我把他当老大哥看待，每年至少要见几面，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而总是我去看他。和邓公相识不久后，有一次我们一同在朗润园参加余嘉锡先生的丧礼。余老先生和我父亲是乡榜同年，他的公子余逊（让之）先生（也是北大历史系的教授）应称我父亲为年伯。记得那天到余家参加吊唁的有翦伯赞、杨人梗、向达、邓公和我，而我是代表我父亲，他因路远，没有能来。我和这么一批

历史巨匠相遇，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机遇！这里除杨人梗（他已去世多年）和我相识，和其他几位，并无来往。只有和邓公的交往，一直保持到他最后一息！

邓公为学不倦，生活简朴，家中除大批线装书外，桌上总是堆满了纸张稿件，有时椅子上也是书，需要临时腾出坐的地方。无处存书目前是很多教师的一个普遍问题，受到了空间很大的限制，已无法“向上发展”。他的工作室中挂的几个轴幅，为胡适、郭沫若、陈垣等所书，多半是落款邓公的字号“恭三”。他们对他的工作评语是“功力甚深”。我想这些条幅绝不是一般的装饰，而是老前辈们对邓公学术成就的称赞和鼓励。

我们会面时，多半是不着边际地闲聊一阵，当然也偶尔会涉及到一些大事。我记得苏联解体后二日，我恰好和他在未名湖畔相遇。邓公在世时，往往每天下午自己去取《参考消息》，有时彼此相遇时，总是我送他回家。那天相遇，不约而同的都觉得苏联事件简直是一夜之间，换了人间！我问他将如何理解“你不打，他不倒”那句话，当时我们也未得出一个答案。后来我们才逐渐明白，打还是打了，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我的历史知识非常有限，有些是和广大群众共同的问题。如关于岳飞《满江红》的争论，邓公精心考证，根据岳飞在世时的题壁，确证那首悲壮爱国的名词只能出自岳大将军之手。所以我觉得邓公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家，还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历史宣传者。他写辛弃疾而未写苏轼，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苏辛二人都是宋代伟大的词家，对这两位大家的成就，专家们所见不同。但对一般人来说，苏的文、词、书、画对后代的影响，则较辛更为深远。直到今日不少的老小都能背诵几句苏的名句。他的书画，成为皇家收藏的至宝。能不能说苏在文艺史上是位大师，而在政治上是个失意人物，没能发挥什么

作用，是个小学生。在我和邓公谈话之中，他对苏在文艺上的成就，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不像王夫之那样，把苏说得一无是处，说他“志放于雕虫之技，以耸天下而矜其慧”，说他关心的就是“酒食、佚游、宠禄、祸福”而已，我想这样对待苏是不够全面的。历史是一面不完整的镜子，全面否定或照抄都是错误的。和邓公的交往中，使我更感到读史的重要，现在的青年，元明清都不太清楚，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点问题。

我和邓公在多年的风风雨雨中，相对来说，我遭受的苦难更多一点，“文革”中，我和他是难友。关在同一牛棚，但不睡在一个通铺上，虽然天天相见，但只能彼此报之以目，否则就会遭到耳光之祸！仅有一次，我们到南口分校劳动，二人单独锄地种番薯。他问我“化学系来的多不多？历史系可一个也没刹，都进来了！”我说“化学系已死了两个”，彼此苦笑！

我们生活都很简单，从没有在彼此家中便餐过一次。我唯一的一点嗜好，就是喝点龙井茶。早年的学生和茶园相识，每年新茶上市，总替我买到便宜的龙井。后来涨价，真正的上品大半是出口或招待外宾。但是碰巧，邓公和杭州有点关系，岳坟正门内的匾额是邓公的大笔，每年他可享受新茶。他总是记着我，分给我一点，这是最难得的礼物。除此之外，每到他家中，还可多尝一杯。

他病前不久，还在写文章，我劝他宝爱身体，但是他说他不服气，还是要写。至于要写什么，我全忘了。自他住院以后，一城之隔，来往就更不方便了，最后去看过他一次，人还清楚，但说话已不太方便了，只能多看他一下，没有能和他握手，从此永诀！

送指路人

金克木

邓恭三（邓广铭）比我年长五岁，是我结交六十多年的老友，又是让我知道学术道路的最初指路人。他走了。我在随他去以前理当说几句话为他送行。

1935年我进北大图书馆当职员，管借书还书。有一天，一个借书人忽然隔着柜台对我轻轻说：“你是金克木吧？你会写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这个某某人的名字我没听清，不知道是谁。他以为我知道，我也就没问。从借书证上我看出这个人是史学系四年级学生邓广铭。我感到奇怪。我只有发表不多的新诗和翻译署这个名字，乱七八糟的文多半用笔名，而且是朋友拿去登在无名报刊上的。他说的那个人是谁，怎么会知道，而且告诉他我在这里？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过他。他也不会想到有这种问题。从此以后，他来借书时往往同我说几句话。有一次竟把他的毕业论文稿带来给我看，就是他在胡适指导下作的《陈亮传》。这是第二次我见到同类清稿。第一次是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徐芳女士，新诗人。她的论文是《中国新诗史》，也是胡适指导的。她有意无意把论文放在柜台上让我看见，由此互相认识。那不奇怪。我明白，她是为了显示自己是才女。邓给我看论文是什么意思？我从未想起去走什么学术道路，也不知道那条路在何方。万想不到他是来给我指路

的。至今我也不敢说自己真是走上了学术正路。后来有一次他在我下班时来，一同走出馆外，走向红楼，在十年后有“民主广场”之名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北大操场上边走边谈。他谈起怎么写了一篇书评，评论一位名人的有关宋史的书。那时规定学生要做读书报告，他便交上这篇文，得到文学院长胡适赏识并鼓励他继续研究宋史。于是他写出《陈亮传》。现在发现宋史情况复杂，资料太多，问题不少，主要是对从东北南下的辽、金的和、战问题。他决心毕业后有条件就继续研究，不过一生也未必能解决多少问题。穿过红楼到了校门口分别时，我说，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宋朝。彼此苦笑而别。当时日本已占领东北，河北省已有一部分变相沦陷，几个月后就扩大到华北。“一二·九”学生运动由此爆发。再一年多，全面抗战开始了。现代毕竟不是宋朝。但我们那时怎么能够预料到，不过十年（1935—1945）全世界就有翻天覆地大变化呢？从此我知道了邓不仅专心学术，而且是爱国志士。

又有一次，他拿来一本装订成册的铅印的讲义给我看。原来是傅斯年讲的中国文学史。我说，傅是五四运动的《新潮》派，怎么留学回来成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说：“你先看这本书，看他有没有学问。”我拿回去一看，不像讲义，是一篇篇讲演稿或笔记。开头讲《诗经》的“四始”，说法很新，但我觉得有点靠不住。看到后来种种不同寻常的议论，虽然仍有霸气，但并非空谈，是确有见地，值得思索。现在隔了大半个世纪，内容几乎完全忘了，但还记得读他比较唐宋诗那一段时的兴奋。真想想不到能这样直截了当要言不烦说明那么范围广大的问题，能从诗看出作诗人的心情、思想、人品，再推到社会地位、风气变迁，然后显出时代特征，作概括论断。尽管过于简单化，不免武断，霸气袭人，但确是抓住了要害，启发思

索。举出例证仅有两首七律，一首是唐代温庭筠的，末句是“欲将书剑学从军”。另一首是宋代黄庭坚的，末句是“暮窗归了读残书”。单从这两句就可以看出明显是两个时代两种文人的心声。这是精心挑选的典型例子。我由此联想晚唐李、杜，盛唐李、杜，初唐王勃，想到宋代苏东坡、陆放翁，回想这些人的诗，再加上两代的文，韩、柳、欧、苏，从记忆中寻找同例、异例，发现双方虽有交叉，而差别显然。又想到以前翻看过的顾亭林的《日知录》，才知道，举例何必多，再多也全不了，靠的是读者自己去思索，去查对。知者可以举一反三，不知者多举例也无用。重要的是顾所谓采山之铜，不重复别人。我还发现傅的比较法并非泛泛。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会有发现。若没有发现，那研究什么。科学的比较不是任意拉扯猜测，看来容易，其实极难。费大力研究的结果可能只需要几句话就讲出了要点。我只在幼年读过旧书，那几年只读洋书，但凭记忆所及就觉得傅的说法虽未必是结论，但确实是独具只眼，能引起人思考问题。于是觉得，学术研究不能要求到我为止，认为我所说的就是最后定论。切实的研究恐怕只能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出新，而新的又不一定全盘推翻旧的。研究学术问题好像是没有终点。看来是终点的实在是新的起点。记得我那晚边看边想，竟忘了照例的读外文小说。可是我还书时，两人只有这样两句话：“有学问？”“有学问。”接着他又谈他的计划，打算申请“庚款”资助，专心研究辛弃疾的词和生平事迹，说起研究这一课题的价值和困难等等。

这时他已毕业留校，属于文科研究所，但还没有交出学生宿舍房间，所以有一次邀我晚上到他住处去畅谈。我去时一看，室内还有两人，都是他的同班同学。一是傅乐焕，一是张政烺。经他介绍后，他们好像跟我早已熟识，继续天南地北古

今中外漫谈。不知怎么忽然说到地理，我插话问起现代的地图画法，怎么把球面改成平面，怎么画出经纬度。傅一听就在桌上书堆里翻出两本书递给我，说：“这是投影问题。这两本小书简单明了，容易懂，你看过就明白了。”我接过一看，是德文的，里面有数学公式和一些图，当然我看不懂，翻翻就还他。也没人问我什么，大家仍接着原来的话题谈。我发现他们虽然同班上课四年，所学却大不相同，都不是照着老师教的图样描画，而是自辟道路。张熟悉古董古书。傅通晓中外史地。邓专心于中国中古史。可是彼此互相通气，并不隔绝。古典、外文，随口出来，全是原文，不需要解释，仿佛都是常识。他们对我毫不见外。明摆着我懂德文和数学，也无人在意，好像认为会是当然，不会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不久就要各自西东，所以大家谈得很热闹。我不觉拘束，没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学识远不如他们。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青年学者的风度不是随时、随地、随人都能见到的。恭三这时已经结婚，在宿舍只是挂名。他回家，我也一同走了。那一晚我见到三个不通人情世故不懂追名逐利的青年。以后这三人果然都成为学者。十分可惜的是，我听说，傅乐焕留学回国后在五十年代由不幸遭遇而自动离开世界。邓如今又去世，三人行此刻仅有张君了。

这段时间我和恭三经常见面不是仅仅空谈，也有实际作为。从一开始他就对我说，天津《益世报》有个《读书周刊》，由历史系教授毛子水主编，实际上是四个四年级学生每周轮流编辑。他是其中之一，每月轮到一次，要我写文章。他不想在这方面多花时间，也不习惯写这类报纸文体，最好我能给他帮忙，经常供给稿子。我说，我现在只看外国书。他说，谈洋书也行。不过报纸是天主教办的，别沾宗教，莫论政治，小小冒犯政府不要紧。于是我写了一些长长短短与书有关的文，每篇

署上不同笔名。我随时交，他随时登，也不修改，还说是我帮助他省下不少写稿约稿时间。记得我写过短文，据英译本介绍俄国史诗《伊戈耳远征》，谈俄国无政府主义女革命家的《薇娜自传》（近年才有巴金译本）。还引过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通报》上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话，发挥几句。他说郭有中国学者所缺少的“科学的想象”，这指的是什么？我借此把当时被通缉逃往日本东京的郭沫若的名字点出来。现在的人不会感觉到，以上说的这些在那时都是犯忌讳的，许多报刊不会登出的。我也写文对名人提过意见，评过邓认识的人的书，自然用的都是笔名。被评的人不知道，不注意。毛主席说过什么没有，邓没说，我也不问。只有一次不同。不妨多说几句。

“周作人讲演，邓恭三笔记”的《中国新文学源流》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周提出“言志”和“载道”对立，提倡晚明小品。这不仅产生争论，而且引出大量古典小品纷纷上市。我对邓说，这是你闯的祸。他说与他无关。他不过整理笔记给讲演者看过，出版者出书赚钱，他得稿费买了一部二十四史，如此而已。文坛上风波怎么能涉及他？我说，不错。梁漱溟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罗常培笔记的。罗不讲哲学。笔记者不对书的内容负责。你没有提倡那种小品文，也不写。可是如今这种小品成为大潮了。其实依我看，“言志”仍是“载道”，不过是以此道对彼道而已，实际是兄弟之争。他叫我写成文章看看。我知道他又借此约稿，便说，写也是白费力气，你能登？他说：“你写，我就发，只看你怎么写。”于是我写出了《为载道辩》，将近万言，没署笔名，交给他。话虽说得婉转，对周仍是有点不敬，以为不会发表。可是全文登出来了，一字未改，占了整整一期。我没问他，毛子水主编和周作人对此文有

什么意见。后来见面时他笑着说：“朱自清以为那篇文是毛子水写的。每月照例由毛出面用编辑费请客，四个编辑也参加。朱来了，对毛说，他猜出了那个笔名。五行金生水，所以金就是水。当然毛作了解释，说那不是笔名，是一个年轻人。”

这样，由于恭三，我为《读书周刊》写文，又常听他的议论，多少沾上了一点学术的边。他使我望见了所谓学术道路和学者的基本功夫，不过我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学者。那太难了。我知道自己不行。恭三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他给我指路。我好像没有真正走上去，走的不像是他指的路。现在他休息了。我就讲这指路故事为他送行。

1998. 7

纪念邓先生

——周一良

邓先生去世已经半年多了，我在哀悼之余时时感到有些歉疚。因为在他弥留之际，我没有赶去和他诀别。他的噩耗和追悼会的日期，因我当时在病中也被瞒过了。当然我不良于行，也不一定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但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

在1997年的9、10月间，我们两个人同住在友谊医院，病房在上下层，曾经彼此互相串联过，而且一同照了一张相。我想这张相恐怕就是邓先生最后的遗影了。

我和邓先生认识是在1946年，但是熟起来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我调到新北大以后的事情。这40多年来，我们两个人的交往并不密切，但是我觉得彼此相知还是很深的。

邓先生庆祝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后来没有写成，这篇文章的主题我想就是“邓广铭是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邓先生研究宋史，不像一般人那样只注重北宋，他是既研究北宋，又注意南宋。比如说他研究岳飞、辛弃疾、陈亮，都是南宋的人。再从研究范围来说，他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战争，研究典章制度，也研究学术文化。特别难得可贵的是，他还笺注过辛弃疾的词，这在一般的历史学家是很少见的。所以，他在史才、史学、史识这三方面都是很有特长的。他的考证是很精确

的。早在学生时代，邓先生就受知于胡适之先生，陈寅恪先生和傅孟真先生。他的史识从议论到分析都是很宏通，容易接受的。另外，他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所以我说他在史学、史才、史识三个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这是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难做到的一点。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能够既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

邓先生之所以难能可贵，还在于他的勤奋。他的考证之学，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前辈学者的赏识。他到老勤奋到底，孜孜不倦，一直到他去世前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在研究《辨奸论》，写文章与人讨论，这一点也是非常宝贵的。他曾经说，“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要把有限的余年用来修改我的书，把它修改得更加完善一些。”这一点也非常难得。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首先抓的是人才。他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充分利用人才，来办好这个系。

首先是任用张广达先生的例子，张广达先生是研究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的，但是长期以来，他被错误地用作一个俄文翻译，不能发挥所长。邓先生当了主任之后，决定让他放弃被强迫压在身上的任务——俄文翻译，而去做他的本行——多年研究颇有心得的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

同时，为了加强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他又从山西请来了王永兴先生。王永兴先生因为右派夫人之累，被下放到山西农村，穷愁潦倒，不为人所知，简直连研究工作都无法进行。邓先生把王先生聘到北京，让他和张广达先生一起来搞隋唐史和敦煌研究。王永兴先生开了隋唐史的课，也开了敦煌学的课，

同时培养了大批对敦煌学有兴趣的学生，还主办了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刊物，出了5期之多，在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方面立了很大的功劳。

还有关于吴小如先生的例子，吴小如先生想要离开中文系，离开北大，到中华书局去工作。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很着急，想挽留吴先生，邓先生更极力主张要把吴先生请到中古史中心来。因为我们觉得吴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各个段都能挑得起来，同时他对文字、训诂各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对于我们的青年教师和同学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和邓先生都去见了校领导，反复陈词，要求把吴先生留下，作为中古史中心的一个教员，让他发挥作用。这也是邓先生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对我的任用，邓先生也尽了很大的心。我记得在1981年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有人提出我应该作博导，也有人反对。邓先生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去找了领导，反复地陈说，一定让我参加第一批的博士生导师，这样我就当了博导。

作为历史系主任，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方面，邓先生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历史系有很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中古史研究中心。在78级的毕业生中，中国古代史出现了不少非常优异的学生，但系里教员编制有限，不能都留下，邓先生感到非常可惜，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为系里储备人才，建议设立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先生当初是想仿照史语所的办法，用自由与强制相结合，就是在研究方面没有任何条条，没有任何拘束，自己愿意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完全自由，但是又必须每天都到办公室来，大家一起坐下来研究，不能够自己藏在屋里，或者名义上搞研究，实际上是自由放任。当然后来没有能够照这个方法做下去。但是这个机构毕竟成立了，人才也留下了，而且也培养出来了。现在北大好几位破格提拔的教授，都

是从中古史中心里出现的。

由中古史中心，我就想到，当初翦老也有同样想法。当时有不少留学东欧的学历史的学生回国，一时没有课可教，没有地方可去，翦老就说应该把这批人养起来，让他们从事研究，将来有用的时候再来使用，所以后来就成立了研究室。可惜的是，当时的研究室没有像邓先生这样的业务上有威信的人来主持；同时，这批学生也参差不齐，不像 77、78 级学生水平那样高。所以，最后这个研究室没有能够作出什么成绩，人才逐渐流失了，没能完成当时翦老储备人才的想法。

邓先生担任系主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确实是做了几件重要的事件，对北大历史系的贡献是很大的，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邓先生年登上寿，实至名归，他的小女儿小南同志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已经有“很有威信的理论教员”的称呼。后来恢复高考，她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专业，毕业以后又留在中古史研究中心，这是邓先生内举不避亲的表现。小南同志出了一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的书，邓先生给她作了序。其中对于小南同志的工作有很高的评价。我们知道邓先生平常是不轻易夸奖别人的，他这样地对待他的女儿，说明他的女儿的水平确实是不错。邓先生虽然像他一千六百年前的本家那样“伯道无儿”，但是“中郎有女”，世其家学，而且显然能够发扬光大他的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大学问家有这样福气的并不多。邓先生应该是含笑九泉了吧。

1998年8月1日口述于朗润园公寓

(臧健笔录)

邓恭三先生悼词

——罗继祖

今年一月廿三日接到北京大学寄我的《邓广铭教授生平》一文，实以文代讣，告我恭三先生已于今年1月10日疾终京寓，寿九十一岁。我追念往事与恭三先生交接，承先生青睐逾于常格。我以一名素不知名之白丁，遽跻身于历史学界之林，参加了1963年都门中华书局《廿四史》校点工作之盛会，则全出于先生之一力推荐。实际我非才寡学，深负先生知遇。加以其间不幸染病，工作没能做好，成了羊公不舞之鹤，至今引为愧疚。

犹忆校史在京之日，值先生鼓盆之戚，与吉林大学同事李时岳暨先生助手何聪同往尊斋唁慰。光景为昨，而时岳已前作古人，何聪亦不知其存歿。“文革”后，遂与先生踪迹稀阔。

读先生著作《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及《岳飞传》，窃叹先生于天水史事致力深邃，非一般所及。最后读《王安石》，此书经先生再四改订，已臻完善。我于1987年撰《堽户录》有《宋朝家法》一则举荆公：“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原则，先生申论敢破宋朝家法者，前有寇准，后惟安石。见《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三期）。我赞叹说：“非深研宋代史学为恭三先生者，不能为是言也”。

我1981年即病耳聋，一直未愈，戴助听器亦无用，遂杜门不出，一切会议酬应皆谢绝，日惟与故籍笔砚为伍，欲知外事惟阅报与看电视耳。大连两度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受殖民地教育影响，学风不振，又耆旧日益凋零，故我素居深念，无以遣怀。前年某日见《光明日报》载先生于辑刊《四库存目丛书》提出自己的意见。时出版界不景气、讹言日出，营利者图出大部丛书可哗世网利。惟先生能烛其隐，以为醉翁之意别有在，非纯为学术计也；力主审慎别择，勿滥费人民币。我亟加附议以为“空谷足音”。奈辑刊已早有成议而罢。

去年我曾与先生通书一次。以五十年前辑录《辽史拾遗续补》所据家藏本李焘《长编》与一般浙局本有异处，当时未加深究，只以为浙局或有前后两本，字句有异，以告先生。先生颇留心此事，且疑寒斋曾藏有旧钞《长编》，以函见询。我家经乙酉（即日寇投降之年）之灾，藏书早已摧毁不存，无从查证，遂无以复先生。

先生耆年硕学，一代学人，为万流宗仰。我自闻噩耗，怆感百端。以闻讯已晚，又山川阻隔，病不能出，无由致鸡絮之敬。伸纸濡毫，用申哀悃，言未能尽，伏维垂鉴！

戊寅年二月四日于大连市白云山庄

恭三，你走了

——王铁崖

恭三，你走了，我想念你。我的年龄比你小，称你为邓公，表示尊敬，我尊敬你。

友谊有时很特别：深厚却又平淡。我们就是这样：从沙滩开始认识，见面聊几句，彼此谈得来，若续若断，五十多年了。

学不同行。我钦佩他，他尊重我，可是彼此不谈学问，也不互赠著作，像是友谊与学问无关。其实，学问溶化在谈吐之间，才有深厚的友谊。

院系调整后，我来历史系，我们又同在中关园第一公寓住家。见面机会多，却还是聊几句，说说笑笑。他喜欢我的二女儿小莉，常抚摩她的头；她则跑前跑后，跟邓伯伯捣乱。此情此景，还历历在目。

好景不长，在“反右斗争”中，我被打成“右派”。他从未把我当成“敌人”，但也不敢彼此来往。然后，我被调到法律系，接着是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大家多难，更没有什么往来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生活活跃起来了。其间，邓公和我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属社会科学组。开会期间，“同吃，同住，同开会”，朝夕相处，形影不离。邓公老成持

重，他的意见，我赞同；他的主张，我支持。我说是“马首是瞻”。在我们的谈话中，“马首是瞻”成了我的口头禅，深厚的友谊好像又加深了一层。

我们老了，我们都退出了全国政协。我们就很少见面，遇着学校召开会议的机会碰碰头。平时，偶尔通电话，互相问候而已。

去年，我当选为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法官。邓公来电，表示祝贺，说我老当益壮。我回答说，还要重温“马首是瞻”的旧梦呢。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通话，从此之后便再见不了面，也听不到声音了。

我出国前，他就病了。我在海牙，几次探问，都得不到好消息，今天初得到了他于一月十日病逝的噩讯，几十年老朋友一旦逝去，为之凄然。

我本想明年回国谋相聚，还期待着几年后祝贺他的百年大寿。这样想法破灭了，留下的是在心中默默地念道：恭三，你走了，我想念你。

悼念邓广铭兄

杨宪益

我与广铭兄神交已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我当时的好友向觉明那里听到他提起广铭兄的学识成就，但可惜无缘识荆。前两年，只在文化书院的一次聚会上，不知为什么大家谈到“文革”期间北大许多朋友的遭遇，听到广铭兄说起向觉明兄受到当时所谓“造反派”的迫害情况，当时又因为在座的人很多，没有机会同广铭兄交谈，今天回想起来，深以为憾。

我过去虽读书的机会不多，自己的文史知识也很贫乏，但也读过广铭兄的部分著作，尤其是他对辛稼轩词的研究，使我获益不少。我近来常想现在有一种风气很坏，不去认真读书，掌握足够资料，就乱发理论，自欺欺人。过去胡适之先生曾有感而发，提倡少谈什么主义，多掌握一些知识，这在当时曾被不少人批评责骂，说是反对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多掌握知识，再发表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先“格物”才能“致知”，“致知在格物”，也只是先掌握了“史实”才能有“史论”。中国人从古就是素朴的唯物论者，现在我们的共产党人从毛主席到小平同志也主张要“实事求是”。当然也有些学人食古不化，只晓得搜集大量资料，而没有任何个人见解，这种钻牛角尖的学究，古人曾讥之为“獭祭鱼”。广铭兄则完全不同，他不但掌握大量文史资料，有深厚的学识基础，而且有

精辟的个人见解，所以才成为当代研究两宋文史的专家，有这样的学术成就。

像广铭同志这样有学问又有见解的学人，今天是太少了。北京大学准备出版一本文集来纪念广铭同志，我也拉杂写几句，来表达我的哀思。

七月十三日晨

对学长的追念

——杨志玖

我和邓广铭先生是山东同乡，北大前后同学，34—37年在北大时，由于有同乡会，又是同系，时常见面，惜未多谈。但我们都知道他学问根底好，旧书读得多，已发表些文章，对有些教师的讲课能发现其不足之处。其时史学系同学同乡中有三位为大家称羨，邓先生是其中之一，另二位是张政烺和傅乐焕先生。

七七事变后，我随校由长沙迁到昆明，38年毕业后，于39年秋季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邓先生作为北大历史系助教，也在研究所，所址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都住所内，因而时常接触。当时在所内住的，有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历史系教授姚从吾、郑天挺等先生和英文系教师潘家训、袁家骅先生。他们在一桌用餐，我们研究生在楼外平房内用餐。陈寅恪先生很看得起邓先生，邓先生更尊重陈先生，他们相处很投缘。据寅恪先生于1942年初在广西桂林所写《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说：“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博精，愿得一见为幸。及南来后，同寓昆明青园学舍，而寅恪病榻呻吟，救死不暇，固难与之论学论史，但当时亦见先生甚为尘俗琐杂所困，疑其必鲜馀力，可以从事著述。殊不意其拨冗偷闲，竟成此篇。是其

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踰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此段前对《宋史职官志考正》的评语要点为：“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是陈先生对邓先生治学的最高评价。相信现代人读之，亦当为之心服。窃以为，邓先生不仅为建立新宋学的功臣，说他是新宋学的先驱、开创者，也不为过。

我在研究所学的是元史，导师是姚先生。宋史只在课堂上听过，任教后讲过，并未深入研究。74-75年间，南开历史系为教学需要，要编写《中国古代史》，唐宋元史由我执笔。我看到邓先生的《王安石》某处和北大的《中国史纲要》有所不同，写信向邓先生请教。他很快就回我一封信，说明上述两书的引文确实存在问题，准备于《王安石》再版时加以补救；信中还评《水浒》中的宋江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由此足见他对治学的认真和对老同学的热情关怀，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和欣慰。当时我住在公寓楼，79年后已搬在现寓所。自去年起，公寓楼已夷为平地，由日本爱知大学投资修楼为他们的留华学生作为宿舍。回想37年七七事变后，南开遭日本飞机轰炸，多处被毁，今天又在南开建设新居，不胜今昔沧桑之感！当然，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为，与今日不同，但抚今追昔之情仍油然而生。

拉杂写此，作为对我逝去的学长的追念。

1998年7月29日于天津南开大学北村寓所

博學於文 行己有恥

恭三先生標舉亭林宗旨平生志節盡在是矣蓋不道問學焉知德性先生考詢往古綜甄當世不擇捨不假借會合之際說一事豎一義吳然言之旁出記誦每有忘荅之致去春花下嘆俛仰六十四年遂隔人天念之滋然

一九九八年九月三日鵲記倩妻濤寫

几面之交怀邓老

李 锐

邓广铭先生大名久仰，但缘悭一面。这也难怪。他是著名学者，历史学家，而我多年做着开发水电的事情，可谓风马牛。由于性喜文史，终在离休后有了见面之缘。

缘分还要从一篇文章说起。1983年12月25日为齐白石120周年诞辰，家乡各界举行纪念活动，并在湘潭筹建纪念馆，我捐了一幅有关书画，还在198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文中谈到，1949年南下途中路过北平，买到黎锦熙、胡适、邓广铭合编的《齐白石年谱》，“对于这一位从细工木匠自学成才的艺术大师，对于他潜心绘事敝屣尊荣的风骨，敬仰之情不觉油然而生。”文章末尾写道：《年谱》是1949年3月上海商务出版的，已经很不容易找到。“我以为很值得重印。不知编者中的邓先生是否有意于此：将白石老人晚年事迹补写进去，使成全璧呢？”这本《年谱》约3万字。邓先生在跋中谈及，为了补充资料，他曾从老人朋辈的著作中去搜集，找过王闿运、瞿鸿禨、陈师曾等八个人的诗文著作，包括湘绮楼日记和全集，结果所得有限，全未采用。由此可见邓先生治学之严。我在文中的这个小建议，先生想必看到的；我完全不了解先生多年来从事的业务和著述，这种“建议”自然是过于随意性了。先生去世后我才收到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

选集》，书后所附的“著述目录”中，1949年并无《齐白石年谱》记载。

能有幸与邓老相识，是近几年的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后，有过一些聚会活动，如为年高德劭的学者做寿，有规模较大的宴会。在这种场合，必同邓老见面握手，互相问好，或交谈几句。我听人说过，他很称赞我写的《庐山会议实录》，认为是“真正的史笔”。有一次他还当面对我说：这本书是记当代史事的“第一本书”。

我不是治史的人。但回顾当代的曲折历史和一生的坎坷经历，所见所闻所感，觉得有责任如实地记录下来，也便是史，至少可称之为史料。对于这些史料，我有我的认识，评析得失，这就涉及史识。我深知治史之难，尤其当代史事，必须屏除各种顾虑杂念，乃至干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一有讳饰，便非信史。而中国向来的历史，最大的问题就是涂饰太厚，以致后人治史，要花很大的力气做去伪存真的工作。邓老一生学问的着力处，可说就在求真。例如他1961年写的《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结尾处，曾引用岳珂的一段文字来说明稼轩创作的态度。三十年后，又特为此文写了一段后记，说明据他研究，岳珂此段记述并不可靠。这是真正的科学家的态度，也为一位历史学家史德之所在。我非历史学家，能得到这位世人敬仰的史学大师的称誉，真是深感荣幸。

同邓老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1997年4月26日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中国文化书院为邓老90岁大寿，张岱年老88岁大寿，还顺便为宫达非和我的80岁，举行庆祝活动，共9桌宴席，到文化教育界人士近百人。邓老与我同桌，他精神很好，只是有点耳背，同我谈到：现在不搞运动了，经济在前进，但政治改革还没有跟上；又当面称赞我写的书有教育意义。席间

我应命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并念了为二老大寿做的一首七律（尾联是临时改动的）：

幸会群贤抒雅兴，玄思史笔两长庚。
曾经世纪同沧海，难避风涛是左倾。
争放争鸣空水月，不移不屈实书生。
少年立志求民主，到老自由仍怕听。

真没有想到这是同邓老的最后一面。曾想有机会向他多多请教，不意他竟遽尔仙逝，这使我怅怅无已，不知何以如此缘慳。

邓广铭先生去了，但他的风范，他的学问，他的史德，都将长存，激励后人去写作真正的信史，不去编造伪史、假史。

1998年6月11日

感皇恩

饶宗颐

挽邓恭三教授，用稼轩“闻朱晦庵即世”韵。
公三笺辛词，足与青兕同垂不朽矣。此词有疑，其中六字经后人妄增，公力证其真。余记建阳考亭，曾论此词，惜公未及见也。

六卷稼轩词，摩挲到老。欲向声诗悟原道。江河不废，说尽百年悲笑。白圭三复久，情偏好。

海国初逢，秋风皂帽。史界开疆绩非少。补天西北，且讽元嘉草草。休弹忆故人，悲难了。

无限的哀思

——悼念邓广铭先生

李 新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刘桂生在电话中告诉我，北京大学为了悼念邓广铭先生，希望我能为他写几句话。这时，我才知道邓广铭仙逝了！蓦然间，邓广铭的音容，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脑际，无限的哀思涌上我的心头。

19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后，吴玉章、范文澜相继逝世。那时，我被打成“黑帮”，并且当了近代史研究所的“黑帮队长”，对我最敬爱、最亲近的两位老人的悼念活动，都不允许我去参加。我愤而暗自发誓：从今以后，任何人的悼念活动，我概不参加了！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我虽然得到了正式通知，我仍然根据我自己的誓言，没有去向他的遗体告别。此后，我一直遵守我的誓言，只有极个别的例外——1991年黎澍逝世时，我带病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去瞻望了他的遗容。回来后我的病情也加重了。同志们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对我的朋友们的死讯，再也不告诉我。因为我的病症很多，其中也有长期的高血压和心脏病，所以家人不但向我隐瞒了许多人的死讯，甚至连哀乐也不让我听，以免我听见哀乐就动感情而伤心落泪。

刘桂生本不想把邓先生的死讯告诉我。但他知道我和邓先生是旧交，知道我对邓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敢于坚持真理、讲真

话、不曲学阿世的精神很敬佩，所以希望我写一点东西来悼念邓先生。但因顾及我年老而又多病，所以说只要我写几句话。但是，我再老、再多病，我能没有感情吗？对邓广铭、邓先生，我能只写几句话就行了吗？我有许多话要说，一片真情、无限哀思，是建筑在共同为坚持真理的伟大的基础之上的。必须让天下后世的人们都知道，为坚持真理而凝聚在一起的友情是人间最可珍惜的，是鼓舞人们奋斗不息的最伟大的感情。

我是全国解放后才认识邓广铭的。那时，他和翦伯赞都在北京大学。他们两人由于工作关系和范文澜来往密切。就是在范老那里，我们很自然地就熟悉起来了。邓广铭是著名的宋史专家，而我又是宋史的爱好者，所以我们谈起宋史来非常投契。我从小对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就很痛心。在川东师范文史组读书时，对学习宋史和明史特别重视。由于陆放翁的爱国诗篇大都是在四川写成的（故名《剑南诗稿》），所以我们常把读陆游的诗和考察抗元遗迹结合起来作为假期的重要活动。我们曾经遍查重庆和合川等地的地方志，寻求当年抗元斗争的原委。除在重庆城内找抗元遗迹外，我们还到合川等地去查访。合川钓鱼城抗击元兵、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的事迹，当地人民一直引为无上的光荣。我们听了也感到振奋，增加了我们当年抗日的决心。邓广铭听我谈起这些情况也很感兴趣。我们两人还经常谈及陆放翁的诗和辛弃疾的词。他对我能背诵他们的许多诗词感到很惊讶。我们还彼此挑剔背诵中的词句错误并探讨某些隐晦词意的解释。

大概是五十年代末期，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要我帮助他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及地图的编写工作。因为他和我在中共太行分局共事时关系很好，我怎样推辞也推不脱。为此，召集了全国各省的有关人员来开会。并请了一些历史专家参加，邓广铭

也是其中的一位。编写的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八条”。这八条的基本精神是要根据新中国的地理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地理。在我们新中国，几十个民族都团结在一起了，因此，历史上不同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只能看作一定的民族矛盾而不能称为对立或对抗的国家。例如金和蒙古与宋的对立和战争，不要说是侵略中国，不要说它们“入侵中原”而要说是“进入中原”。会上对此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因为八条是总理批准了的，有些人明知其不妥也都表示积极的拥护。但邓广铭始终反对这种看法。他说：讲历史应根据历史事实说话。历史上金人和蒙古人明明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它们与宋的战争明明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怎么能抹杀呢？我们怎么能根据现实去歪曲历史呢？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曾经发生过战争（虽然和平相处的时间更多），而到新中国就团结到一起、亲如兄弟了，这不更证明新中国的伟大吗？为什么要去歪曲历史真相呢？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了，也不能说今天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是错误的呀！他的意见在会上很孤立，但他始终坚持，反复辩解，毫不动摇。因为他讲的是事实，是真理，别人驳不倒他，所以会上争论很久，无法达成共识。我虽然是会议的主持人，但我明确地表示支持邓先生的意见。我曾在会上说：我们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为什么抗日呢？因为它侵略中国。我们能说日本侵略中国只是“进入中国”吗？将来世界大同了，能说我们当年抗日是错误，而汪精卫降日是正确的吗？这是什么理论？日本法西斯的理论，汪精卫汉奸的理论。因为这次会议未能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也没有结论，所以白白浪费了金钱和时间，无结果而散。有人在会下反映说：邓广铭把会议搅黄了。我向张盘石汇报时，说明我和邓先生都不赞

成按“八条”讲历史，绘历史地图，这就是这次会议的重要结果。你看该怎么办？他笑笑说：“你的意见既然是这样，会议就算是有结果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为这件事找我了。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随着政治运动的加紧，学术界的气氛也更加紧张了。历史学界受到的压力很大。毛主席批评历史研究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脱离阶级斗争。明确地批评了范文澜、翦伯赞的“让步政策”。其实，他们两位所讲的让步政策，也是迎合毛主席说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是农民战争而创造出来的解说。本来，农民战争只是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哪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农民战争后的新朝代，其统治者在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发慈悲而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所以让步政策的解释是很勉强的。如果说地主对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只有反攻倒算，不可能有任何的让步，那就更符合历史事实了。例如我们四川，经过明末的农民战争后，到处荒无人烟。这时，既没有了农民，也没有了地主，哪里还有什么地主对农民的让步？哪里还有什么反攻倒算？清政府采取移民垦荒的办法，以“湖广填四川”，对湖广到四川的移民，不仅一时轻徭薄赋，而且宣布“永不加赋”。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能随意解释。毛主席强调农民战争，可一时又对康熙皇帝大加褒扬，因为康熙为中国开辟了广大的版图。这样一来，就使得历史工作者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如果跟着毛主席的指挥棒打转去讲解历史，其处境就十分尴尬。我就曾对一位写文章吹嘘康熙的“历史名家”开玩笑，说他的历史哲学是汉奸哲学。他过去曾宣传过王船山等人是爱国主义者，现在又宣传康熙，显然自相矛盾。毛主席感到许多老年的历史学家不行了，又特别把一个不懂历史的戚本禹推了出来，让他

写文章批判李秀成，说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很快，戚本禹便成为著名的“青年历史学家”。很显然，这不是什么历史研究，这是在学术掩盖下的一场政治斗争。人们从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应该看清了这个问题。总之，不根据历史事实去讲历史，研究历史，只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讲历史、研究历史，那只能歪曲历史，把历史随意打扮，而且很难打扮得好，甚至打扮得很丑。因为毛主席的指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从而使得跟着他转的“历史学家”也常常不能自圆其说。例如在延安时，毛主席鼓吹《水浒》的造反精神，而到“文革”期间又说什么《水浒》“好就好在投降”。这叫我们的史学家，怎么跟着他转呢？

北京大学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是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历史学在不少时候更是首当其冲。翦伯赞等人在北京大学不断地遭到批判，最后在“文革”中丢掉了性命。邓广铭受到批判也是必然的。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听说他被打倒，被下放劳动，但详情我并不清楚。不过，他因有宋史的专长，所以后来又调回北京，到中华书局去标点《宋史》，这些也都是听说的，并不确知。但在传言中，有一点令我佩服，即他没有跟着造反派跑，即使谈历史，他也没有违背良心，跟着形势去胡编乱造。像邓广铭先生这样能洁身自好的历史学家是很值得人们尊敬的。

从“四清”开始，到“文革”结束，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和邓广铭见过面。可是“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们却在武汉大学不期而遇。那时，湖北、湖南和广东、四川要合编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他们通过中山大学的马菊英请我去当临时的顾问。我在东湖宾馆给他们讲了好几次课。我的中心思想是不赞成他们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为编写近现代史的方针。我说：

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近现代史，站在批资产阶级思想的立场是写不成中国近现代史的。我通过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讲述我的观点，所以讲得很长。同时，还回答并与他们讨论了许多问题。那时，极左思潮仍然盛行，各高等学校还驻有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他们认为我讲得太大胆，但又都认为我讲得不错。因此，武汉大学要我去作一次讲演。就在讲演台上，碰见了邓广铭先生，我们当时的高兴和兴奋之情，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主人问我们谁先讲，我推邓先生先讲。他在讲演中仍然坚持他一贯的观点，认为岳飞抗金，是宋朝反对金人的爱国战争，金和宋是两个独立的国家，金人入侵中原，是金侵略宋。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满族已经是新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就去歪曲历史事实。随后我在讲演中完全支持邓先生的见解，并且赞扬他能在极恶劣的环境中坚持真理，坚持按历史事实讲历史、编写历史。我们两人的讲演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我们这次在武汉大学的际遇，我永远未忘，我想邓先生也一定会铭记在心。只可惜后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了！

大约到80年代后期，我才又一次见到邓广铭。他当时被全国政协敦请为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这一届文史资料委员会大概是第四届了吧？主任是杨成武。开成立大会时，杨成武通过张盘石把我也拉去参加。我又在会上与邓先生不期而遇。从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时开始，我就是委员之一。到“文革”后的第三届，由王首道任主任，何长工、徐冰如、王昆仑和我担任副主任。因为他们都年老，所以开大会时推我作报告。我在报告中说：文史资料不必包括革命史的内容。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应多延纳党外人士，不应由党员包办。《光明日报》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后来被党拿过来了。现在就剩下一个《文史资料》，如果党员还在上面大登革命史的文章，那党外人

士还有什么“文化园地”呢?《文史资料》创办时,周恩来总理就说过,那上面的文章,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我们必须给党外人士提供这么一块特殊的园地,供他们发表文章,发表意见。试问,请溥仪写文章,能要求马克思主义观点吗?请章士钊写文章,能要求他全用白话不带一点文言吗?我们现在搞得太“左”了,挤得人家没有地位,没有说话、发表文章的地方……。我的这个报告,事前是经过正副主任讨论过的,在会场上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会下却被文史办公室主任挑动各省代表团群起反对。连续几期会议简报都刊登各代表团的反对意见,说我反对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甚至说我引用周总理的话是捏造。各省代表团的团长差不多都是统战部长,他们说从没有听周总理讲过那样的话。问题闹大了,反映到中央统战部。后来刘澜涛和平杰三都告诉我^①:你的讲话录音,中央统战部放了三次。我问:怎么样?有问题吗?回答是:没有问题,讲得好。不过,年轻人,讲得太大胆了!因为我担任过华北局青委书记,所以,他们一直把我看作青年。经过这次文史资料工作大会,加上编书事忙,从这以后,我再也不过问文史资料工作了。不料开第四届大会又把我拉了来。我一见杨成武就开玩笑说:你这位将军当主任,是不是要把文史资料搞成武史资料?杨成武立即对我和邓广铭说:不是就请你们这些历史学家来了吗?张盘石又说:搞中国近现代史,既要文史资料,也少不了武史资料呀。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杨成武接着又说:你讲的周总理的话,他们后来曾专门追查。查来查去,倒是查出来了。你讲得一个字也不差,而且解释得也很好。现在第四届文史资料的方针,除周总理说的“不拘观点,不拘体

^① 刘澜涛和平杰三是前华北局的领导,这时负责领导中央统战部的工作。

裁”外,还增加一个“不拘长短”,你看怎么样?我说:很好。现在改革开放,心胸就是应该开阔些,眼界就是应该远大些。接着,开会时间到了,我讲了话,邓广铭也讲了话。讲些什么已经忘了,但这次见面,我一直铭记在心里。我后来还是没有过问文史资料工作。因为我看到新出的《文史资料》,比起“文革”前姜克夫主编的50辑《文史资料》逊色多了。而这时,姜克夫和我都正在为编民国史忙着呢。至于邓先生后来在文史资料方面的工作如何,我就更不清楚了。但我知道他在北京大学培养古史方面的人才成绩卓著。

我一直为邓广铭先生的成就感到高兴,谁知他却忽然离开我们而仙逝了!当刘桂生要我为纪念邓先生写几句话时,我蓦然心惊,无限的哀思涌上心头。刘桂生知道我和邓先生是史学界的知音,又知道我体弱多病,所以说只要我写几句就可以。但是,我对邓先生的敬仰,对他的无限哀思,哪里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呢?纵使千言万语,乃至任何语言都表达不了的。于是我提笔就写。当写到这里,写到他的仙逝时,我已禁不住两手发抖、双目流泪了!我不能再往下写了,也用不着写了。邓广铭先生的道德、文章,已逐渐为当今世人所了解,必将传诸后世而不朽。何需我多说呢?我写了这些,不过略抒我的怀念,略遣我的哀思罢了。

1998年3月

怀念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

程光裕

我于1997年12月赴美国探访亲友，本年2月间返台北，接读1998年1月11日邓广铭教授治丧办公室寄来的讣告。“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邓广铭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1月10日9时50分不幸逝世，享年91岁”。一代著名历史学家遽归道山，无任悲悼和怀念。

忆我于1944年6月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由明清史学家陶元珍师之推介，自贵州遵义赴重庆入独立出版社，任助理编辑，获读广铭先生撰《陈龙川传》（1944年4月独立出版社出版），言龙川之才气超迈，喜谈兵事，志在经济，论述君道师道，力学著书，娓娓道来，发人深省。

是年8月，浙大教务处通知我准予免试升入本校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遂回校追随著名宋史学家陈乐素师研治宋史，乐素师时亦言及广铭先生在宋史研究方面之造诣。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国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翌年夏我随校复员至杭州，1947年初夏毕业于浙大史地研究所（由原史地学部改称）。一日我自杭州赴上海探访亲长，承乡前辈胡伯引导拜谒胡适先生，先生和蔼可亲，言谈多

启发性。他详询我求学过程，浙大史地方面师资情况，当我说曾受教于张其昀师、陈乐素师时，先生即说：“乐素是援庵先生的哲嗣，援庵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名家，治学谨严，乐素家学渊源，研治宋史很有成就，真了不起。”又说：“北大有个邓广铭，也是研究宋史的，你看过他的著作吗？”我答道：“曾看过他的《陈龙川传》”。先生随即问：“你有兴趣去北京吗？”我答：“北京藏书丰富，如有机会去继续做研究工作，是最乐意的事。”他说：“研究所毕业，要从助教做起，大学里有很扎实的助教，讲师，至于教授很难说个个都有高水平。”又说：“目前北京情势混乱，这种情形，明年该有分晓，到时再来。”亦见适之先生对援庵先生、乐素师之称誉，对广铭先生之关怀。

1947年夏，我应福建泉州国立海疆学校（专科学校）之聘赴校，任史学副教授。泉州为宋元时代之名城，课余时间，率学生遨游于老君岩、洛阳桥、伊斯兰教寺、开元寺等历史名迹，于宋史探研多有助益。

1949年夏赴台，从事教研工作，与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宋史著名学家姚从吾、牟润孙教授，过从至多，从吾先生亦时言及广铭先生。1956年，我参与姚从吾、方豪、蒋复璁、赵铁寒诸教授成立宋史讨论会，假台北市南海路国立中央图书馆不定期举行讨论会，引述广铭先生论著，启迪亦多。

1958年春，我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史学副教授，远赴南洋，其后兼任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教职，讲授中国史（着重中国与南洋诸国之关系）。1965年冬返台北，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兼长史学系史学研究所硕士班系所职务，讲授“中国史学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华侨史专题研究”、“中国通史”、“东南亚史”诸课程，亦时参考广铭先生之著作。

1993年3月25日至29日，“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我应邀前往出席。会议期间得与广铭先生及小南教授晤叙，游览西子湖，品尝龙井茶，广铭先生之淳雅言词与温良气质，印象深刻。

广铭先生在大会上的“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专题学术报告，提出岳飞是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不应把纪念岳飞作成一种造神运动”，论点精辟，所言研究岳飞生平所应遵守的原则是：“去粗取精，去伪取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实事求是地还岳飞一个本来面目。要这样做，首先就要严肃认真地吧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粹编》和《金佗续编》，特别是对其中的《鄂王行实编年》，以思辨的头脑和精深的认识，通体检核一遍，对其中虚构和夸张失实的事件，尽可能加以删除或辨正，对于岳珂有意加以淹没和隐蔽的事件，尽可能根据旁证而加以填补，使他以其真实的英雄面貌而流芳百代，永垂不朽”。（“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刊《岳飞研究》第7辑——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岳飞研究会编，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8月第1版）此种“有一分证据说一分实话”的研究方法，使学术著作提升到科学研究的水准，足资取法。

广铭先生于1995年4月寄赠《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收录学术论文39篇及自序、自传各1篇，主要著述目录1篇，其研究工作辛勤，成果卓越辉煌，殊深令人颂赞。

我从事教研工作数十年，刊印《常溪集》，为1947年至1996年春诸单篇文字之选集。内容分专论、序例、书评、国史随录、传记、游记、南洋杂识、纪念文、附录一相知者文、编著专书目录诸项，都160余万言，又收入“浮生影辑”照片

190余帧，分订成5册。（《常溪集》5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6年9月出版）全书曾邮呈广铭先生乞予赐正，承颂嘉言称许，至为汗颜愧作。先生年高德劭，长者风范，实深感慕。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亦得永垂不朽。

1998年5月1日於台湾台北阳明山寓邸

高山仰止

——纪念邓恭三先生逝世一周年

徐 规

记得顾颉刚先生在抗日战争后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近代研究宋史的学者，以邓恭三先生与先师张荫麟先生（1905～1942）为代表。张先生是近代中国宋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即发表有关宋史的论文，到四十年代初逝世为止，先后刊布这方面论文约三十篇，所考究之问题大多是首次提出来的，其中不少创见给宋史研究增添了宝贵的财富。惜英年病故，且所处时世战乱频仍，环境恶劣，故未能尽展其天才。邓先生在三十年代末完成了《辛稼轩年谱》、《辛稼轩诗文钞存》和《稼轩词编年笺注》三部书稿，经不断修订，到1957年之后相继重版。我曾购得三书，细心阅读，钦佩他对辛弃疾的探索既全面又精审，近世诚无人能与伦比！邓先生享寿逾九秩，毕生勤劬，且长期在首善之区北京大学执教，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思想界又比较宽容，故其对宋史的研究，方面之广，造诣之深，实为空前的权威，当代的泰斗。

和邓先生初次晤面在1978年的春天。当时杭州大学首次举行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恭请各地名家莅临指导，邓先生是应邀而来的嘉宾。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作学术报告后，通过校领导约见蒋礼鸿先生和我。他说蒋先生与夫人盛静霞女士对其著述《稼轩词编年笺注》的修订工作帮助很大。又说读过我在

《文史》上登载的《李焘年表》和《补正》两文，写得颇扎实云云。语多勉励。

1980年10月上旬，在上海召开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我应邀出席，并提交《〈梦溪笔谈〉有关史事记载订误》一文，拙作受到了邓先生的称道。在这次成立会上，邓先生、陈乐素师、程应镠先生和我等七人被选为理事。经理事会推定邓先生为会长，陈先生为副会长，程先生为秘书长。在邓先生的主持下，宋史研究会举行过五届年会，每届都出版有《宋史研究论文集》。在历届年会开幕式上，邓先生都作了学术报告。他强调学术研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束缚，希望会员做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发扬务实的学风。针砭时弊，语重心长。近二十年来，我国大陆的宋史研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这与邓先生的领导有方和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

自宋史研究会成立后，我和邓先生交往较多。1982年10月，在郑州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我奉呈拙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一书，猥蒙赞许。1988年4月，他赐寄《陈亮集增订本》上、下两册，读后获益非浅！1990年3月，又寄赠他和张希清同志点校的《涑水记闻》一书，我对他所撰的《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供他斟酌，他立即覆书云：“待再版时，一一遵命加以改正。”1995年，又惠赐其大著《学术论著自选集》，我诵读后，也提了些误刊或欠妥之处，供其参考。并乞指教有关《宋史·地理志》的主要史源问题。邓先生于当年9月1日覆示云：

八月十五日来函敬悉，拙著承蒙那样的认真翻阅，实在令我感激莫名。谨先表示由衷的致谢。信中所提示的误

高山仰止

——纪念邓恭三先生逝世一周年

徐 规

记得顾颉刚先生在抗日战争后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近代研究宋史的学者，以邓恭三先生与先师张荫麟先生（1905~1942）为代表。张先生是近代中国宋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即发表有关宋史的论文，到四十年代初逝世为止，先后刊布这方面论文约三十篇，所考究之问题大多是首次提出来的，其中不少创见给宋史研究增添了宝贵的财富。惜英年病故，且所处时世战乱频仍，环境恶劣，故未能尽展其天才。邓先生在三十年代末完成了《辛稼轩年谱》、《辛稼轩诗文钞存》和《稼轩词编年笺注》三部书稿，经不断修订，到1957年之后相继重版。我曾购得三书，细心阅读，钦佩他对辛弃疾的探索既全面又精审，近世诚无人能与伦比！邓先生享寿逾九秩，毕生勤劬，且长期在首善之区北京大学执教，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思想界又比较宽容，故其对宋史的研究，方面之广，造诣之深，实为空前的权威，当代的泰斗。

和邓先生初次晤面在1978年的春天。当时杭州大学首次举行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恭请各地名家莅临指导，邓先生是应邀而来的嘉宾。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作学术报告后，通过校领导约见蒋礼鸿先生和我。他说蒋先生与夫人盛静霞女士对其著述《稼轩词编年笺注》的修订工作帮助很大。又说读过我在

《文史》上登载的《李焘年表》和《补正》两文，写得颇扎实云云。语多勉励。

1980年10月上旬，在上海召开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我应邀出席，并提交《〈梦溪笔谈〉有关史事记载订误》一文，拙作受到了邓先生的称道。在这次成立会上，邓先生、陈乐素师、程应镠先生和我等七人被选为理事。经理事会推定邓先生为会长，陈先生为副会长，程先生为秘书长。在邓先生的主持下，宋史研究会举行过五届年会，每届都出版有《宋史研究论文集》。在历届年会开幕式上，邓先生都作了学术报告。他强调学术研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束缚，希望会员做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发扬务实的学风。针砭时弊，语重心长。近二十年来，我国大陆的宋史研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这与邓先生的领导有方和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

自宋史研究会成立后，我和邓先生交往较多。1982年10月，在郑州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我奉呈拙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一书，猥蒙赞许。1988年4月，他赐寄《陈亮集增订本》上、下两册，读后获益匪浅！1990年3月，又寄赠他和张希清同志点校的《涑水记闻》一书，我对他所撰的《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供他斟酌，他立即覆书云：“待再版时，一一遵命加以改正。”1995年，又惠赐其大著《学术论著自选集》，我诵读后，也提了些误刊或欠妥之处，供其参考。并乞指教有关《宋史·地理志》的主要史源问题。邓先生于当年9月1日覆示云：

八月十五日来函敬悉，拙著承蒙那样的认真翻阅，实在令我感激莫名。谨先表示由衷的致谢。信中所提示的误

字和误文当即遵命，待再版时一一加以改正。

所谈《宋史·地理志》的主要史源问题，我很惭愧，从来对于此事不曾注意，所以无可奉告。在半个世纪之前，我在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进修时，对于《宋史》中的诸志虽拟一一加以校正，但对于天文、五行、律历、地理诸志，则因其中的问题既众多而且烦难，所以都未放在我的考虑之内。对于这许多志的史源问题，也都不曾注意过。

我现在虽已进入风烛残年，但积习难改，所以还经常注意一些学术问题，特别是有关宋史的一些问题，今后有待先生指教之处必还甚多，来往函件千祈不要在尊名之上冠以“后学”二字为禱！

其谦逊之情，溢于言表。

1996年初冬，我寄奉拙作《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及《〈青箱杂记〉订误》两文求教，邓先生于12月5日覆示云：

接奉来教及大作两篇，拜读之后极所钦折。在1982年的《文史》上读到大作对杯酒释兵权献疑一文之后，我即认为千古传闻至此可得一确切解决。（中略）

《青箱杂记订误》既指明了吴处厚的一些误记，也胪举了李裕民在校勘和标点方面的诸多疏失，李君应能从此文获得甚多教益。（中略）

前接梁太济兄来函，指出拙作《元一统志陈亮传考辨》一文中，对“虞允文军政宣威”的所作解释不够确切，所论极是，我当据以改正。便中乞转告，并代致谢

忱。

其奖掖后进、虚怀若谷的风范，跃然纸上。

1993年3月25日到29日在杭州举行“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86岁高龄的邓先生以“岳飞研究会”顾问名义莅临指导，这是他晚年最后一次离京赴外地参加学术活动，由他的令媛小南女史陪同前来。在会议期间，我曾请教他对于章培恒教授所撰《〈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一文的意见。他说：“章文洋洋数万言，旁证博引，面面俱到，确是一篇力作，但我不同意其论点”云云。盖在此之前，我校副教授方建新同志曾在《杭大报》1991年第3期上刊布了《〈避暑录话〉考略》一文，考定该书开始撰写乃在绍兴五年（1135）五、六月间于湖州卞山闲居日，完成于绍兴八年五月再次担任江东路安抚制置大使之前，并对书中包括《辨奸论》记载在内的若干条目有所是正。我希望方君继续撰写批驳苏洵作《辨奸论》的文章，所以才向邓先生求教。

1996年10月25日，邓先生又惠赐新作《〈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一文（载《国学研究》第3卷，1995年）。次年秋天，又写成《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一稿，后文当为先生的绝笔。他将打印稿寄我一份。窃以为《辨奸论》非苏洵所撰可视作定讞，此论应是北宋末年人所编造。北宋后期亦有人伪撰苏轼的诗文，大苏在《答刘沔书》中说：“世人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识真者少，盖从古所病。”（《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46）可知宋人文集中混入一些伪作也是常见的事。

1997年秋天，又寄赠其新编《邓广铭治史丛稿》一书，

嘱为之校正。今年春间始得暇拜读，不幸邓先生已归道山，为了使该书更臻完善，谨将其中不足之处试举数例转呈小南女史，以报先生在天之灵，聊酬其生前的嘱咐。

数十年来，不断拜读邓先生的论著，获得启迪和教益良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爰缀芜文，以志永念！

1998年5月于杭州大学

春风化雨五十五年

——深深怀念殷切教导我的邓恭三先生

王瑞明

自1943年9月至1998年1月，在这55年悠悠岁月中，邓恭三先生始终是我的老师，他给我传授历史知识、治学方法与为人之道；他关心我的教学工作，指导我的科学研究，经常告诉我一些学术动态，启迪我愚蒙，策励我前进。

邓先生于1943年来到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任教，我就是在这一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学系的。复旦从私立改国立不久，新任校长章益励精图治，决心要办好学校，延聘一些名家充实师资队伍，浙江大学地貌学专家任美镔、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等来到复旦，给复旦带来蓬勃朝气。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顾颉刚先生也应复旦之聘，迁居北碚。这时史地学系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各系学生都必须选读《中国通史》，因此有两位老师同时开设这门课。邓先生开的《中国通史》，深受欢迎，选课的学生特别多，约有二三百人，大教室也容纳不下，在大礼堂上课。另一位老师开的《中国通史》则在一间小教室上课，只有二三十人。

邓先生的课之所以受欢迎，因为他语言清晰，声音宏亮，条理井然，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情节生动，课堂气氛活跃。他在课堂上从不讲闲话、废话、空话，对教学极其严肃认真。有一次，同学要求公布考试成绩，他报了前几名的成绩，我以

98分的高分名列第一。这是我的专业基础课，理所当然应该考好一点。这一成绩对我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坚定了我的专业思想，我原想二年级就申请转入复旦有名的新闻学系的，有了邓先生这样真才实学的好老师，极富吸引力，使学习充满希望，学习的天地忽然开朗，学习的目的似乎明确了几分。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打消了转系的念头。同时，邓先生给我的这一高分，让我有了学习历史的自信心。我怀着这份自信，选读了邓先生专为史地学系学生开设的《宋辽金元史》，当时史地学系人数很少，我所在的那个年级只有12人，全系不过四十余人。因此这门课是在小教室上课。在小课堂里，邓先生的教学更富于专业色彩，讲得深入细致，让我们能接触到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史料，邓先生所讲的契丹的“四时捺钵”的一些细节，其声音迄今犹在我耳边回响。邓先生更为我们展现了宋儒学问的博大精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对宋史产生浓厚兴趣，使我对宋代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有高山仰止之感，跃跃欲一测其高深，此一思绪起伏激荡于怀四十余年而不能自己。1990年起，我告别讲坛，退休在家，享受晚年的安静，将长期积累的史料加以整理，花了四年时间，写成53万字的《宋儒风采》一书，岳麓书社于1997年10月出版，夙愿以偿。这是对邓先生春风化雨辛苦培育我五十五年的一份微薄的献礼。没有邓先生的循循善诱，我就不会有写这本书的动机、志向与准备，以至大功告成。

邓先生开的《宋辽金元史》在1946年2月初开始上课，5月初结束。因为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复旦大学忙于迁回上海江湾。邓先生就是在这时候离开复旦大学的。解放后两年，我从上海回到武汉，调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

系，此后经常与邓先生保持着书信联系。解放初期，我们采用的中国通史教材对金代经济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为此我写了《关于金代经济的几个问题》，我认为金代经济经历了恢复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虽曲折起伏，但其经济成就很明显。我将稿件寄呈邓先生审阅，他很快审阅完毕，只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修改，这篇文章寄给天津《历史教学》，摘要发表；后来全文发表在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史论丛》第9辑。

邓先生编写的《中国史纲要》中册，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寄赠我一册，成为我的教学指南。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他对书中错误一一改正，如第121页注①《国朝文类》卷35改为卷36。第125页第2行“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籍江南民……’”改正为“至元十三年（1276年）‘籍江南民……’”移至第一行“世祖”之后。第132页第6行“八百二十余万锭”改正为“四百二十万锭”。改动之处颇多，不一一列举。这一手改本在我心目中是珍本，迄今珍藏在我的书柜里。这本书在教学工作上给予我很大帮助，在科学研究方面给予我不少启发与新的思路，如第113页“依智高的反宋斗争”对其斗争性质虽未明言，在其诱导下，我反复思考，写成《依智高反宋斗争的性质问题》一文，发表于《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编入其《中国古代史》（二）。

大约在1975年“开门办学”中，我带领历史系学生在荆州纪南城从事历史调查一个月，编写了《纪南城的历史故事》一书，铅印出来后，我寄了一本给邓先生。出乎意料的是，他给我来信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意见：

略略翻读了一遍，觉得写得极生动，能引人入胜，但

也觉得渲染之处稍多了一些，绘声绘影之处过于细致了些，作为一种文学读物则可，作为一种通俗的历史读物似乎就以更朴实一些为宜。

我遵循“更朴实一些”的指示，进行改写，改名《楚国故事》，1981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年内一再重印，第三次印数达63,900册，作为通俗历史读物，拥有不少读者。

1980年，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自1946年分别，已经35年未曾见过邓先生，这次见面，有很多话要讲，但讲话的机会不多。在这次成立大会上，邓先生当选为会长，一个新的学会刚成立，有许多工作要处理，有很多朋友要接谈，每晚去拜访他，房间里总是高朋满座。会议结束后，吴绍烈、顾吉辰和我陪邓先生游览豫园。中午，由吴绍烈同志作东在福州路一家餐馆吃便饭。邓先生很随便，很健谈，家事、学校事、国家事无所不谈。这一天我们一道逛了福州路古籍书店，邓先生买了一捆书，我只买了一本新出的陆游《老学庵笔记》点校本。他问我为什么不多买几本书，那几年，我收入有限，家庭负担重，手头拮据，这类话，我没有讲。这一天，我对邓先生讲了很多话，问了他很多不该问的问题，他很直爽，有问必答，毫无掩饰，毫不隐瞒。当谈到王安石变法时，由于王曾瑜同志的王安石变法新论发表不久，邓先生平静地说：“我算是一家之言吧！”

邓先生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毫无保留。他得知我多年致力于宋人文集史料的选编工作，极为赞赏，认为这一工作“不论对人或对己，总会有一些好处的。”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来信鼓励我：“极盼能把它完成，一方面学术界对此类书大为需要，另一方面从目前中央领导人所指引的学术发展方向看

来，出版界不久必将欢迎印行此类书籍也。”这部书稿编完后，我在教学中多次运用，对学生有很大帮助，对自己确实也有好处，我在编写《湖北通史》宋元卷时，参考自编的这部史料书，节约了不少时间、精力。写点小文章，检索史料也很方便。

古籍整理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利在当代，功垂千秋。邓先生很重视这一工作，他曾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问。他以身作则，完成《陈亮集》增订本的整理工作。他早有计划整理《三朝北盟会编》，八十年代初，正当他改写《岳飞传》接近完工时，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已答应中华书局，要校点《三朝北盟会编》，预计七八年内完成。”这期间他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的工作，可能因工作繁忙，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不怕困难，重视古籍整理工作，身体力行，我在他的感召下，也尝试性地整理了一部宋人文集，花了五年时间，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找了多种版本对校，写出校记五千多条。由于出版困难，邓先生特为我在全国古籍整理会议上呼吁，他明知这件事情的难度，但仍知难而上，尽力帮忙，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爱护，也体现了他对古籍整理工作的一片真诚。

邓先生对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师资培养、课程建设、教学工作给予过长期的、无数的指导、帮助与支持。特别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上，邓先生鼎力赐助，我先后培养历史学硕士15名，其中大多有幸得到过邓先生的耳提面命，我曾一再带领研究生到他的寓所求教，每次我们都满意而归。有一年他在我们学校小住几天，给我系师生作学术报告，给我的研究生开座谈会，大家都非常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勾起我回忆年轻时受业于邓先生门下那种愉悦的心情。那几天的高兴劲儿，

现在想起来反而增加了我的悲痛，邓先生逝世忽已一周年，纪念邓先生最好的办法恐怕是认真严肃地研究宋史，坚韧顽强地整理古籍，诲人不倦地培育人才，邓先生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我们是望尘莫及的，但只要尽心竭力，坚持不懈，奋勇前进，是足以告慰先生之灵的。

理解与合作

——忆邓广铭教授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

穆欣

1957年秋天，我调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很快就同邓广铭教授相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授课，又兼任这个报纸专刊之一《史学》双周刊的主编。此后十年间，曾经在业务上有过不少接触。邓广铭先生的博学明辨，论必据迹，无曲学以阿世的史识与史胆，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光明日报》作为一张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创办了几个学术性专刊。这些深受知识界欢迎的专刊，构成《光明日报》的一大特色。我在这里工作期间，经常出版的专刊就有《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这此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知名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几个主要专刊编委会成员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各自组成一支学术界知名学者为骨干的作者队伍。这些专刊都联系了广泛的作者，拥有众多的读者。其时由于国家纸张供应困难，报纸限量发行，供不应求。为了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并能节省纸张，专刊曾经经过邮局单独订售。在几个专刊中，《史学》是订户数最多的。

《史学》专刊始创于1953年4月30日，是《光明日报》版面上出现较早、出版最久的专刊。《史学》编委会由中国科

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方出人组成，范文澜、翦伯赞先后曾任编委主委，编委会委员先后有陈垣、荣孟源、邓广铭、向达、邵循正、杨人楩、白寿彝、谢琬造、田余庆、汪篯、陈振飞等。编委会的工作，经常得到郭沫若、吴晗的关注。《史学》专刊初时由三单位各出一个编委为执行编辑：近代史所为荣孟源、北大为邓广铭、北师大为白寿彝。到1964年前后，谢琬造接替荣孟源，陈振飞接替白寿彝。三家执行编辑，一家负责一个月的主要审稿和版面工作。报社收到的史学稿件，集中后送交当月执行编辑，他们三位每周三集体研究一次。当时报社还住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大街）接管原《世界日报》旧址，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印报用的是从上海旧《时事新报》接管的已经用过三十年的一部“老掉牙”的轮转印报机（直到报社在永安路新建办公楼竣工要搬迁时，才淘汰了这部拆卸后已无法再安装起来“工龄”达四十六、七年的机器）；办公房屋更是破陋，拥挤不堪。偌大一个报馆，竟然无法为《史学》专刊提供一间开会、审稿用的办公室。后来轮到由北大执行编辑负责审稿的月份，邓广铭建议将办公地点移到北大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里，“不料他们二人都不肯来”。经过范文澜与翦伯赞商洽，《史学》的编辑工作改由北大历史系专负其责。最后即由翦伯赞选定北大古代史教研室的汪篯和近代史教研室的陈庆华、张寄谦在邓广铭领导下负责《史学》的编辑工作。前后十多年间，邓广铭自始至终参加《史学》编委会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戚本禹以“改组”《史学》专刊的名义，派了五个人进驻报社，夺了邓先生《史学》主编的权，很快就把这个专刊搞垮了。

邓广铭主编的《史学》专刊，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多次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推动史学界的学术争

鸣。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如何正确评价曹操的讨论。“双百”方针是为促进艺术繁荣、科学发展而提出来的，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正确方针。但在执行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和磨难，未能保持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时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知识界许多人心有余悸，整个学术界空气沉闷，万马齐喑。1959年2月间，报社编辑部和《史学》专刊编委一起研究，首先选择关于曹操评价问题作为突破口组织讨论，作一次开展百家争鸣的尝试。这次讨论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在学术界反应强烈。就像邓广铭先生说的那样：“曹操是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参加讨论的写稿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而且有各个行业的人，那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和台湾，都有讨论曹操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报，有的稿件在正版发表，大部分在《史学》刊出，可谓极‘一时之盛’。”（本文所引邓广铭的话，均见其《回忆“文革”前的〈史学〉专刊》一文，载《光明日报四十年》。）这次讨论冲破了学术界的沉闷空气，并且引发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评价等一些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增强了报社编辑部和《史学》专刊同史学界的联系，在读者中有比较强烈的反响。《史学》专刊持续办了14年，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发表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对于繁荣我国学术研究，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不断改进、持续出版这个专刊的过程中，邓广铭先生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劳的。

邓广铭毕生治学，终身执教，桃李满天下。他在主持《史学》专刊编辑工作中，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史学》专刊先后联系了不少青年作者，他很细心地处理他们的来稿，鼓励他们在参加学术讨论的实践中锻炼，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的专家学者。而今有些已经出名的史学专家，他们的研究工作是

从《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也是在它组织的历次学术讨论中受到锻炼的，他们是在《史学》专刊上崭露头角而后得到社会重视的。《史学》专刊起到了培养一批史学专家的作用。邓广铭先生曾经深感欣慰地谈到这一点：“编辑《史学》专刊，虽不是我们的专职，但我们对于外来稿件的审阅、去取，却都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十年间，国内外风云变幻，烟雨莽苍，党内风波迭起，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自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舆论导向经常偏离正常轨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完，全国报刊开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一些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这个时候，学术批判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分析说理，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极左思潮进一步发展，不但严重地影响报社编辑工作，也给专刊的编辑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本来，像《史学》、《文学遗产》这样的专刊，文章内容多与现实距离遥远，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可以超脱一些，应该允许和正版有所区别，也不应该与其他专刊强求一致。可是，政治运动一来，总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当强劲的极左思潮凶猛袭来，势若狂风暴雨，铺天盖地，整个知识界“在劫难逃”，所有专刊也都陷入困境。

由于形势发展迅速，瞬息万变，舆论导向往往朝令夕改，难以捉摸。加以当时清规戒律甚多，报社编辑部与专刊编委会难以及时通气。遇事既要求专刊和正版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

对上边来的指示，常受“纪律”限制不能告诉专刊编委，致使专刊编委蒙在鼓里，难辨动向，造成编辑工作上的严重困难。邓广铭先生说：“尽管我们要坚决贯彻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但我们同时也很同意翦老的一个意见。翦老说：史学研究要为政治服务，但不能为政策服务；如果跟政策跟得很紧，我们的编辑工作有时将会陷于被动。事实也正是如此，《史学》是光明日报的专刊，是要由光明日报社最后把关的，而光明日报却是不能不为政策服务的。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安排的《史学》版面，到印在报上时，有些文章位置却有了改变。”以后在“让步政策”的讨论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也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我读到邓先生这段话的时候，深感歉疚。

邓先生为他最后出版的著作《邓广铭治史丛稿》所作的自序中，曾引章学诚所说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这两句话，用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在生前所作撰述，力求“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绝不“奄然媚世为乡愿”。半个世纪以来，邓先生正是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在宋史研究中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对于宋、辽、金对峙时期的一系列存在争议的重大问题，力排众议，经过精细的“考索之功”，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独断”。例如四十年代后期写的《释“拐子马”》、五十年代写的《论赵匡胤》，以及他的专著《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岳飞传》等等，都是厚积薄发、穷形尽相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这种富有创见，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毫不含糊的治学精神，也运用到专刊的编辑工作中。遇到认为不合情理的事情，不苟且，不暧昧，不肯违心相从，随波逐流。如在全国报刊上普遍开展

的“清官”问题的讨论，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调是不赞成的。尽管他“所听到的‘小道消息’，仿佛有一个未见诸明文的高级指示在那里起指导作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这场讨论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按照他的说法：“对于这种论调，我们一直是跟不上的，因而在《史学》上便没有刊出批清官的文章。”他在当时那样严峻气氛中这样做，是需要拿出很大勇气的。其后如像“让步政策”问题等一些学术讨论，他对那种片面、武断、无原则的一边倒现象，总是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的。

及至批判《海瑞罢官》事件，邓广铭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姚文元无限上纲，罗织诬陷的卑劣手段深恶痛绝。这时极左思潮已居全面统治地位，任何报刊已经难以抗拒这场来势汹涌的风暴。再要坚持原则，独立思考，已无可能。邓先生说：“有一次，我们北大历史系教师座谈这一问题，打算把同志们的发言整理后在《史学》上发表。但整理后交翦伯赞（伯赞）老去看，他认为会上的发言都是批判吴晗的，一面倒，过左了，最好不要刊出。当我们把整理稿送交报社之后，报社却又认为发言的都在维护吴晗，太右了，也不肯采用。这次的座谈会记录终于未能见报。”对这一点，他在以后无限感慨地说：“在缺乏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环境下，不但办报困难，即使办一个学术专刊，也是同样会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的。”这也是笔者和我们编辑部许多同志都有同感的。

《光明日报》的多数专刊是受读者欢迎的。美中不足的是，多数专刊学院气氛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报社编辑部未能及时与同名编委会研究改进。到了1958年，“大跃进”一来，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报社来稿增多，版面紧张，报社内外都有要求多刊的意见。当时，我到报社不久，对有关情况不甚了

了，对此问题也未认真研究，加以受到当时“左”倾思潮影响，是年10月，报社编委会未作慎重考虑，未与各专刊编委会协商，曾单方面决定停办全部专刊，并于10月25日在报纸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自11月起全部停刊。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在郑州开会，看到了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他让吴冷西同志写信把这些意见转告给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进行了讨论，认为原来匆忙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慎重、不严肃的，因而是错误的。当即决定：由报社编辑部一面向各专刊编委会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同时商谈专刊继续出版的有关问题；一面指定专人草拟一份纠正上述错误决定的新启事，公告读者。邓广铭先生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脾气耿直，他对报社诸如此类的不当作法本来窝一肚子火。但他顾全大局，体谅报社的困难，继续按期编发稿件，使《史学》专刊得以不间断地继续出刊。对邓先生的热心支持，我和报社同仁深受感动。

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是治学精深严谨、领域宽广的宋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他所撰述的一系列宋、辽、金对峙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论文与专著，都是有鲜明特色，极富创见的传世之作。早在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为邓先生撰著《〈宋史·职官志〉考正》所写的序中，就称赞“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又说“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及先生所写其他一系列开创性的论著，被称作“《宋史》成书六百年来第一次

认真清理。”回顾邓广铭教授半个多世纪宋史研究的累累硕果，令人愈益叹服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

在精进不休的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拨冗热心于传播学术知识的学术专刊的编辑工作，这是邓广铭先生一生中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地方。早在三十年代在北大读书时，他就参与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四十年代在重庆又主编过《读书通讯》；抗战胜利后又做过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的执行编辑；五十年代起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一个学富五车、享誉海内外的宋史权威，却能在研究与教学之余躬身于报刊的编辑事务，这是他奉行“文以益世”古训的最好说明；也是他坚持学术研究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教材，以报纸为阵地，向读者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的具体实践。在他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的十余载中，能与他合作共事，作为一名老报人笔者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感谢他为《史学》专刊所做的一切！

1998年6月15日，北京

追忆邓广铭教授

柳田节子

我是1985年5月应邓广铭、徐规两位教授邀请，参加在杭州大学举办的宋史国际研讨会时与邓教授初次见面的。对邓广铭教授的大名，通过他的著作和论文我早已有所耳闻，但这次我却亲眼目睹了他泰然自若的学者气质和充满和蔼与友善的音容。以前听到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宋史研究学者都口口声声地称自己是“邓教授的弟子”，我以为我已经够了解他的了，这次相见使我重新了解到邓教授在中国宋史研究界的重要地位。说来有些难为情，也许是因为在新学期繁杂的事务中硬挤出时间才脱身参加这次研讨会的缘故，我在会议开始的第二天就病倒了。邓教授听说后马上亲临我的住处看望，像慈父一样无微不至地询问我的病情，使我深受感动。

1991年8月，由北京大学、河北大学主办再次在北京召开了宋史国际研讨会。会前，末次玲子、前山加奈子等我们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的成员以及日本综合女性史研究会的早川纪代女士，与北京大学齐文颖、郑必俊、卢淑华教授等一起开了一次女性史研究交流恳谈会。但出乎意料的是，当天晚上，邓教授邀请与会学者去吃北京烤鸭，甚至还请来了北京大学副校长与大家共进晚餐。学者们尽情地品尝着难得的正宗口味，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不知不觉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这种气氛在日

本的中国史研究界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内心里感谢邓教授的细心安排，也更坚定了从事女性史研究的决心。在后来的宋史国际学会期间，在颐和园慈禧太后曾一边欣赏鸟语一边用膳的听鹂馆，邓教授又设宴招待与会学者品尝清朝宫廷料理。这是我至今还引以自豪的终生难忘的经历。

1987年春，邓教授赴日访问考察两个月，在东京召开了几次讲演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东洋文库所作的题为《中国文化的继往开来》讲演中开头的一段话。当时，周藤吉之、中岛敏先生等，几乎所有住在东京附近的宋史研究界的几代学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邓教授这段话的大意如下：

我来日本第三天遇见了一位宋史研究界的日本学者。这位学者对我说：“我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中国史的研究上了，你应当表扬我才对。”我想，我不仅要表扬这位学者，今天我要借此机会对所有出席本会的日本学者，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恕我直言，我真为那位学者说出这种话而感到羞愧，甚至是气愤。战后40年，我们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到底作了些什么？我扪心自问的同时，也为邓教授的宽宏大量深受感动，至今仍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自五十年代以来，我一直对中国进行的中国史研究抱着浓厚的兴趣。七十年代，我曾经发表过文章，阐述“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史研究的动向。当时对儒法斗争中的王安石、方腊佣工论、宋江投降论等宋史研究问题的评价，始终是与现实社会的政治倾向紧密相联的，人们不断为此展开激烈的争论。我就是在这期间认识了邓教授。邓教授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作为

宋史研究学者的立场。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依靠科学理论和对史料进行严谨的考证分析的方法，对随波逐流的人痛加驳斥。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坚持自己作为学者应有的立场。我私下阅读过一些“文革”中对邓教授的批判文章。作为儒法斗争的一环，批判《水浒传》曾在社会上风行一时，而邓教授却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毅然决然地对宋江镇压方腊等观点予以否定。邓教授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从不违背自己做学者的良心。

落笔至此，邓教授大义凛然的学者风范与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不禁浮现在我的脑海，使我感到他现在依然漫步在北京大学那绿树成荫的小路上。

1998年6月15日

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

——漆侠

1月10日晚上,电视荧屏上忽然出现了恭三师和他的小女儿小南同志的形象,正在讲说岳飞抗金斗争的历史。我对身旁的小孙子说:“邓先生是爷爷的老师!”可是没有多久,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邓先生已于当天上午十时病逝。自从知悉邓先生患不治之症,我和好多朋友一直担心,但同时又为他的九十一寿高兴。及至听到这不幸的消息,作为我这个追随先生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老学生来说,不由自己地沉浸在无限哀痛之中,不知道能够说些什么!

我是在1944年秋后认识先生的。这年夏天,我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在联大一年级时,为猎取历史知识,真正是“兼容并包”,诸家通史如翦伯赞、张荫麟、钱穆、邓之诚等人,甚至连缪凤林的,无不在阅读浏览之列。到二年级,我打算在断代史特别是在唐宋史方面下点工夫,于是在上学期读《旧唐书》,下学期读《宋史》,在图书馆上午下午晚上三段时间,一本一本本地读。因此在46年秋后,邓先生开设《宋史专题研究》一课,我立即选了下来。第一堂课,先生以鲁北话作为基本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清楚,而真正吸引人们的则是先生讲课的内容。前几堂课所讲的主要是北宋立国的规模及其根本性的重要制度,一般地通史总

是以杯酒释兵权作为重大事件,钱穆比这些人高明一些,把削弱宰相职权也作为一件大事,虽然说得很不充分。先生则从宋的立国形势,北有强邻契丹辽国,京都开封又系四通八达之地,由此论述宋代“以兵立国”,以养兵作为基本国策。与此同时,对凡是有危害于专制统治的诸因素,“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结果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为历代所未有。先生对宋代立国规模的论述,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看,不仅是当时学术界绝无仅有的,而且这些论点,经住了历史的检验,愈益证明它的正确。我追随先生学习宋史,自此开始了第一步。

我虽然听先生的课,但开始时从来没有同先生交谈过。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说过几句话。我考入大学之后,即开始抄点卡片。我的小学同学傅乐成兄,小学高我一年,联大则高我三年。他联大毕业时,曾把他的几百张卡片——据说是傅斯年孟真先生的,送给了我。我利用这些卡片抄录一些材料,记得其中抄有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宋制禄之厚》、《宋恩荫之滥》等等,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统统被抄走了。期终考试时,我的这些卡片放在桌面上,先生经过时看了一些卡片,他笑着问我:“你打算学宋史?”我是说。接着先生说:“你有工夫可以到我家去。”自此,我总是隔些时候到先生家去,向先生提问。先生不但回答我提的问题,还指定我看哪些书。许多书是从先生家借的,除借之外,先生还给了许多书,其中有四部丛刊本的二十多种文集,充实了我的书架。

1946年秋后胡适先生自美返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申报》办了《文史》副刊,名义上是胡适先生主编,实际上是先生全权处理。胡先生曾在《文史》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曹魏孙吴校事制度的文章。此文一经发表,风起影从,引发了

许多学者写出这方面的文章。我当时正在仔细阅读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曾经浏览到尹洙、王安石对校事制度的批评，便向先生提出此事。先生立即让我写出来。文章虽然不过几百字，却由胡先生过目，并将文中的简体字“达”给改正过来。这件事使我受到教育，觉得老一代学者治学谨严，一丝一毫都不马虎。这篇札记得到先生的奖励，在《文史》上发表。接着，我因读李觏的文集以及其他小说笔记，知道李觏对孟子颇多烦言。于是先生又让我写了《李觏不喜孟子》一文。先生对这篇文字修改甚多，最后一大段有关李觏思想的特点，是全文的精华，也是由先生写成并在《文史》上发表的。之后，从1948年到解放后的两三年，我所发表的文章，都是由先生过目并修改的。如果没有先生的奖拔、爱护，我的文字生活是不会这样顺利的。

先生对我的论文的指导，也是终生难忘的。我很早就读过梁启超先生的《王荆公传》，后来在大学又读过《王安石评传》、《王荆公政略》等著作，以及许多篇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论文。我认为这些专著和论文，对王荆公新法的研究还很欠缺。如梁启超《王荆公传》引用《制置三司条例》一文来说明均输法，而这段文字脱衍不可解。因此我向先生提出，王荆公新法还有重新研究之必要，先生极为同意，我的大学和研究生论文都是以《王荆公新法研究》为题的。大学毕业论文写了八九万字，仅写出了青苗、免役两法，因而研究生时继续进行。当时先生对论文提出如下的要求：（一）每项新法都要进行校订，正其讹误，补其缺漏，以恢复新法原貌；（二）每项新法引起的争论，变法派、反对派的意见，都加以研究，以评论其是非；（三）每项新法制订及其在实际执行中的具体情况，以说明每项新法的作用；（四）对王荆公新法的总评价。

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一向是非常严格的，我就兢兢业业地按照先生的指导去写论文。我力图把论文写得像个样子，可是越写越好，越出漏子。有一次写出一篇文章交给先生，文章把苏子瞻的“瞻”字写成了“瞻”字，先生说：“怎么把苏子瞻的瞻字都写错了！”当时政治系教授吴恩裕先生适在先生家中，我听到先生的批评，立即觉得满脸发烧，恨不得有个砖缝钻到地下去。这类错误本不应当出现，但是由于我读书粗疏，不细心，援引的资料经常出现问题，有的是脱漏，有的是这部书中的记载写成了另一部书。如《长编》（卷四十七）、《宋史·王禹偁传》都载有王禹偁对当时地方统治虚弱的奏疏，但奏疏有所歧异。我用的《长编》，却写成了《宋史·王禹偁传》，引文自然有不少舛误。像这类问题，先生经常给以批评教导，所以对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评语是，肯定了我对材料的搜集，称之为“披览甚广”，但是指出了论文的两大弱点，一是引文“脱衍甚多”，再一是文章不通顺。先生对我的要求很严，对我的指导则很周密细致。可惜由于我愚笨，不能认真领会先生的教诲，粗疏的毛病一直没有改正，也因此受到应有的惩罚。前几个月，为《宋代经济史》的再版，我作了一番较为细致的校对，出自粗疏而使引文脱衍和注释上的差错，不下一百多处，我在愧对读者的同时，想到刚刚逝世的先生，更觉有愧于先生的教导。

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正因为先生的严格要求，培养了不少的优秀学者，对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教育家。遗憾的是，我虽然是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却使先生很失望。1953年底，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中出了岔子，开会批判。我的老同学蔡美彪兄当场揭发：“漆侠是邓先生最不行的学生。”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

在一个时期之内，我既不愿意说自己是先生的学生，也不愿意别人知道我是先生的学生，唯恐有损先生的清誉。

1988年，我去济南参加山东大学博士生的论文答辩，碰上张政烺苑峰先生。张先生虽然没有指导我论文，但他对我的厚赐终生不敢稍忘。在我的心目中，苑峰师同恭三师都是我的恩师。我对苑峰师说：“老师，招学生，千万不要招我这样的学生，一点用处都没有，不能宏扬光大您的学术。还是要招当官的和有钱的学生，才有用处。子贡结骑连驷，周游诸国，孔夫子的名声才张扬起来。”这些话，没有任何的牢骚，而是出自肺腑之言。我这些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总是觉得得之于恩师的赐与者甚多甚多，而回报于恩师者则甚少甚少，愧对恩师。特别是下面的一件事，已成为了终生憾事。中国学术界缺乏一部像样的中国通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断代史的研究不够。断代史的研究胜于中国通史，但也不尽如人意，讲义式教材居多，有独到研究者则甚少。只有真正能够盱衡一代，将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作为统一整体，从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论述其发展，才有可能写出一部较有深度的断代史。因此，我自任大学任教以来也写出了包括宋辽夏金史在内的几部断代史讲义，但从来不敢对宋辽夏金史有所问津。蒙先生厚爱，多年前即推荐我向某家出版社写这部断代史，我没有答应。七八年前，先生曾当面对我说：由你挂帅，写一部宋辽夏金史。在我思想上从来没有这一奢望，当时没有回答上来。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前几年看到先生自选集序言，以自己没有写出宋辽夏金断代史为憾事。真正能够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只有先生。如果先生当面提出这一问题时，我力请先生主持其事，对先生、对我都不成其终生憾事了。每念及此，就像一个沉重的铅块压在心头上。

对先生的学问，作为学生，只有老老实实在地学习，不敢妄自议论，勉强说上几句。我以为，先生的学问，以博大精深，或“致广大而尽精微”一句以尽之。我自己认为，专才易得，而通才则甚难。求中国通史一类的通才怕是很难找到，而断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并不多见。有的断代史能有一二人或二三人也就很不错的了，有的断代史怕是一个通才也没有。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只有先生才称得上。四十多年以前，先生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曾奖勉先生：“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个结论经历了几十年的检验，依然是极其正确的评论。我，以及先生的其他学生，只有认真学习先生的著作，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才能继续在先生开拓的宋史研究的道路上前进，宏扬光大先生的学术，推动这一断代史的发展。

1997年，先生九十大寿。原拟亲自去北京祝寿，但先生非常谦虚，仅同家人团聚，因而未曾前去。为祝贺先生百年一遇的大寿，我曾写了一首诗。诗自然不佳，但聊表寸心。不揣谫陋，写在下面：

一从杏帐五十年，头白犹期序三千。

还我河山悲武穆，斜阳烟柳怜稼轩。

凌云健笔意纵横，天水风物换新天。

耄期幸逢称盛事，敢以心香寿南山

（《祝先生九十寿辰》）

先生毕生尽力于学术研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治学精神，学术上卓越的成就，将如生活之树一样，万古长青。

悼念邓广铭先生

姚瀛艇

邓广铭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长达六十余年之久，德高望重，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虽在耄耋之年，仍著述不辍。孰料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我虽未直接从邓先生受业，但作为一个学习宋史的后辈，从一开始，就学习邓先生的著作，深受教益。所以，从1979年得见邓先生之后，即以师礼事先生。我又有幸与先生有通家之谊，因此，对他的逝世，更感悲痛。

先伯父从吾先生，于1934年到北大史学系任教，邓先生于1936年从史学系毕业，与先伯父谊在师友之间。1946年秋，先伯父来汴任河大校长。当时我是河大文史系史组四年级的学生，住在校内集体宿舍。先伯父校务繁忙，我和他见面的机会不多。间或某个星期日能见到他时，他也常和我谈些在北大与西南联大时的往事。其中就曾谈到邓先生，很称赞邓先生做学问功力之深与创获之多。这些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却无缘与邓先生相见。1949年元月，先伯父去了台湾。全国解放后，我更不敢用这种关系去打搅邓先生，唯恐给他带来麻烦。因此，一直到1979年夏季，我才有幸见到邓先生。

当时，邓先生来汴参加《简明宋史》审稿会。我作为这本

书的撰稿人之一，也参加了会议，第一次与邓先生见面。当他了解这种关系后，非常高兴。我除了在会上聆听邓先生及其他几位先生的发言外，在会外还曾就有关陈亮的一些问题，如究竟几次被诬入狱，对绍熙四年殿试对策中“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这句话应当如何理解等等，向邓先生请益。邓先生均给以详尽深刻的分析，使我顿开茅塞。当时我知道邓先生的毕业论文就是《陈龙川传》，就问邓先生是否可以借阅。邓先生答复说他仅存有出书时的清样，并慨允回京后即寄来。当时刚刚拨乱反正，整个国家都困难，邓先生的住房也不宽裕，许多书都堆在地板上或床下。邓先生回京后，不顾酷暑炎热，多次周折，才找到这本清样，挂号寄来。当年，邓先生已七十二岁高龄，为了帮助一个初次见面的故人的侄子，就不顾年迈炎热，亲自在书堆里翻来翻去，检出这本书来。邓先生对我这样热心关怀和帮助，我当时就觉得不知怎样感谢才好。如今写这篇悼念邓先生的文章，回想当年我接到这本书时的心情，更不禁涕泗纵横感泣交集了。

我第二次见邓先生是1982年的10月，当时在郑州举行第二届宋史年会。因健康和其他原因，82年以后有好几次宋史年会我均未参加，直到1992年4月在开封举行的宋史年会上，我才第三次与邓先生见面，距第二次相见，已经整整十年了。但在此期间，邓先生对我仍非常关心，每有著述出版，必以见赐。如1986年赐《岳飞传》（增订本）、1988年赐先生亲手校点增订的《陈亮集》、1990年赐《涑水记闻》（校点本）。其后，1995年赐《学术论著自选集》、1997年赐《治史丛稿》，这已是邓先生住院以后于1997年11月4日由苗书梅同志带回的。再有一本就是重新大幅度增订修改后于1997年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这是邓先生去世后王云海同志受小

南同志之托，于今年5月12日带回的。这一本本专著，都体现了邓先生对我的关怀之情。现在重新捧读这些专著，邓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而他与我已仙凡永隔，再无相见之期。每念及此，怎不令人伤心欲绝！

1992年开封宋史年会期间，我曾记有简单的日记，因此，现在还能复述会议的梗概。这次会议于当年4月20日至24日举行，会址在河南大学学术交流中心。4月20日为报到期，邓先生于当日中午时分到达开封，住在学术交流中心201号套房。中午休息后，拜访邓先生的人络绎不绝，我于下午四时左右才与邓先生见面。21日上午，在河大新建成的科技楼大阶梯教室内举行开幕式，邓先生作了重要报告。24日下午，在同一地点举行大会发言与闭幕式。其他时间，或小组讨论，或自由交流，或参观访问。25日上午11时左右，我到邓先生住处与邓先生话别，下午3时，邓先生与乔幼梅、马力二同志由苗书梅同志陪同离开汴去郑州，我与许多同志都在学术交流中心院内广场送行。不料对我来说，这一别竟再也见不到邓先生了，行文及此，真是伤哉！痛哉！

在这次年会的开幕式上，邓先生作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痛斥教条主义对我国史学研究所造成的危害，又痛陈史学研究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个报告，不仅表现了邓先生在理论上的勇气，而且表现了邓先生严谨踏实的学风。邓先生六十多年的学术实践，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典范。

根据我个人的粗浅体会，邓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史准则，在他的论著中至少有三方面的体现。第一，对史料的严格审查与鉴别。邓先生在《自选集》的自序里曾说：“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

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致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相”。这段话可说是邓先生一生治史的总结。他在自序中又说：“收录在这本《自选集》中的许多篇文章，可以说，都是因为我加意地对于有关史料作了充分的鉴别、审查和由此及彼的比勘考证，然后才使研讨的问题得出了较新的结果的。”事实上，邓先生的所有论著，都是经过如此缜密、深入、严谨、细致地对史料的鉴别、比勘而取得的新成果。正因为邓先生对史料审查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所以，他的论著，几乎都是考原、匡谬、订误、辨伪、增补、发覆之作。第二，不断纠正前此一些不够确切的论点。任何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总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所涉及的领域，也有一个逐步拓宽的过程。早年或初涉某个领域之作，往往存在一些不够妥当或不够深入的问题。即使成名成家，有时迫于某种特殊的环境，也不得不发违心之论。对这些问题，邓先生一贯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地坦诚纠正。最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三个。一个是1984年在《陈亮反儒问题辨析》中纠正1944年出版的《陈龙川传》中关于陈亮绍熙四年（1193年）殿试对策中所说“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一句所作的不妥当的理解；另一个是1987年在《略论宋学》中纠正1963年出版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两宋的哲学思想》一节中关于“理学”的不当论述；再一个是1997年出版的四写《王安石》中清除了1975年二写《王安石》时所掺入的“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等污染因素。四写《王安石》，是邓老最后一本专著，可见“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直贯串于邓先生治学的始终。第三，锲而不舍，精益求精，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大幅度修改或改写旧作，典型的

例子就是三写《岳飞》，四写《王安石》。这样大幅度改写、精益求精的态度，在当代学人中，可称举世无双。

至于邓先生对我国史学的贡献和学术地位，陈寅恪先生早有定评。陈先生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就读到过邓先生考辨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昆明，陈寅恪先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邓先生任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与陈先生朝夕相处，陈先生目睹邓先生勤奋治学的刻苦精神。因此，当1943年，陈先生读了邓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后，就盛赞邓先生“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更断言“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人之一，可以无疑也。”（引文均见陈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从1943年以后，55年过去了。邓先生的学术实践，完全证实了陈先生当年的论断！邓先生对新宋学的建立是当之无愧的最有功人之一！

邓先生虽已仙去，但他的道德文章，自在人心，他的论著，自会流传；而且当代享誉国内外的宋史学者，大部分是邓先生的及门和再传弟子；特别是小南同志，克绍箕裘，继承家学；薪尽火传，邓先生应无遗憾。

我自1947年起即心仪先生，当年我二十四岁，刚从河南大学文史系史组毕业，尚摸不到做学问的门径。一弹指间，51年过去了，我在学术上仍乏建树，幸未因此而见弃于邓先生。每念及此，既感且愧。如今，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合力编辑邓先生纪念文集，我特写此文，追忆邓先生对我的关怀和我对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的体会，以表达我对他的感念之意与哀悼之情。

愿邓先生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1998年6月3日

仰止集

98

永远不会淡去的印象

彭志齐

又一颗巨星陨落！又一次噩耗惊魂！

当沈从文、朱光潜、贺麟、冯至诸先生相继谢世之后，邓广铭先生又溘然长逝了。

今年一月下旬，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忽然收到“邓广铭教授治丧办公室”寄来的一份《邓广铭教授生平》。像被雷击了一样，我木然茫然地站着，想着就在不久以前，老同学邓可因在来信中还告诉我：先生健康状况良好，刚刚写完的《王安石》就要出版了；还说我为先生九十华诞所写的祝寿词《沁园春》，先生看了很高兴，赞扬我写得不错。怎么倏忽之间，先生就撒手长眠了呢？我默默地面对先生的《生平》伤心落泪。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展现出五十年前我深受先生的关怀、鼓励和教益的一连串往事。

我最初见到先生，是在1947年暑假里，而且接二连三地找了他多次。先生一点也未表示厌烦，总是热情接待，为我排忧解难。那时北大先修班已经结业，学校规定：学生中五门功课（国、英、数、理、化）如有三门不满60分的，就取消其

仰止集

99

保送资格。说来惭愧，尽管我当时的英文考了85分，（而且第二学期我的英文夺魁，考了89分）国文也有81分，但数、理、化都未滿60分，因而也就失去了保送资格。我着急了，心想，我由交大二年级转入北大先修班，就是为了要读文科；北大不是标榜发展个性、学术自由吗？像校方那样的录取标准，能说是合理的吗？

我想找校长去说理。

由四院到了沙滩，我就径直朝校长室走去。在院子里，正好见到负责先修班英文教学的潘家洵先生。因为读过他翻译的《易卜生戏剧集》，我对先生很尊敬，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有点惋惜地说：“你的英文很不错啦！”接着他又鼓励我说：“你可以参加入学考试，当然也可以找校长谈了。”

到了校长办公室，只有邓先生在那里。我定睛一看，只见他仪表堂堂，穿着一套中式绸缎裤褂，学者气质十足。他好像正在整理一篇什么稿子，书桌上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呈郑天挺师教正”。先生见了我，就停下手里的工作，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要见胡适校长。他说校长不在，是什么事他可以替我转达。我就把我的来意告诉了他。先生见我神情沮丧，就安慰我说：眼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入学考试已经临近，我应该先把这件事放下，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努力复习一下数、理、化，以便参加考试。他鼓励我说，按我当时的成绩，一准能考上。一种对青年学子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那时先生刚刚步入不惑之年，风华正茂。他说话时的诚恳热情，两眼里温良亲切的目光，一下子就让我认识到：先生是一个真诚坦率、值得信赖的人。

回到四院，我就按照先生的教导，一心一意复习功课。几天后参加了入学考试。（接着又参加了北师大的招生考试和北

大招考练习生的考试，后来连中三元，练习生名登榜首。）

考试完了，我又决定去找校长，还是想从他那里讨一个说法。这次还是没有见到校长，又是邓先生接见了。还没等我开口，他首先问我考得怎样，然后说他已经把我的意思向校长转达了；校长让我用中文和英文各写一篇自传，他要看看我的水平。我意识到先生已经向校长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因而引起了校长的关注。我很快就向邓先生交了卷。记得先生首先翻开我的中文自传，看着看着，脸色变了。他说：“你真行！你明知校长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你却偏用文言写作，而且是直接写给校长看，这不是有意跟他唱对台戏吗？”我说：“校长提倡白话文我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这次写作的时候，就把这档子事给忘了。”我又解释说，我少年时代，读的是“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书，小学只念了一年，就上了中学；这其间我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到了交大以后，读的新文学作品多了，才开始学写白话文。我说这篇文言文不行，我可以再写一篇白话文。先生笑了，温和地说：“算了吧，你过几天再来。”

没过多久，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去了沙滩。这一天，天气晴和，刚走到院子里，我就见到了先生。他好像手里拿着稿子，准备外出，见了我就疾步向我走来，笑容可掬地说：“你高中了！明天就见报。”我喜出望外，不知说什么好。先生问我还要不要见校长，说他今天来了。我当然想一睹校长的风采，就跟着先生进了校长办公室。

见到校长，我开始有点紧张，怕他责怪我还写文言文。谁知他并没有提起此事，只是随便问了些事。记得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湖南人。他说我发音不对，湖南的“南”应该念“nan”，而我却念成了“lan”，他还捏着鼻子念给我听。这样

我的紧张情绪立刻就烟消云散了。他又问我北大的光荣传统是什么，我说是提倡科学和民主，“科学”、“民主”二词我是用英文说的。校长笑了，他说科学的基础知识就是数、理、化，如果一个人连数、理、化的基础知识都不具备，学什么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要珍惜北大这样的学习环境，趁年轻多读些书，把基础打好，将来才能成为国家社会的有用之才。真是蔼然仁者之言，不是咄咄逼人的训斥，而是春风化雨式的循循善诱。我现在回想起来，一种对先哲的敬仰之情，仍不禁油然而生。

我从校长室出来，看见邓先生正坐在那里改稿。他提醒我说，要记住校长的话，不是每个学生都能面聆校长的教诲的。

二

开学以后，我为助学金的事，又受到过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原来我在交大是享受助学金待遇的，来到北大先修班，就失去了这种待遇。大学一年级有这种待遇的也只是一部分人。为此，我首先向沈从文先生求助，因为我由交大入北大先修班时，沈先生的教导对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6年暑期，北大招收的先修班直到11月份才开学，在此以前，我已经在交大二年级注册上课月余了。有同学劝我就在交大读下去，因为交大也是名牌大学；如果去读北大先修班，就要耽误两年，我犹豫了。也许因为读过沈先生的几本小说，就贸然写信向他求教。真想不到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长信，整整四大张纸，写得密密麻麻。大意是说：如果我想学文学，那就还是读北大的好；至于多读两年书也是好事，不算耽误。对于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学子，问的又不是写作上的事，先生竟然如此热情对

待，真使我万分感动。可惜那封信在“文革”中丢失了。

沈先生听我说起助学金的事，当即伸纸挥毫，为我写了一纸申请书，并签上他的大名。他让我最好再找找邓先生，请他也签个名，这样力量就大些。于是我又一次找到邓先生。先生从我不久前写给校长的自传中，知道我母老家贫，倘无助学金接济，就有辍学之虞，所以他看了沈先生为我写的申请书，就欣然命笔，签上了大名。随后先生又建议我请韩寿萱先生也签个名，这样就万无一失了。韩先生当时是北大博物馆的馆长。我考取北大练习生后，曾在韩先生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先生为人谦和热情，讲一口十分流利的英语，常有外国人来博物馆参观，他们总是用英语交谈。见到先生，我说明来意后，他也立即签了名。我将这份申请书交给训导长贺麟先生时，他笑着说：“批准了！”

后来邓先生见了我，还关心地问起助学金的事，我说贺先生当时就批准了。先生说：“贺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对青年学生是很爱护的。”

三

自从我选修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以后，亲聆先生的教诲就多了。先生教学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那严谨的学风。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旁证博引，灵活发挥，讲得既深刻，又生动，使人感到每一次听课都是一次愉快的享受。记得讲先秦诸子时，讲到孔子的学说，先生就联系孔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来启发和勉励我们：第一要多读书学习，第二学习必须结合独立思考。先生说，孔子一生都在学习，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古人也素有“博闻强志”

的传统；学文科的人要广泛涉猎历史文化的各方面，以后再向某一学科专攻，就能见出成效。先生又说，孔子不但一生都在学习，而且一生都在思考，他引孔子的话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学与思的统一，才能学有所成。

先生讲课，还要求我们记笔记。他教导说：“记笔记既要聚精会神地听讲，又可以帮助记忆和思考，是学习的重要一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我们的笔记本收去，进行评阅。后来笔记本发下来了，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些地方打上了“！”和“？”，还有改错和补漏。记得对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我把“罔”误写为“枉”，“殆”误写为“怠”；对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写成“民为贵，君为轻”，漏掉了“社稷次之”一语。先生都一一予以改正和补上了。这就是先生教学严谨踏实的纯正学风。后来我见到先生，他教导说：“读书要下苦功夫，对经典著作要精读，才能熟记于心。”

岁月流逝，人事倥偬。如果当年我真能按照先生的教导去学习，去思考，也许自己的学业前途和人生道路都将是另一个样子。想到这一点，一种深沉的怅惘就会向心头袭来。

四

离开北大，我再也没有面聆先生的教诲了。其后不久，我就运交华盖，在一条坎坷的人生旅途上，跋前踖后，踽踽凉凉。但每一念及当年良师益友的教导和帮助，往往策励自己要不停地学习，永远同自己的浅薄作斗争，以免在浑浑噩噩中坠入难以救药的地步。我从小就爱好祖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喜欢阅读唐诗宋词，常常被其中的锦章绣句所激动。因此，读古典

诗词就成了我学习的内容之一。记不清是在哪一年，我在旧书店里买到一本龙榆生先生选编的《唐宋名家词选》，龙先生对每位作者都附有“传记”与“集评”两项资料，供读者参考。我在辛弃疾的“传记”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近人邓广铭著《稼轩词编年笺注》，附《辛稼轩先生年谱》，采集之富，为历来治辛词者所未有。年谱有商务印书馆本，笺注尚待印行云。”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万分高兴。从此便经常去书店搜寻，很快就买到了《年谱》，但《笺注》却很难买到，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在哈尔滨买着。

先生的这两本书，正如先生在《稼轩词编年笺注》的《例言》中所说，是“互为表里”的。我有了这两本书，就遵照先生的指引，把两者对照起来研读，所获的教益就大了。先生的国学功底很深，对辛公的行年考证是那样详审，那样精当；对囊括经史、贯穿万家的辛词的笺注，更是独具特色，能发前人所未发，其所包容的知识、方法，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对一般读者，都是补益良多的。所以专家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词坛泰斗夏承焘先生在其序文中嘉赏备至，认为《笺注》“钩稽之广，用思之密，洪兴祖、顾嗣立之于昌黎，殆无以过。”著名词学家叶嘉莹教授也认为邓先生是“直至近代，对辛词之研究致力最勤，成果最丰的一位学者”。因此常为研究辛词的人奉为主臬。

对于像我这样的一般诗词爱好来说，这两本书就更是良师益友了。由于辛词用典最多，要读懂辛词，就必须弄懂词中所涉及的古书、古语、古人、古事，这是真正进入丰富多彩的辛词世界的必由之路。先生《笺注》录词 629 首，搜罗繁富，校勘精严，对词中的典实，详加注释，对僻奥难解的词句，均能旁证曲喻，求得其本义确解。其见解之精辟，真能益人神智，

使人思想豁然开朗。由此可见，先生的《笺注》就像是一把金钥匙，有了它就能打开辛词世界的大门。进入大门，再读辛词，使人感到的就是那热烈跳动的爱国激情，那壮志未酬的忧伤怀抱，那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以及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他的词集就是作者一生自我心声的真实记录，感情世界的艺术再现。我常常以仰慕和惊叹读着先生的这两本书，我庆幸虽然不能再到课堂上去亲聆先生授业解惑，但只要一编在手，我就总有如坐春风之感。我曾经写过一首《浣溪沙》来表达这种心情：

竟日芸窗读稼轩，依稀侍坐讲筵前，恍闻警发启愚顽。夫子文章悬日月，辛公词赋挽云天。丰碑高耸万年传。

先生走了，留下等身著述，留下长青师表，从容地步入了永恒。此时此刻，五十年前的每一次见面，每一次听课的情景，仍是那么清晰，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

一个仪表堂堂、温良亲切、海人不倦、博学多才的邓先生，永远留在我印象里，永远不会淡去！

邓师周年祭

田余庆 李克珍

邓先生走了。在师辈中，邓先生是老寿星，走得不算早。一年以前，先生九秩华诞，友朋弟子著文为寿，同声赞颂先生五美具备：年高，德劭，学富，体健，业勤。事隔一年，先生还是走了。毕竟是老健不足恃，岁月不饶人。友朋学生哀痛之余，得知先生病中和病前的一些情况，都说先生真有福份。

先生走得没有痛苦，走得平静，走得尊严，是不幸中难得的幸事，是最大的福份。

先生素来坚信自己健康，耄耋之年，屡次体检，居然没查出过什么大毛病。他能吃能睡，从不忌嘴，从不失眠。他不进滋补品，很少吃药，每天还坚持到系办公室走一趟，当作散步。他老态并不显著，除了雪地以外，不用拐杖。可是细细观察，还是一年一个样，不变中有变。在外面开会时，我曾有几次与先生同住一室，最近的一次是1988年初夏在广州参加纪念陈寅恪先生学术会议。邓先生会上发言，谈笑风生，不时道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掌故，座间为之咨嗟。可是一回到房间里，就打瞌睡，显得疲惫不堪，力不从心。近几年在家里，瞌睡更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逞强，坚持生活自理，不要人照料。总之，邓先生对自己的健康很达观，从没听他说过担心的话，心理状态一直很好。

前几年，我病后，邓先生不时给我送点茶叶。他说，他的健康可能是得益于喝茶，所以有了好茶，与我分享，对我的健康会有好处。我还保存了先生的一纸“赠茶帖”，说是“两天前，有人送来绿茶两盒，盒上标明是特级，今特请林宗成同志转送给你们……”。老人提笔不稳，字迹歪扭，更见一番心意。一次，先生自香港开会回来，给我带来西洋参片剂，据同行的小南说，先生一路自携，说是怕挤碎了，情谊实在感人。

从这里，我想到最后一次与邓先生见面的情景。那是去年十二月，我们到友谊医院探病，邓先生一见面就说：“我的病不要紧，你这个病才算病，要多注意自己，何必来看我！”他还说到想出院的事。我们看他精神很好，病容不显，像是爱谈话的样子，感到高兴，想找个他有兴趣的轻松话题聊聊。于是我扯到胡适书信集中涉及的闲事。没想到他话匣子一开，就像平日在他书房里那样健谈，源源本本，一五一十，叙事很有“史法”，丝毫不像是在病榻上的样子。克珍提醒我，让病人散心就行，不能让他太兴奋。我想找个岔打断他的思路，恰好另有人来，结束了这个话题。

我当然知道邓先生有膏肓之疾，据说他自己是在知与不知之间，没有人跟他明说，但可猜测的迹象很多。尽管如此，看到他精神这样好，绝想不到他近期内会有险情。可是不到一个月，邓先生就走了。走前有短时间的昏迷。但是没有呻吟，没有牵挂，保持自己的常态，保持一贯的尊严，潇洒而去，这是难得的完满。

邓先生住院好几个月，他一定感到是生命的浪费。但是他把书房搬到了病房，让书卷气冲淡了病房特有的气味，这又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静卧病床，但思想中的兴奋点却始终在学问上，让人觉得他除了熟睡时间之外，考虑的都是文稿著

作，思念的都是他神交已久的古人，此刻他驱之不走的古人是王安石。据小南说，新版《王安石》的大样，是别人一页一页地举着让他看完的，那时他平卧输液，自己不能举手。新版《王安石》有他逐字口授的卷后“附志”，说：“我从今年七月初至今一直在医院内，本书得以顺利面世，实有赖于多方帮助”，以下列举三项致谢内容，合共百余字，表现出他病中心境平和，思虑细密，对学术一往情深。“附志”所署日期是1997年9月18日，离辞世不到百日；但样书印成在年底，他亲眼见到了，他会感到对得起自己神交已久的古人，他完成了引为欣慰的大事。

邓先生卧病不废著述，正为后来的讣文所说，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全在学术，与一般人在老病之际常所萦怀的不同。带着这种为学术奉献的高尚情操走完自己一生的道路，心无旁骛，这当然也是福份。

邓先生卧病之前的一两年中，已对自己一生心血之所积，亲自作了总结，出版了《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又商定了出版全集之事。这几件事都是出版社促成的，邓先生并无结束此后研究工作之意，但时机凑巧，邓先生恰恰在此时为自己一辈子学术生涯圆满地画上句号。著作结集出版，是邓先生最为关注的事，既然办得妥妥帖帖，邓先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事了。

邓先生在《治史丛稿》自序里特意提到章实斋所说文史通家“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近来所见纪念邓先生的文章多引据此语，赞扬邓先生的学术成就，是非常恰当的。邓先生兼有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两者无所偏废，这正是古人之所难。但邓先生也认为两者毕竟有别，治史必先要有选择处理史料的能力，才谈得上独断的创获。在学风浮华的时

候，更要不废考索之学的基本功。我年轻时，邓先生关注我的学术成长，但并没有给我口头指点，只是送我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线装殿本，“文革”以前我一直放在手头使用。现在回想，邓先生是为了怕我走浮华不实的道路，才寓指点于赠书，送给我他所看重的“四把钥匙”中的一把，启迪我举一反三。既然说是“钥匙”，就是为了用以开启历史科学殿堂之门的意思。用这把钥匙登史学的堂奥，才可能有独断创获，达到史学研究目的。这是邓先生治史的一贯思想，一贯方法。想当年批“四把钥匙”之说真是无事生非。

“文革”以前，邓先生曾领着我们几个人编《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常聚在一起看稿子。邓先生说，他选稿的标准是：有史有论才是上乘之作，要细心对待；其次是有史无论，这种稿子有些有用，其中有些可能还有大用；再次是有论无史，其中不少是不花本钱的空洞文章，最不足取。史，是考索之功；论，是独断之学。有史有论，就是指在考索之功基础上获致创见的文章，这才是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当然，文章要细致分析，才能准确判断其实质内容和具体价值。邓先生的话只是几条粗杠杠，但是我们都能理解，都很同意。“史学”选登的稿子虽然质量上不整齐，但选稿标准大体就是这样。我们选稿标准有时与报馆有关方面在某个特定时间的需求不尽一致，不免形成意见分歧。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由几个书生办报纸专刊，越来越不适应，才由大家商定，邓先生作主，辞掉了“史学”编辑工作。今天看来，这件事说到底，就是大家心目中有个不愿改变的独断之说和考索之功的史学标准之故。

邓先生在做学问上如此投入，无分工作日与休息日，无分在职与退休，甚至无分家居与住医院，真可谓是“恒兀兀以穷年”。正是由于有这一辈宗师把学术融入生命，把生命融入学

术，由于他们的表率作用，中国的学术赖以传承，文化赖以发扬光大，人才赖以熏陶培养。我劝过邓先生，耄耋之年，要自找闲散，晚间尤其不宜工作。我见过他在溽暑夜晚在强光灯下奋笔，书桌前面地下放着电扇排风，才有此劝。他说，自己兴趣有限，电视节目不爱看，只有读和写。白天免不了有客人来访，有电话，有杂事，难得专心致志，夜晚工作，图个安静。我想，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三余”。邓先生活得这样充实，这样有价值，真叫人歆羡，真叫人佩服。但是，几十年如一日，从青年到老年，邓先生毕竟太疲倦了。他已经安息了，就不要再打搅他，就让他永远地安息吧！

悼念邓广铭教授

王云海

邓广铭教授不幸仙逝，宋史学界一颗巨星陨落，大家无不悲痛，而我有幸与邓老有一段特殊的因缘，对他的逝世，更感到万分沉痛。

我虽与邓老素昧平生，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和他见面，但早在50年代初期，我就拜读邓老的著作。当时我先后在平原省师院和河南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后来又专讲宋辽金元明清这一段。因为没有统一教材，需要自己编写，在备课和编写教材的过程中，经常认真阅读邓老的著作，对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十分钦佩，并作为努力学习的榜样。这时，我实际上已成为邓老的私淑弟子，所以在后来的交往中，均执弟子礼，每通信则尊邓老为师。

与邓老第一次见面是1979年，在开封宾馆讨论《简明宋史》初稿的会议上。由于下文所述原因，当时邓老对我已经有所了解，并对我有关《宋会要辑稿》的研究成果异常重视。

1958年，我被打成专政对象，翌年送学校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因病安排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接受监督。当时由系主任刘尧庭教授负责，组织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及河南省历史研究所的部分人员，建立了“宋史研究小组”，定期讨论宋史业务和史学理论，并着手积累宋代经济史资料，指定张怀礼同

志抄写《宋史》、我抄写《宋会要辑稿》中有关宋代经济史的资料。由于长时间抄写，我逐渐对该书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将体会写成一篇《宋会要辑稿的史料价值及其存在问题》的论文。因为我的处境不能发表，刘尧庭副主任在征得我的同意后，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名义在学报刊出。与此同时，我又将中华书局影印的现存《永乐大典》，对《宋会要辑稿》进行校补，取得一项新成果。此后，发现的问题日益增多，只有用逐篇详注的形式才能系统编入，于是又编制了一本包含大量研究成果的《宋会要辑稿标目》。《校补》和《标目》二稿被教研室影印，后来知道，历史研究所的陈振同志将这两个油印本寄请邓老审查，得到邓老的肯定，并向宋史学界广为介绍。1979年在开封开会时，偶与邓老及陈振同志等同桌进餐，席间，陈振同志将我介绍给邓老，并提到那两个油印本就是写的。邓老称赞了几句，又问我：“准备在哪里出版？”这期间，河南大学党委对我的平反工作尚在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出书，自己也不清楚，只好如实回答：“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将来如果出书，可否请邓先生写一篇序言？”邓老当即慨然应允，会后我就积极作出书准备，将与该课题有关的两篇论文及新撰的全书之“说明”，誊写一份寄呈邓老，以便据以写序，邓老征得我的同意后，将其中一篇论文，推荐给《文献》刊出，并给该书命名为《宋会要辑稿考校》，又将《标目》改作《宋会要辑稿篇目索引》。此后邓老每有新著皆及时寄赠，给我提供更多的学习条件。

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邓老即将《序言》带交上海古籍出版社，此事为《考校》的顺利出版，起了关键作用。

上海的会议，我未能参加，直到1985年见到《宋会要辑

稿考校》的清样时，才第一次拜读邓老为该书所写的《序言》。我在被改造的艰苦环境中所做的一些工作，得到一代宗师那样的肯定和鼓励，不禁百感交集，酸辣苦甜一起涌上心头，而知遇之恩更使我永生难忘。

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邓老以会长的身份推荐我为第一批会员。1989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三届年会上，漆侠同志和我又被补选为理事，使我接受邓老教诲的机会日益增多。除了历次会议及不时会面时可以当面受教外，平时在治学方面的问题，经常可得到书信的指导，邓老的治学方法对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邓老师承傅斯年先生“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这一命题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及观点立场的用意），特别重视对史料的搜集、解析、鉴别、审查和由此及彼的比勘考证等方面的基础工作，从而排除庞杂混乱记载的干扰，使研究的新成果具有开创性的独到见解，能够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相。例如，邓老在有关岳飞问题的研究中，将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中的一些谎言和误解，予以揭穿和校正；对《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的考源辨误等，皆旁征博引，揭示致误的由来，恢复附合史实的记载，从而推动学术水平的发展。

邓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逾六十年，大量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可靠史料的基础之上，实事求是地对史实进行分析，得出令人折服的结论，在许多课题上足以代表二十世纪宋史研究的新水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搞清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是我从邓老的实践中得到的一个体会，尽管我在研究工作中有时力不从心，但却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我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中就有“史料学”、“校

勘学”两个学科。邓老提出的治学门径，也是我向学生认真讲述的内容。苗书梅同志在她的《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一书的《后记》中写道：“王先生曾多次向我们讲起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把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目录学、年代学作为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的学术观点，在此启发下，我选择宋代官僚制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尽力搜集有关史料。”这段话说明邓老科学的治学精神，在我的学生中得以传承，她也一定要把这种精神传给她的学生。因此，我自己深感欣慰，也愿用这段话来告慰我的恩师邓广铭教授的在天之灵。

1998年3月26日于开封寓所

缅怀一代学人、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

何 聪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恭三先生 1998 年 1 月 10 日病逝于北京。恭三先生于我来说,虽未经课堂上授业,实际却是我亲聆教诲的师长。从六十年代初,我作为他的助手开始,相识相知近四十年。后来这份友谊又延伸到两个家庭。我们之间的感情是诚挚的,是深厚的。我得到了他多方面的关爱。他的逝世,我们家中每个成员都感到非常沉痛。我们深深地缅怀着这位可敬的老人。回忆四十年来,国家家庭个人在那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多少往事都一一回到我的记忆中来。

我作先生助手的前前后后

我是在六十年代初,经已故北大明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介绍,开始作恭三先生的助手。商先生是我的姻兄,大我近二十岁,对我是关怀倍至。我在四十年代末,曾任职语文教学工。五十年代因革命需要,转向经济工作,但自己耽溺于文史,眷恋旧业,深得商先生同情。其时,中华书局为了整理古籍工作,建议为恭三先生配备助手。在他遴选期间,商先生将我介绍过去。商先生对恭三先生了解很深,他们都是北大学友。商先生对我说:“邓恭三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很为胡先生

所器重。他勤奋好学,持论谨严,具有深厚的史才、史学、史识,著作繁富。三十年来从事历史教学,辛勤培育英才,桃李满天下,堪称史坛巨擘。作为他的助手,必将获益良多。”

我接恭三先生的第一项工作,即是通校他于 1957 年出版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先生从 37 年即开始致力于此书的编写。从 37 年到 78 年,四十余年间,几次修订、重版。这部传世之作充分显示出先生治史功力的精深,著述的毅力,写作的严谨和献身史学研究的学者风范。

在我校这部书的初起,先生即将他的所有著述都检出赠送给我。我想他这样做是要我能了解他的治史意向、工作方法和写作风格,同时也可以加深我对有宋一代史学研究的理性知识。

我喜读中国古代诗词,尤其是词。觉得词中怀人、叙事、写景婉丽抒情,感人至深。最喜爱的是李清照、南唐二主、纳兰容若的词,但从未作深入研究。至于豪放派的苏东坡、辛弃疾的词作,也就是熟稔为大家所读烂的那一二十首。特别辛弃疾的词,词意艰深,用典冷僻,不易记诵。但是从《笺注》这部书中,我学到了对辛词的欣赏和认识。《笺注》首篇《略论稼轩及其词》一文,具有清丽的散文风格。先生运用成熟的写作技巧、简练的语言、雄健的笔锋,很强的逻辑性,不论叙事、说理,都能婉转透辟,曲尽其意。虽是史学著作,却可以作为文学佳篇来阅读。中国的传统史学,多是只重史实,不重文采。书法较刻板、保守。司马迁的《史记》千百年来,始终为人所赞颂,正是因为它既是史学也是文学。有一次我曾和先生谈及“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坛新潮汹涌,散文、小说、新诗名家辈出。想不到先生也对这些名家名篇熟读,熟记,历历如数家珍。如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

色);许地山的《落花生》;冰心的《我的童年》、《笑》;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冯沅君的《隔绝》;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诗人徐志摩的《别了康桥》、《偶然》;戴望舒的《致萤火》等等。甚至还情不自禁地吟哦那些诗句。当时先生心醉神驰的神情,真是完全沉浸在美的享受中了。我几乎不能相信那是一位已经六十岁的老人了。斯情、斯景也令我沉思,也令我神往。顷刻之间,我霍然领悟到,先生写作风格的形成是由来有自,源于先生国学根柢深厚,熟读唐、宋、辽、金史,唐宋史实更是烂熟于胸。在继承史学二司马的流风余韵的同时又溶入“五四”新文化,新思潮。清新的气息,活泼的思想,浅白通俗的笔法,强烈地影响着他,遂熔铸成先生具有时代精神的亦文亦史的写作风格。商先生也曾说过,现在广为学人所欢迎的两大手笔,一是翦伯赞,一个就是邓广铭。

我在几十年间,了解到先生写作宋人传记,如岳飞传、陈亮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年谱等几部力作,是深有感触的。先生没有一蹴而就的作品,都是经年累月,辛勤笔耕。每部书都是经多次增删,数易其稿。我常对他说:“这些书都是精雕细刻,应是名山之作。”他每次都是谦虚地说:“是老牛破车啦!只能慢慢地写出来。”他非常珍惜自己的书稿,曾在出版部门说:“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这一点,也曾为一些编辑先生所诟病,但也可以看出,先生驾驭文字的威力,文如其人,是审慎、认真和自负的。

宋史的《志》书,先生用力最勤。重点在《刑法志》、《兵志》、《职官志》,尤以史界所称道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为最。该书考证翔实,论据精当,巨细靡遗。在1943年陈寅恪先生所写该书的序言中,即表示曾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考,深服其精博,认

为先生《考正》一篇“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评价之高,绝非一般。日本史学家佐伯富等对先生至敬至佩。在我为先生所译的佐伯富的《宋史职官志索引》序文中,看到佐氏提到该《索引》多处征引先生《考正》的研究成果,从中也不难看出《考正》一书对他的启示与影响。先生是日本史学界推重的中国宋史专家。八十年代在香港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坚请先生与会。87年先生更以八十高龄,在樱花似锦的季节东渡扶桑讲学。日本、香港学界都以能请到这位史界权威、大老为荣。香港报纸还曾以整版篇幅介绍先生的生平事迹。他的史学贡献是为国际所公认的。

我作为先生助手,最主要的工作是由先生主持,我具体负责组织人力编辑、整理《宋人文集篇目索引》。这是一部收录五百部宋人文集、总集的篇目索引(原收316部,经先生补充为500部),原为燕京大学史学前辈洪业所领导的燕京引得编纂处遗留下来的散乱卡片,经整理计有二十余万张。在编写过程中,稍有变更体例或小有遗漏,牵一发动全身,立即陷入二十余万张卡片的汪洋大海中。我们只有三四个人力,个中甘苦一言难尽。但始终得到先生的支持与鼓励。三年竣工,交付中华书局审稿。又值“文革”,卡片全部拉乱。80年代初,先生再度主持,先得哈佛大学的资助,后由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组织人力编辑竣事。这部大型工具书,几经风雨,岁月蹉跎,二十多年最后成书。先生是自始至终主持关注。开编之初,即声明不收一文酬劳,只为造福学人。其果毅、坚韧、执着,不能不令人叹服。

一次夜访

66年“文化大革命”“红八月”过后,红卫兵横扫冲击社

会的风暴情势稍息。下一步的“革命行动”是什么？普通老百姓是很难预测的。这天，夜已深，宿舍院子里，人们都已安静下来。房间里灯光昏黄，孩子们已经睡下，屋内外分外清凉。不知是身凉，还是心冷。两个大人都瑟缩着。忽然，很轻，很轻，笃笃地敲门声。我们一时感到十分惊悚。这个时候，除了“革命行动”，已经没什么人际的往来，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疑惑中，开开了门。“啊！邓先生！”真是意外。先生很快闪身进来。看他身上穿着一件薄旧棉军装，头戴军帽，两个耳翼放下来包着半个脸。当掀起帽翼，现出的是一张苍白瘀血青紫的脸，不知道是由于伤，还是因为冷。我们赶紧送上一杯热水。和先生已经是三四个月未见面了。他显然是消瘦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神情落寞。稍喘一口气，开始告诉我们自己目前的情况：“学校红卫兵的揪斗高潮已经过去，现在是转入大批判。白天劳动，晚上多是看大字报，接受批斗，然后写检查。他们痛斥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反动资产阶级代言人。批判的主要内容有：教学、写作、思想感情几个方面。开始我曾辩解……”当我听到先生说 he 做了辩解，马上觉得这次他可要吃大亏了。因为先生有辩才，善言辞，臧否人物入木三分，甚至有失苛刻，曾为人所计较，绝不是那种木讷寡言一派书生气的人。先生说，“反正你辩不辩都是牛鬼蛇神”，说“在教学上，红卫兵说我不走阶级路线，不照顾工农出身的同学，用难题卡他们，要把他们泻肚子似的泻出去。我说我认为凡是学校录取的学生都应该是合格的。我作为老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我对同学不论出身，一视同仁。学习不合格的应被淘汰。不论谁不能有所优容。北大自应有北大的水平，北大的标准。红卫兵说这是阶级报复，今后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牛鬼蛇神占据讲台的局面。第二个内容，是针对我的写作。重点批

判《稼轩词编年笺注》。我的这部书，自己存有的二三十本都被抄走了，也都在他们手上。几乎是人手一本。是一边翻看，一边批。辛有‘愿将万卷平戎册，换得东家种树书’，说这是我借题发挥，是对党的不满。他们说‘毛主席曾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你邓广铭用注词反党也是一大发明。’这些人还提了很多不可思议的问题，要我逐条答复。我手边又没有这书。你们家大概还能有我那本书罢？”我赶紧从书架上找出给他。我看到他轻轻地抚摸这本书，神情惨然。接着继续谈到批斗的第三个内容，是说他 and “国民党政客、学阀”胡适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感情。他说对胡适的问题已在五十年代初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做了交代。胡离开北京后，彼此再没有什么联系。（“文革”后，80年代我在先生的书斋旁，客厅门口，赫然见到胡适写给先生的条幅。立刻使我想到是：人际之间的美好感情，用暴力是不可能虐杀净尽的。）先生说，“现在我不能再多说了，得赶回去。我今夜出来，是冒很大的危险。今天从牛棚放回家，是让写检查。我不敢早出来，要等到九点钟以后，怕红卫兵又光临。北大校园里要是有人自杀，这些不想自杀的人就会被看得更严，更难有好日子过。可是我又不想太晚出来，因为32路公共汽车十点半就是末班了，不容耽误。”先生将书藏在棉衣内的单制服兜里。自己写的书，却像是偷了人家的东西。我们要送他出去，他坚决阻拦，说悄悄地走出去。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样最好。我们只好稍延一下，随后赶到门口，在黑夜憧憧中看到先生高大的身影匆匆走向车站的方向。我伫立在宿舍门口，寒风彻骨，真是感到大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情了。

“四人帮”倒台，大地复苏。广大知识分子兴奋无比。拨乱反正，一切逐步走上正轨。十年一场噩梦，好像很快就烟消

云散了。77年恢复高考制度，先生又回到昔日的讲坛，也兼主持系里的教务工作。这时，我已经到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只是还经常去看望他。先生的书斋里又有着往日活跃的气氛，他看起来是已经恢复了原来的精神面貌。豪迈的气势，高亢的语调，爽朗的笑声。先生素性开朗豁达，心胸坦荡。只要能从事教学、治史，于平生之愿足矣。听到先生对教学的期许，对未来治史的展望，报刊书社的约稿，学术讨论会的请柬，津津道来，神采飞扬，兴趣盎然。十年的政治风雨对他的严重伤害，已经是完全淡忘了。云淡风清，一片晴朗。身在书斋中的我，此刻却是思绪万千，想到中国知识分子实际要求的，不过只是一张书桌啊！

先生热爱北大，献身北大，六十余年生死以之，历劫磨难不改初衷，虽九死其犹未悔。在北大六十年，92年先生曾发表纪念文章，心情充满喜悦、自得、自慰，令人钦羡不已。

先生值得记述的事迹很多，如先生的爱才，惜才，育才；读书，购书，藏书；喜书法，论书法；个人的趣闻逸事，比比皆是，但是限于篇幅，只能另篇写出了。

最后，我在此写下先生最喜爱的王安石的一首诗作为此篇纪念文章的结束，以寄托我对先生深切的哀思。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钟山》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吧！

记我和邓恭三先生的交往

——黄永年

邓恭三（广铭）先生以九十一高龄于今年元月10日谢世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准备在明年3月先生诞生九十二周年之时出版一册纪念文集，向我征稿。本来，我自揣给邓先生写纪念文字是不够格的。因为一则我不是邓先生的学生，只是个景仰先生的后学；再则我虽说也研究本国史，但最生疏最不行的偏是赵宋这一段。所以写正经文字来纪念邓先生，表扬邓先生在宋史研究上的丰功伟绩，自有邓先生的高足、包括真能传父业的邓家三小姐小南女士来承担，我何敢僭越。无已，写一点个人和邓先生的交往，用句套话叫聊以寄托哀思吧！

还是从宋史说起。我童年上小学时，对宋代的事情本来也有兴趣。不怕诸公笑话，这个兴趣是看了世界书局版《岳传》连环画引起来的。所以当抗战前一年升入初中后，在国文课本里读到节选《宋史·岳飞传》的大破“拐子马”一段，会高高高兴兴地背了下来。碰钉子是在抗战开始之后，1938年冬天在沦陷区常州城里买了部竹简斋石印大本《宋史》之时。当时本指望多知道点打金兵的事情，谁知一看便倒了胃口，这不能光怪罪自己的文言文尚未过关，还得怪这《宋史》实在写得太严肃，连列传也像报简历似的甚少可读性（其实这正是《宋史》

等后起史书记事之可征信处，但当时我哪能懂得）。于是“望宋兴叹”，“望宋生畏”，从而注定了这辈子进不了赵宋研究的大门。

不弄宋史怎么会知道邓先生？论因缘可仍离不了《岳飞传》的“拐子马”。这已是我读复旦大学史地系的第二年。1947年，在学校出版部门买了三本复刊的《复旦学报》，发现第三期上有邓先生的《〈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出于好奇我拜读了一遍，居然弄清楚了这个“拐子马”的本来面目。邓先生在这里告诉我们，“拐子马”者本来只是北宋以至南宋初年人惯用的军事术语，是指布置在大阵两翼的骑兵而言的。这种战术不仅金人即宋人也早使用了。此外，金人有一种名叫“合札猛安”的侍卫亲军，“皆重铠全装”，人称“铁浮图”、“铁塔兵”，后来被宋人误认为是“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着“堵墙而进”的部队。到岳飞孙儿岳珂撰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又把这“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的误解移到“拐子马”身上。章颖撰写《南渡四将传》又把岳珂的错误讲述写进其中的《岳飞传》里，《宋史·岳飞传》则照抄章颖的《岳飞传》，于是这大破“三人为伍”的“拐子马”进入了正史，而不知初无其事。这样就不仅清洗了我头脑中的“拐子马”错误形象，还使我对邓先生这段考辨功夫产生“五体投地”般的钦佩。因为在这以前，我上苏州中学常州分校高中二年级时听了吕诚之（思勉）师的《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等课，已有志于历史研究。稍后又遍读了顾颉刚师的《古史辨》和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宾四（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对史事的考辨大感兴趣。当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河南路门市部陆续出售，我请在常州教小学的妈妈寄来点钱，再加上一笔奖学金（记得

是个资本家通过复旦给的）统统买来看。看到第十本上登载着邓先生长篇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以及陈寅恪先生给写的序，序里极口称赞邓先生“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陈先生其时已是我尊崇的前辈学人，他这么讲自然更加重了邓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邓先生在抗战胜利那天出版问世的《岳飞》，我也在上海买到了。记得除邓先生的《岳飞》外，还买了吴晗的《明太祖》和钱宾四的《黄帝》，对《黄帝》认为写得不好颇不满意。

十年以后，我在西安交通大学被打成右派。1959年在宝鸡水利工地劳动时，知道邓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已出版，曾函恳在上海的龙榆生师给我买一部寄来。因为辛稼轩词是我爱读的，五十年代前期在上海时买到过商务影印汲古阁写四卷本、四印斋刻本和嘉靖王诏刻本的影抄本，“反右”开始后还买了和元延祐本《东坡乐府》一起影印的元大德本，所以即使在困厄中仍要看看这位尚未谋面的宋史专家是怎样给它作笺注的。

和邓先生见面，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1978年我奉调到陕西师范大学，1979年元月右派问题平反改正，1983年9月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会成立，我忝任委员，而邓先生正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当时邓先生精神还很好，不论在北京还是去外地，每次开会常能到，有好几次讨论时他还亲自主持。奇怪的是，他老是称我为“黄先生”，而对别的委员很少以“先生”相称，这也许是我在委员中比较年长的缘故，但不知为什么他还往往点名要“黄先生讲讲你的看法”。我读复旦时虽曾写过些文章，但多数发表在上海的报纸副刊上，邓先生在北京未必能见到。解放后要到1978年才重新发表文章，难道这些文章的传统考证气息引起

了邓先生的关注？记得有一次是在苏州，某学校提出要求编《全清诗》，大家冷场不发言，邓先生就点名叫黄先生讲看法。我思想上初无准备，又感到在邓先生面前不宜说些模棱两可谁都不开罪的话，就坦率地把反对此举的理由大讲了一通（无非是工程浩大不易收全，而且收编了也没有用处之类的话），邓先生居然紧接着肯定了我的看法，这个要求于是乎被否决。不明底细的人，很可能认为邓先生和我事先有默契，其实没有。

这十多年来我常因公到北京，多数住在北大勺园，但到朗润园十公寓去看邓先生的次数并不多。这是因为邓先生毕竟比我年长了将近二十岁，不便像同辈人那样一起聊天甚至胡说八道，而且他已届高龄，更不宜常去打扰。加以我这个人认路的本领比较差，北大里边安了个未名湖，去朗润园路弯弯曲曲不好找，必须请人陪伴或引导，也实在欠方便。记得第一次到朗润园造府拜谒，已是1985年入冬我在北大中文系古文献专业讲课之时，是个晚上，由安平秋兄和曹亦冰女士陪同去的。其时新版《岳飞传》的增订本刚印出，邓先生分赠我们各一册，曹女士得到后特别高兴，轻轻地对我说：“亏得陪你来看了邓先生。”

此后邓先生每出书必送。校点增订的《陈亮集》以及与张希清君合校的《涑水记闻》还给我寄了两次。原来此两书刚出版时邓先生已给我寄了，到1991年我校点的《类编长安志》出版后寄呈他一册，他可能记忆不清，又在这年5月把《陈亮集》和《涑水记闻》寄我作为答谢。他还给我来信，在对拙校《类编长安志》谬加奖饰，夸为古籍整理标准之作的同时，并指出此书堂宅亭园类“众乐堂”条所说的“张仲孚”应作“张中孚”，告诉我《金史》即有此人的传。可见他是把此书仔细看了的，不像有些名人收到后学的赠书往书架上一搁便了事。

邓先生寄赠的书常题上“永年教授存念”，这已使我感到惭愧。因为我的“教授”是到1982年才当上的，在先生面前是十足的“后学”，称个“贤弟”、“仁弟”之类我更心安理得。可到1995年5月我收到他赐寄的首都师大版《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上面竟题着“永年教授尊兄指正”，这个加码就使我更不敢当了。我给他专门去了一封信，讲明对此称呼愧不敢当的理由，并说，我当初本是想上北大历史系的，如真上了，还不是您正牌的学生吗？

我虽然不弄宋史，但爱读邓先生考辨史事的文章，所以他的这部《自选集》我是很有兴趣地通读了一遍的（尽管少数文章前此已拜读过。）同时我想，邓先生老是记住我，出了书即赐寄，我到北京应该登门拜谢厚赐。

这是1995年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由北大古文献专业的副教授吴鸥女士陪同我去看邓先生。大家兴致很好，谈了许多往事，很随便，不觉得拘束。记得我是首先提出“尊兄”此称不敢当，说我当年向往的是北大，只缘国民党打内战，兵荒马乱，弄得不敢北上，将就进了复旦。邓先生说复旦史地系也不坏啊！他当年也在那里教过。我说那是在重庆夏坝的事情，抗战胜利后您就回北大了，迁回上海的复旦史地系实在没有多少精彩的课可听。胡厚宣先生开甲骨文课当然是专家，可甲骨文金文的书比明板书还贵，买不起，只好不走这条路。蓝孟博（文徵）先生来讲过隋唐史，方杰人（豪）先生来讲过宋史，但已在淮海战役之时，讲不了几周就都离沪他就了。而且蓝先生讲得毕竟平了一点，看他的商务版《隋唐五代史》上册就可知道。方先生当时的文献功底也似尚不够，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介绍参考书就出了些差错，如把《直斋书录解题》错成《直斋圣经解題》，把讲南宋临安的《梦梁录》错成《梦梁录》，说是

追念北宋东京开封即大梁之盛况，不过经我当场指出他还能接受。

这次和邓先生至少谈了一个多钟点。我们谈话时吴鸥女士给摄了些照片。邓先生又把新出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三版本赐我，上面仍题“永年教授尊兄指正”，说不好改口。

1996年秋天我在北大时还去看过邓先生，谈到他在《国学研究》第三卷上发表的《〈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他送了我一册刚印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本年度第四期，上面有他的文章《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的主张及其实践》。这次去是请北大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孙钦善兄的公子引路的，向邓先生告辞后我一个人回勺园，仍差一点迷路。

1997年出版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6月初我也收到了一册，应是邓先生囑他的二小姐可蕴女士付邮的。我从所附邓先生的著述目录里发现有登载在台湾《传记文学》上的《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赞》和《台大历史学报》上的《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两篇文章，很想一看，邓先生就把存有的那期《台大历史学报》抽印本叫可蕴女士寄给我，欣幸的是在抽印本上已改题为“永年教授仁兄”而不再使用我当不起的“尊兄”。另一篇《传记文学》上一篇文章后来也由荣新江君复印了寄我。

我知道邓先生病重住院，是在1997年11月我来京开会之时，会前住在北大，曾请吴鸥女士带到国林风看新书，发现北大出版社又出了先生的《邓广铭治史丛稿》，心想不宜再打扰索取，自己买一本作纪念吧！还听从吴鸥女士买了精装本。不过我没有去医院看邓先生，因为总感到在这种场合我极不擅言词，明知凭如今的医疗水平要转危为安已不可能，还能讲点什么安慰的话呢？再谈学问自更不适宜。只好在回西安后给可蕴

女士写了信，承可蕴女士来长途电话告知先生病情之严重，让我有个思想准备。

邓先生的谢世，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来长途电话告知的，我请他们代送了花圈，但不久仍收到了寄赠的先生《治史丛稿》，书中还夹有先生署名的赠书短筒的复印件，当都是秉承先生遗志办理的。最近小南女士又寄来了刚出版的《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其中有我很想一读的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文字。

从1947年我获读邓先生考辨“拐子马”的文章，到今年邓先生谢世，我和邓先生的文字交往可说已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我一直是邓先生学问的景仰者，是邓先生论著文章的爱读者。而且正所谓“文如其人”，从邓先生的文字以及和他不多的往来中，我还充分领略到了一位史学界前辈既谨严且正直的风格。

尽管如上所记我们之间的往来不算多，连邓先生的九十大庆我都未参加祝贺，也许正如古人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吧！当然我知道自己的缺点毛病很多，不像邓先生之于“君子”之称真正够得上也。

1998年7月7日写定于西安城南

听邓恭三先生讲课

——邓锐龄

1998年5月4日，和许多北大毕业生一样，我也回到燕园参加北大百年校庆的活动。多时没有过这样的愉快兴奋了。但沉浸于共同的喜悦之中，心上总有一丝拂之不去的惆怅。本来近年在北大教过我的老师里唯有邓恭三先生健在，还想在返校时再次瞻仰他的风采，聆听他的议论，而不料三个多月前，邓师也悄然地离开了我们，于是北大曾给我以教诲的师长遂无一人。人们说返校如同出嫁的女儿回娘家，而我回到这里却又举目无亲，这种伤悼的情怀又不是面前许多欢天喜地的青年同学所能体会的。同时还有自怨自艾的心情，想近几年来，本可以谒见邓师，虽然耽搁他一点时间，也许能给他一点欣慰，只是一拖再拖，最后竟无一面之缘，真是追悔莫及了。

1946年到1947年，我在北大文学院历史系读书，恭三先生教我们宋史课。那时文学院的上课地点在沙滩的灰楼（在红楼的西北，图书馆的正北），那是一幢三层楼房，南面有不甚大的院子，植有四五株合欢树，每年仲夏，从羽状复叶中挺出淡红色的花，即标识着一个学年的结束。

邓先生的课程开了一个学年。记得上课在早晨八时开始。清早，尤其在冬天，同学们都紧张地赶到灰楼，从东门或南门进入教室。那是我二十二岁，从来不注意老师们的年纪，先生

给我的印象约是三十多岁。他穿着长衫，躯干魁梧，风度潇洒。开讲前有时点名。

听他的课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他教历史课深入浅出，层次分明，清楚扼要，谈话微微带着山东口音，吐字间或有顿挫，显得十分有力，无赘词冗语。那时郑毅生（天挺）师开明史课，也很受同学们欢迎，郑师谈话滔滔不绝，速度比邓师快，不过中间往往带着“这个”、“这个”的口头语，邓师则不快不慢，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我们的座位是一边扶手的前方带着圆形小木桌的椅子，可用以记录。邓先生间或在黑板上抄出一段史料，使大家暂时休息，所以记录邓先生的课并不吃力，这不比杨人梗师的课。杨师开法国大革命史课，则是另一种教授法，他先抑扬地朗诵一段腹稿，一边讲，一边在讲台前往返踱步，然后停止踱步，换成平常的声调对前面的讲义加以阐释，我们必须把前面那段逐字记下，因为知道这段正是杨先生的精心结构，严密如法律条文，一字不可删易。邓师在讲台上面对学生，雍容和蔼，目光时或掠过教室，这又不同于向觉明（达）师和邵循正师，向师讲中西交通史，邵师讲蒙古史，他们一上堂就低头看着讲义，目不他视，直到下课。

邓先生讲宋史，先用两堂课介绍史料，然后从北宋开国讲起，那个学年只讲到南宋孝宗。（学校并不要求教授们一定授完全课。）他讲得很有系统，指出北宋开国实际上即五代军阀搞政变夺权的一次继续，太祖太宗以还，即以觅求同地主阶级士大夫妥协为立国方针，以故五代的积弊也就延续下来，北宋对于辽，因军力不敌而求和，燕云十六州遂不能收复。由于国势贫弱，引出庆历时范仲淹的改革、熙宁时王安石的变法，变法的失败、朝廷中的反复党争导致北宋的灭亡。在高中时我读过《宋史纪事本末》之类的书，所得的只是紊乱无章的印象，

听邓师一讲，历史的递嬗演变的轨迹非常分明，而且从社会经济问题着眼来解释政治事件，见解尤为深刻，虽然毕业后不复治宋史，但先生那年教课的要点至今还没有忘记。

先生讲课讲得这样好，并非他有意追求什么效果，而是天赋使然，这使我联想到胡适之校长的讲课。

那是在1948年冬，我虽然已从历史系本科毕业，在北京一所中学里教书，课余仍可以来北大旁听，因为母校的风气是宽容、自由，面向社会、来者不拒的。胡校长的课安排在下午，连上两堂。地点是灰楼的地下阶梯式的大教室。穷冬短景，往往讲到第二堂课，不得不开灯了。校长讲《水经注》的版本校勘，把这样极为专门的学术问题讲得有条有理，清楚明白，他写板书也有次第，自右至左，一边讲，一边将次要的部分擦去，使听众对所讲的要点一目了然。现在只记得在讲授中附带告诉我们“定讞”的“讞”字的读音，谈到观点的同异时写出 Convergent 与 Divergent 两词，其它部分记不住了。

这几十年中我所接触过的学者中能娓娓清谈者颇有人在，而在大庭广众中讲授学问如此漂亮的，只有胡、邓二位先生了。

1947年那年，北大到处弥漫着勤学求知的气氛，而民主运动自前一年的“沈崇事件”后步步高涨。历史系内不少同学参加了运动，从沙滩民主墙的壁报上可以看出左右两派之斗争非常激烈，但学术空气并未受到多少影响，邓老师和其他老师备受尊敬，在学生中学绩优良的也为侪辈重视，图书馆内安谧如常。可以说读书与革命二者并非不可兼容。记得同学马复高曾在灰楼内贴出独自办的极简短的壁报，讥刺胡适之先生。邓先生一次在课堂上对此谈他的看法，大意说，师生可以有不同政见，而学生对师长不宜措词如此尖锐。在解放前仅此一次听

到他对现实问题的意见。1949年夏，先生鼓励我投考了北大文学院研究部，我侥幸地被取中了。1952年附带着做些历史系办公室内的工作。当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邓先生在系内先生们的学习会上谈到胡适之，他说胡适之其实在政治上天真幼稚，本质上不是搞政治的人。我在旁听了，不禁一惊，因为全国正在准备或许已经开始批判胡适的政治、学术思想，而邓先生曾经任胡校长办公室秘书，却不避嫌猜地谈出这样的话来，幸好无人驳诘，事情平安地过去了。八十年代以后，我才读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杂忆》等书，印证邓先生五十年代所做的评价，事实确实如此，我不能不为邓先生当时的实事求是、坦率真诚的精神所感动。

邓先生治学勤奋，年臻高寿而不废笔墨，在史学上的贡献之大是大家所共知的，而他平易近人，从不暖暖姝姝以一家之言而自喜，对人坦白，见到后进乃至同辈在学问上的缺点错误，往往直率评论，不稍加曲饰，将求全责备之意寓于警拔诙谐之中。我在研究部时写过一篇文章，请先生审阅，先生即大笑地指出不合逻辑，当时感到难堪，却相信老师的话没有错，退下即细读了两部讲形式逻辑的书，确实终身受益匪浅。

1952年夏我离开北大后，很少与先生见面，1957年后二十年间，若干次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人人自危，也使我们师生关系越来越生疏了，而我心中总是惦念着他，经常打听有关他的消息。1992年10月20日，北大历史系九十周年系会并庆祝邓先生八十五岁寿诞，周一良先生八十岁寿诞，会上邓先生讲话，言语清晰，风度安雅，犹如往日，我听了，十分宽慰。这段发言即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和北大》一文的基调。会后我们几个同学和他在校园中合影留念，后来大家一个一个散开，最后他一个人站在园中，仿佛茫然不知所往的

样子，有位在校同学搀扶着他向他的寓所慢慢地走去，这是与邓师的最后一面。此后，多次想去谒见，又总愿找一两位同学同去，一拖再拖，遂失去了最后求教的机会。我虽然已入老年，但对先生犹怀着如昔日从学时那样的敬爱，我总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到称誉的言语日多，而听到批评日少，以今日天下之大，才智之众，在茫茫人海中再觅这样对我严格要求如邓师者，似乎不可得了。

1998年6月22日

教诲、指导，永记不忘

——张传玺

邓广铭先生是我在北大历史系四十余年中往来最多，也是对我的教诲与指导最多的师长之一。对他的谆谆教导，我将永记不忘。现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略述以下，以表缅怀之意。

一、邓先生教我如何研究历史

我自进入北大历史系，就从邓先生处受益良多。特别是在“文革”后，我的导师翦伯赞先生离世后的二十年中，我实际上是以邓先生为师，凡事必问，他也有问必答。

事例许多，仅举两则：

(一)“不穷尽史料，就没有发言权！”

此话是邓广铭先生在1957年2月初对我们几个新入学的研究生讲的。当时，我们已受到系主任翦伯赞先生接见。次日，则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与各位导师见面，邓先生以教研室主任身份主持会见。邓先生讲话中有这样一项内容，他说：“关于学习马列，翦老已讲过了。我要讲的，是读史料问题。”“你们是中国的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副博士，顾名思义，应当在本专业中拥有发言权。一知半解，不穷尽史料的人，就不

可能获得发言权!”邓先生对于“穷尽史料”的要求做了说明。他说:“你们是四年制,应当用三年读书,一年写论文。先秦与秦汉的研究生,应当通读本段的全部文献。魏晋南北朝与隋唐的研究生,应读完本段的基本文献。宋朝以后,由于印刷术发明,文献大增,当然不可能遍读,研究生要将导师所开列的书单,认真读完。四年级写毕业论文时,要求穷尽与论文有关的文献和考古资料。”

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有关“穷尽史料”之说,当然还是重视的。但此事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确实尚无体会。1961年1月,我在毕业后当了翦先生的助手,才过不久,就遇到了亟需“穷尽史料”之事。

这年5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王冶秋给翦先生送来一本由文物出版社新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建议翦先生为此篇写个跋。翦先生欣然同意,我为翦先生做了一些检阅资料的工作。文章很快写成,于6月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主旨是赞扬“司马光著《通鉴》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可是文章发表不久,则问难之事不期而至。8月10日,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辽宁大学中文系阎简弼教授的文章,题为《为〈通鉴〉的编写分工质疑》,对翦先生的文章中的一些说法提出异议。不仅这样,阎文还对自元至清,一些名家如胡三省、全祖望等之有关说法进行了辩驳。要回答阎的“质疑”,不“穷尽史料”,将是很困难的。

翦先生见到阎文之后,命我将阎文所提问题归类梳编,并遍查旧北大与燕京大学的两个图书馆的有关藏书,对司马光与司马康父子、后辈司马伋、助手刘恕、范祖禹,及有关著录、研究者如高似孙、晁公武、陈振孙、胡三省、陈仁锡、全祖望、王鸣盛等的有关著作,一一检阅研究。还到北京图书馆查

阅了一些善本、抄本等,其中包括了南宋和元代的抄本。做这些工作,邓广铭先生是我的主要指导者。同月18日,翦先生在同一报纸上发表题为《为〈通鉴〉编写分工问题释疑》,应当说对阎先生的疑问比较完满地解决了。我通过此事,对于邓先生所说的“穷尽史料”的意义,有了较深一些的理解和体会。

(二)“熟悉通史,受益无穷!”

此话是邓先生在1959年9月初对我讲的。他当时动员我辅导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中国通史课,自原始社会辅导到南北朝,时长一年。主讲教师是张政烺先生。我面有难色。原因是我早已完成了研究生的教学任务;此次辅导,内容太多,已是半部通史,时间又太长,我想集中精力和时间写秦汉史专业的毕业论文。“熟悉通史,受益无穷”这个话就是在此时讲的。辅导任务我还是接受了下来,但对于“熟悉通史,受益无穷”之说,我尚无此体会。

也是我在毕业后不久,知道翦先生将率领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内蒙古自治区,时间定在7月至9月间,地区是自西蒙到东蒙,有城市、有草原,还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民族有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我将以秘书的名义,随同前往。我为了此行,在历史、地理、民族、考古等方面,查阅资料一个多月,看了许多古今文献、地方志和现代人的著作。当然这些准备还是有益的;但在许多场合仍“如堕五里雾中”,显得自己的历史知识太贫乏了。这次内蒙之行,对我来说,学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知识,我确实为此而高兴。可是,考验至此并未结束,我们回到北京之后,翦老要对此行进行总结,其总结之一就是撰写那篇名文《内蒙访古》。我在此时,又再次感到所学的那点秦汉

史知识太不敷使用了。

总之，一次内蒙之行，我深深地体会到邓先生所说的“熟悉通史，受益无穷”一语，真是经验之谈。在以后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日益体会、理解到它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邓先生坚决支持为翦伯赞平反

翦伯赞先生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冤案。可是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人们为避免无端遭受牵连，只有噤若寒蝉，道路以目。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我还被通知，于1977年8月到大兴县北大“五七干校”去走“五七道路”。行前，我向邓先生告别，略略吐露了我的苦闷。他未谈别的，只是嘱我“好好的劳动！”另写宋人张舜民的《哀王荆公》七绝四首之三给我，诗曰：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邓先生同情翦先生的不幸遭遇是不言而喻的。

次年3月，我自“五七干校”提前回校后，获通知于4月6日下午3时到历史系开会。届时到会者为10人。除系总支副书记和校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以下称“落办领导”）外，还有邓广铭、陈庆华、荣天琳、宿白、郝斌、刘祖熙、杨济安和我。大家久不相见，略作寒暄，互相打听开什么会。据透露，是“翦伯赞审查结论”放风会，大家的表情顿时有些严肃紧张。落办领导首先发言说：“本来没计划开这么个会。因为

翦伯赞的这个‘审查结论’是校党委最后的审查结论，已经上报市委了。但系领导建议找几个老教师、比较了解情况的人说说，所以就请你们几位来了。这个‘审查意见’可以念给你们听听，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必提意见。”

“审查结论”是由副书记念的。还有一份为说明“审查结论”而写的“关于翦伯赞的政治上、学术上的错误的复查报告”，由落办领导口头说了一下。其要点有三：

(1) 1957年4月20日和6月9日关于“鸣放”的文章，“有些观点是错误的”。

(2) 1935年冬至1936年夏，参与刘少奇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

(3) 1939年在《历史哲学教程》“代序”中说蒋介石是“伟大的革命领袖”；1940年在《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一文中有说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具有抵抗外族侵略决心的革命政府”等反动内容。

说者话音刚落，与会8人俱呈惊异之色，情绪转而愤慨。第一个发言者为郝斌，他毫无顾忌地、直截了当地说：“我看翦伯赞没有罪过，应当给他记一功。促成国共‘和平谈判，共同抗日’是有功的！”邓广铭先生是第二个发言者。他当时已70多岁了，自己头上被扣的“帽子”还未被摘掉；可是也很激动，激昂慷慨地说：“‘审查意见’简直是牵强附会，根本不能成立！”由于这一少一老的带头，以下6人相继发言，对“复查报告”进行了逐条批驳。此会如果发生在过去，可以定为“反党”或“右派”会议。可是，中国的历史毕竟前进了一大步。通过这一小会，我对与会各位，尤其是对于邓先生的刚直不阿、坚持原则的精神，肃然起敬。

会上大家一致要求落办领导将大家的意见汇报校党委，希望党委重新调查研究翦的问题。可是落办领导的反映冷淡，大家忿忿而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向邓先生表示，要自己去找党委书记，汇报开会的情况，建议将已上报市委的“审查结论”撤回，再做研究，他表示赞同。

但次日晚，我见到管政治的党委副书记，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予考虑。于是我将意见写成一份3千余字的长信，准备送给党委。

此信于9日写成誊清，送邓先生过目。他看了之后，心情沉重，不由我分说，即在信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签在首位。他说：“我是要签名的。你去问问那几位，他们是不是可以签名！”其他6位一一签名，我作为第8位，签在最后。由于邓先生的主导作用，使我的“个人上书”成为“八人上书”^①，此信于11日上午送给了那位管政治的副书记。

此后一周，未见党委有什么动静。这时我起草了一份题为《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的大字报，请邓先生审阅，他看后表示赞成，我就连夜抄出，共16张大字报纸。为了不愿别人担风险，就由我一个人签名，由杨济安同志协助，于4月25日贴在北大的人群集会处“三角地”。一时大字报前人头攒动，三角地人群如流。邓先生曾三次前往看大字报，还对我说：“这张大字报写得很好！很好！”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校党委正副书记周林、高铁、韦明等同志前往看大字报后，于当天做出决定：解散原“翦伯赞专案组”，另成立新的

“翦伯赞专案组”。

为了扩大“大字报”的社会效应，我油印了300份向有关党政领导和学术单位寄发。同时我还产生了“告御状”的想法。关于此事，我也曾与邓先生商量过。

6月8日，我把给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信和两份大字报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请该馆保管部副主任胡德平协助转给他的父亲（胡耀邦）。此事获得胡德平的大力协助。

此后，我按照胡耀邦同志的指示，写成一份“要求中央为翦伯赞昭雪沉冤的申诉状”^①，长约3千余字，于6月15日送到胡德平处。几天后，他来电话说：“你的报告，中央组织部已用‘重要情况’的名义报到中央了。”8月16日上午，中央组织部的唐秘书用电话通知我说：“你写的那份材料，我们报到中央了。你记一下，邓副主席的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共七个字。”又说：“我们已通知北京市委了！”我获通知之后，赶快告诉了新任系总支书记郝斌，又连忙去告诉了邓广铭先生。他十分高兴。

9月1日，北大党委在全校召开“落实党的政策大会”，翦先生的10年沉冤彻底昭雪了！

^① “八人上书”的内容摘要（约600字）见北京《纵横》杂志1998年8月号张传玺《翦伯赞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一文。

^① “申诉状”全文见北京《纵横》杂志1998年8月号张传玺《翦伯赞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一文。

邓老谈往

王汝丰

邓老是我仰慕的老前辈，但在我到北大历史系任教之前，还从未有缘见过邓老。邓老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后，在一次全系会上才第一次见到邓老。此后，天天“老三段”，早中晚差不多都可以见面。记得当时教师和工农兵学员混合编组，开会“学习”最多的地方是在学员宿舍的房间里，邓老讲话不多，常常是在学员的床沿干坐到散会，然后回家。

“四人帮”垮台后，邓老变了一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有说有笑，议论风生，恢复了昔日的风采。有时还像年轻人一样，讲话中带上句“俏皮话”，很是诙谐、幽默。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邓老对历史系工作的关心与日俱增，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邓老认为，要把历史系的教学搞上去，必须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高水平的教师必须到第一线为本科学生上课，认为这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两个互不可缺的方面。邓老常说：我当学生时听的就是名家的课，怎么现在的名家却很少给本科生上课？邓老还把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北大作比较，连选多少学分的事都想了又想，取长补短，想出了好几套历史系的教学方案，诸如大通史，小通史，断代通史（以断代史相连接构成的通史课）等等。无论哪一种，邓老谈起来都是那样认真，论长说短，充满自信。为了充实教学力量，邓老曾向系里推荐从外地调一位

唐史专家来北大，当时，调动工作并不顺利，邓老曾多次到系里催询，不厌其烦地介绍情况。邓老很重视基础课，系里请北大刘乃和先生来讲古代历法。刘先生把这门原来枯燥的课程讲得十分生动，邓老得知后非常高兴，说：“教得其人。”云南大学的李埏教授，是邓老的学生，也是著名的宋史和经济史专家，李先生来北京时看望邓老，邓老便请来为全系学生做了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那时是没有讲课费、报告费之说的，报告结束后，邓老自己掏钱请李埏教授吃饭，说这是礼貌，把我和张寄谦同志叫去作陪，钱交给我，说：“你就说系里请客。”当然我们还是如实说是邓老请客。当时邓老刚从逆境中走出来，在系里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这些看似分外的事，邓老却视为己任，从未放弃一个教师对教育事业赤诚的责任。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邓老的接触多了起来，向邓老请教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话题也日愈广泛，逐渐什么都谈，使我受到深刻的教益。邓老倡建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事，早在1978年、1979年之间就已经开始酝酿了。邓老对“中心”的筹建有一个宏大的规划，壮心不已。筹建的事得到学校领导的积极支持，邓老十分高兴和振奋，曾多次说过对学校的支持很是感谢的话。但筹建计划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又常常使邓老困惑不安，例如“中心”的用房问题不能落实，邓老多次为此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一位执著于事业的老学者的理想和希望，都透过这种高兴和困惑，振奋和感叹透明透亮地表现无遗。凡是听过邓老谈“中心”筹建事情的人，无不为了邓老晚年的执著追求和敬业精神所感动。现在，“中心”正式建立已经整整十六个年头了，满树青枝绿叶，果实累累，人材辈出，成绩斐然，其中凝结着邓老许多心血，怎不令人倍加钦佩。

我回到人民大学后，仍常去看望邓老。和往常一样，一谈

就是一两个钟头，话题依然很广泛。九十年代以后，不知怎么的，邓老的话题却转向谈“老”，这是以往很少有的。有一次，在未名湖畔相遇，邓老对我说：“你看，都走不动了。”我说：“走得很好嘛！”邓老又说：“我已经像个老人了。”我随口应了一句：怎么“像”个老人？这一问一答，早已过去，但有一次见面时，邓老旧话重提，问我还记不记得当时的问答？还说从此以后我就对人说是个老人，而不是“像”个老人了。周一良先生是邓老的知交好友，周先生不慎摔伤，邓老十分惦记，对我说，人老了，我现在到系里去，走路很小心，宁慢也不快走，就怕这双脚不听话。我安慰说：“慢慢散散步，不要走那么远，晚上千万别看书写东西了。”谁知邓老却说：“你错了，我必须晚上干活儿。”我说：“是晚上安静，无人打扰？”邓老说：“你又错了。你不知道，我这手很奇怪，晚上不抖，白天抖得利害，写不了字，只有靠晚上了。我现在的第二怕就是怕我这双手。”接着不胜感慨说：“大概这双手跟我几十年，也太累了。你想，80多年了，还不累？”说到这里，我竟无言以答，默默相对，一煞那间，不知想了些什么，很不平静。原来，邓老晚年的论著文章，竟然是日复一日地在万籁无声的深夜中完成的。一位孜孜不倦、皓首穷史的老人，挑灯夜读，清夜笔耕的画卷，至今仍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这不也是中国老一辈学术大家默默奉献，勤奋终生的画卷吗？

除了谈“老”，还谈“往”，这也是以往话题中少有的。有几件事，深刻难忘。

有一次，我偶然谈到辛弃疾的《摸鱼儿》，说起词中“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名句。邓老突然问我：“你知道决定我一生的是谁？”我还来不及思索，邓老就说：“是辛弃疾。”由此引出了邓老一段关于往事的话：

邓老北大毕业后，因为研究工作的需要，需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申请一笔研究经费，于是去见胡适。胡适说：“好，三十以前做学问要鼓励（当时邓老不满三十），三十以后是本分（邓老解释说，“本分”就是分内的事，不在鼓励范围）。”接着问：“你要研究什么？”答：“辛弃疾。”“辛弃疾？这可是梁任公研究的，你也要研究？”胡适接着说：“这样吧！基金会的委员（董事）多数是自然科学的，认文不认人，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先写篇文章，等发表了再说。”邓老于是埋头写了一篇关于辛弃疾的文章（即《〈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而且是批评梁任公的。文章送《国闻周报》后，很久不见刊出。写信去问，也无回音。后来登出来了，陈寅恪先生看到了很是赞赏，但不知邓广铭何许人也（邓老原话），就去问胡适。胡适说是北大的学生，青年人。陈说，这个学生很好，可造就，于是主动为之推荐，评价很高。推荐意见只有几十个字，读起来铿锵有声。这样，邓老申请的研究经费批准了。邓老不无感慨地告诉我：“就这一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就不回头了（指研究宋史）”。

邓老认为学术批评对促进学术发展十分重要，认为要创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以树立良好的学风，推动学术研究。他对现时缺乏认真的学术批评很不理解，特别觉得名人名家为什么就不能批评，对于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深为感叹。他认为学术论辩，古已有之，是中国学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在邓老的《自选集》中，就有不少学术论辩的文章，体现了邓老的治学态度和精神。

邓老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做学问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有一次，还是因为谈辛弃疾，邓老又谈起自己所写的四个传，说我一生写了陈（亮）、王（安石）、辛（弃疾）、岳（飞）

四个传(即《陈龙川传》、《王安石》、《辛弃疾传》、《岳飞传》),《陈龙川传》是我读北大的毕业论文,校正了前人许多错误,下了功夫,但现在已经几十年了,陈亮的研究有很多进展,我应该认真修改一下,不然,人家会说我邓广铭一本陈传放了一辈子也不管。又谈“文革”后期出版的《王安石》,邓老说:这是由毛主席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谈话引起的。1972年田中访华,毛主席对他说,你很像中国的王安石,王安石有“三不足”精神,一是天变不足畏,二是祖宗不足法,三是人言不足恤。此话传出来后,各方面找我写文章。《人民日报》要我写,找到系里,军宣队说,反动权威怎么能写,顶回去了。人民出版社直接找到我,我答应了。但当时正“评法批儒”、“批林批孔”,出版社要求有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王传是有“污染”的,怎能不修改?邓老说:“对自己写的东西,不要以为都不能动。学术有发展,个人有局限,讲求认真,就要认真对待自己写的东西,回头看看有什么错没有?还有什么不足?”首都师大出版社要出邓老的学术论著自选集,邓老高兴地答应了。我建议邓老请位助手协助。邓老说:请助手是多年的愿望了,但谈何容易啊!编自选集,更得自己动手,这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东西,错的,对的,自己应该知道。邓老说:“四传”都要好好看看,不能一辈子不动啊!只是力已不济了。

以前,我曾听说邓老对他的学生很严格,严到有时令人很难接受。其实邓老对自己也一样严格,这正是邓老治学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的表现,对人对己,莫不如此。邓老所说的“四传”,当然不止于“四传”,而是旁及于围绕“四传”的所有论著的。在这些论著中,这种严格的科学精神随处可见,始终如一。为了追求学术真理,邓老勇于论辩,勇于批评,更勇于自我批评。邓老是一位扎扎实实下功夫做学问的人,对自己的论著文章充满自

信,与人论辩,决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甚至在论辩中为维护自己的观点咄咄逼人。但是邓老一旦发现错了,又绝不固执己见,是避短讳非,而是对批评报以衷心的欢迎。邓老虽然常说对“四传”的修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事实上却是一直竭尽全力在做。岳传的修改是完成了的。王传也作过修订,到90年代又作了更大的修改。陈传、辛传的修改虽未着笔,但对《陈亮集》则作了精心的校点和增补。对《辛谱》和《笺注》的修订也投入很大精力。这也许正是邓老为修改陈传、辛传所作的“基础工程”。后人研究陈集,研究辛谱和笺注,想必定能从中更全面地把握陈、辛生平的,这对促进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学术贡献。

邓老对王传的修改一直挂在心上,非常重视。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邓老在修改王传过程中的研究和思考,或许就是邓老修改王传整体构思中的重要部分。

1989年,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一个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名为“华夏人物学术讲座”,人物范围包括帝王将相,思想家、改革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并要求要请著名的专家出任讲座。于是我们就去请邓老讲改革家王安石。邓老对历史学会的工作向来热心支持,欣然同意了。我们自然非常高兴。临讲之前,邓老告诉我,讲题改为“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我愣了一下,邓老似乎看出我的心思,随即说:这是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题目。王安石是北宋儒学的杰出代表,讲北宋儒学代表人物,非王荆公莫属。但王安石的儒学地位被他的政治地位遮盖了,他的儒学成就也被他的政治地位遮盖了,人只知王安石变法,而不知王安石是一代儒学大家。全面看王安石,不可不讲王安石对儒学的贡献。邓老简要精辟的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这次讲座,是我第一次,

也是惟一次聆听邓老的学术报告。当时邓老已是八二高龄，仍不辞辛劳，有条不紊地娓娓讲来，一个半钟头还多的时间里，邓老精神矍铄，毫无倦意，把王安石对儒学的贡献及其在儒学学派中的地位讲得清清楚楚，对我来说，这样评价王安石，确是前所未闻，对王安石又有了新的认识。后来，邓老将此次的讲稿修改成文发表，又收入了《自选集》，可见邓老对此文的重视。

邓老谈往的话题中，常常谈到胡适。有一次问我读过《光明日报》连载的《胡适传》没有？我说读过，是我的老同学写的哩！邓老说：冒犯、冒犯，这本传不谈胡适在北大，不谈胡适教育方面的东西，这一点不好。为胡适写传，不能不写北大。邓老认为，对胡适要有全面的评价，实事求是，尤其当北大校长，不可不讲，不可不评。如何评？则是研究者的事了。邓老对北大，对北大历史系有深厚的感情。他很希望能在胡适工作过的北京大学举行一次胡适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还说，如果开成，我第一个报名参加。这是邓老多次谈到的一个大心愿。现在，邓老已乘鹤西去，但我相信邓老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我每次见到邓老，听邓老谈古说今，都感受到一种长辈、长者的亲切，受到很多的启迪和教育。邓老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造诣之精深，为人之耿直，任事之尽责，待人之挚诚，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邓老虽然离开了执著一生的心爱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但邓老的道德文章，学术风范将是长存的。这是邓老留下的珍贵精神财富，在邓老逝世周年之际，缅怀故老，我们晚辈后学者更当努力继承和发扬，以寄托我们的无限哀思和深切怀念。

1998年7月初伏

我所接触的晚年的邓先生

夏应元

邓广铭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接近半年了。但有时候却总觉得他似乎还在我的眼前。那慈祥的笑容、不倦的谈锋、犀利的见地……这些年来，我似乎无形中有一个习惯，每逢校系内外、学术界内外、乃至国内外发生什么重要事情，总希望找机会和邓先生谈一谈，聆听邓先生的高见，觉得这是生平一大乐事。可是现在不可能了，永远不可能了，只留下深深的惆怅和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邓先生是我的师辈，但我却未能有幸直接受教于邓门。因为在1952年前三校分立，我在清华历史系时，已学过宋史。三校历史系合并后，我只念一年就匆匆毕业，更无机会作邓先生的受业弟子。我从1953年起毕业留系工作后，属于以周一良先生为首的亚洲史教研室，与邓先生分属于不同的教研室，平常接触机会不多。但由于长期景仰邓先生的大名，在系里处于“远而敬之”的状态。我对邓先生开始熟悉起来，乃是始于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

1966年夏天风暴一起，我作为多年明牌的“老右”，与邓先生等系里一批“权威”都被赶进“牛鬼蛇神”的队伍，几乎每天都是无休止的“批斗”和“劳改”。在这场风暴面前，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邓先生倔强的脾气。那时，每逢“批斗”，

按例必先由红卫兵向群众介绍被斗人的“罪状”。那时，每逢“斗”到邓先生时，红卫兵必宣布其“罪状”曰：“他解放前是胡适的秘书。”而每说至此，不论任何场合，邓先生必立即打断他的话，用那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浓厚的山东口音反驳说：“我不是胡适的秘书，我是北大校长室的秘书。”针锋相对，绝不含糊。说到此，常常使红卫兵下不了台。我在当场看到这一幕，不由得惊叹邓先生的倔强性格和斗争精神。

后来，我们这些身列“牛鬼蛇神”队伍的人，又被送到郊区太平庄和学校的“劳改大院”去“劳改”；工宣队进校后，又搞什么“清队”，自然我们又成了重点。在那阴霾满天的岁月里，那些“监改者”们，为了搞出点什么“新材料”，惯于搞什么“以毒攻毒”，奖励“检举立功”，在这种形势下，有的“小人”就想方设法背地给人打“小报告”，靠损人以利己。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邓先生始终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我觉得，在平时我们主要敬佩的是他的学问，而在非常时期，我们更多的是敬重他的人品。

进入七十年代，从江西回来，表面上学校开了课，招了工农兵学员，似乎步入了“正轨”。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然处在最低层。与此同时，学校不断“运动群众”，搞什么“评法批儒”，后来又发展到搞什么“批邓”……。在这种几近令人窒息的气氛下，有时在节假日或星期天，我去邓先生家，谈起当前的形势。在谈话当中，我发现邓先生对这些“运动群众”之举，非常反感，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当然，我也有时难免对邓先生谈一些当时“犯忌讳”的言论。那时，记得“四人帮”的爪牙——迟群曾在大会上叫嚣，北大清华要每隔几年抓一次右派，有一阵历史系在揭批什么“小集团”。在这种气氛颇为紧张的形势下，

有一天早上，系里开会。我曾经想，去找邓先生，“嘱咐”邓先生两句。后来，又怕人多眼杂，被人看见，反而不好。我想，相信邓先生会“善自处理”。果然，事实证明，我的“相信”是没有错误的。其实，今天回头看来，我从斗室之内听到邓先生的一些言论中，充满了对祖国前途和人民文化学术事业的关心和热爱，他的爱憎经常反映的就是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共同的爱憎。因而，在“四人帮”倒台后，他的脸上又重新绽开了笑容，恢复了学术上第二个青春，那是很自然的。

众所周知，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蜚声海内外，尤精于宋史，为斯界公认之泰斗。我作为既是隔行，又是学识浅陋的晚生后辈，没有资格对邓先生的高文宏著妄加评论。在这里，只能就亲身接触到的一些琐事，谈一点感受。

由于邓先生学识渊博，既专且精，年轻一辈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在年轻教员中认为邓先生对人要求高，要求严，做邓先生的门人与弟子难的议论。其实，据我的感觉，邓先生对年轻人的业务要求，并非高不可攀。而且，像其他几位老先生一样，也是期望甚殷的。例如，在七十年代，我系有一位60届的毕业生，由国政系调回历史系，在邓先生指导下治宋史。这位同志聪颖过人，但毕竟离系多年，回归本业，难免生疏，自然需加倍努力。而偏偏他又交游广阔，乐于助人，自然消耗一些时间。邓先生一面嘱咐他要缩小交际圈，同时十分关心他业务上的成长。那时，我与这位同志同住一室，邓先生每逢遇到我时，必十分关切地问：“他最近情况怎么样了？”我答以“交游圈小多了，现在我作了他的‘秘书’，凡是无关重要的来找他的人，我都给挡驾了！”邓先生笑着点点头，说：“那好，那好，那我就放心了。”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对年轻后辈期望之殷。后来，不幸这位同志突患急病去世（主要因为

按例必先由红卫兵向群众介绍被斗人的“罪状”。那时，每逢“斗”到邓先生时，红卫兵必宣布其“罪状”曰：“他解放前是胡适的秘书。”而每说至此，不论任何场合，邓先生必立即打断他的话，用那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浓厚的山东口音反驳说：“我不是胡适的秘书，我是北大校长室的秘书。”针锋相对，绝不含糊。说到此，常常使红卫兵下不了台。我在当场看到这一幕，不由得惊叹邓先生的倔强性格和斗争精神。

后来，我们这些身列“牛鬼蛇神”队伍的人，又被送到郊区太平庄和学校的“劳改大院”去“劳改”；工宣队进校后，又搞什么“清队”，自然我们又成了重点。在那阴霾满天的岁月里，那些“监改者”们，为了搞出点什么“新材料”，惯于搞什么“以毒攻毒”，奖励“检举立功”，在这种形势下，有的“小人”就想方设法背地给人打“小报告”，靠损人以利己。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邓先生始终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我觉得，在平时我们主要敬佩的是他的学问，而在非常时期，我们更多的是敬重他的人品。

进入七十年代，从江西回来，表面上学校开了课，招了工农兵学员，似乎步入了“正轨”。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然处在最低层。与此同时，学校不断“运动群众”，搞什么“评法批儒”，后来又发展到搞什么“批邓”……。在这种几近令人窒息的气氛下，有时在节假日或星期天，我去邓先生家，谈起当前的形势。在谈话当中，我发现邓先生对这些“运动群众”之举，非常反感，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当然，我也有时难免对邓先生谈一些当时“犯忌讳”的言论。那时，记得“四人帮”的爪牙——迟群曾在大会上叫嚣，北大清华要每隔几年抓一次右派，有一阵历史系在揭批什么“小集团”。在这种气氛颇为紧张的形势下，

有一天早上，系里开会。我曾经想，去找邓先生，“嘱咐”邓先生两句。后来，又怕人多眼杂，被人看见，反而不好。我想，相信邓先生会“善自处理”。果然，事实证明，我的“相信”是没有错误的。其实，今天回头看来，我从斗室之内听到邓先生的一些言论中，充满了对祖国前途和人民文化学术事业的关心和热爱，他的爱憎经常反映的就是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共同的爱憎。因而，在“四人帮”倒台后，他的脸上又重新绽开了笑容，恢复了学术上第二个青春，那是很自然的。

众所周知，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蜚声海内外，尤精于宋史，为斯界公认之泰斗。我作为既是隔行，又是学识浅陋的晚生后辈，没有资格对邓先生的高文宏著妄加评论。在这里，只能就亲身接触到的一些琐事，谈一点感受。

由于邓先生学识渊博，既专且精，年轻一辈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在年轻教员中认为邓先生对人要求高，要求严，做邓先生的门人与弟子难的议论。其实，据我的感觉，邓先生对年轻人的业务要求，并非高不可攀。而且，像其他几位老先生一样，也是期望甚殷的。例如，在七十年代，我系有一位60届的毕业生，由国政系调回历史系，在邓先生指导下治宋史。这位同志聪颖过人，但毕竟离系多年，回归本业，难免生疏，自然需加倍努力。而偏偏他又交游广阔，乐于助人，自然消耗一些时间。邓先生一面嘱咐他要缩小交际圈，同时十分关心他业务上的成长。那时，我与这位同志同住一室，邓先生每逢遇到我时，必十分关切地问：“他最近情况怎么样了？”我答以“交游圈小多了，现在我作了他的‘秘书’，凡是无关重要的来找他的人，我都给挡驾了！”邓先生笑着点点头，说：“那好，那好，那我就放心了。”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对年轻后辈期望之殷。后来，不幸这位同志突患急病去世（主要因为

为电大赶写讲稿过于劳累所致)，使邓先生十分难过。

后来，我通过与邓先生接触中体会到，邓先生对年轻人要求高，期望殷，主要又源于他对历史科学业务上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奋进不息的精神。所以，他既严格要求别人，也严格要求自己。

以我个人来说，我刚毕业四年，在业务前途上充满幻想的时候，就被一场政治暴风雨赶下讲台，并剥夺了搞研究的权利。尽管自己当时水平有限，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总感到抑郁不得伸，有“怀才不遇”之感。尽管为此也受了不少“批判”，譬如，说我“政治上失意了，想在业务上再和群众较量”等等，但总不能使我心服口服。有一次，邓先生遇到我，他不知从谁那里听到我有“怀才不遇”的想法，于是，就开诚布公地对我说：“你不能有这个想法，你在业务上还差得远。你现在感到怀才不遇，将来有一天给一付重担叫你挑，只恐怕你挑不起来呢！”这一句话，如冷水浇头，倾泻而下，使我如梦初醒，细一思量，感到心服口服。证诸后来事态的发展，即使在政治上“紧箍咒”得到解脱以后的这些年里，自己的业务成就始终很有限，愧对单位领导及师友们的期望，更加证实邓先生当年的批评的一语中的。所以，此后不论在任何场合，即使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的场合，或受到同行和师友的点滴谬赞，也常常想起邓先生的话，常以此自警。

记得在1993年左右，正值邓先生85岁华诞之际，系里有人议论，为邓先生开会祝寿。而邓先生本人坚辞不受。有一天，我遇到他，谈起此事。我建议他不必坚拒。当时他十分恳切地说：“我是真心诚意不希望开这个会。因为我的成就实在有限……。”我当时举他关于岳飞、王安石、辛弃疾的著作为例，企图说服他。说到这里，邓先生很激动地说：“我这些东

西算什么？根本不值一提，比起人家（下面他列举当代一些著名学者的名字）那差得远了，根本不值得开会纪念……。”说话当时只有我二人在场，况且我又是他的晚生后辈，他没有任何必要进行言不由衷的表白。这一番言论，完全反映他的真实想法，说明他即使在晚年，对自己的业务成就也毫不自满，反而感到需要继续努力。

邓广铭先生一方面积极关怀祖国命运，爱憎分明，显示他一副火热心肠，不愧是爱国忧民知识分子的本色。另一方面，对历史科学的本门业务，他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而且精进不息，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的典范。这两方面完美结合在他身上，这就是我接触到的晚年的邓先生。

春雨润物细无声

——回忆40年前我受邓先生教诲的一段往事

安作璋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写的《春夜喜雨》一诗中的前四句，用这四句诗来形容邓先生对我的教诲和栽培，再恰当不过了。

邓先生的大名和他在宋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早在1948年我读齐鲁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时，就已从业师张维华先生讲授宋元史的课程中听到了。可以说，我对先生的为人与治学都非常敬佩，虽无缘相见，但心向往之。

1951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原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学之余，也从事一点科研工作。我读大学时，重点学的是秦汉史，毕业论文题目是《西汉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有了这个基础，不过三年的时间，到1954年春，我就陆续写出了差不多近十篇文章。五十年代初，历史刊物很少，发表论文很难，尤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文章发表更难。由此我想到了邓先生。那时，先生正担任《光明日报》《史学》版的主编，我鼓起勇气将其中的《西汉的西北屯垦》一文寄给先生，并附上一封求教的信。完全出乎意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该文就发表在1954年2月20日《光

明日报》的《史学》版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而且是发表在全国报纸中唯一的一家史学专刊上。捧读之下，真有一登龙门之感。不久，我又寄去《论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一文，很快又在1954年5月27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刊出。三个月之内，连续在《史学》上发表两篇文章，这在当时史学界青年一代中是很罕见的，自然要产生一定的影响。同年秋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原华东人民出版社）的总编张玖先生来济南约稿，亲自找到我的宿舍，指名要我写关于汉史的书稿。据说这是对前辈专家的待遇，竟然落到我这个尚未出茅庐的后生头上，我简直是受宠若惊。我当即答应从现有的论文稿中选出一部分文稿，交给他们，并拟定书名《汉史初探》。这本不过10万字的小书，于1955年和1957年前后两版共印了14000册。后来我听到一些同代以及下一代的不少青年学者对我说，他们都读过这本书，说明它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受到读者欢迎的。我深深知道，如果没有邓先生这位史学大师的伯乐鉴识和着力栽培，是很难有这样一个结果的。他不仅支持和鞭策了我此后在治学道路上不断前进，而且也间接支持和鼓励了众多青年学者的信心和决心，使他们在史学领域脱颖而出。

我对此事一直铭记在心，终生难忘。从当年《汉史初探》初版后记，到去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维华纪念文集》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大家自述》中，我都提到了这件事，以表示对史学界先贤的追念和敬意。

《汉史初探》出版后，我收到样书的当天，就寄奉邓先生一册，一则表示对先生感激之情，一则继续向先生求教。没有想到很快就收到先生的回信，从信中得知，先生不仅将全书通

读了一遍，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宝贵意见。

西汉的田赋，在文、景以前是十五而税一，景帝以后确定为三十而税一，关于这一问题似乎不大。然而所谓“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根据标准是什么？究竟每亩应出田赋若干？却史无明文。邓先生的来信中即提出了这个问题。

该文（指《汉史初探》《从赋役剥削看西汉的农民生活》一文的第一部分“西汉的赋税与地租”）引用马端临之说，以为秦代是“随所占之田以制赋”，此亦恐是马氏以后代的情况对古代作了错误的理解。秦代姑不论，即如汉代所谓十五而税一或三十而税一，究竟应作如何理解？在我一直是一个极大的疑问。因为当时每人或每户所有土地之多少以及随时的买进卖出，似非政府之所能掌握，则所谓“随所占之田以制赋”，实为不可能之事。且即使计亩而税，则每亩照平均产量抽取三十分之一耶？抑照每年实收数目耶？……

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它鞭策我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后来我给邓先生写了一封较详细的信，我的主要论点认为西汉田赋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办法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从《盐铁论·未通篇》文学答辩所说可以看出，西汉田赋的征收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这个标准是既不论年岁的丰歉，又不计土地的肥瘠或每亩每年的实际产量多少，而是根据每亩历年的通常平均产量，即所谓“较数岁之中以为常”，由官府按照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通扯为统一的赋额来征收的。由于年岁的丰歉是不定的，而赋额是固定的，所以才产生“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的结

果。

那末，根据这个固定的标准，每亩究竟应出田赋若干呢？《汉书·食货志》载晁错上疏说汉初每亩产量一石，若按十五税一，则每亩约出六升；若三十税一，则每亩约出三升。我以为晁错的话是有根据的，这个每亩产量的约数，必然是本于当时官府制订统一赋额标准的文册而来的。

但是从这里又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西汉的亩制，在晁错上疏时还是施行着小亩制，即100步为亩，武帝太初以后，则统一改为240步为亩的大亩制。西汉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也由汉初每亩一石（约合大亩二石四斗）上升为每亩十石左右。而在武帝时，土地兼并已达到高峰，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土地早已为地主阶级所占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西汉每亩三升的固定税率，几乎长达百余年之久而没有任何变化，很显然是充分照顾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尽管如此，西汉的地主阶级对于每亩三升如此低额的税率，并不满意，他们还要隐瞒土地，拒不纳税。邓先生说：“当时每人每户所有土地之多少以及其随时的买进卖出，似乎非政府之所能掌握”，这一推断是完全合乎当时事实的。隐地漏税乃是伴随土地私有和土地兼并的一个必然产物。正因为有了这个漏洞，所以在汉代才出现了“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的现象。汉献帝建安九年曹操平定河北后曾在命令中说过这样的话：“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这虽然指的是东汉末年的情形，然而在西汉又何尝不如此。

我和邓先生这一段文字交往，已写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汉史初探》再版附记中，今天之所以重提这件往事，意在说明先生没有一点大学名教授的架子，平易近人，而又认真负责，循循善诱，不仅使我学到了治学的思想和

方法，而且也为我树立了一位良师的典范，这一切都使我一生受用不尽。

以上就是40年前我受邓先生教诲的一段往事。直到20年后，我们才有机会见面。那是1973年的春天，我和山东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一起赴北京参观学习访问，拜访的第一位教授就是北大的邓先生，先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那本《汉史初探》，连说：“很有功夫”，“做学问就得要下功夫”。我知道这些都是鼓励的话，但也正是先生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风。

邓先生很早就倡导治史要掌握四把钥匙，即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这是治史的基本功。先生不仅这样倡导，而且是身体力行，我们从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能够体会到这四项基本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可以说先生在这方面的言论和实践，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宋史》一书向来被学者讥为“漫无统纪”的“繁芜”之作，尤其是《职官志》问题更多，先生于1943年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是对《宋史》成书六百年来第一次认真清理，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我后来读《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时，即采用了邓先生的一些方法，将所有的原始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近人的研究成果，都分门别类，系于各有关职官及制度条目之下，并加按语，或补其缺失，或勘其讹误，或抒以己见，日积月累，汇为长编，又几经修订，最后完成《秦汉官制史稿》一书（与熊铁基合著）。邓先生撰写的《王安石》、《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传》等几部历史人物传记，也都体现了先生的深厚功力与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学风和创新精神。例如先生在《岳飞传》中，不仅详细占有官修史书、私人著述以及家传文献等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在

使用这些资料时，还给自己定下一个取舍标准，即“用时务求其宏，取时务求其精”，于史实“合则从之，不合则舍之”。因此，这部书不仅具有“考索之功”，而且成为“独断之学”。在所有关于岳飞传记的作品中，被公认为传世的上乘之作。先生的这几部历史人物传记，从搜集、研究、运用资料的思路、原则、方法，到布局谋篇、写作技巧，都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近年来我写的以及和我的学生合写的几部历史人物传记，如《班固评传》和汉帝三传——《汉高帝大传》、《汉光武帝大传》（以上两部书与孟祥才合著）、《汉武帝传》（与刘德增合著），正是在邓先生上述著作影响下的产物。

现在邓先生已离开我们，鹤归道山，每念及先生多年春风化雨之情，不胜欷歔，谨献此小文，聊寄哀思，并以自勉。

1998年4月末于山东师范大学

怀念邓师恭三先生

袁良义

邓师恭三先生的不幸逝世，是我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噩耗传来，他的门生弟子莫不为之悲悼不已。

我是他的门生弟子之一。他不仅教过我《宋辽金史》，而且指导过我的本科生毕业论文。我是1950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的，当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门阀士族的兴起、发展和没落》，一共五万字。邓先生不仅以治宋史闻名于世，对中国古代史的其他段代也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指导这个题目同样得心应手。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热潮在北大已经展开，不过那时我学习得还很少，理解也肤浅，所以这篇论文在观点上基本上是新旧杂糅。在史料上，我按照邓先生的要求，重点地阅读了正史、《汉魏丛书》和其他书籍中有关材料，阅读了中国学者的论著和论文，也阅读了日本学者的一些论文。

当时，北大图书馆的书是开架的，不过正史的版本较差，我每抄一段材料，都要到邓先生住处对照百衲本二十四史，因为邓先生不希望我因版本出现一些字句上的误差。我忙得不得了，每天除吃饭、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泡在写论文上了。

邓先生还要我去请教本系的余逊先生。余先生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为人和蔼可亲，对我也乐于帮助，替我找材

料，还替我出主意，使我获益不浅。在我的写作过程中，邓先生对论文常指出问题，提出意见，凡是有毛病和写得不够的地方，我都要重新写过。这篇论文的题目实在太大，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么大的题目来写。邓先生的意思倒是无可无不可，他认为这个题目并不错，就是太大了些，限于时间和字数，不易精到，但能写到有点样子，就行了。这个题目好在有得啃，可以作为毕业后继续研究和扩充内容的基础，只要多啃几次，便会出成绩。

我把论文交上以后，邓先生又请系主任郑师毅生先生审阅。郑先生学识非常渊博，不但是清史的权威，向我们讲授《明清史》，而且教过许多课，其中包括《魏晋南北朝史》。他对我论文题目也有兴趣，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评议我的论文的，只知道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外边需要一些历史小册子，如果你同意，我可以把你的论文介绍给出版社出版。虽然论文不过关，郑先生仍认为有出版价值。

我把郑先生的话告诉了邓先生，不料邓先生大加反对，连声说不行，不行，说我这篇论文只不过是打了一个基础，应当毕业后继续充实、提高，才能考虑出版问题，说：“你要是急于拿出去，将来你会后悔的，你用得上着这个急吗？”我觉得邓先生的话有道理，我虽在论文上很紧张了一阵，但一是马列主义学习不够，二无写作经验，三无充足的时间，论文仍然浅薄得很，暂时不拿出去也是好事。我把邓先生的意见告诉了郑先生，说过几年，等我把问题研究得深入一些，扩充一下内容和篇幅，再请他介绍出版。

1950年8月，我留在学校里当助教，9月去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工作。1952年又回到北大历史系，教学和研究方向仍为明清史。繁忙的教学工作使我修改论文的工作只得一

拖再拖。1958年初，我下乡参加劳动。第二年回来后，发现存放在备斋的论文没有了。邓先生知道后若有所失，我修改论文的事彻底耽搁下来。

以后我忙于上课和搜集明清方面的资料，与邓先生讲授和研究的方向不同。但我仍时常到邓先生家去，除问候外，我觉得邓先生对明清史也相当熟悉，不少地方向他请教还是很受益的。

1969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这年十月，北大有二千多名教职工到江西省南昌县鲤鱼洲去劳动，邓先生和商鸿逵先生都参加了，是我系教员中年纪最大的两位。我也去了。最初我们住在草棚里，没有墙，青蛙往棚里乱跳，蟋蟀在床下叫；后来盖上草房，墙是土坯砌的，蚊子白天也咬人。我们面对鄱阳湖，这是围湖造田的地区，堤身有二十二米高。我们一到那里，就要挑土上堤，加固大堤，我看到邓先生也挑土上了大堤。这项劳动很累，邓先生和商先生都年逾花甲，干这种活实在不容易。我没有听到邓先生有什么不高兴的话，他一直在埋头苦干。商先生后来改为牛倌，养牛去了，邓先生始终和大家在一块干。不少人提前回校，而邓先生和我们在江西整整劳动了两年。这里的天气很热，气温高达41度，不但白天光着上身流汗，晚上睡在床上也直流汗。下雨天穿雨衣出工，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水里，水里有血吸虫，有些人因此得上了血吸虫病。邓先生和商先生顺利地过了劳动关，精神状态也很不错，我记得第二年的一次小会上，他们共同表演了一个节目，唱道：“一个六十二，一个六十三……”，下面的话我记不清楚了。对他们生动的表演，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从来没有看到邓先生在什么会上表演过节目，这次表演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为数很少的一次。

1971年9月，北大教职工从南昌撤回北京。我又被迫在大兴劳动了七年，于1978年9月，回到北大历史系，这时邓先生担任历史系的系主任了。

历史系显得有些冷落，因为一大批著名的老专家教授，如翦伯赞先生、向达先生、杨人楩先生、邵循正先生、余逊先生、汪篾先生等相继去世了。张政烺先生早就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铁崖先生转到法律系，剩下的老专家教授不多了。1952年院系调整后济济一堂的盛况不复存在。

邓先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重振历史系，企图罗致一批较年轻的历史学家到北大历史系来任教，逐步充实历史系，1980年，他邀请河北大学的漆侠先生、河北师院的胡如雷先生来北大讲学。漆侠毕业于1948年的北大历史系，解放初研究生毕业，是邓先生的大弟子，讲授宋史专题。胡如雷毕业于1952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讲授隋唐史专题。

过了两年，邓先生辞去系主任的职务，专带研究生，未过多久，邓先生退休了。退休后的邓先生，重又埋头书斋，整理旧稿，准备出文集，同时还写一些文章。

邓先生的书房墙上，原来长期挂着一幅齐白石送给他的画，画的是一只大公鸡，带几只小鸡，文化大革命中这幅画被红卫兵拿走了，文化大革命后，他一直要不回来。邓先生换上一幅胡适写给他的字，上录辛弃疾的一首词。给我的印象，一方面是画丢了，才换上字，一方面也是他晚年思念胡适的缘故。邓先生和胡适有师生之谊，并担任过胡适的校长秘书。有一年，齐白石抱了一大堆旧稿去见胡适，请胡适为他写一本传记。胡适让邓先生协助他写，后来，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了《齐白石年谱》。齐白石为了感谢邓先生，才画了那幅大画送给他。当时我们看了，都很奇怪，齐白石为什么不画母鸡

带小鸡，而画公鸡带小鸡呢？这幅很特别的画可惜见不到了。

时光像水一样流逝。到邓先生九十岁的前两三年，我发现邓先生面现苍老之容，不同往年。但体格检查的结果，没有任何病症，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康。他的记忆力仍很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应答如流，连一些琐碎小事都记得住。97年阳历年时我去给邓先生拜年，问他做九十大寿的事，他说不做寿。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打算做茶寿。”茶寿是一百零八岁，好像这是日本人的说法。这样九十岁后还得再加十八年。我心里想：你能再过十八年做茶寿，我们这些七十上下的人，除少数人外，多数人恐怕都奉陪不了。我笑着说：“九五之尊看样子是挡不住你了，你就做一百岁的整寿吧。百岁称做人瑞，很吉祥，做这个寿不是也很好吗？”

过春节时，我去见他，他仍然很健谈。想不到几个月后，他就因病住院了。在住院期间，他还同来探看他的人谈笑风生，好像他的病没有什么大不了似的。

他终于与世长辞了。一个人活到九十一岁，算得上长寿了。而且在他生前，他几乎把他要写的书和文章都写出来了，要做的事都做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几乎”这个词当然还不等于完全，但差不多了。他唯一的憾事可能是没有实现他做茶寿的愿望。

茶寿是在2015年，那时我们的国家应当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大国，对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在怀念他，为他做九十二岁的冥寿，到了2015年，历史系会为他做茶寿召开一个纪念会，来纪念这位“一代宗师”、“宋史泰斗”。他也许不再有什么遗憾了。

青年人的导师和朋友

——怀念邓广铭先生

张必锟

邓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同学们都很敬重他，爱听他的课，更乐意和他接近，把他看作自己的朋友和导师。

我是1946年秋进北大的，念的是教育系。一年级的時候学中国通史，是邓先生教的；到二年级，邓先生开了宋辽金史，这是一门选修课，可是听课的人很多，除史学系同学外，还有图书馆学系和我们教育系的同学，七八十人都挤在北楼的一间大教室里，这盛况在当时简直可以跟朱光潜先生开的美学课媲美了。

邓先生上课总是穿一件赭色长衫，淡雅而又大方，又总是站着讲，从不坐下，而且声音宏亮，态度从容不迫，我用自己的速记办法，差不多能把他的每句话都记录下来。每讲完一段，他还要列出一些书目，叫我们到图书馆去查阅。课后我按照他的指示，一边查资料一边整理课堂笔记，每个学期下来都有厚厚的两三本。

我入校时还不满18岁，又来自湖南山区，没见过世面，突然见到这么多过去只能在书上才能见到的名人，心里又高兴又害怕，除了奉父母之命去拜访过一次乡先辈沈从文先生而外，跟别的教授从来没有说过话，可是一件意外的事却使我受到了邓先生的亲切教诲。那时教我们英语作文的是一位印度籍

助教，很年轻，不到30岁，他有一个习惯，作文批改过后要按分数排队，一篇一篇地发下来，排在前几名的同学还要向全班朗读自己的习作。偏巧这几位同学中除我而外，还有两位也是来自美国人办的中学，他一听我们的美式发音，十分生气，开始还逐个地纠正，后来索性命令我们“stop”。我们感到屈辱，愤愤不平地议论起来：印度做英国殖民地一百年，发音标准有什么了不起！如今美音还更吃香呢。于是有人提议给胡适校长写信，请他下令禁止歧视美式发音的做法——我们天真地认为，胡校长留美多年，又当过驻美大使，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请求。

信写好了，怎样才能送到胡校长手里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恭三先生——他是胡校长的得意门生，除在史学系任教外，还兼着校长秘书，请他转交最稳妥不过的了；又因为我上课爱坐第一排，大家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第二天上午恰好有通史课。下课铃响过，邓先生刚缓步走下讲台，我便迎了上去，哆哆嗦嗦地说：“邓先生，我们几个同学给胡校长写了信，您能替我们转交吗？”

“有什么事要告诉校长？”他和颜悦色地问。

“是关于英语课的事。”

“好吧，把信给我。”

我们高兴极了，满以为今后英语作文课上不会再发生不愉快的事了。过两三天，又是通史课，刚下课邓先生就叫住了我：“下午放学后，你抽空到我家去一趟——东厂胡同一号。”

东厂胡同一号有前后两院：胡校长住后院，邓先生住前院。我敲了敲门，邓先生叫我在客厅坐下，手里拿着我们那封信。

“你们的信我看过了，老师要求你们按标准英语发音，并

没有错呀！”他缓缓地说，态度还是那么从容、平易。

“现在美式发音也很流行啊。”我小声地辩解了一句。

“不能这么说，这到底是英语课嘛。”稍停之后，他又指着那封信说：“你们说要‘兼容并包’，这可不对，‘兼容并包’是指学术思想、观点说的，怎么能跟英语发音扯到一起！希望你们平心静气地想想，老师生气其实也是为了你们学好英语，千万不能误解他的意思。你们还年轻，要改也不难，对吧？”

我无言以对，只好说：“是的。”

这时，先生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接着说道：“你是学教育的，更应当懂得尊师的道理，老师不是按年龄划分的，不要因为这位老师很年轻就不把他当老师看；对老师的正确要求，应当切实照办，不管他的态度如何。”

我惭愧地低下了头——我们那时确实很自负，在教会中学读了六年，别的不说，英语是过得去的，没把那位老师放在眼里。

随后，邓先生又改用温和的口气说：“今天找你来，是想征求你们的意见；这封信不必给胡校长看了，好吗？”

我说：“好的。”

接过信后，邓先生又告诉我，北大有聘用外籍教师的惯例，对外籍教师尤其需要尊重，以免损害北大的国际声誉。

在告辞的时候，我诚恳地对邓先生说：“我一定把您的话转告那两位同学，我们一定照您的指示做。”

后来我们几个人听从邓先生的劝导，并且经常查字典，改正我们的发音，那位教师看到我们的进步也很高兴。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想当年我们的幼稚举动，不禁潸然汗出；如果不是邓先生及时纠正了我们的错误想法，我们跟那位印度籍教师的矛盾必定会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而我的感触尤深，因为我是直接聆听恭三先生教诲的人，我从中懂得了要尊重人的道理，这使我终身受益。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40年中，我尊重校领导和同事们；也尊重学生的人格，见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也像恭三先生当年诚恳而又亲切地教导我那样教导他们，这使我的生活中充满了乐趣。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1992年9月17日在未名湖畔见到恭三先生的事。那天，我们教育系46级的十多位同学在母校团聚，走到未名湖西侧的树林中，恭三先生恰好在这里散步，我们一窝蜂似的拥了上去向他老人家问好，他似乎还记得我们，只是叫不出名字，轻声地问：“你们是教育系的吧？”

“先生的记性真好！”我们都高兴地叫了起来，似乎忘记自己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跟恭三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

恭三先生现在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形象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他的无数学生的心中。

永远的怀念

——常国武

开始知道邓广铭先生，是在1958年。那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关于辛弃疾的传记故事，我参考了邓先生的《辛稼轩（弃疾）传》。翌年，该出版社又约我写岳飞，邓先生的《岳飞传》是我最主要的参考书。邓先生这两部著作材料翔实，考证精辟，当时就使我钦敬不已。其后，因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又反复研读了邓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年谱》和《辛稼轩诗文钞存》等专著，也同样受到了极大的教益。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由于在大学期间曾选读过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开设的所有词学课程，因而对宋词尤感兴趣。解放初大学毕业后不久，又有机会与圭璋师在同一教研室工作，从而得知邓先生与圭璋师非常熟悉，在北大历史系工作，是国内外首屈一指的宋史研究专家，这就更增加了我对邓先生的景仰之情。

七十年代末，我偶然在某大学的学报上看到一篇批评邓先生有关稼轩词研究的文章，出语既非常不逊，论点又十分荒唐，出于对师长长辈的崇敬爱戴，同时也为了在学术上明辨是非，我写了一篇长文予以驳斥，意在说明邓先生原来的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批评者的意见反倒是大谬不然。对方撰文加

以辩解，我又给以回击，对方这才偃旗息鼓，没有再争论下去。

在这场笔战之后，我开始同邓先生通信，向他请教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有时也将我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词抄呈给他求正。他总是有问必答，对我的作品和书法给以很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

八十年代中期，我忽然收到巴蜀书社总编的一封来信，说该社计划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其中《〈辛稼轩词集〉导读》原已邀请邓先生执笔，后邓先生因接受国家一项重要任务，不得不辞去这项撰写工作，曾先后三次去函该社推荐我来承担。对于邓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举荐，我一方面深感受宠若惊，另方面又不免担心自己能否胜任愉快。在得到邓先生同意为我审稿的许诺后，我才壮着胆子将这项任务接受下来，尔后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全稿。在撰写过程中，我不时写信向邓先生请教一些疑难问题，有少数意见不同的地方，也不揣冒昧地向邓先生提出质疑。对于我所有的请教，邓先生都不厌其详地给以答复和解释，从而使我在辛词研究方面的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

虽然和邓先生保持通信联系，但我始终因为未能亲聆他老人家的警颜而深以为憾。1989年江西省上饶地区召开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大会，听说邓先生准备前往参加，我在大喜之余，也决定利用这次极为难得的机会去当面向他请益，并一睹我久已仰慕的前辈的丰采。

在上饶期间，我不仅有幸聆听了邓先生在大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更有幸能亲自接受他老人家的耳提面命。邓先生是国内研究辛弃疾及其作品的泰斗，所以在大会期间拜访、求教的人络绎不绝。邓先生在百忙之中单独接见了，我就同

我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其间还请人摄影留念，照片至今犹为我所什袭珍藏。

我在邓先生指导下撰写的《〈辛稼轩词集〉导读》一书，已于1988年9月正式出版。1990年4月23日，周景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在香港《大公报》的“读书与出版”副刊上撰文给予较高的评价，后来该书还获得了江苏省及我校社科优秀科研奖，对于邓先生当时的力荐和指导，我总是铭感在心，无日或忘的。

在上饶同邓先生接触的短短几天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十分深刻：慈祥、谦虚，对后辈总是那样循循善诱，乐于奖掖。听他娓娓而谈，确有如坐春风之感。

邓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为人在学术上的建树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

1998年4月25日

回忆邓广铭先生在历史系“拨乱反正”

——祝总斌

早在五十年代，我就购买、拜读过邓广铭先生的大作《岳飞传》、《稼轩词编年笺注》，但我认识邓先生则是在1972年初调来历史系以后。慢慢发现，他不但是宋史学界泰斗，是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文笔犀利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在学者中比较难得的，有见识，有魄力，有组织才能的“将才”。

记得“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邓先生公开表示：“我还要工作二十年！”作为十年动乱中备受折磨的老教授，当时已过古稀之年，不但没有丝毫消极之意，反而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二十年”，这就是说要工作到九十岁，这不能不令全系教职工惊异，同时也是一种鞭策，令大家振奋不已。

随后不久，邓先生便毅然挑起在历史系主持拨乱反正工作的系主任重担。

当时学校里有些思想还比较混乱，如政治挂帅的口号还起不起作用，“红专”、“白专”的区别还存不存在等，邓先生对此一概不予理会，迳自明确提出，在历史系拨乱反正，首要任务便是提高教学质量。为此，除本系教员外，只要认为有必要，还尽量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系兼课。就中国古代史专业言，如聘请宁可先生讲授《中国通史》，吴荣曾先生（当时尚未调回北大）讲授《战国史专题》，刘乃和先生讲授《中国史

知识讲座》，漆侠先生讲授《宋代经济史》，胡如雷先生讲授《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王利器先生讲授《古文选读》，蔡美彪先生讲授《辽金元史》等等。当时还没有汽车接送的条件，各位先生都是自己设法来北大上课，十分辛苦。如宁可先生每周四学时课，都是从北京师范大学骑自行车，有时还要顶着烈日寒风，赶到课堂。刘乃和先生年过花甲，身体肥胖，是从北京师范大学或城里能仁胡同家中挤公共汽车，在中关村下车，步行很长一段路，到达课堂。可是由于邓先生的诚恳聘请、妥当安排和个人声望，他们全都欣然应聘，为提高北大历史系那几年的教学质量做出贡献。

在教学内容上，邓先生十分强调要给同学打下扎实的史学基础，让他们真正学到知识，掌握初步科研方法。王利器先生讲授《古文选读》，并非一般提高学生古汉语水平，而是选出一些比较艰深、系统的史料，如《汉书·食货志》全文及颜师古注等，油印发给同学，由他一字一句释读，实际是引导大家认真阅读原始史料。这和一时尚未完全扭转的重观点、轻史料的风气，不大吻合，也有些议论。当时我是副系主任，听后有点顾虑，便去请示邓先生。他说：“不管它，学生不认真读史料，怎么能提高水平！”与此大约同时或稍后，王永兴先生上课也一字一句释读《通典》、《唐六典》有关篇章，事后同学都感到受益非浅。这些都同邓先生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魄力是分不开的。

五十年代中，邓先生曾经提出治史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后来遭到无理批判。七十年代中，北师大刘乃和先生来北大支援，给外国留学生（与工农兵学员合班）讲授《中国古代史》，曾附带简略介绍过这方面知识。邓先生当系主任后，听说此事，立即聘请、敦促刘先生

将它们扩大，发展成为一门专题课《中国史知识讲座》，讲后反映极好。这不仅证明治史四把钥匙的重要性，而且从中也可看出，邓先生善于抓住机会，安排工作。

十年动乱中，北大历史系是重灾区，师资力量损失惨重，急需补充。邓先生高瞻远瞩，狠抓这一工作不放松。先后从山西调回王永兴先生，从社会科学院调回吴荣曾先生，从本校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先生；而且还亲自主持考试（出题，阅卷），从校内录取、调来张衍田先生等。当时邓先生雄心勃勃，想调的人还有好几位，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如经过邓先生活动，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二级教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已经同意来北大，但因拖得时间较长，山东大学不放了，回答说：“放王仲荦也可以，拿你们邓广铭来换！”这事方作罢。尽管如此，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师资力量已加强了，开的课程也增多了。由于从校外调人很难，后来邓先生创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后，便大力培养、储存大批优秀人才。这些年来，他们科研硕果累累，在国内外学术界知名度日益提高，教学上成绩斐然，深受同学欢迎，在目前老教师已相继退休或面临退休之际，更成为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坚、骨干力量的极重要组成部分，推本溯源，不能不佩服邓先生当年想得深，看得远，抓得准！

在师资力量使用、提拔上，邓先生也极具特色。

张广达先生的人品、学识都是令人敬佩的，但是1957年遭到过不公正待遇，邓先生却不理会这些，平日备加称赞，当系主任后又为他创造各种发挥才华的机会。1979年定职称，我就当面听到邓先生坚决表示：“张广达应定为副教授！”后来张广达成为历史系升教授、定博导最早的几位先生之一，并被任命为中古史中心副主任，在学术上、教学上、行政上发挥重

要作用，除主要决定于本人的水平和努力外，邓先生的大力帮助，也是不可忽视的。

王利器先生是老一辈学者，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但不幸1957年与张广达先生同遭厄运。可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邓先生同样毫不犹豫地聘请他来教《古文选读》。王先生年迈体衰，住得又远，为保证油印教材质量，邓先生又商请我一度担任校对（因我稍知内容）。

王永兴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高足，老一辈学者，十年动乱前已备受压抑，十年动乱中更遭到严重迫害，发配山西，邓先生认定他是国内极少数难得的隋唐史和敦煌学专家，便想方设法，辗转托人，颇费了一番周折，把他调回北大。

这些表明，邓先生爱才若渴，敢作敢当。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实际上上述邓先生的所作作为，都是默默地在用行动真正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当时北大“左”的势力虽受打击，不少人对之犹有余悸之际，若是没有一心在历史系拨乱反正，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决心和魄力，是绝对办不到的。

邓先生平日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交谈中，笑声爽朗。八九十岁时依然记忆力非凡，聊起半个世纪前学术界轶闻，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往往连续一两个小时也无倦意，令我们这些后辈大长见识。可是办起事来，却极有主见，轻易不受人左右，而且拿得起，放得下，果断坚决，指挥若定，有大将风度。我十分敬佩，有时想，如果邓先生年轻几十岁，改教从政，去担当个政府部长甚至更高职位，是定会干得很出色的。

在历史科学中永生

——怀念邓广铭老师

郑必俊

近十几年来，我一直在邓先生的教导下工作，学到了很多做人、做学问的道理，不过，却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才开始真正了解到作为历史科学家的邓广铭老师的精神世界。

一、邓先生领我进了历史科学之门

我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大，1953年，被调到校团委工作，所以，虽然听过邓先生的中国通史课，但对他的印象不深。1972年回到历史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我当时也在系里担任一点工作，接触才多一些，人家都说他不好说话，我暗自庆幸，我主要负责平反工作，可以不必去碰钉子。改革开放几年后，我的归队思想越来越强烈，但是已年过半百，业务荒疏太久，要在这种情况下再从头开始搞业务，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而且，即使我下了决心，又会有哪个教研室愿意接受我呢？正当我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的时候，一次，与邓先生谈起我的这些想法时，邓先生竟然是那样热情地支持我，并且毫不犹豫地对我说：“你可以到中古史中心来工作。”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也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因为我深知，邓

先生对人的业务要求是很高的，当时我想，能获此殊荣，当然是三生有幸，不过，到了真达不到要求时，可是一点退路也没有了。但是，这样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只有这一次，如不知难而进，只能遗憾终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所以，当梦寐以求的机遇不期而至时，心情十分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主要的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所以表现得迟疑，缺乏信心。邓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严肃地说：“做人、做事、做学问是一个道理，只要是老实、认真、肯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当我抬起头来，看到他那充满期望的目光时，万念顿时净化，我的心定了，从此踏上了回归业务之途，再也没有动摇过。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心中总是充满了对先生的感激之情。

工作的大转轨，尽管自以为作了十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怕自己业务水平低，不怕坐冷板凳，不怕打击讥笑，……，但是当真面对着超出我想象的业务困难，特别是天天都要面对时，对于能不能坚持下去，思想上确曾有过波动。我对邓先生说：“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是我力所能及。”实际上，我是有点畏难了。又是邓先生鼓励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走下去。他以自己积几十年做学问的经验，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在科学的道路上，只有真理与谬误之别，无所谓老幼、尊卑、先后之分。把个人的荣辱、地位、面子、得失看得很重的人，是难得科学的真谛的。”邓先生的一席话，对于处在进退维谷中的我来说，不啻是一付清凉剂，因为那时要想闯入科学之门的，的确首要的不是看自己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如何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问题。

来到中古史中心，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宋代的《三朝北盟会编》进行版本校。每天坐在图书馆里进行校对，开始时，

觉得很简单，不过还是认真地做下去。经过一段时间，我逐渐体会到，邓先生的本意并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劳动力，而是要通过这样的基础工作，让我明白科学研究就是这样老老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做出来的。如果说这是邓先生对我的入门初试的话，那么，《怀古录》校注则算得上是对我的复试了，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开始尝到了做学问的滋味。

南宋陈模的《怀古录》是一本诗文评。当时邓先生手中拿着他自己收藏的手钞本对我说，这是一个流传的孤本，而且是一个极为粗率的钞本。正如他在《怀古录校注》的序言中所说，是“鲁鱼亥豕，几于无叶无之。其中所摘引的诗文语句，出自于名家的固然很多，而其属于不甚知名或甚不知名者亦复不少。这种种，都说明它是一本极需要进行校勘和注释而又极不容易进行校勘和注释的书。话虽这样说，但我却认为它毕竟是一本小书，篇幅并不太多，所以对于校注工作的难度便有些估计不足。因此，我就向郑必俊同志建议，希望她能把这本书的校注工作承担起来，而她也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实际上，至今我还这样认为，要是由一个熟悉古籍整理业务的人来做，这本书的难度的确不大，可是对于我来说，倒真是对它的难度估计不足。

我之所以对《怀古录》校注工作的难度估计不足，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古籍整理，不懂得这门学问的深浅，只看到这是一本不过两万字的小书，所以当邓先生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下来。尽管邓先生对校注工作的要求作了详细的布置，但是由于我对其中的难度不甚了了，所以听了之后，并不感到有什么压力。谁知做起来竟问题百出，就以我所认为最容易的标点部分而言，也因为没有经过校勘的原文错字很多，漏字不少，而难以进行下去。开始

有了问题，我总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再硬着头皮去请教，几次下来，我的紧张心情松弛了下来。因为我发现，邓先生不仅严格要求，而且耐心帮助，时常戴着老花镜，用颤抖的手握着那支老式的钢笔，一丝不苟、一笔一划地帮我修改，就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肯放过。这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竟是我父亲的身影。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怀古录校注》这本小书，几经大改，那时还不像现在能够用电脑打印，每改动一次，我就得重抄一遍。最后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邓先生在序言中说：“经过这样一些勤奋和艰苦的劳动，终于使这本湮没了近七百年，且几乎可以说是遍体鳞伤的《怀古录》基本上都得到了整理和重现。”其实，这里面倾注了先生的许多心血。后来我才逐步体会到，先生正是要通过校注这本小书来培养训练我的基本功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言传身教，才使我在实践中领悟到，科学研究是一种极其艰苦的劳动，北京大学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正是因为有了像邓先生这样的导师一代一代地把科学的接力棒接下来，传下去，这座科学的殿堂也正是这样一砖一瓦地集垒起来，建造起来的。

耄耋之年的邓先生就是这样把着手把我领进历史科学之门。

二、邓先生鼓励我走上妇女历史研究之路

近十年来，我能够一直在中国古代妇女历史这个领域里耕耘着，是和邓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1988年，当我尝试着做一点中国古代妇女历史研究时，很怕邓先生反对，我主观地认为，北大人在学术上的传统观念很深，不喜欢搞这些新东西，没想到邓先生却说：“妇女的历史就是应该有人来研

究。”这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自信。邓先生不仅是这样说，而且亲自把它作为一个事业来推动。在后来我们所进行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妇女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中，邓先生几次亲自出席学术会议讲话，并且为学生讲课。1991年1月22日，是一个严寒的冬日，邓先生冒着大风到电教大楼来参加我们召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妇女”研讨会。在会上，他从建设两个文明的高度作了长篇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民族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后者存在于今天，对于妇女来说，就是男尊女卑的影响。他还追述到夏朝，说历史上视女人为“祸水”，对妇女的作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些为我们的民族和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的妇女却名不见经传。例如殷代的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但是她的事迹却从未见于正史，直到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中发掘出了她的墓葬，又从墓葬的甲骨文中才发现她是一位曾经带领三千士兵，驰骋疆场作战的女将军。又如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晚年写了一部《柳如是别传》，竟引起了非议。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写了女人，而且这个女人还曾一度沦为妓女。其实陈寅恪先生讲的是柳如是为振兴汉民族文化传统而献身的精神。这就说明，不仅是在没有文化的人当中，就是在高层的文化人中，也还根深蒂固地保存着男尊女卑观念。在妇女研究尚未能进入主流学科的状况下，邓先生的一席话对与会者不仅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也使大家倍感亲切。“中国传统文化与妇女”这个课题，至今仍是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重点研究项目，是和最初的这次会上，有邓广铭等学术老前辈的支持和指导分不开的。

1990年春，我们将“中国古代妇女史”课第一次推上北京大学的讲台。课前，我感到精神压力很大，心里忐忑不安。

邓先生就把他当年第一次讲课的经验和体会教给我，他说，课前要充分准备，课上就能够充满信心。后来在我讲课中，确是努力去这样实践的。1991年5月3日，在我讲的“中国妇女历史与文化”的课程中，邓先生为学生讲了一课，这也是邓先生一生千百次地为大学生讲课当中的最后一课。84岁高龄的邓先生，讲起课来非常投入，不仅思维逻辑严密，而且语言生动风趣，他说：“中国妇女长期受压抑，男尊女卑的影响很深，有人说现在是阴盛阳衰，希望真的是阴盛阳衰。”他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阐述了研究妇女史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研究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他一连站着讲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再三劝他坐着讲，可他就是不肯，学生们都深受感动，也深感不安。课间休息他还要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课后同学们又围着他问这问那，当时我真担心把他老人家累坏了。事后他还问我，学生有什么意见。邓小南告诉我，先生为了备课，那天中午竟没有休息。这种对教学精益求精，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永远是后辈学习的楷模。当时他站在讲台上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的风貌，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史是从写点人物传记开始的。此后虽然收集掌握的历史资料逐步增多，可是有时写点论述性的文章总感到难以驾驭，力不从心，每遇到疑难之处，我就去向邓先生请教。他多次向我讲起，研究历史（包括妇女史）必须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宏观是鸟瞰式，用望远镜观察，而微观是用显微镜观察，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要有通体上的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又必须要注意到不同的历史阶段、阶级、阶层、地区、民族等等的特点。点面结合，论从史出，言之有据，论证严谨，才不致落入空想泛说，不着边际，漏洞百出。他还举例说，研究萧太后，不了解辽、宋的历史，不了解辽、

宋军事实力对比，就无法研究澶渊之盟中萧太后的作用。邓先生的指教，尽管我还有待去不断地实践，但一直是我在讲课、写文章中努力遵循的原则。

就是在邓先生病前不久我去探望他，当我对他说我想写一本关于宋代妇女的书时，他非常高兴，同时又针对我的具体情况，语重心长地说：“人就是要有一个目标，确定下来，就一点一点地去做。不过，不要想一下子就能写出一本书来，先可以一篇一篇地写，积累起来就是一本子了。”一年来，邓先生的话一直在督促、鞭策、推动着我，每当我想放松下来时，先生的话语就会在耳边响起，催我奋进，要我沿着妇女历史研究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邓先生为中国古代妇女史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开创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是我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感受。

三、邓先生的精神对我的灵魂的震撼

邓先生的身体一向很好，但毕竟年事已高，在我们去为他祝贺九十华诞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三个月后他会一病不起，竟于1997年7月住进了医院。邓先生住院后我每次去探视他的谈话内容，可以这样说，除了史学研究之外，他就没有说过别的。开始，我每次去他都在急切地等待着医生的“宣判”，盼望着早日出院回家。他扳着手指对我数，还有哪些书要等着他定稿；哪些书还需要去修改；哪些问题还应该回答；……按照他自己安排的任务，我看是永无尽头的。和人说起话来，他还似平时那样，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让你连说句要走的话也插不进去。他还非常得意地对人说：“郑必俊说我说话爱包场，我现在还是包场。”

住院之初，邓先生的精力还较好，有一次我们去时，走进病房，看他正端坐在床前，就像他在家中的书房里一样地伏案工作着，全神贯注，我们进去了他也没有发现。原来他是正在为修改即将出版的一部书稿而忙碌着。为什么重病在身的人，却要这样来消耗自己？他是否预感到了什么呢？可他又从来没有流露过什么，为此我还问过小南，她也无法回答我的问题。这在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

不断传来邓先生病情恶化的消息，1998年1月3日，风力足有六七级，夏自强说我们应该尽早去看邓先生，我明白他的意思，吃了午饭，就和他一起赶去友谊医院。邓可因站在床前，看见我们进去，就大声地对邓先生说：“郑必俊他们来了。”先生居然听见了，微睁开眼睛，叫我的名字，随即又昏沉地睡去。看到他那无助的神态，我一阵心痛，只是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这时可因把新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拿给我们看，我们都为邓先生能够亲眼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而高兴。我当即凑到邓先生的耳边说：“这本新版的《王安石》很好！”先生居然又听见了，并且用力地睁开眼睛看着我，说：“那就送你一本！”我用力地握着他的手，却说不出话来。此后，一直到我们离开，他再也没有清醒过。后来小南告诉我，这就是邓先生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清楚明白的话。这本书，这句话，留给我的是不尽的哀思，永远的怀念，更是先生对我的期望。

在邓先生去世前的一段时日里，我常常是等小南在晚上从医院回家后和她通电话。通话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夜深了，不知不觉地又去搜索我的记忆，把邓先生生病、住院、病重、弥留之际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汇集到一起，不由自主地、反复地去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在行将离开自己深深爱恋着的亲人，离开自己生活了九十多年的世界时，为

什么能够那样的平静，那样的泰然自若？难道他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可留恋、可动情的了吗？应该说不是的，或者说应该，邓先生对人生的留恋、动情之处与众不同。他所深爱的是宋史，他所眷恋的是史学，他的心之所思，情之所系，除了宋史还是宋史，除了史学还是史学，这已占据了她的思维、情感、精神的全部。因为，如果说在他头脑清楚的时候，还可能用理智来控制或掩盖自己的感情的话，那么，在他处于昏迷失控状态下的话语，只能是反映他的思想情感的真实，为什么常常在他下意识的的话语中也都是关于历史科学的内容呢？想到这里，我终于悟到了，一个以历史科学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和生命的全部依托的人，他一生从事历史教学、科学研究，几十年来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到教育事业中，浇灌到这片神圣的园地上，如今早已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历史研究已经后继有人，这其中包括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小南——他最疼爱的小女儿。他的史学研究成果早已洒遍祖国和世界，不断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将万世流芳。他的生命已经和历史科学融为一体，他的生命已经超越了生的极限和生与死的界限，他的生命不但可以在宇宙中延续，而且能够在历史科学中不断地发展，那么，死对于他来说又何所惧呢？！当然，这样的精神境界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具有的，也不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我从很不理解到逐步理解后，反馈回来的是对我的灵魂的一种冲击、一种震撼。原来我是认为学也无涯、生也有涯，已是人生理想追求的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当我亲眼目睹、亲自体验了先生在人生的最后时日里，他是如何完成或实现生死界限的超越之后，我真的相信，邓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已在历史科学中永生！

1998年7月9日

不求强同 不惧独异

——缅怀邓广铭先生

丁伟志

听说邓广铭先生因病住院，正和老伴商量着哪天去医院探视，不料他已遽然作古了。尽管邓先生已享高龄，但是听到他辞世的消息，还是不由得痛切感到中国史学界老成凋谢的悲凉。

我的妻子陈崧（惠民）是邓先生教出来的学生，我却无缘直接受业于先生。七十年代末，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后，才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得睹邓先生的风采。他的坦诚质朴，他的博学多识，以至他的言谈中的浓浓乡音，都让我感到敬重而亲切。可是，由于我的疏懒和忙乱，虽然同居一城，却错失了向邓先生请教的许多良机。只是到他府上拜望过一回，主要还是谈别人的工作问题，言不及义。

所幸的是，我读过邓先生的许多著作，受益极多，这大大弥补了我与先生交往不深所留下的遗憾。说来连我自己都几乎难以置信，把先生的《治史丛稿》以及遗著目录摆在面前，竟然发现他的著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都是我往年认真学习过的。

在我青少年时，对宋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可是，童年时正值国家处于强敌侵略、山河破碎的危难中，于是“杨家将”、“岳家军”的故事便成了最能震动我幼小心灵的读物。稍长，

又喜欢上辛弃疾的词，读起来觉得回肠荡气。这些因素，就是促使我在五十年代把邓先生的《岳飞传》和《稼轩词编年笺注》作为最心爱的读物，经常置于案头枕边的原因。当然，那时我的宋史知识水平，是地道纯业余的；也就是说，对于邓先生的这些著作，我当时只不过算是一个并没有能力真正读懂的业余爱好者罢了。不过，也正是从那时候起，邓先生的博学的良师形象，便在我的心中稳稳树立。

真正从学术的专业的角度研读邓先生的论著，是“文革”后期我有幸参加了蔡美彪同志主持的续编范著《中国通史》工作以后。那时候我们七八个人正在全力以赴撰写宋史，邓先生的著述当然就成了我们的必读书。我分工着重研究宋代的哲学，但是不能不参与全书的讨论和修订工作，因而对于有宋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也都得尽力学习、补课。这样一来，邓先生就真正成了我未曾谋面的名符其实的专业导师。不但他执笔的《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部分，对于我从整体上把握宋史具有不可代替的指导意义，而且每逢遇到一些具体的疑难问题时，我也常常要向邓先生的著作请教。至今记得，从宋代政治的特点、“外患”频仍的缘起、积贫积弱的两宋何以经济能有很大发展、文化何以空前繁荣、南宋战和之争的实质与内幕，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直到宋江是否征过方腊、拐子马是何种阵势、《金佗粹编》及《金佗续编》内容的虚实，这样一类非常具体的问题，我都从邓先生的著作中受到过极大的教益。后来我不专门做宋史研究了，但是对宋史却从此结下了再也解不开的情结，所以一直留心着有关宋史的研究成果。每当看到邓先生的论作，自然更是认真拜读，不肯错过。正因为这样，现在再来阅读邓先生的《治史丛稿》，便不仅感到亲切，而且为自己失去了从事宋史研究的良师而感到十

分惆怅。——当然，我从未能跨进、今后也无力跨进宋史研究的门槛，没有资格把自己列在邓先生私淑弟子的地位上。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将永远保持对邓先生治学成果和治学精神的仰慕之情。

邓先生在宋史研究领域里的建树之著，是史学界所公认的。我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即从邓先生一贯坚持的难能可贵的治学精神的角度，说说对邓先生的景仰与缅怀。

我认为，邓先生不论在他的那些几十万字的专著中，还是在他的那些三五千字的论文中，概无例外地都体现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治学精神，这就是独立探索的科学精神。独立探索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这是常识。但是，真正能够把这种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全部学术活动中，几十年如一日；而且不论面对的是重大的还是细小的问题，都用同样严谨的科学精神去审视和探索，提出不依傍他人的独到见解，这可不是常人能够轻易做到的。邓先生关于宋史职官志、刑法志的研究，关于辛弃疾、岳飞、王安石的研究，都是前无古人的传世之作，这已为历史学界所公认。这里只从他的论文中举两个例子，来展示一个邓先生从不肯为定论或时俗所囿的独立探索的精神。

例如，周敦颐在宋代理学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从南宋朱熹起便造成舆论，把二程说成是师承于周敦颐，从而把周敦颐抬高到理学创建者的地位上。这种说法，长期流行，几成定论。邓先生在《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中，却根据确凿的史料和周密的推论，揭示出这种论断的错误，指出周敦颐和程颢、程颐间不仅从未有过师徒关系，而且，周氏虽在学术上造诣颇深，但在北宋当时并没有造成过重要的影响。

又例如，关于陈亮的主张与生平，这是邓先生从三十年代起从事研究的课题，他在八十年代，即过了四十年之后，又对

这个课题进行了新一轮的研究。他在有关文章中条分缕析，纠正了从朱熹到《宋元学案》中关于陈亮的王霸义利观的误判，指出陈亮非但并不反儒，而且也不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功利主义者。同时，他还改正了自己早年对于陈亮考取状元的殿试对策的评论。陈亮在那份对策中，曾经劝说宋光宗只须在处理国事上遵循多年所接受的其父孝宗的教导即可，而不必拘泥于“一月四朝”的礼仪去按时拜见孝宗。陈亮的这一对策，从当时起便倍受指摘，说他这是为着谋取状元，逢迎光宗，而有惭德行。八十年代，对先生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了考察。邓先生在全面考察陈亮当时的思想后指出，陈亮所作的这次对策，无非是在贯彻他认定国难当头的大势下，“孝悌忠信不足以趋天下之变”的一贯主张，因此绝不能从个人品德上去加以指摘。于是，邓先生说，这桩八百年的公案，包括他本人早年说陈亮此举有些“曲学阿世”的结论，都一律应予推翻。

在邓先生的《治史丛稿》中，上面这类的例子，是俯拾可见的。但是，能做到不断有新的学术创见，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一则，必须要有深厚的功力，才可能提得出问题，特别是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不发生疑问的地方，发现问题；二则，在提出问题之后，必须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搜集、检查和辨析尽可能详尽的史料，以求对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合乎史实的合理的答案。可以料见，在这样的科学探索过程中，艰苦平实的劳作、实事求是的态度、敏锐缜密的分析，是缺一不可的；对于一生治学的学者来说，特别是对于年届高龄的学者来说，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样做学问，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邓先生在进行独立的学术探索的过程中，高扬着“唯真理是求、唯科学是尊”的无所畏惧的精

神。我认为，这可以说是邓先生治学态度的精髓所在，而且这也正是最值得后学者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精神。

不难发现，邓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经常与人发生争辩。显然，这并不是邓先生喜欢争辩，而是出于进行科学探索的必需。试想，要在学术上破除陈见、探求新知，即使是要在很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做些除旧布新的事，如果没有这种无畏的科学精神，能够办得到吗？如果抱着明哲保身的“乡愿”态度，在学术问题上只是一味转弯抹角，回避矛盾，和气一团，息事宁人，能够在科学探索中前进得了半步吗？邓先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向人们展示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就必须和各种时风流俗、千年定论做必要的争辩，同时，也无可避免地要和持有这样那样不同见解的人进行讨论，乃至发生尖锐的争论。学术探索，也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人际关系这样的敏感领域，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正因此，这也就愈加要求学者能够以平常心坦然对待学术上的争辩，保持住只问学术是非而置其他庸俗的人事关系于不顾的纯真的赤子之情。管你是学界新进也罢，管你是大家权威也罢，我在学术探索中一旦和你发生了分歧，那我就要无所顾忌地和你展开讨论，直至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辩。当然，既然是学问范围内的斯文事，讨论总该是心平气和的；但也正因为是探讨学问，所以更应是坦诚相见，更应不避尖锐，不做俗态。邓先生正是在这方面给学界做出了典范。他在学术研究中，指名道姓地和许多学者做过讨论，有时还是颇露锋芒的争论。诸如，校正张阴麟、胡道静、张家驹诸先生所作万春圩系沈括所筑的论断，与余嘉锡、夏承焘先生辩论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与章培恒先生辨析《辨奸论》真伪，与崔文印先生辩论《南迁录》真伪及《大金国志》作者问题，与陈志昂先生讨论辛弃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词写作时

间地点，以及与人讨论宋江投降事，等等，无一不体现出邓先生在学术探索上，坚持着独立研究、独立判断；在学术见解上，无论面对何人何事，一概心地坦实，知无不言，而不避亲嫌、不畏人言、不记恩怨。直至暮年，邓先生仍然保持着这样的学术风格，一再发表文章，阐述理由，不赞成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邓先生的意见未被采纳，《存目丛书》已经出版，此事的得失自可别论；但是，邓先生此举，至今在学界中仍旧受到称誉。人们赞赏他的识见过人之处，更赞赏他的“不强同，不惧异”的学者风骨。

以自尊自信的态度进行独立的科学探索，敢于得出、敢于发表、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这不只是诚实治学者所需的基本品德，而且是保证学术研究能够有所发展有所前进的唯一途径。既然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是学术得以发展的前提，既然“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那么，这就不仅需要有一个适宜的舆论环境，而且需要学者个人具有在学术上的独创精神、首创精神；如果学者都是些只会随众从俗、不敢为天下先的庸人，那么学术的生命自然也就完全止息了。邓先生对于这一点，是保持着清醒的自觉的认识的。他为《治史论丛》所写的序言，就是他对这种治学信念和治学准则所做的简明扼要的阐明。他援引了章学诚《文史通义》中有关“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几段话，然后说明章学诚所提倡的“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而这两者又必须先以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凭藉。”他进一步指出，“章学诚最反对的，则是一个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当中，既不能抒一独得之见，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邓先生说这些，当然都是为着说明自己的治学守则。所以邓先生接着便说，自己一直是以此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对

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作风深恶痛绝。我以为，这篇短短的《自序》，完全可以看作邓广铭先生对自己一生治学的最中肯的总结。

邓先生的自我评价，是诚恳的。他平生从事学术研究所追求的，确在“一独得之见”、“一法外之意”。正因为是这样，他才在论学时无牵无挂，心胸坦荡，保持着学术见解上的独立与学术品格上的自尊。这种独立与自尊，既是为着追求学术上的“真”和“是”，所以它从来没有流变为固执己见的自以为是。邓先生对待自己的学术见解，和对待别人的学术见解一样，采取的是同等严格审视态度；一旦发现自己在哪个问题上论断有误，便毫不迟疑地立即加以纠正。凡他人（即使是正在激烈与之争论的对手）能够指出其错误时，他从不文过饰非，而是虚心考虑，认真改正。在收入《治史丛稿》的许多文章里，经常可以看到他改正自己已往某些论说的事例。而且在这样的改正时，其态度之诚恳、自我要求之严格，均足可为后学的范式。这里只举一例。他在和人辩论岳飞《满江红》真伪的文章发表后，得到老友臧克家先生来信的热情支持。臧先生在信中，也就“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提出了和邓先生不同的解释。臧先生指出，“尘与土——风尘奔波之谓，非视功名如尘土也。”如释作“视功名如尘土”，则与慷慨激昂的词意不合。邓先生接到信后，立即作复，说读后心情畅快无比。他表示完全接受臧先生关于“尘与土”的解释，尊臧先生为自己的“三字师”，并且宣布自己有关此意的一段文字应全部作废。说到做到，他在重新发表那篇原作时，特意把有关“尘与土”的一段文字框起，并注明自己解释得不对，接受臧克家先生的指教，另改写一过。接着便把改正过的文字写上，让人两相对照，看明白正误的区别所在。如此胸襟，不正是体现出了“唯

真理是求”的高尚的学者之风吗！

邓先生走了，但是，他为追求真理而独立探索的学者风范，必将是一切正直学人永远尊奉的典型。邓先生的“不求强同，不惧独异”的治学精神，无疑是我国学术界当前需要大力提倡的品德操守，也无疑是今后我国学术界永远应当发扬的优良学风。

1998年6月8日于京郊寓所

纪念中国宋史断代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 邓广铭先生

陈 振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一代宗师邓广铭先生，1998年1月10日离开了我们，值此邓先生诞辰九十二周年之际，再次思念起邓先生对中国宋史研究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自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之初，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史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逐渐为中国学者所认识和运用。自二十世纪之初至二十年代出版的各种中国通史已有十种之多，学者们竞相以各自的新史学观点研究与解释中国历史，其中虽有名家，但是，没有一部是比较完美的中国通史，原因就在于各个断代史的深入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开展。尽管研究各个时代的文章已有相当数量，但就总体而言水平不高，而且也还没有专门研究某一断代史的专家，学者们常常是上自秦汉，甚至更早，下至明清，兴趣之所至，或视需要选择题目，大多数文章没有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许多文章只是介绍性的。宋史研究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论著也日益增多，其中也有一些是名家，极少数的论著水平也很高，但宋史研究总的情况，在各个断代史研究中更为落后，也没有一个是专门从事宋史研究的学者。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四十年代中叶总结当代

史学研究发展的情况时所说:

(中国)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专门从事某个断代史的研究,邓先生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邓先生还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就开始发表宋史研究的论文,从此开始了邓先生一生专门从事宋史研究的学术生涯。差不多同时,张荫麟先生也开始专门研究宋史,但在1942年即英年早逝。到四十年代的中后期,邓先生在宋史研究领域不仅取得了最高成就,而且与张荫麟先生等,为宋史的断代史研究开山奠基,因而受到前辈知名学者的称许,顾颉刚先生在总结三四十年来各断代史研究的概况时,对宋史研究的评价是:

宋辽金元史的研究,……这里先叙述宋史研究的成績。《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两代欲为之改作者极多,或其书未成,或已成而不脛人望,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证》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正》,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

铭先生而已。其论文有:《南宋亡国史补》、《〈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①。

陈寅恪先生在其后不久,也说邓先生“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至四十年代中叶,正是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南宋的爱国将领、诗人、学者岳飞、辛弃疾、陈亮等,成为邓先生的主要研究课题。

五十年代初开始,由于当时学术环境的关系,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本来就为数不多,这时又纷纷转而研究其他历史,邓先生则仍然始终如一地继续专门研究宋史。

1953年,北京大学开始由四年制改成五年制,历史系成为文科首先试行五年制的单位。这是一种近似大学与研究生一贯制的学科,学生在一二年级时学习基础课,二年级下学期撰写学年论文,三年级开始选定导师学习专门化的专业,并进行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撰写毕业论文。历史专业分为几个专门化,中国古代史专门化下又分为几个专段,邓先生是宋史(含辽、金史)专段的导师,每年有数名学生学习宋史,邓先生在这个时期提出了著名的目录学、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四把“钥匙”,使学生们受益非浅。邓先生对学习宋史的学生布置作业,与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也大体相似,培养了数十名具有初级研究能力的宋史研究的后

^① 《当代中国史学》下编,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第72册,1990年。

^② 《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备力量。但是,由于学生毕业后所在单位的工作需要,以及宋史研究需要较好的图书资料条件等种种原因,后来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专门从事宋史研究。但他们不仅学习了邓先生严谨的学风,重视史料的鉴别,依据科学理论对史实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以邓先生为榜样,不为潮流所吸引,毕业后专门从事宋史研究,积极为宋史研究添砖加瓦,为该学术领域的发展尽绵薄之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宋史的断代史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他们是推动宋史研究发展的基本力量的组成部分。我是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二年级时由于写学年论文《北宋的河患》(未发表)而受知于邓先生,三年级起从邓先生专习宋史,邓先生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毕业后虽然变换过几个工作单位,却有幸成为能一直专门从事宋史研究的邓先生的学生之一。

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使从事宋史研究的学者终于有一个自己的学术团体,邓先生和陈乐素先生出任正副会长。当时《文汇报》的报道说:“来自全国的六十多位宋史研究专家共聚一堂,切磋学术。”但正如邓先生所说:“说到会的六十多人都是宋史研究专家,不但我们不敢当,而且也与事实不相符合”,而且是“来自五胡四海,大多互不相识”。除了其中一部分是专门从事宋史研究或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以外,大部分是通治其他时期历史的学者。邓先生对当时宋史的断代史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后认为:“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他号召大家“同心协力奋勇前进”,“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

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①。

邓先生的登高一呼,不仅与会的原先即是专门研究宋史及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更加努力,而且与会的原先通治其他时期历史的学者,后来也大多转为专门从事宋史研究或以宋史研究为主。这次会议以后,不少没有参加会议的学者,包括曾经研究过宋史前些年又转而研究其他历史的学者,也都相继加入宋史研究者的行列。

邓先生不仅早年为中国宋史的断代史研究事业开山奠基,而且一生都在宋史研究的不同领域开辟草莱,引导宋史学者不断深入研究宋史的各个领域。现略举数例。

由于宋代的典章制度复杂混乱,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谈到宋代的官制时,就曾说:“名同实具(异),交错难知。”^②因而成为后人深入研究宋史的障碍。邓先生在四十年代末叶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是宋代典章制度研究的开创之作。但是,由于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环境,这项宋史研究的基础性研究领域,无形中停止了。直到七十年代末叶,邓先生的弟子才又开始研究宋代典章制度,不久即成为一部分宋史学者的主要研究课题,现在已是宋史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的领域之一。这不能不归功于邓先生当年将宋代典章制度作为他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以及后来将之列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四把钥匙”之一的远见卓识。

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的土地关系等课题,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但是,宋代的土地关系问题,几乎无人问津。这和

^① 见邓广铭先生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所写的《前言》及所引《文汇报》的报道。

^②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65《百官表总序》。

1954年出版的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书中提出了庄园制由晚唐到两宋“已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形态”。从此，唐宋盛行庄园的学说广为流行，中学的教科书、博物馆中的历史陈列、其他历史著作也采用了唐宋庄园制的说法，没有提出不同观点的论著。邓先生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之后，1963年发表《唐宋庄园制度质疑》，从理论到史实进行了全面商榷，否定了庄园制度说，指出这一时期实行的是租佃制。该杂志次年刊出了反批评文章，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本来是有可能展开讨论的，也许是该杂志不想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加上不久之后的十年间，学术讨论已全部停止，由邓先生开始的宋代是租佃制还是庄园制的讨论，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又真正展开。所不同是，已经没有坚持庄园制说的文章，有的只是否定庄园制说及深入研究宋代租佃关系的论著。今天，宋代租佃制说已得到文、史、哲各界学者的普遍认同，邓先生当年倡导此说，功不可没。

北宋中期新儒学“宋学”诸学派的产生，对当代和后世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深受学术界的重视。但是，长期以来却将“宋学”学派之一的理学派等同于宋学，而将宋学的其他学派排斥于“宋学”之外。

邓先生于1984年在《略谈宋学》中，首先指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然后论述了宋学的产生，各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思想家的活动，以及受佛、道学说的影响等。并对理学形成学术流派，在部分士大夫中形成一种言必谈修养、说性命的风气，已是南宋高宗在位的晚年和宋孝宗即位初期的事等问题都做了精辟的阐述。

这个通常是哲学史界学者讨论的问题，此后便成了一部分

宋史学者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十多年来，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在宋代的发展情况已基本清楚，这个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宋学即是理学”的不正确地命题，至少已首先在宋史学界得到澄清，宋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也因而得以能比较全面而正确地进行阐述。这是邓先生晚年所开辟的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

近二十年来，专门从事宋史研究和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学者增加了数倍，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宋史研究在我国史学界的各断代史研究中，已不再是落后的，在国际上也是高水平的了。值得欣慰的是，作为宋史泰斗、一代宗师的邓先生，在晚年看到了他当年号召宋史学者努力奋斗的目标，已经达到。他为之开山奠基、又不断开辟新研究领域的宋史研究事业，正欣欣向荣地迈向二十一世纪。

师恩难忘

——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张广达

元月11日，北大历史系发来电子信件，告知邓师去世的消息。此前，我已知道邓师不幸身罹绝症，卧病医院数月。邓师年届91岁，回生乏术，已在不免。然而，预料中的事情一旦成为现实，我依然受到巨大的震撼，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己。

稍稍平静后，我给邓小南师妹发回一封短短的吊唁信。发完后我怔怔地守在电脑屏幕前：邓师走了，生顺死变，又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永别。我认识邓师是在1952年暑假之后。45年来，我身受邓师的知遇之恩，难以为报。而最近十年我羁身海外，不得亲聆教诲，更未在邓师临终前略尽心意，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1952年夏，教育部依照苏联的模式，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调整。我原在燕大历史系读书，院系调整后成为新北大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生。1953年毕业留校，任世界古代史胡钟达先生的助教。当时，胡先生住中关园一公寓，和邓师住上下楼。我经常到胡先生家，不时碰到邓师。胡先生的母亲为了清凉去火，使用沏过又晾干的茶叶装枕头，邓师经常亲自托钵把晾干的茶叶送下楼来。

在当时，邓先生属于“老教师”之列。所谓“老教师”，

除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治欧洲中世纪史的孔繁霖先生年逾60以外，其余教授53年时都不老，向达先生52岁，杨人楩先生49岁，周一良先生40岁。当时历史系很多名教授济济一堂，皆一时之选，真可谓郁郁乎文哉。那时我23岁，学无根底，不谙世事，但出于我的价值取向，我对这些老教授自有一种亲和力。那时邓师年在四十五六岁之间，身体健康，神采奕奕，对我非常亲切，蔼然有长者之风。有一次我与胡先生告辞后，和邓师一起走出胡先生家，邓师主动邀我到楼上他家坐一坐，把他刚刚收到的新刊《岳飞传》（该书初版）签上名送给了我。

在我第一次去邓师家，邓师就谈到，治学要打好根底，“根深才能叶茂”，至今铭记不忘。邓师还谈到，研究历史，不妨写些关键人物的传记，这是很好的入门途径。我注意到，在宋史研究中，邓师不仅下大功夫研究制度，如宋代职官，也认真研究宋代几位关键的人物，通过个案深刻剖析宋代的历史。他一再增订的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人的传记，从政治、军事、文化、事功等多方面加深了宋史研究的深度。在海外，刘子健先生之研究欧阳修等，也是同样的治学路数。

但那时我还不知治学为何物，费了不少时间翻译苏联《古史通报》、《历史问题》等杂志上的佶屈聱牙的文章，充分表现出我分不清什么是有长远价值的学术，什么只是一时的热闹。自从与邓师接触以来，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研究世界史不能脱离中国史。邓师的博学多闻和妙趣横生的谈话对我极具吸引力，他对我讲过在北大读书时，与张政烺先生同上姚士鳌（从吾）先生课时的轶闻；对我讲过当年北大教员可以随时进入校长办公室而与胡适谈话，平时也总有不少人在这里高谈阔论；讲过郑天挺先生任北大总务长时的干练清正等。

逐渐地，邓师成了历史系重业务、轻政治的典型。他在讲课中曾向学生提出过，地理、职官、年代、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为此多次受到会上会下的点名批评，邓师被攻讦的最大理由是，“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其实，这并不符合邓师的本意，邓师是当时历史系发表论文最多的先生之一，他常常为进行对比研究，为开阔思路而求助于理论学习，常常重复当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话：有了许多制钱，还要有把这些制钱贯穿起来的钱串子（指理论）。1988年，邓师为日本宋史学界发起的《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同朋舍，1989）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谈到：“认真说来，仅仅借助于我所列举的四把钥匙，以及前代学者所提的文字、训诂等，作为现代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工具，也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无不与历史科学的研究有极其密切的关联。在这些学科方面的造诣之深与浅，知识面之广与狭，对于一个史学家的论著质量之高与低，精到与粗浅，关系也极要切”。由此可见邓师前后一致的治学观。今天，已经不是在举办白专道路展览会上为邓师的“四把钥匙”单辟专栏的时代了，邓师的教导是正确的，学历史的人，既要学理论和尽可能多掌握治史的工具，也要像他那样开拓视野与胸襟，与时俱进。

邓师过去与胡适、傅斯年有较深的共事关系。在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运动之后，他仍然表达不合时宜的学术见地，当然易于被人抓住辫子。难得的是他表里如一，不管他人态度如何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圣人周公尚不求备于一人，谁也不能要求他人完美无缺。邓师令人尊重的地方在于他性格鲜明，不因时因势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在运动频仍、批判不断的

日子里，邓师的想法有时不免天真。例如，1956年规划向科学进军的时候，执著的事业心使邓师很兴奋，他真的认为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听到对专家学者即将有一番优越的待遇，邓师也很感兴趣。我当时正给一位在历史系教苏联史的苏联专家当课堂翻译，邓师便向我打听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对苏联院士享有的某些待遇大为赞赏，希望中国的专家也能像苏联的专家那样受重视。邓师尤其赞赏苏联政府给院士住宅门口镶嵌上亮晶晶的、写上姓名、住址、职务的大铜牌。邓师攒了些稿费、又听到了高级知识分子可以享受某些特殊待遇的传闻，他甚至于想用稿费给自己买辆汽车。在当时，他老先生可谓异想天开了，但这就是邓师。

1957年6月8日，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前此，我因狂妄无知，说了一些被认为“违反六项政治标准”的言论，受到若干场揭发批判，于翌年（1958）2月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为右派，又于1959年十年大庆前夕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在人人怕犯政治错误的紧张氛围中，谁都知道“右是政治立场问题，左是思想方法问题”。所以，无论对“戴帽右派”，还是对“摘帽右派”，都是以保持距离为明智。为了不给别人带来麻烦，我没事绝不接触任何人，遇见熟人，能绕道走就绕道走，能假装看不见就假装看不见。令我惊异的是，邓师对我的态度不改先前。我在下乡劳动或下放锻炼中偶然回校，邓师碰到我，总是以长者的关怀跟我说几句话，而在这几句话中传达着更多的言外之意，令我在人间冷暖对比中，对邓师给予绝境中的青年人的关怀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就在这时，我耳闻邓师对别人讲：张广达是个人才，应该给他安排工作，这样既利于他的改造，也让他发挥一些作用。

此事已过去近四十年了，任何时候想起来，我都感动不已。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饥荒遍及全国而强调劳逸结合，政治气候相对缓和。我向系领导表示愿意从世界史转向中西交通史，邓师听说后，当即表示支持。我后来终于从世界史转向中国史，完全是邓师支持的结果。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右派的任何关照都可以在适当时刻上纲到丧失政治立场的高度，何况邓师有过与胡适、傅斯年的共事关系，这本身就是政治辫子，可被罗织罪状，招致灾祸。邓师为了爱惜年轻人而忽略了自己可能遭受的连累，这种无畏的襟怀令我永远敬重。邓师不仅对我，对其他与我情况相似的年轻人也深加爱惜。有一位53年入学的的女学生戴静华，57年被划右，邓师对此非常惋惜，说：“可惜这个人才”。邓师似乎为此而受到过批判，被迫做了重业务短政治、重才不重德的检讨。邓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明知对他看重的青年人的热忱爱护可能为他招致麻烦，但他置之度外。在艰难困顿中，我既从他那里得到了师辈的温暖，也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我今天所以也能坚持自己的某些信念，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邓师人格的感召。人活着就应该像邓师那样，如果是正确的，就应当不计个人得失而予以坚持，不当随风摇摆。

1969年11月，北大教职工下放江西南昌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这里原是一处劳改农场，靠在枯水季节造堤围湖，与鄱阳湖底争地而成的圩田。由于土地本是湖底淤泥，所以干旱时坚硬如砥，雨天一下子变成黏稠的泥塘。遇上连雨天，泥深逾尺。人走在这种胶泥塘中举步维艰，即使穿着统长及膝的胶靴，深深的胶泥也把胶靴牢牢地吸住，往往拔出来的是脚而不是胶靴。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北大数千名教职工受命建立干校，走“五七道路”。干校实行军事编制，由军、工宣队领导。

邓师和我被编入八连的后勤排，邓师放鸭子，我在蔬菜班种菜，师生情谊走向更深厚的一步。那时邓师已年过花甲，头戴草帽，脚穿胶鞋，挽着裤腿，手里拿一根细长的竹竿，在暑气蒸人的田野上放鸭子，条件极其艰苦。像他这样的老教授在全干校也没有几人，可是邓师秉持素有的开朗乐观，能吃能睡，不改本色。开饭时，邓师拿着一只不小的搪瓷饭盆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吃满满的一碗，有时还加上些。睡觉时和大家挤在大统铺上，倒头便着。一段时间内，我和他并排挨在一起。我的工作主要是从厕所掏粪，把粪挑到菜地的粪坑里“沤肥”（发酵）。当我挑着粪担来回时，常和邓师聊几句。师生关系越来越亲密，有时甚至开开玩笑。鲤鱼洲夏天奇热，冬天奇冷，冬天的条件更加艰苦。邓师和我以及绝大部分下放教工都得了尿急尿频症。这些，邓师和我都一起熬过来了。

1978年，邓师任历史系主任，当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师提出“实事求是”四字作为他的办学方针。他对“文革”中历史系人才凋零的惨象有切肤之痛，不顾年事已高和脑血管硬化而致力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网罗全北京市的优秀教师为历史系学生开课，并提出大、小通史方案。自历史系主任卸任后，他又着手筹办“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着眼于出人才、出成果，这是老先生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着。从邀集人发起，到“中心”逐步成形，全由邓师亲自擘划操持。中心建成以来，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方面成绩非常突出。今天北大历史系中古史后继有人，凝结着邓师的心血。说来惭愧之至，在“中心”筹建过程中，我未能为邓师分劳，迨“中心”建成后，邓师却让我忝任副主任。“中心”的很多事情我并没有做好，辜负了邓师的厚望。

我生平第一次正式讲课是在1978年，担任“中国通史”

后半段，这是邓师亲自安排的。1981—82年我在荷兰莱顿汉学院访问，其间到了英、法。回国后，邓师亲为我主持了一次全系师生出席的讲演会，让我报告国外见闻。我还记得，邓师也为我主持过学术报告会，我当时的讲题是“碎叶城今地考”。所有这些安排，都渗透着邓师提携我的苦心。他说：“过去京城名角都需要人捧场，学人的成长也一样。”邓师对他垂青的学生，非常重视为之创造成长的条件。有一次我对马雍学长谈起邓师，马雍学长立刻说：“邓先生是我的恩师。”

随着改革开放，回忆和记述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的书籍、文章多了起来。读了这些著述，我方才醒悟，邓师正是本着陈寅恪为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的精神提携后进，正是发扬胡、傅秉公处事的精神培养学子。我感到邓师身上有胡、傅两位先生的作风的影子，包括不怕开罪人的作风。

1987年春，我和邓师同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大致同时到了日本。从东京到京都，我亲眼看到了日本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宋史学者对他的崇敬。1988年，日本宋史学界筹划出版刘子健先生祝寿文集，序言就是请邓师写的，序言前后印上邓师手迹，然后附上英、日译文，充分体现了国际学界对邓师的敬重。我为邓师为中国史学争得的荣誉感到由衷的骄傲。

1989年夏我来到国外，在巴黎一呆八年，来美又将两年。我一再拂逆邓师促我返校的心意。然而，邓师并未对我生气。对我的关心爱护一如既往，有增无已。迨知邓师入院查出绝症，我心知此去凶多吉少，数月来惴惴不安。获悉邓师辞世的噩耗，我终于面临了无情的现实：每每于我艰难踟蹰时刻而雪中送炭、向我伸出温暖之手的恩师永远离开了我。

我生也笃钝，学无所成。邓师生前，每次得知我有点滴成

就而由衷喜悦，但也为我的笔下枯涩老写不出大块文章或专著而内心起急。他通过各种途径予以督促，希望我早点儿拿出著述。作为学生，未副恩师厚望，我十分惭愧。但可告慰老师的是，我一天也没有荒废学业，只是由于根不深，没有做到老师要求的叶茂。十年来，在海外授课的同时，补了补中外基本典籍，略略考察了欧陆和美国的治学路数。我行年六十有八，余生无几，唯有以邓师的期待督责自己，尽心致力于撰述，以报邓师的恩遇。

1998年5月20日

淳淳的教诲，无私的帮助

——裴汝诚

怀念敬爱的老师，秉笔的手都在颤抖，十分难写这缅怀的文字，因为依然殷望着像过去一样，在老师膝前禀报学习疑难，聆听教诲。虽然这已成回忆，但回忆中的老师形象更加崇高，言传身教，永志不忘。

七十年代初，因为整理《宋史》的缘故，我和挚友王修龄先生（当时任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今移居香港）受师友同志委派到中华书局与会。休会其间，我们先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拜访邓先生，被告知在长辛店编书，待赶到长辛店，又告知返家休息。我们颇感不安，先生难得休息，又要被我们打扰。见到先生，说明校点《宋史》事，请先生指教。先生不顾疲劳，放弃休息，和我们进行了长谈，先生说：

《宋史》版本源流简单，应以百衲本为底本。

《宋史》修撰的不好，各种错误很多，主要应靠他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都要查，文集要用，总之，要多查书，不能只靠版本，有些错误各种版本

都一样。

我们向先生说，这次校点二十四史，强调版本对校，先生立即说：

这要实事求是，二十四史各史版本情况不同，写作修撰不同，怎能一律对待？整理《宋史》一定得多查书。

以后几年的工作实践证明，邓先生的意见完全正确。《宋史》百衲本与局本、殿本对校出的异文，百分之九十九是百衲本对，而三本相同但实际均误之处颇多，只有靠用他书校勘方得改正讹、舛、衍、脱。先生的指导，使我们少走弯路，而提高了校点质量。

校改要慎重，对于典章制度的改字更要慎重。譬如宋代有“指使”，这不同于“指挥使”。狄青就曾做过“指使”，千万不要改为“指挥使”，这个“挥”字不能加。

老师的博学、真知，使当时年纪尚轻的修龄先生和我钦佩不已，以至在八十年代初修龄从香港返沪谈及此事时，仍然表示衷心敬佩。而更为重要的体会是，先生当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是深远的，使我终身受益。而对于我们初涉整理工作的青年、中年学生的爱护和教导，更是至高无价的。

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先生取出七册百衲本《宋史》交给我，并说：“这是我初步校过的几册书，供你们参考。”我已记不准确这七册邓先生手校的《宋史》具体内容，大概有《食货

志)、《河渠志》等。这使我们喜出望外,同时也使我们完全折服了。这种全心全意为了整理好《宋史》而毫不吝惜的精神太崇高了。当我们向中华书局主持二十四史日常工作的赵守俨先生叙述这个过程时,赵先生也显得很激动,并告诉我们说,邓先生有一部已排出校样的索引,因66年搞起运动而没有印行出版,你们可以问问邓先生,如果他同意出借,对你们整理《宋史》十分有用。我们不大好意思地向邓先生提及此事,没敢说及借用。可是我们尊敬的老师马上表示:你们可以向中华书局借出,我这里没有校样,这个索引对你们或许有用。岂止有用,是太有用了。在《宋史》点校本的几千条校勘记中,凡是有用文集集中的墓志行状校勘的,绝大多数都是借用了这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把自己的手稿和等待出版的著作稿提供出来,把别人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这是何等可贵?敬爱的老师,您交给学生的不只是七册百衲本《宋史》点校手稿和一部《索引》,您交给我们的是一种比金子还要贵重百倍的学术道德。人们常以“道德文章”四个字赞誉学者,我体会,所谓道德,对于学者来说,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当是学术道德,而在这方面,我的老师是崇高的,伟大的,像他在学术上是一代宗师一样无比辉煌。

二

继点校《宋史》之后,我和师友同志们又整理《续资治通鉴长编》。从中华书局得知,此书杭州大学徐规老师曾动手整理,徐先生为了支持我们集体整理《长编》,欣然把课题转让给我们。此后,我到北京大学向老师汇报整理《长编》事宜,得到老师肯定,并叮嘱我以下数事:

《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宋刻本,五朝,趁这次整理之机对校了它,这种本子不是一般读书的人能够见到的。

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长编》之后,改动了人名、地名,改的又不统一,甚至在一页上,前面改了,后面又没改,很不统一。他们这一改,就和《宋史》、《宋会要辑稿》等未经改动的书籍不一样了,人们用起来很不方便,有的还会用错,把一个地名,因译文不同而误作两个地方;把一个人误作两个人。甚至有的大学者也把一个山名误作两个,还反复考证。你们趁校点的机会把它改回来,会给后人一个极大的方便。

我们点校了一个阶段之后,为了查找一个人名或地名,往往要查找不少时间,有的同志就提出是否不改了(也有的为了避免改错,改的不统一等等),我向邓先生汇报了,邓先生说:

搞研究工作怎么能怕麻烦!

你们花费了时间,可就方便了很多的读者。

《长编》这样的大书,要改一遍是很不容易的,你们是个集体,大家分工,做好这件事,就是发挥优势。即使有少数地方查找不到,尽了力,也可以了。

我向师友同志们传达了邓先生的意见,几易寒暑,大家共同完成了《长编》校点工作,并尽可能地将清人改动的人名、地名改回来,与宋代其它史籍恢复了一致,不仅方便了中青年宋史学者使用,就是老年学者也感到标点本《长编》使用起来方便得多。当今天人们对此给予肯定时,我们衷心感谢邓先生的及

时指教和循循善诱的教诲，使我们能够坚持做完这项工作，尽管它并不十分完善。

从整理《宋史》，到点校完《长编》，前后历经十五年以上，这中间得到老师多方教导，而一以贯之的则是“学术无私”和“对读者负责”。多少年来，每念及此，无不肃然起敬！我一定不辱师教，禀承教诲，身体力行，死而后已。

邓老精神 与世长存

——李范文

记得八十年代中，《光明日报》记者王广华同志在《内参》上报了西夏研究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1909年沙俄大佐柯兹洛夫从我国黑水城掘去的数以千计的西夏文献，至今尚未整理出版。二是宁夏是西夏的发祥地，银川是西夏的故都，这里遗留下西夏丰富的文化古迹，她应是西夏研究的中心，但因经费困难，影响这一学科的发展。这一报道引起了中央和地方有关领导的重视。不久，高教部第二司给我来函，让我去北京大学找高等院校古籍整理指导委员会，他们可以帮助解决。宁夏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法光召集我院领导和宁夏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开会研究，程说：“宁夏再穷，也要拿出钱来与苏合作，把这批文献整理出版。”1989年春，终于请来原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所长彼得罗先和副所长克恰诺夫，经过多次谈判终于签订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协议书。后因故搁浅。

1992年5月，宋史学会在河南开封召开，邓广铭教授不仅是宋史学会的会长，而且也是高等院校古籍整理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国务院古籍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决定参加这次大会，请求他的支持和帮助。会上我听了他的讲话，深深感到他不仅是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而且是一位敢于直言、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一次，利用开小会之机，我坐在他的身

旁，讲明我的来意。他说：我已经老了，高校古籍指导委员会我不再参与负责了，但是我可以帮你们说话。初次见面，一位长者、蜚声中外的宋史专家，却是那样的真诚、热情，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会后我接宋史学会秘书长范荧同志来函：上海古籍出版社东方文化部副主任李伟国同志，从苏联获悉，愿同宁夏合作共同整理出版西夏文献，同时我给邓老致函，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没有想到他接信后，不顾年迈，满腔热情为我奔波，并在国务院古籍领导小组会上大声疾呼，希望大家支持，一定要把这批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搞回出版。

7月，宁夏大学为了争取经费，委派古籍研究所负责人龚世俊副教授陪同我赴京感谢邓老，走访有关单位。事先我给国务院古籍领导小组组长匡亚明致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马欣来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建议我们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我当即与该社魏国贤社长进行了联系。8月底上海古籍出版社派总编李国章、东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李伟国来宁会谈。9月1日，达成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拟投资一千万与宁夏、苏联三家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这一协议的签订，与邓老的奔波、呼吁分不开，没有他的支持、提拔，没有他那种为祖国文化事业竭尽全力的执著精神，关心大西北边陲文化建设的高度责任感，不可能达成那样的协议。这种不顾耄耋之年，满腔热情，大声疾呼的态度，怎不感人肺腑！

当我接到邓先生的来函和见到他在国务院古籍领导小组会上的发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激之泪。这种感情如果未经坎坷，不是饱经风霜、挣扎中的幸存者，是无法体会的。

1992年12月，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王天顺教授主编的

《西夏战史》杀青后，希望我向邓老致书请他题写书名，不久收到他用毛笔一丝不苟的题字。这种有求必应，关心奖掖晚辈的精神，我将永远铭刻在心。

在邓老的身上，体现了老北大的精神。这在今天尤为可贵，愿这种精神与世长存！

1998年3月29日

忆邓广铭先生对青年教师的关怀和培养

——马克圭

邓广铭先生是我的史学启蒙老师之一。我于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长达四年的中国通史课中，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的唐宋史，就是由邓广铭先生讲授的。记得在这个课上，邓先生除了发给我们他自己编写的讲义外，还发给我们一些参考材料，而这些参考材料对我的学习启发很大。我当时对史学并无什么基本知识，只是在中学时杂七杂八地读过一些文史书籍，但却心高气傲，满以为自己了不起。邓先生所发的参考材料中，我记得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几篇，一篇是《卖炭翁》，这首诗自己还算是读过的，还有一篇是《阴山道》，则自己根本就没有读过。可是再一看陈寅恪所做的笺证，则真可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因为自己一向好读书，不求甚解，白居易的新乐府，自以为它明白易懂，不知道其中还有那么多的学问，“回车叱牛牵向北”可以和“欲往城南望城北”联系起来，说明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而《阴山道》中的“纡遶敦肥水泉好”一句的笺证，更把我吓了一跳，要读懂几个字竟有那么大的困难。当然我从此还知道了以诗文证史的方法，虽然并没有使用过它。这一学期邓先生的课，对我可以说起了“棒喝”作用，逐渐知道要老实地学习，不能一知半解，望文生义。

大学毕业后留系任教，系里让我教世界史，因而和邓先生的接触不是很多。在我们这一帮年轻助教的心目中，邓先生是严师，多少有点令人望而生畏。当时学校里对年轻教师上课的准备工作，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般大学毕业后要当三、四年助教，要把整个通史课再跟着上一遍（跟随上整个通史的办法不久便取消了），在这期间，还要就你所上的那一段的课程内容，写出相应的讲义，然后在教研室全体教师面前试讲。这个试讲，实际上就是考试，如果通得过，那你就可上讲堂，给学生上课，否则仍然回去准备。教研室的教师，差不多都是我们这些年轻助教的老师。所以试讲给我们的压力很大，而教研室主任的态度，对试讲是否成功，尤为重要。这样，教研室主任是否严厉，也是我们十分注意的问题。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是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邓先生是主任。有一天他兴冲冲地去试讲了，回来后无精打采。我偷偷一打听，听说邓先生在听课时专门找他读错的音和板书上的错别字，据说有十好几个，那结论自然是你字还不认识，如何能上课呢。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我想我的这位同学学习还是不错的，总不至于连字都不大认识，邓先生未免小题大做，有些不以为然。又一想幸亏我没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因为我一向是“秀才识字识半边”，几乎不怎么查字典的。如果要我试讲，经邓先生这么一考，还不知道要出多少问题呢。现在为人师多年，方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当教师的不能念错字，更不能写错别字，这是个起码的要求。可是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做学问的基础训练不够，要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还真得经过一番努力。邓先生当时从这个问题入手抓年轻教师的培养，是完全正确的。

五六十年代是革命的年代，校园内运动不断。58年下放劳动，59年反右倾，60年热量不够的问题就很明显了（即吃

不饱饭，不免时常饥肠辘辘），不过这时运动反而少了，系里又在抓我们这些年轻教师的培养问题，记得有什么向老教师学习，对号入座等口号，我们心里还真感到高兴，因为可以名正言顺地学习而不再老怕被当作“白专”典型对待了。不久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又发生了轩然大波，听说邓先生给他们开了一张书单，大概包括《资治通鉴》、前四史之类（详细内容已记不清），说是念完了就可以考虑升讲师。可是大家一算，即使每天不停地念，一天念十个小时，十年也念不完，于是不禁愤愤不平。我当时当然站在中国古代史的年轻教员一边，想邓先生又在给他们出难题了。后来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不得而知，很可能的是根本用不着解决，因为不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示开始贯彻执行，校园里又要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年轻教师的培养工作也就无人提起。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感到邓先生的要求自有他的道理。我们这一代人学习的时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革命、运动较多，而学习的时间较少。学习时又老赶上大批判，强调的是要学好马列主义理论，再加上改造世界观。历史学的基本功是很差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同志，不要说缺乏金石、甲骨、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就是基本的古代史学著作、原始资料，也是没有读过几本的。邓先生从抓青年教师读基本史学著作和基本史料来进行培养，正是补我们最基本的不足之处，这是完全正确的。在那时敢于提出这样的要求，还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因为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便很容易被扣上把青年教师引向何方的帽子，这可是“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呀。我不敢肯定邓先生开的书单是否过多，因为并没有看见过。可是他所坚持的方法是对的。读中国古书，讲究要能够背诵，这是邓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的基本功。我们当学生时也老听说某先生能把前四史都背下来，后

读叶圣陶先生为《十三经索引》所作自序，云“幼年习五经，背诵于塾师之侧，均能上口”，也不禁大为羡慕。现在虽然二十四史等可以通过光盘检索，对背诵的要求已不像往常那么认真和必要。可是熟读一些基本史料，还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功。否则连考虑问题的基本材料都没有，还谈什么研究呢。

“拨乱反正”之后，邓广铭先生出任历史系第一任系主任，为重振北大历史系往日的雄风，为全国史学界的开拓进取，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当时邓先生做的对我们影响较大的一件事，就是他采取断然措施，不让中国史专业我们这一代教师上课，而宁愿另外从其他学校临时聘请一些资深老先生来代课。我们这一代教师当时虽然名义上还是助教，可是都是人到中年，有差不多二十年教龄的老助教了，原来大部分也都上过各种各样的课程，也已是教学的主力。现在突然不许上课，感情上就接受不了。而且现在上课与否，肯定是和开始进行的提职提薪相联系的，不能上课大概就难以晋升。堂堂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要请人来讲基础课，也未免丢人。所以这一措施引起的反对意见可就大了。中国古代史的同辈纷纷发牢骚，说怪话。我们当时把邓先生的这一措施戏称为“邓恭三变法”（和邓先生研究的王安石变法相对应），而且预测这个变法大概也要以失败告终。可邓先生自有他自己的想法。记得一天他在二院门口对我说，你们年轻人多少年没好好念书了，现在给你这样一个念书的好机会，就应该好好利用，回家去把书念好，还有什么意见。我当面不敢和邓先生辩白，可心想你大教授如何理解我们的苦衷。而且我是教外国史的，邓先生当时并未说世界史的教师也都不许上课，所以我也用不着和他辩白。这一“变法”似乎也没有实行多久，好像中国古代史的中年讲助不久都开始上课了。事隔多年之后，有一天我和邓先生偶然论及此

事，他却说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他说当年采取此一措施，就是考虑到“四人帮”的破坏太大，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太重，所以给大家一个集中的时间补课。在他辞去系主任，由周一良先生接任系主任后，他曾建议立即让青年教师开始上课，使大家各得其所。

这三件小事，都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属于道听途说之流。但给我的印象，却是邓先生是一位严师，最好是敬而远之，免得惹麻烦。后来我在系里也担任了一段时期的工作，和邓先生的接触多了。遇有系内教学、科研大事，总要到先生处走走，听听意见，逢年过节，也要去坐坐。和先生谈古论今，臧否人物，或说儒林掌故，或述国家大事。我的话不多，他的话很多。只要提起一个话题，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思维敏捷，记忆准确，风趣幽默，充满机锋。和邓先生谈话，真有如坐春风之感。有时我有不同意见，也会说出来，先生并不反驳，并不给人以睚眦必报之感。有一次为了发挥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内同志们的积极性，曾讨论过把历史系和中心分开管理，邓先生在会上提出要把系里的两位先生的编制转到中心去。我当即予以反对，表示这是坚决不能同意的，邓先生也就不再坚持了。这时我感到邓先生十分和蔼可亲，并不老是板着面孔，过去的印象是错误的。

后来有一次和小南谈起邓先生，小南说邓先生十分不喜欢乡愿，我这才对邓先生的人格风范有进一步的了解。邓先生不喜欢媚于俗的乡愿，在原则上，在学术上，他决不妥协，不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所以老有“惊世骇俗”之举，有时会吓人一跳；但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事业，为了史学，为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古史中心，而并不是为了其他。如不涉及原则问题，邓先生是个十分可亲的长者；但如事关原则大局，则邓

先生从不含糊，不怕得罪人，也不怕被人家说三道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乡愿太多了，尽是一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人。我们纪念邓先生，我感到特别要学习他这种不做乡愿的精神，把我们北大历史系，把中国的史学进一步办好，以慰邓先生在天之灵。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追怀邓广铭先生

高增德

我与邓广铭先生的亦师亦友之交谊，若从1980年算起，至少有十七个年头了。在这近二十年中，见面有四次，通信有四封，可算是走近先生的观察。

在我主编《晋阳学刊》的同时，策划了一项抢救中国现代学术史活资料的项目，即通过约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丛书来实现以上的构想。当时，所以产生这个构想，主要有感于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繁接踵地进行，一大批由旧社会过来的著名学者，尽管他们早在本世纪的前半期已经成就斐然，但却只能在新的政治风浪中被动浮沉，而在学术领域里则变得无所作为，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或到政治上得到平反解放时，他们的生命已到了黄昏之年，即使有鸿鹄之志，恐怕也难作千里飞行了。于是想到了抢救学术史活资料的事，举措则是通过撰写自传或回忆录来实现。

当把我们的构想和举措以约稿的方式，通知有关的学者时，其反映之热烈和响应之迅速，均出乎人们预料之外。这其中最早复信支持这件事情者，就有邓广铭先生。信的时间是1980年5月8日，信曰：

来函收悉。

贵刊要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要把我的生平列入你们编辑的《传略》一书，实在不敢当。我虽已年过古稀，但并无甚么太大成就。容自个努力工作二十年，或许有可能值得写一些传略性的文字。

另外，关于翦伯赞同志的传略，可请我系张传玺同志撰写。他曾是翦伯赞同志的学生和助手，最近在《北京大学报》等刊物上正写有几篇关于翦伯赞同志革命一生的文章。此事请您直接与张传玺同志联系。

信是用“北京大学论文用纸”横向竖写，毛笔字的功力使我想起他1946年代胡适向陈寅恪先生回信时的神韵（此信存我斋）。在我将刊载《季羨林自传》的那一期《晋阳学刊》寄赠邓先生时，他还曾在多种场合，甚或给学生讲课时，既称赞这项工作的意义，又推崇季先生自传的特色。邓先生此举曾受到人们的喝采，也令我辈增加了工作的自信和力量。

邓广铭先生1907年生人，早在半个世纪前，他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就受到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评价，在是书序中称“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又指出：“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此前，他敢于面对梁启超兄弟所撰《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疏证》二书中之不足，推出了《总辨正》，曾经受到陈寅恪的赏识，得到了中华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作为有志者的邓广铭，历时二载埋头于北平图书馆，完成了他的奠基之作《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被名家誉为“传世之作”，当时的著者年仅三十岁出头。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他又出版了力著《岳飞》一

书。从以上所列举之著述，不难看出邓广铭先生本已是现代宋史研究的宗师，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怎么能没有他的地位？在约组现代学人传略时自然也不应缺少他的名字。

然而，他却在信中表明二十年内不考虑作传。起初，我以邓先生是谦恭之态，可是经过我四次上门访谈游说，使我终于坚信他的表态并非故作清高，而是他所恪守的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生宗旨。第一次上门，大约是1981年春节前后，在访过同住燕园内的陈岱孙、王瑶、季羨林、宗白华诸先生后，即登门造访邓先生。其时，商鸿逵先生也在坐，尽管商先生不时为我打边鼓，劝说邓先生入传，但仍无济于事。由于我一再进逼，邓先生忽然施了一个缓兵之计，他当年正任中国历史学会执行主席，表示愿在执行主席卸任后考虑。当执行主席改任他人后，我二次访他，结果他又回到了二十年后的答复。第三次动员他入传，时间又过去了几年，可是仍无结果。到第四次，为了稳操胜券，我还特意邀请一位朋友作帮手上阵；邓先生每日上午都要去办公室亲自取书信报章，步行往返，作为休息调剂，恰在路上相遇，他一见面即先声夺人：“一定是又来催传，我看你已经成效显著，《传略》丛书已经出版好多辑了，确实值得道贺！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可否有特殊例外呢？”我问如何特殊例外，他答：“如果一个人思想不通，可否容许人家继续考虑，待条件成熟了再入。”到此，我已无计可施，只能佩服先生的坚定精神，也只能尊重先生的自我选择。

时间到了1988年，我又筹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的编纂，涉及类似邓先生的情况如何处置，又使我犯愁起来。一部学人辞典，总不能将不该缺的人漏掉的，但是本人拒绝提供有关资料；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根据已掌握的材料撰写这些人的条目，不怕字数少，只求文字的准确和评价的

客观。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常常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批评甚或发难。《辞典》出版后，我以试探的征求意见的态度向一些长辈学者发了样条和征订单，其中自然少不了邓先生。邓先生不仅有回信，而且还尊称我为“同志老友”，信说：

来函及所附我的传略，均已诵悉。十多年来，曾允诺老兄待我二十年后自写传略相奉求教，你幸而未上此话的当，因为，迄今尚未满二十年，我已经头脑昏聩，耳聋眼花，手臂颤抖，成了一个几乎丧失了劳动力的半残废，如果不由你“擅自”代写，我也将难以报命了。此传略中，只是所举述的我的“代表著”，有些选择不甚恰当之处，但全文皆是经你亲自斟酌费神写出的，所以基本上我是同意的，而且对你是非常感激的。承示此典乃借债出版的，为酬谢你对学术文化事业的这种热忱和无私，今寄上书款九十五元，即请惠赐一册为盼。

从回信看，完全是长者风范和学者雅量，尽管我“擅自”代写了他的辞条（他称为传略），还在举述他的“代表著”方面“有些选择不甚恰当之处”，然也未表现出责备的口气，而仍奖掖我之对待学术文化的“热忱和无私”，同时对于“借债出版”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从来信的笔迹上见，即使用硬笔书写，已难见当年毛笔的挥洒，确如他所说“手臂颤抖”了，甚至有的字迹尚需费神方可辨认。此时，我倒怪罪起自己的唐突打扰之举来了，悔不该以此等琐屑之事麻烦一位九旬老人！

邓广铭先生早年师承陈寅恪、傅斯年和胡适之诸师，其师之深思严谨的学风，他自始至终以其师法治学。从朋友处得

悉，邓先生虽年高九旬，目前正在改写自己曾在读者中有声誉的著作：《陈龙川传》、《岳飞传》、《辛稼轩传》和《王安石传》。先生原定九十岁以前，修定四传，然鉴于身体状况的变化，每日写作速度，过不了千字。今年适逢先生九十寿诞，然我们所见到的，仍是一位生命不息，耕耘不止的形象。每当想到这些，就会增加自己的惭愧之情和责怪之感！甚觉多年来，对邓先生理解得太少！

附记：此文写于1997年3月，收编于《鸿儒遍天涯》一书，出版于同年8月，我在年底附函奉赠邓先生一册，向他请教。然我久候未见回音，不过从与先生交往近二十年的情况看，并不符合他的作人的习惯。以前凡给他去信，一周左右总能见到回函。为什么这次拖延月余未见复信呢？正当我蹊跷之际，从《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21日）上一篇文章的编后中，看到了我不愿承认的事实，“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1月10日9时5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岁。”

见此消息，当即向邓先生亲属去信问候安慰。回信的是先生之女公子邓小南，函告“家父于去年七月间因病住院，今年一月不幸辞世。当时我们姐妹因心绪烦乱，诸事丛脞，未能及时通告家父生前友好。不周之处，敬祈海涵。”“遵嘱寄奉家父生平一份。北大历史系与中古史研究中心准备编纂出版纪念家父之文集，不知先生愿赐稿否。”“日内将寄呈家父《治史丛稿》及新版《辛稼轩年谱》各一册。”随后，如期收到邓先生大著，令人追悔莫及的是赠书已难见他之本人亲笔题签了，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现写下这篇追思性的文字，以资纪念。

1998.6.15 于速朽斋

邓广铭先生的最后二十年

——杨渭生

当代史学大师邓广铭教授仙逝，巨星殒落，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深受震撼。回忆先生的教诲，如在眼前。先生虽逝犹生，音容宛在，依然活着！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生命已依附于他的不朽著作之中；作为宋史泰斗、一代宗师，邓广铭的英名镌刻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化史的丰碑上。

六十多年来，先生的奋斗历程和治学之道，尤其最后二十年（1978-1998），夕阳辉煌，谱写了闪光的篇章。本文仅以聆听先生指教和他赐予大量书信中所体会到的几点，略加记叙，以见先生光辉业绩之一斑。

1978年，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新生与腾飞的历史转折关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春天的到来，赐给这位大师温暖的生命旅程，春天的来临，使这位大师欢欣鼓舞，壮志不已，为祖国的学术与教育事业奉献了他的一切。

其一，肩负重任，拨乱反正，培育英才。

1978年，邓先生七十一岁，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82年，先生为了“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倡议并创建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出任中心主任达十年（1982-1991）之久。在此期间，该中心在先生领导下，成绩卓著，硕果累累，培育出许多杰出的中青年学者，他

们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跨世纪人材。这是先生最后二十年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也是先生在《自传》中所说，“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

其二，组织推动宋史研究事业的新发展。

1980年，先生与陈乐素教授以及程应镠等先生发起在上海成立中国宋史研究会。在成立大会上，邓先生针对当时我国宋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他说：“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就很难谈到质量。因此，关于宋代史事的研究，还亟需我们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去生产成品，去培育人材，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从1980至1992年，先生连任五届宋史研究会会长。1994年六届年会，先生辞去会长之职，改任顾问，由漆侠教授接任会长。先生在担任会长期间，亲自主持历年年会，把握研究的大方向，与年会各主办单位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从确定编稿原则，到具体审稿、编稿和删稿，他都亲自负责，认真对待。尤其是对1984年杭州年会第三辑论文集的出版，先生更是亲自写信十封，奔走呼吁，尽了最大努力，帮助解决难题。论文集的出版，使他“如释重负”，感人至深！

1984年10月，先生亲自布置接待我国台湾学者陶晋生教授，开启了海峡两岸宋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同年12月，邓先生与陈乐素教授、邝家驹教授率团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宋史国际研讨会。这是海内外宋史研究学者欢聚一堂，共商学术问题迈出的可喜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邓先生与徐规教授等学者开始筹备于1985年5月由北京大学与杭州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会议）。这是1949年以来在祖国大陆第一次举行的宋史国际学术盛会。当时会务由杭州大学历史系具体筹办，作为筹

委会主任之一的邓先生虽曾谦逊地自称他是“挂名”的，其实他是这次会议非常热心的策划者和指导者。从会议立题申报、拟请学者名单、讨论问题、论文征集、外语翻译，乃至日程安排等等，他都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在会议前后给我写了二十三封信，反复阐明上述诸问题的看法。我先后两次专程到北大向先生汇报筹备工作，他竟不顾劳累，一次和我谈了三个多小时，一次谈了两个多小时，围绕主题，天南地北说开去，真是听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其思维之灵敏，见解之精辟，涉及问题之广泛，思考之缜密，实属罕见，令人高山仰止！遇有问题，他以长者的慈祥态度共同商议，便于解决问题。

五月十四日，先生在开幕词中说：“中国学术界自来把学术视为天下公器”，强调宋史研究者要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中国有句古语，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我们国内的研究者来说，国外的同行们算是‘他山之石’；对国外的同行们来说，国内的又算是‘他山之石’。我们之间可以互相切磋琢磨，把宋史研究或者说把辽、宋、夏、金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会议结束后，先生来信说：“从杭州返京，久久不能平静，很是兴奋！”在召开国际宋史研讨会的前后，我们之间的书信往返频繁之至，会务活动结束之后，再没有那么多麻烦事需要商谈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但彼此间的通信也从此稀疏起来，反而产生不习惯的感觉。先生确是全心全意为宋史研究事业而操劳。

1991年8月，邓先生与漆侠教授联合主持第二次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会议）。这次会议是由邓、漆二先生发起，由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具体筹办的。邓先生对这次会议自始至终非常关心，提出许多具体的设想。八月十日，邓先生在开幕词中提出：“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

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为求能够全面地、正确地、深入透彻地予以剖析、说明，并作出公正的评价，这就需要运用多种视角、多种尺度，多种思想方法和思考方式来进行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单靠汉族中的某些人，单靠海峡两岸中华民族中的某些人来致力于此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必须具有多种文化背景和思想体系的学人才能搭配成广角镜和透视镜，共同完成这一任务。”这个开幕词，他亲笔撰写，先后修改了四次，充分体现了他严谨治学的精神。在会议期间，他参加分组讨论，听取不同见解，反映其大家风度。他对这次会议达到预期目标，感到很高兴。

上述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和发展，两次宋史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行，是促使我国宋史研究步入新阶段、走向世界的标志。这与邓先生的倡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而这也是邓先生晚年很喜欢谈论的三件大事。

其三，老当益壮，积极参加许多重大学术活动，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

1978年5月，邓先生应邀参加杭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讨论会，并作了精彩的学术讲演。1984年10月，在北京、杭州分别接待台湾学者陶晋生教授。同年12月，率团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宋史国际研讨会。1987年上半年，应邀到日本东京国际交流学部讲学。返国后，先生发起召开中日宋史学术研讨会，初拟在上海，旋即改由河北大学漆侠教授主办，1989年因故会议未成，改由邓、漆二先生主编《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1991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7月，应香港中文大学国际交流学部的邀请，准备参加在该校举行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因故未行。1991年

10月，邓先生由他的三女小南陪同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纪念胡适先生百岁诞辰的学术会议。与会者有海峡两岸、香港地区和美籍华裔学者共四十余人，绝大多数为中青年学者，胡先生的及门弟子两人，邓先生是其中之一，也是与会者中德高望重、最年长的一位。1993年3月，邓先生南下杭州参加岳飞诞辰8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实践他前此许愿参加的诺言。1991年8月，上述北京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有的学者建议在台北召开宋史国际学术会议。邓先生当即表示他虽年逾八十，不想再参与一些大型会议，但为两岸的学术交流，如能正式举行这样的会议，“还是乐意去参加，拼着老命也乐意到祖国的宝岛去看看的。”遗憾的是，这竟成了先生未曾实现的心愿！

二十年来，正是由于邓先生的倡导和推动，祖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无论从深度或广度而言，都有很大的发展。与其他断代史相比，虽非排行第一，却已跃居前列，论文、专著大批涌现，新一代宋史学者辈出，堪谓群星灿烂。作为一代名师，邓先生的功绩永存！

其四，著述报国，开拓创新，成果辉煌。

邓广铭先生是继张荫麟、陈乐素教授之后享有盛誉的宋史研究开拓者、学术大师。其学问博大精深，研究领域广阔，尤精于唐、宋、辽、金史。代表性著述有《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自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发表学术论文近二百篇。主要论文经他亲自编订，结集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三十九篇，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四十八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很多

论著是邓先生最后二十年的新作，如《自选集》中有二十篇，《治史丛稿》有三十二篇；《自选集》所附《邓广铭著述目录》（1978—1992）有三十八篇新作。又如：《辛稼轩年谱》（1997年新版）、《稼轩词编年笺注》（1993、1995年新版）、《岳飞传》（增订本，1983年、1985年新版）、《辛稼轩诗文笺注》（1995年新版）、《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1997年新版）、《陈亮集》（点校增订本，1987年新版）、《涑水记闻》（点校本，与张希清教授合作，1989年版），等等。他还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分册。邓先生的最后二十年，是他学术论著的丰收季节，是其夕阳辉映、金光灿烂的时期。

邓先生的论著中，很多是富有创见和鲜明特色的传世之作。诸如：《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两部著作，是《宋史》成书六百年来第一次认真清理，为考订辨正《宋史》之先导。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言》中，指出“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邓先生所撰岳飞、王安石、辛弃疾、陈亮等一系列研究著作，达到了当代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他关于宋文化及对宋文化研究的新观点，关于宋学与理学应当区别开来的观点，关于理学开山祖问题的精辟见解，关于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关于历史学即史科学，关于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学是治中国古史的四把钥匙的论断等，都是勇于创新，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的开创性论述。陈寅恪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写道：“（邓）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先生的科研实践完全证明了寅恪先生的预

言。

作为一代宗师，邓先生是造诣高深的权威学者。然而，他严肃又风趣，平易而近人，始终以一个普通人而生活、工作着。在最后二十年中，他从七十到八十岁身体很好，生气勃勃，不像是一位古稀老人。八十以后，日渐衰老，先是手抖，后是耳聋，但他仍每日读书，坚持工作，自称“继续工作，才不会变成老年痴呆。”有事去城里，还去挤公共汽车，开玩笑说自己“还能坚守阵地（在车上还能站个位置）。”他由小外孙女陪同，从北大朗润园十公寓走到第二体育馆附近的历史系办公室去取邮件、报刊，还亲自到东南校门口去买馒头。这些活动，后来慢慢地减少了、取消了。他常说自己是一个凡人，很有人情味。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对自己能长寿充满信心。1987年3月，邓先生的弟子漆侠教授与张希清等同志私下联络为先生庆祝八十大寿。我们杭大诸同仁亦发去贺电。他给我来信说，“我历来都向人说，我只有到一百岁，才做祝寿活动，八十不做，九十也不做。”他有一种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

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全书共九十余万字，包括五十七篇学术论文及附录《邓广铭先生主要著述目录》。它如同一座丰碑，记录着邓先生在国内外极为广泛的学术交游和他博大的学术成就及高足弟子满天下的盛况。这也是邓先生最后二十年中的一件大事。

1995年10月，我去北大开会，到邓先生家拜谒他老人家。那是金秋的一个清早，他谈兴极高，从诗人臧克家谈起，东南西北，品评人物，讨论宋史，询及朋友，一谈两个多小时，事后来信说这次晤谈“极感快慰”。不料这次拜会竟成为

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机会，追思及此，无限感怀！先生归仙，风范永在，先生的道德文章，如山高水长，心向往之，可望而不可及矣！

悼念邓广铭教授

——王德毅

去年九月初，我前往北京清华大学参加“纪念王国维诞辰一二〇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特拜托北大历史系张希清教授陪同，一起前往医院探望已经卧病月余的邓广铭教授，虽然我预先已请张教授向邓教授的女公子小南女士讲明，邓教授已知道了，但见到我来拜访他，仍是十分惊喜，紧握着我的手，愉快地问候到在台北的宋史界朋友。临别时，邓教授赠送我他新近出版的《治史丛稿》，并勉强坐起来题字签名署年月，虽然手有点颤抖，但仍字书清整，令我非常感动。事隔整整一年，今日忆及，更增悼念。

早在四十二年前，我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时，同时选修方豪教授开的宋史和姚从吾教授开的辽金元史，两位师长都曾介绍过邓教授和陈乐素教授的著作。我在大学三年级时，曾写了一篇短文〈洪迈使金始末〉，发表在香港出版的《大学生活》第三十九期上，乃呈请姚师指教，姚师看过后颇为奖许。我即恭请姚师指导写毕业论文，当时大学生不撰写学士论文是不能毕业的，我拟的论文题目为洪迈（容斋）年谱，姚师告诉我说：“邓恭三先生编的《辛稼轩年谱》不可不看，可从其中学到编年系事考证的方法。”我就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图书馆去

借阅，读后受益甚多。当时中文系郑騫（因百）教授也曾编有《辛稼轩年谱》，我便向郑师请益，他说：“抗战前在北平读书，与邓广铭先生同时属稿辛稼轩先生年谱，各作各的，拙著在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以抗战军兴，公私涂炭，生怕手稿湮没，乃以自费印了二百部，冀图保存。邓著则迟了九年始问世。邓谱资料丰富，考证精审，叙述详尽，然就全书而言，亦各有得失。”我当时就想，如果邓教授能追随傅斯年校长来到台湾，必定被聘为台大教授，不少研究宋史的新进、后生，都是他的学生呢！就在我临毕业之前，在旧书店买到一本邓教授著的《岳飞》，是在民国三十四年由胜利出版社印行的，经过八年抗战的一代人，尤其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对岳飞的坚决抗金收复河山的壮志，总是崇敬有加的。邓教授自序中说：

向着这一个胸怀中充满了复仇的火焰的人，这一支有著钢铁一般的风纪的军队，人民大众付之以全部的信心，觉得凭靠着他们便一定可以获致胜利。和民众成为一体的岳飞，既以其胜利的信念灌注著全体人民，也由全体人民的爱戴而更加强了他自身的胜利的信念，对于他的复仇雪耻，恢复中原的主张，他更加坚定地执持着，也更加踏实地践履着。

这正是抗战一代人的心声，没有亲历八年抗战苦难的人，是绝对没有如此深切的体认的。德毅虽生也晚，然在童年时代，正逢全面抗战，不仅不能正常求学，而且常要躲避日寇下乡烧杀，惊怖之情，今日思之，犹不寒而栗。我对邓教授这段叙述，是最感同应的。

自1949年两岸隔绝，史学的研究也无法交流。直至二十

年前，大陆始改革开放，史学界逐渐了解台湾、香港同行的研究概况。在宋史学界，我国旅美学者刘子健教授，执教普林斯顿大学，倡导宋史研究最力，并联络欧美日本研究宋史的学者。1963年秋来台北主持史丹佛大学所主办的华语研习中心，并在台大史学研究所讲学，与赵铁寒、姚从吾、方豪、全汉升及蒋复璁五位教授倡议成立宋史座谈会，每一至两个月集会一次，相互切磋，并编辑《宋史研究集》出版，至今已三十五年，集会已达一百三十一一次，《宋史研究集》也出版了二十七辑。自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刘教授更积极联络两岸三地的宋史学者，互相交流。如果去北京，自然要拜访邓教授。据刘教授说：

1978年，子健第二次到北京，经过安排，才见到邓广铭先生。那时候，还不能随便谈话，两人就假装湖边散步，这湖就是原来燕京大学的。……邓先生听说宋史座谈会，就想同样去做。不久，宋史研究会成立了，而且出版论文集。在杭州曾经举行国际会议。

这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记得在1980年秋，我获得普林斯顿大学之邀请前往访问和研究，行李中特带了一部《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六册，由刘教授寄赠邓教授。不知何故，邓教授只收到前四册，稍后刘教授收到谢函，立刻拿给我看，函中除称许此索引搜编资料极广，为前所未见，有多方面的实用价值外，末后还感慨地说：“国内三十年来，研究宋史的学者受到环境限制，只在意识形态上放言空论，没有做出任何成绩，思之不胜惭愧矣！”刘教授还告诉我：他和邓教授谈到台北的宋史座谈会特色和成就时，邓教授马上说：“台北能做得这么好，

我们更应该这样做。”所以于1980年10月在上海成立宋史研究会，并举行研讨会，宣读论文，选编了三十一篇，出版了第一辑《宋史研究论文集》。这是一个既新且又好的开始。

刘子健教授为了促进两岸三地宋史研究的交流，让老中青学者能够聚在一起互相切磋，特发起在香港举行国际宋史研讨会，于1984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由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邀请欧、美、澳洲和两岸三地宋史学者来参加。在寄发的第一次通告中，特说明召开的目的：

宋代为中国史上兼有复古与创新之时代，影响深远，及于近代。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及中国文化研究所有鉴于宋代研究之重要，特发起召开国际宋史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地宋史学者来参加，发表论文，互相切磋，以广学术交流。香港地处国际交通孔道之中心，方便各地学者集会。此次研讨会深信必能增进学者间之互相认识，并从而提供今后研究宋史之动向及方法。

研讨宋史，上通古，下贯今，集世界各地专家于一堂，交换研究经验，尤其是两岸三地的学者三十五年来没有聚会过，这实在是难得的机会。这次研讨会如期举行，自台北去的以宋晞教授为首，随同者有张元、黄宽重、梁庚尧三教授和德毅，共五人。自北京、上海和广州来的由邓教授、陈乐素教授为首，随同的有漆侠、酆家驹、王曾瑜和朱瑞熙四教授，共六位。从美国来的除刘教授外，尚有陶晋生、陈学霖、马伯良和罗文教授等，共六位，其他不备述。这次集会议程紧凑，讨论热烈，确实达成交流的功效。我们是第一次晤面，大家都是很兴奋的，

邓教授是宋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诚挚又谦和，对后生晚学语多称美，令人肃然起敬。

1991年8月9日至14日，北京大学和河北大学联合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由邓教授和漆侠教授联名邀请，我被邀请参加，从台北去的尚有金中枢、赵振绩、叶鸿澍、葛绍欧、王明荪教授，共六位，大会安排了半天时间参观卢沟桥，桥面用石铺成，两边为狮柱石栏，柱头刻狮，形色生动，叹为观止。想到“七七事变”就发生于此，又不禁心情激动。这五天的集会，邓教授都和与会学者共同出席，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热心宋史研究，对后学起了鼓舞作用。

1988年，邓教授在为《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所写的〈前言〉中，称扬刘教授“为学如其为人，为人如其为学，都可用笃厚朴实四字加以概括。”这是深知刘教授的。刘教授奖掖后进，真情流露，不才如德毅者，亦蒙受他的沾溉。就我与邓教授两次学术会议相聚，十日从游，也体认到邓教授的为人与为学，确可以用温厚笃实四字加以概括。今年元月，邓教授仙逝，宋史学界的同道同深悼念，然温厚敦实的风范，将永远留在人间，高山仰之，心向往之！

戊寅九月

独立不阿的人品 沉潜考索的学风

傅璇琮

我于六十年代前期曾见过邓广铭先生。那时我在中华书局编辑部，本在文学编辑室，后因中华书局拟加快“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63年下半年，当时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对编辑部人员作了部分调整，并把我调到古代史编辑室，担任《宋史》的点校和编辑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就有时到北大向邓先生请教。但不久就搞起政治运动，1965年秋，我随大流到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接着1966年“文革”风暴起，一切正常的文化事业也就停止。但想不到1967—1968年间，忽然说要恢复“二十四史”整理，于是除了中华书局编辑部本身外，还请来了几所大学的专家学者，那时邓广铭先生也被邀请作《宋史》的点校。这几位学者（还有如高亨、唐长孺、王仲荦等）都住在中华书局旧址翠微路二号的西北楼宿舍。邓先生刚来，我到他房间去看他，他还兴致很高。食堂离住处还有一段路，他也每天三餐自己拿着碗到食堂，与我们一起排队，领取饭菜。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大约一年左右，后因1969年去“五七”干校，工作中止），但处在那一时期总的动乱中，总算也是乱中偷闲，忙中作乐，我时常向邓先生讨教点校中的一些问题，过得相当愉快。

邓先生的几部著作，我是很早读过的。我于1955年毕业

于北大中文系，留校作浦江清先生助教。浦先生那时教宋元明清文学史，我一边担任教学辅导，一边研读宋代的几个大家文集。1958年夏我调到中华书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我不便于写文章，就重点搞资料工作，于1959年至1962年，先后编成《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两书，并作范成大佚文的辑集。在此期间，我就抽时间读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年谱》，以及他所作的王安石、岳飞、陈亮等人传记，邓先生在文献资料上所下的工夫，其搜集之广博，考析之深刻，对我启示极大。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但我觉得我此后的治学道路，邓先生著作的影响是不可没的。

后来我读到陈寅恪先生的几篇文章。陈寅恪先生一生也多坎坷曲折，但他始终坚持以学术自守，“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于友朋”（《赠蒋秉南序》，载《寒柳堂集》）。他非常看不惯做学问的一种只求声誉、到处挂名的“夸诞之人”，他讽刺这种学风为“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因此他在抗战时期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极力赞扬邓先生摈弃世务，“庶几得专一于校史之工事”，并且极为郑重地说：“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正因为读了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更加深了我对邓先生人品、学品的认识。前一时期读了邓先生的《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邓先生在自序中曾引用清人章学诚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评论，并说“章学诚所最反对的，则是一个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当中，既不能抒一独得之见，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邓先生用极重的

笔调写道：“我以为，对于今天从事研究文史学科的人来说，也应当把这些话作为写作规范”，并且再次强调：“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我觉得，这几句话，确实体现了邓广铭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令人钦敬的学术风范。邓先生那种独立不阿的人品和沉潜考索的学风，是很值得当今学界研思的。

由此我想起了两件具体的事。这两件事都与书有关。

1986年，北大中文系古文献研究所得到的高校古委会的经费资助，开始编纂《全宋诗》。我当时被邀为主编之一，经常参与编纂工作。邓广铭先生则受聘为全书的学术顾问。1989年，前五册编成，编委会就请邓先生题写几句话，下面即是邓先生那年二月七日的一段题词：

这部《全宋诗》，搜采广博，涵容繁富，名家鉅制，散篇佚作，全部荟萃于斯。而考订之精审，比勘之是当，亦远非《全唐诗》所可比拟。不唯两宋诗坛之各流派各家数均可借此而探索其源流，而三百余年之社会风貌，学士文人之思想感情，亦均借此而得所反映。因此，这部书不仅是攻治宋诗以及宋代文学史者之所必须披读，亦为攻治宋史者所必须备置案头的参考读物。

《全宋诗》前五册出版后，北大古文献研究所于1991年12月28日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在京一些学者对此书作一些评论。许多先生是肯定这一成果的，当然也提了一些意见。在我印象中，邓先生的意见提得最实在，最见功力。如邓先生提到，此书第三册第1835页所收李宸妃《卜钗》，出于清人所编《历代名媛杂咏》，应是清人之作，非宋李宸妃诗。按这确是我

们编纂中的疏失，但一般人如不细心察看，是查不出来的，由此可证邓先生在《治史丛稿》自序中所提到的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两句话：“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邓先生确实兼具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

邓先生对《全宋诗》中范仲淹诗的整理颇致不满，他认为小传中将范的仕宦经历不分先后堆在一起，看不出升迁贬谪。又说小传的版本说明中提及以宋本《范文正公集》作参校本，但整理者是否真正看过这宋本，值得怀疑，如宋本末首是《落星寺》，但现在这《落星寺》诗却据方志补入（按整理者系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邓先生又提到北宋夏竦两首诗，一是《奉和御制读隋书》，诗中有夏竦自注，几次提到杨玄感，四库本因避康熙名讳，改作杨感，现在整理本未予补正；二是《奉和御制读五代汉史》，注中有“杜重威引契丹，临城谕之”，应作“杜重威引契丹主临城谕之”，当据《五代史》补“主”字。

邓先生的这些意见，使我想起钱钟书先生。在《全宋诗》编纂工作刚开始，我曾与北大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孙钦善同志去钱钟书先生家，敦请他出任主编，钱先生谦和地谢绝了，但表示支持这项规模较大的文化工程。前五册出版后，钱先生给我一信，具体开列书中的问题（此事我已写有一文，题《钱钟书先生的几封书信》，刊于《人民政协报》1998年10月11日，又转载于《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这些，都可见出我们这一时代真正有学问的前辈，一方面对有意义的事业出于真心的支持，同时又对学术负责，不惮烦地自己动手翻检书籍，提出严格的要求。（按，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全宋诗》第二次印刷时，已根据邓先生的意见作了相应的改正。）

另一本书是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此书是邓广铭先生与

张希清同志合作整理，于1989年9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列入“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有一年北京市要评选优秀图书奖，北大拟申报这部书，但需有校外一人写推荐意见。当时邓先生提出：这份意见请傅璇琮同志写。我当时听了确受宠若惊，因我自知我的学力实为不配。但既受此嘱咐，我就仔细阅看了全书。这部书我过去在搜辑宋人诗文时曾看过，但看的是丛书本（大约是《学津讨原》或《学海类编》本）。现在的新整理本，邓先生特地在书前写了一篇《略论有关〈涑水纪闻〉的几个问题》长文，把《涑水纪闻》当初的撰写，及后来的收藏、流传、印刻作了系统考述，并联系南宋初期的政治情况，及与南宋时几部史书（如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比较，具体论述这部司马光生前尚未定稿的书所具有的特殊史料价值。我觉得，邓先生这篇文章，作为此书的前言，不单可为宋人史料笔记的整理，也可可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一个既是高水平又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范本。

《涑水纪闻》的校勘确实花了不少工夫，用以参校的书，除了现存的几种主要抄本、刻本及《续通鉴长编》、《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外，据我初步统计，仅第一卷，就用了下列十种书：《锦绣万花谷》、《宋朝事实类苑》、《类说》、《宋会要辑稿》、《宋史》、《古今事文类聚》、《太平治迹统类》、《三朝圣政录》，以及《说郛》中所收书。其他卷中还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赵清献公文集》及《永乐大典》那样的大书。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邓先生对张希清同志于此书所付出的劳力，所作出的贡献，一再提及。在点校说明中，他明确地说，这部《涑水纪闻》的校勘工作是张希清同志做的，说“他

在接手之后，首先把《纪闻》的各种抄本和刻本都进行了一番对比”。又说，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温公琐语》一书，为宋代其他书目所不载，现在尚有明人的一个抄本，这次即以此为底本，并与《三朝名臣言行录》及《说郛》所引录的加以对勘，附于整理本《纪闻》之后，“这项辑校工作也是由张希清同志作的”。又说，《涑水纪闻》、《温公日记》和《温公琐语》三书，原来全无标目，而《宋朝事实类苑》从《涑水纪闻》引述近二百条，则加了标题，现在整理时，即参照此例，将这三本全部拟制标题，并依先后次第编为序列号码，这也“一律由张希清同志”作的。最后还说，由张希清同志编制全书《人名索引》，“以求对参考此书的人提供一些方便”。我们知道，张希清同志原是邓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一直在北大历史系任教，他们的师生情谊是很深的，而邓先生在与张希清同志合作搞这一项目时，一是共同署名，二是邓先生具体叙明张希清同志所做的工作，绝不掩人之功，掠人之美。这与时下有些名人动辄以主编自居，自己并不动手，却不提他人，名利全归己，比较起来，邓先生这样做，真可谓有针砭之力。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的是，1991年，匡亚明同志接受国务院任命为第三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并于1992年5月在北京香山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邓广铭先生以古籍小组顾问参加了这次全国性会议，并作了重点发言。今据这次规划会议的《辑要》（1992年9月编印），录邓先生的发言如下，于此可以见出邓先生对我们传统文化研究所作的理论阐述与宏观审视，借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我们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唐代玄奘的唯识

宗之所以后继无人，就是因为没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失去了生根开花的基础。毛主席就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英国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对中国文化作了很高的评价，我们有责任把传统文化研究好，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决不可妄自菲薄，我们的工作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前途是光明的。

1998年6月，于北京六里桥寓所

含泪忆邓恭三师

——何龄修

1998年1月10日，卧病恰半年的恭三师走了。我对此没有感到意外。因为1月3日我和杨讷、闻少华两兄去医院探望过他老人家，那时先生病躯极度瘦弱，完全靠供氧输液维持着，双眼紧闭，呼吸迫促。令人吃惊的是头脑仍然清醒。当可因师姐在他耳边大声告知谁来看他时，他竟断断续续、模模糊糊连声念叨：“不敢当，不敢当。”一想起往日神清气旺、谈笑风生的恭三师，对比眼前的情景，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明显地觉得，先生已走到距他人生旅途的终点只差一步了。回家后，可因师姐打来电话，说大夫认为病人抵抗力极差，怕引起感染，不同意再有人去探望。这样，我知道，1月3日的探望成了我和杨、闻两兄与先生的永诀，我们也成了最后见到恭三师的三名学生。仅仅过了一星期，先生就驾鹤西归了。

恭三师逝世时九十一岁，已臻高龄。但我仍然觉得他不应该这样早离去。我想他自己也是心有所不甘的。在这次卧病以前，他一直能吃能睡，活动正常，那充满智慧的头脑依然思维明晰，反应敏锐，作品依然文笔犀利，说理透辟。我们都期待他寿过期颐，有更多的史著问世。他自己也有此自信。因此，他的“提前”辞世，只越发使人增悲和抱恨。

我作为恭三师的受业弟子，已有四十五个年头。我含着热

泪回想起四十五年来与先生接触的种种情景。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1953级学生。在我们二年级上学期即1954年下学期时,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三)》,即《隋唐宋辽金史》。他很重视学生的基础学习和训练,所以他虽已是很有成就的学者,却亲自给我们教授基础课,指导我们第一次的历史习作。

他有一篇名作《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显然是那时候写成的。他将此文随同讲义印发我们研读、学习。关于拐子马为何物的问题,南宋时已在史籍中被搞错搞乱,贻误数百年。一提起拐子马,大家就以为是“三人为联,贯以韦索”。这个问题,不仅是宋金战争史和岳飞个人历史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而且是古代军事史中的一个战术问题,应当加以澄清。先生此文教导我们探本求源,利用历史学、语言学和军事学加以考证、辨析,以得到正确解答的完整方法。此文对我们全班同学发生了重要影响,使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比较重视考查资料、辨析史实。先生在文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他说:“在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用兵较多的战役当中,断无只在正面摆布大阵,而不配置左右两翼的道理。”这在军事上是完全正确的认识。他强调指出,金国侵宋以来,一直利用被称为“三生阵”的包括正面和左右翼骑兵的阵型作战。也就是说,金人一直沿用拐子马战术。后来我在参加工作后读恩格斯的书时,发现他指出的这一点,与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骑兵》条目中对骑兵战例战术的考察完全吻合。恩格斯指出在古代和17世纪,骑兵都“配置在军队的两翼”。义明人庄应会、所著兵书《经武胜略正集》也指出:“东西拐子马阵,为士阵之左右翼也”,“并选精骑”组成。此书在清朝遭禁毁,成为传世孤本,藏辽宁图书馆。先生的论证与古人的认识也完全吻合。这使我更加坚信他的结论的科学

性。在他的启发下,我联想到清兵入关时,也用同样的战术,刘健《庭闻录》说“满兵乃分左右翼鼓勇而前”,钱士馨《甲申传信录》说多尔衮“九王居后队,以三桂为前锋,英王张左翼,统万骑从西水关入,豫王张右翼,统万骑从东水关入”。这不是拐子马战术的复归或者说隔代遗传吗?因此,我在《中国史稿》第七册中叙述山海关石河之战时,就明确指出清军取胜用的是拐子马战术,并注明参看恭三师的论文。

那时,他已提出了著名的“四把钥匙”论。他认为,年代、地理、职官制度和目录学是打开中国历史之门的四把钥匙。年代和地理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是历史的载体。历史是实在的,不是虚幻的,没有不由时空承载着的历史。职官制度是国家机器的重要表现,不懂得职官制度甚至看不清看不懂史料。目录学则是整理和统率图书典籍,概括其内容和学术源流的学问。因此,这四种专门学问对治史无疑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先生将它们概括为“四把钥匙”,是他经过广泛深入的史学实践,并以灼见卓识加以提炼、升华的结果。为了让学生掌握四把钥匙,他在课堂上经常强调年代、地理等问题。我们读三年级时,由系里开设《中国古代史科学》(向达先生授)、《中国近代史科学》(邵循正先生授)。这是目录学的一部分内容。我们还学习聂崇岐先生讲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主要内容就是职官制度。这些都是必修课。后来我们又选修吴晗先生的《明清史讲座》,其第一讲为《明清官制》。这些课程使我们逐渐理解了这四种学问的主要内容、四把钥匙的意义。因此,我的工作室五库斋中有了可说是特设的“钥匙”库,收有各种年表、日表、地理沿革表、历史地图、各省地图册、辞典、职官表、职官制度史、史籍考、书目提要等,可以按图索骥,进行查考。四把钥匙及其有关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非浅。

我们班上有些同学怕恭三师。我想，老师的学术成就就会造成一种威严，加上先生说话有时很尖锐，甚至有些尖刻，使有的同学感到畏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先生是富于感情的人。他一篇为怀念他的恩师傅斯年先生而写的文章，完全展示了一位九十初度的老人丰富的感情世界，读了十分感人。他对待学生，更有春风化雨的温润，家人父子的亲切。他是真正能同学生交心的老师之一，与他谈话彼此没有隔阂。把这些方面合起来，可以看出先生的性格是真、直两个字。我记得，系里曾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局的李祖荫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法律史》。李先生是思想进步、学识广博的老师，但他多年脱离教学，尤其与新的重理论重分析的教学不接轨，授课方法较陈旧。青年学生有一种傲气，听完一学期后要求第二学期停开。恭三先生与汪钱先生这两位教研室负责人来给全班做工作。恭三师说明李先生是中国法律史权威学者程树德先生的弟子，学术有渊源，本人也有成就，值得向他学习，要求同学具有向老师吸取学术成果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又诚恳地说自己同李先生约定讲一学年，现在刚讲一学期就不叫他讲了，这话怎么说出口呢？同学们听了，很受启发，也很感动，一致同意请李先生继续授课。我们五年级写毕业论文，进到四年级，必修课大多已上完，选修课和讲座增加。有的同学趋向自学，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厚的库藏中汲取养分，很少听课，个别同学每周只有两节课。先生得知后，找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同学谈话，说明学生在学校主要是上课，不要急功近利，要求每人每周至少上10节课。我记得我每周有10节课，符合先生的最低标准。遗憾的是，他苦口婆心的劝导没有使所有同学都领会。实际上，认真听学有专长的学者讲课，确实益人心智，能缩短自己的摸索过程，有的课程所含的知识，我们日后也不见得会去

用功，选修课程能用较短的时间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为未来的工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可惜我们错过了一些机会。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设新馆时，恭三师被借调参加陈列设计。杨讷兄和我也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借调到那里。先生隔日去一次。中午没有地方休息，他就把我们叫去陪他从天安门到午门来回走动聊天，话题海阔天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告诉我们，历史研究所对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些事非常不满，但他反复强调“北京大学历史系还是要与你们所搞好关系的，我们要做补救”。受他的影响，我和杨讷兄从不做损害两个单位关系的任何事情，而且对某些不正常的攀龙附凤的说法做法深为愤慨。历史研究所对先生个人也很尊重，在许多年里请他担任学术委员，多次主持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答辩。他始终坚持团结，以八十七岁高龄还亲自进城参加历史研究所40周年庆典，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这对一些喜欢拨弄是非制造事端的人应是很好的教育。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精通宋史。我很浅陋，而且从未对宋史用功，对于先生的论著的学术成就，说不出中肯的话。但因读先生的书和文章而形成一种印象，认为他的治学道路特点很突出。根据我粗浅的体会，觉得：一、他从关键的人物入手，政治、经济史抓王安石，军事史抓岳飞，文学史抓辛弃疾，学术史抓陈亮，由此推开，全面带动一代的历史；二、抓紧四把钥匙，作《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二种（我想，因聂崇岐先生研究《宋史地理志》，所以他就没有做有关的考正），这是继承和发扬史学界重视制度研究的传统的。这样一条治学道路是以雄厚的知识为基础的。如非具有深入文学史、学术史这些专门领域的的能力，就不能形成这样独特的治学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我

的体会可能是无知妄说，在回忆先生时试着写出来。因此想法念念在心，有一阵子我还发奇想，也学先生涉足文学史领域。我读过清代各种体裁的不少文学作品，但限于能力，始终没有写出像样的文章。在恭祝先生九秩华诞时，我试作《〈生销剪〉的作期和艺术价值》一文，自知陋劣，不敢明说，但确有学习先生的微意。

在先生的晚年，我们的接触有所增加。他虽然家居简出，但一点没有闭目塞听，专门颐养天年，相反，他放眼国内外，关注学术动向，消息灵通，许多事他还有不已于言、积极参与的满腔热情。我们都知道他反复撰文，参加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现存四库存目各书应否全部印行等问题的辩论，旗帜鲜明，毫不畏避。我每次进谒，都能听到先生滔滔不绝的风趣和丰富的讲话，许多的议论评述、新闻旧事。先生高年时的言行，还表现出对国家、对科学的强烈的责任心。我自觉感受很深，敬仰不已。

1997年初，我蒙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先生和图书馆界的朋友朱宪、邱东江、崔京生等先生不弃，邀约担任《四库禁毁书丛刊》副主编兼工作委员会学术部主任。后来，主编王钟翰先生委派我一登门，敦请我的老师邓恭三、杨拱辰（向奎）、张苑峰（政烺）、周太初（一良）等先生为编委会顾问。当我去恭三师府上时，一路上心里直犯嘀咕，不知先生能不能答应，因为我知道先生反对印行全部现存四库存目各书，摸不准他对禁毁书的看法。没想到我刚一说明来意，先生就笑着说：“好，你们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禁毁书很有价值，应该出版。只是我实在不能给你们做什么，而且我现在一般连会议都不参加。王先生叫我当顾问，我是既顾不上，也问不了，对你们实在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你们同意，我就只能挂个名，表示我对

这项工作的支持。你看行不行呀？你跟王先生说明一下。”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连连说：“好，好，王先生一定同意。有您的支持，就是很有力的支持呀！”

由于我写过一篇《〈柳如是别传〉读后》的文章，先生在1997年1月12日历史系一次欢迎著名京剧演员杨秋玲女士演唱会后，拉我到身边说：“还有一篇文章你要写一下。”“什么文章呢？”他说：“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是为了向夫人表示懊悔和歉疚，因为他没有听夫人的话，离开大陆去香港。这说法是不对的。你要写篇文章讨论。”后来，我有一次恭谒，先生旧话重提，说：“为了向夫人表示忏悔，写一部80万字大书，那不是笨伯吗？用得着吗？写一两首诗就足够嘛。我看你要写这篇文章。怎么看陈先生写《柳如是别传》？好好读读《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就能理解陈先生写这部大书的指导思想。”我很感激先生对我的信任，布置我写这样一篇文章，并具体进行指导。我不知道我承担的工作能不能给我时间进行研究，以完成先生郑重的遗命。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我作的最后一次指导，使我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

1998年3月20日于五库斋

的体会可能是无知妄说，在回忆先生时试着写出来。因此想法念念在心，有一阵子我还发奇想，也学先生涉足文学史领域。我读过清代各种体裁的不少文学作品，但限于能力，始终没有写出像样的文章。在恭祝先生九秩华诞时，我试作《〈生销剪〉的作期和艺术价值》一文，自知陋劣，不敢明说，但确有学习先生的微意。

在先生的晚年，我们的接触有所增加。他虽然家居简出，但一点没有闭目塞听，专门颐养天年，相反，他放眼国内国外，关注学术动向，消息灵通，许多事他还有不已于言、积极参与的满腔热情。我们都知道他反复撰文，参加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现存四库存目各书应否全部印行等问题的辩论，旗帜鲜明，毫不畏避。我每次进谒，都能听到先生滔滔不绝的风趣和丰富的讲话，许多的议论评述、新闻旧事。先生高年时的言行，还表现出对国家、对科学的强烈的责任心。我自觉感受很深，敬仰不已。

1997年初，我蒙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先生和图书馆界的朋友朱宪、邱东江、崔京生等先生不弃，邀约担任《四库禁毁书丛刊》副主编兼工作委员会学术部主任。后来，主编王钟翰先生委派我一登门，敦请我的老师邓恭三、杨拱辰（向奎）、张苑峰（政娘）、周太初（一良）等先生为编委会顾问。当我去恭三师府上时，一路上心里直犯嘀咕，不知先生能不能答应，因为我知道先生反对印行全部现存四库存目各书，摸不准他对禁毁书的看法。没想到我刚一说明来意，先生就笑着说：“好，你们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禁毁书很有价值，应该出版。只是我实在不能给你们做什么，而且我现在一般连会议都不参加。王先生叫我当顾问，我是既顾不上，也问不了，对你们实在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你们同意，我就只能挂个名，表示我对

这项工作的支持。你看行不行呀？你跟王先生说明一下。”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连连说：“好，好，王先生一定同意。有您的支持，就是很有力的支持呀！”

由于我写过一篇《〈柳如是别传〉读后》的文章，先生在1997年1月12日历史系一次欢迎著名京剧演员杨秋玲女士演唱会后，拉我到身边说：“还有一篇文章你要写一下。”“什么文章呢？”他说：“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是为了向夫人表示懊悔和歉疚，因为他没有听夫人的话，离开大陆去香港。这说法是不对的。你要写篇文章讨论。”后来，我有一次恭谒，先生旧话重提，说：“为了向夫人表示忏悔，写一部80万字大书，那不是笨伯吗？用得着吗？写一两首诗就足够嘛。我看你要写这篇文章。怎么看陈先生写《柳如是别传》？好好读读《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就能理解陈先生写这部大书的指导思想。”我很感激先生对我的信任，布置我写这样一篇文章，并具体进行指导。我不知道我承担的工作能不能给我时间进行研究，以完成先生郑重的遗命。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我作的最后一次指导，使我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

1998年3月20日于五库斋

崇高的责任感

陈智超

1996年12月18日，我又一次来到我所熟悉的北大朗润园十公寓二〇六号邓宅。这次我拜访恭三先生，是因为即将赴美讲学，特来向他辞行，同时也是向他预祝九十寿辰。那天他的谈锋甚健，同以往一样，既谈史学界的掌故，也臧否当前的人物。他记忆之准确、细致，思想之敏捷、尖锐，使人无法相信他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当时我满怀信心，访美归来之后再和他长谈在美国的观感，不料这竟是最后一面。

1998年1月11日，我在哈佛大学通过不同的渠道得到了邓先生逝世的消息。虽然此前从何龄修、李锡厚等学兄的信中已经知道邓先生病危，思想已有所准备，但噩耗传来，仍然使我深深震动。

自恭三先生逝世以来，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我自1957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四十年来，所受到的恭三先生的教导、鞭策、关怀、鼓励、帮助，不是一篇短短的回忆文章所能尽的。现在只能谈谈我感受最深的两点。

垂暮之年的失落感

1992年春节后，我对恭三先生作了一次三个多小时的访

问。经过他多处修改、补充的访问记，后来刊登在《中国史研究动态》该年第4期上。我所以要进行这次访问，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我在多年从事史学研究的过程中体会到，要真正理解一位史学家，要对他们的学术有深切的领会，除了认真阅读他们的著作以外，还要对作者本人的经历以及写作的时代背景有一定了解，因此发愿写几篇老史学家的访问记。我访问的第一位是陈述先生。1月2日访问了他，在整理访问稿的过程中发现有几处需要核实、补充的地方，5日打电话到他家，才知道他已在前一天逝世。这个突发事件使人意识到这种访问实带有“抢救”性质，促使我抓紧时间接连访问了张苑峰先生和邓先生。

在对邓先生的访问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他开头的一段话：

我近来有一种失落感。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耳朵越来越背；看文字也很吃力，戴上老花镜还要加一副放大镜；手一写字就发抖。这说明我已届风烛残年，却还有些非非之想，想把自己过去的一些著作，好好修改，使他们真能为新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一砖片瓦。比如《王安石》，“儒法斗争”的烙印太深了；而早年写的《陈龙川传》、《辛稼轩传》，也都想作一番大幅度的补充、订正。这些都要好好改，要集中精力改。而在此以外，对徐梦莘的那部《三朝北盟会编》，……早就向人宣告说，不校完此书，我死不瞑目。然而现在事实上已经面临“蹈火”之年，头脑和手眼都已不好使唤，因此终日焦躁不安，只想能把全副身心扑在这些工作上，极怕再有任何别的事来相干扰，却又苦于无法排除掉这些干扰。

我在访问记中，只是要忠实地把他的想法记录下来传达给读者。现在我要写的，是我当时听了这番话的感受。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恭三先生晚年视力日衰，读书看报，老花镜加放大镜，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写字颤抖，他给我的信件以及他修改的文稿就是明证，而且可见他递年颤抖愈甚的过程。我曾经建议他学习电脑，用按键来代替执笔，看来这种想法并不适合他的实际。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像恭三先生这样高寿，著作等身，在学术界有崇高地位，晚年完全可以颐养天年。但他的想法与此完全相反。他那充满智慧和经验的头脑仍然不断涌出创作的灵感，他还有许多写作计划要实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曹操的诗句来描述恭三先生晚年的心境是最恰当不过了。但他那不听使唤的眼和手束缚住了他的雄心壮志，心与力的矛盾使他产生了失落感。但即使如此，他在晚年仍然用那颤抖的手，艰难地但也是愉快地写出一篇又一篇文章。

我从中受到了极大的鞭策。老师在垂暮之年还奋斗不息，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晚辈，能不趁体力尚健的时候多多努力吗？

老而弥坚的论战风格

这次访问中，他用了相当多的时间谈他写的《〈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记得近四十年前我们在北大读书时他也讲过这篇文章。不过当时他是启发我们这些刚踏入史学之门的学生如何利用工具书提供的线索去收集史料，

这次访问则是着重介绍他申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这个在他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而四十年中感染我的则是恭三先生的论战风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助教，初出茅庐，但他却敢于向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以及他的弟弟）挑战。文章的结论是：梁氏兄弟写的辛弃疾年谱及词疏证包括了许多“严重错误”，需要重新编写。这个结论是尖锐的，但又是充分有根据的。“小助教”在这个问题上扳倒了“大权威”。

自此以后的六十年中，恭三先生的论战风格非但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高昂。随着年事的增长，他论战的对象不但有他的前辈，也有他的同辈，他的晚辈，以至晚辈的晚辈。

我们只要阅读他的《学术论著自选集》就可以看到，这一类论战性的文章在他自己挑选的代表作中占了多么大的比重。例如：1963年关于唐宋庄园制的论战，1981年关于岳飞《满江红》词是否伪作的论战，1992年关于《汉宫春》词的作年和地点的论战等。

同年底，他为《自选集》写的自序中，还对盲从岳珂记载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不仅如此，在《自选集》出版以后，他还就辛弃疾的经济生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印行，辛弃疾《书东流村壁》的作年与地点等问题进行论战。纽约城市大学李弘祺教授告诉我，他去年冬到北京探视恭三先生，当时邓先生进食都已很困难，但仍兴致勃勃地谈他同人论战的情况。一些老同学告诉我，恭三先生在病危时，仍以未能写作他久已酝酿的两篇批判文章而抱憾。可以说，邓先生写作六十年，论战一甲子。

有些关心他的人常为他的好论战而担心，怕他得罪人太多。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认识未必正确。

有些人认为邓先生年高德劭，何苦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同人（包括一些后生之辈）去论战，太不值得，也降低了自己的身分。这是用庸俗的眼光来看待恭三先生的论战。在他看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无年龄、身分之分。真理愈辩愈明，学术愈争愈进。

当然这并不是说，邓先生在每次论战中都完全正确，他也有失误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人，但当他觉察了自己的错误，他勇于公开改正自己的失误，他也欢迎别人对他的批评。

堂堂正正，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恭三先生的风格。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风格。在当今学术领域受到歪风邪气的侵蚀，庸俗吹捧，拉帮结派，学钱交易，阴谋诡计之风弥漫之际，恭三先生的这种风格更显得十分珍贵。

垂暮之年的失落感与老而弥坚的论战风格，这两者之间贯穿着一种精神，或者说，它们是这种精神在不同方面的表现。这种精神就是一个中国学者的崇高的责任感，是他对祖国、对社会、对后人和对前人的高度负责的体现。这种责任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之一。

邓恭三老师的崇高的责任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1998年3月（剑桥）——7月（北京）

邓门问学杂忆

——恭三先生九二冥诞纪念

梁太济

1953年10月，当我作为本科新生刚踏进北京大学校园的时候，在历史系众多知名教授中，邓师恭三先生绝不是最年轻者之一，但也只有46岁，正处于精力充沛的盛年。

恭三先生给我们讲授的课程是中国上古中古史（三），内容范围为隋唐五代宋辽金约七百年间的历史，安排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每周六学时，是最最重头的课程之一。讲稿是先生亲自编写的，讲过课后就印发给我们供复习之用，累计起来，共有近30万字之巨的份量。当学生的未免有点怕考试，临到期末考试了，不少同学提出要求，请先生划定些“重点”。先生回答说：我们这段历史，在二十四史中占了八史，如果不是找出其中重点之重点，怎能讲授？既然已是重点之重点，还再划什么重点？这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读历史的不应该害怕资料的丰富，要善于从中抓住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对于前人既有的梳理和阐发，更要充分地吸收和消化。

恭三先生在讲课的同时，还指导全班同学写作学年论文，中心论题是王安石变法。记得当时曾印发了大量资料，主要从《宋史》的“志”中选出，字数当在5万以上。恭三先生用辅导时间作具体指导，让我们首先读懂并熟悉这些资料，然后要我们每人选定一个题目，进行写作。先生对每篇作业都作了极

其认真的批改。在我班同学中，原先志愿报考中文和哲学的相当多，写起作业来，有的可能文字过于花俏，有的可能对史实分析不足，而空泛的逻辑推理太多。这些，都受到恭三先生的严厉训斥。先生的类似训斥，至今仍像警钟一样时时在我耳边响起，史家作风（包括学风和文风）以平实为贵的观念则从此深深印于心底。

作为院系调整后通过全国统考入学的第一届学生，系里诸位教师对我们班的期望值都相当高。特别是作为北大也是全国的三两个专业之一率先将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以后，教师们的期望值就更高了。因为学制已改为五年，在专业之下遂分设了不同的专门化，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苏联史、亚洲史、欧美史等。恭三先生当时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课程设置耗费了大量心血。他邀请校内外诸名家开设的高质量课程，在对我们进行扎实的专业训练上都起了良好作用。其中我选修过的课程，计有向达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聂崇岐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李祖荫的中国法制史，翦伯赞的秦汉史研究，吴晗的明清史研究，汪篪的均田制研究和唐代党争史。大概是忙于著述和其他工作，恭三先生本人没有为我们开设专门化课程。

为了加强具体指导和个别辅导，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学生又被分成若干小组，宋史组由恭三先生亲自负责。我分在隋唐组，因而失去了接受恭三先生个别指导的良机，也无形中丧失了与先生接触、聆听先生教诲的不少机会。

在学生中间，对于每位教师，有时免不了要有所议论。关于恭三先生，当时有一句传自某教师的贬誉参半的话，说邓某某现在是作家了。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如下情况而发的，即在全系教师中，恭三先生著述最勤，发表的论著也最多。除去报刊

上的论文不计，光是成本的著作，我们在校求学期间出版的即有：《王安石》（1953，三联），《岳飞传》（1955，三联），《辛弃疾（稼轩）传》（1956，上海人民），《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皆1957，古典文学）。先生写的传记，中国古代史学生中未曾读过的几乎绝无仅有，而稼轩三书，由于早已声名远播，篇幅最巨的《编年笺注》又是首次印行，三书既为全璧，在学生中遂也流布甚广。当时的我，只是觉得先生的传记可读性强，稼轩三书为阅读欣赏辛弃疾作品提供了种种便利，搬走了不少拦路虎，而对于先生的识见，对于先生求真求实的为学态度，则是很少甚至毫无认识的。

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才深深感到像母校那样能随时接受名家指点的学术环境可贵，然而却已不可复再。经过几年摸索，经过对一些名家名著，其中包括恭三先生的传世名著的反复认真阅读，自以为对于治学的一些具体门径已经有所领悟。因此在1979年冬工作调动之日，由于今后可能即将以宋史为主攻方向，我拟订了一个进修提高的初步设想，趁路经首都之便，向恭三先生汇报并征求意见。当时我对社会经济，尤其是社会基础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在我读过的有关论著中，几乎没有一种不是大量征引《宋会要辑稿》的，而我又恰好在杨讷兄的帮助下刚购得这部当日相当难觅的大书，于是理所当然地把主要攻读此书列为设想的中心内容。恭三先生听过我的陈述以后，针对此点，淡淡地说了如下的意见：资料总得有个归处。若是北宋，总还得归至《长编》上。开始我有点不以为然。后来读书稍多，才逐渐体味到先生这一多年甘苦备尝的独具心得是怎样的有见地。靠自学暗中摸索的人，往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和固执，深陷泥淖而不知自拔，恭三先生的话促使我经

常以此自警。此外，还曾不时向先生请教过一些具体问题，也都获得了满意的答复。

我是1958年离校的。离校以后，总有十七八年未再谒见先生，也未同先生通过信。可是当我1976年春首次谒见先生时，先生竟还清楚地记得我的姓名，并主动讲起了当年的一些轶事。我在校绝无什么特殊表现足以给先生留下任何深刻印象，先生的如上反应表明，在他与学生的关系中，我不是特例而是通例。这就立刻增进了我对他的亲近感。1980年参加宋史研究会以后，时时处处受到先生奖掖提携，与先生的接触稍稍多了一些，对先生的品德和学术的理解也增进了一些。特别是他对待著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给我们树立了永久的榜样。

大约是宋史研究会1984年杭州年会期间，恭三先生提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通行本的一处重大脱误，即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丙申记事下，有将近一页的内容，原文脱佚，而误屏入了前文卷21建炎三年三月辛丑的记事。他说，在北京能找到的本子都查过了，都同此脱误，要我抽空查阅一下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查阅结果是：今本系据通行本补抄者，屏入部分虽已抽去，而脱佚依然，且中间不再留有空白等痕迹。当时，恭三先生在新出版的《岳飞传（增订本）》第190—191页，已经依据直接或间接出自《要录》的文献对此段史实作了准确的转述，可是仍在念念不忘地要找得确凿无疑的版本依据。后来才知道，文津阁本、影印文渊阁本，此处皆无脱误。

1994年春初，恭三先生在信中又提到浙江图书馆所藏《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有无缺卷的问题。当时先生正应约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拟将影印出版的此书写一序言。先生翻检过多种抄本，均缺6、7两卷，5、8两卷各缺一半，114—

119卷共六卷亦全缺。而《全国善本书目》著录的《长编纪事本末》，则以浙图所藏者置于首位，其他各馆所藏皆注明缺卷，唯独浙图未注，似为全帙。先生认为此事甚为可怪，并断言：“杨仲良书之流传于今世者，必无一部完整者，且其所阙篇卷也全都相同，浙馆所藏不会独异。”何况光绪六年（1880）“浙江书局编纂《长编拾补》时，所用《长编纪事本末》乃自面朱楼借来，可证浙馆入藏此书为时必较晚，因而不可能得到不阙卷的抄本。”但先生仍然认为，判断只是判断，还必须与原书直接验证，才能确定。要我去浙图查阅一下，情况到底如何。查阅结果是：除卷5亦全阙外，其他各卷缺佚情况与先生所访全同。入藏时间也确已甚晚，乃自嘉业堂转入浙图，而嘉业堂又得自结一庐旧藏者。书内尚夹有嘉业堂藏书签，上书：“IE黑丝抄本，六十四册。原缺数卷。结一庐旧藏。”不知《全国善本书目》缘何有此疏误。

1996年春，恭三先生在信中又谈到近人书目所载鲜于绰《皇朝传信录》的真伪问题。《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郎亭知见传本书目》等皆著录有鲜于绰《皇朝传信录》一书，且谓其内容所记为绍兴元年至二年事。先生认为：鲜于绰乃神宗、哲宗时人，怎能预记绍兴初年之事，且与《郡斋读书志》此书解题之言，“记国朝杂事，多言元丰后朝廷政事得失、人物贤否”，显然不合。因为据《全国善本书目》所载，此书今唯杭州大学图书馆有藏，先生要我就近查个究竟。查阅结果是：全书10卷，所载确是自绍兴元年正月至二年十二月间之事，然与《三朝北盟会编》卷144——154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前九卷每卷与《会编》之一卷相当，卷10则与《会编》卷153、154相当。）当是鲜于绰原书早佚，后人节抄《会编》冒充者。显属假冒伪劣的赝品。

就近查阅《长编纪事本末》和《皇朝传信录》两事，有如先生用两桩实例对我进行的教育，使我切切实实感觉到，只有像先生这样，才是治学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

1980年，我曾在一篇习作中，作为两宋土地所有权转换加速的论据，从恭三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1957年第一版）中引用〔最高楼（吾衰矣）〕的“千年田换八百主”。此句之下，当时先生尚未加笺，可是在1993年的增订本中，则已引《景德传灯录》卷11《韶州灵树如敏禅师》作了详细的笺注。如敏死于南汉乾亨二年（928），《景德传灯录》成书于宋景德年间（1004—1007），则这一出于敏口、载于灯录的“千年田，八百主”的社会现象，显然不是宋代才有的，自可追溯至唐末五代乃至更前。〔最高楼（吾衰矣）〕词初版共有5则笺注，增订本增至9则，其中删原注1则，新增实共5则，超过原注一倍以上。增订本用力最甚之处，主要表现在考订调整诸词的编年上，但于此亦可见先生对著述精益求精的大概。

恭三先生的《辛稼轩年谱》，在它编定之初，即已远远超越于此前的四种年谱之上，但先生仍然从未放弃过使年谱更臻完善的努力。辛启泰曾经见到的济南和铅山的两种《辛氏族谱》，先生一直“疑心”他并未充分加以利用，因此也一直存有想见到此两种族谱的期望，并在1957年《辛弃疾（稼轩）传》的后记中公开吁请读者帮助寻访。先生的期望没有完全落空。八十年代中期，在铅山县档案馆友人的帮助下，先生终于见到了《铅山辛氏宗谱》的第一本。虽然其中所收资料，出于明清人伪造者十居七八，但有一篇《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历仕始末》，却确是出自南宋末年人手笔，是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文字。它不仅证明先生当年的“疑心”是正确的，而且以此为主要依据，完成了对《年谱》的全面修订。此外，对于辛

稼轩词作以外诸诗文的搜辑及其真伪的鉴别，先生也是穷毕生之力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因此，先生终于谢世之前，给世人留下了业已公开出版的稼轩三书的更完善本子：《辛稼轩年谱（增订本）》（1997年），《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1993年），和《辛稼轩诗文笺注》（1995年）。

在1990年暑期一次审稿会间隙的私下闲谈中，恭三先生曾提到，他有幸在傅斯年、陈寅恪、胡适三位硕学大师身边工作多年，除接受直接指导外，还在识见和具体方法上受到不少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不才，不足以透彻理解先生学术的底蕴，但如先生在《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中说的：

我把宋辽金对立斗争时期的历史作为我进行研究的主攻对象，而在这一时期内的错综复杂的事物和问题之中，我的研究取向则是倾斜于政治、军事、学术文化诸方面。就此诸方面的静态现象说，是一些典章制度之类的东西；就其动态现象说，则离不开从事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等事业的人。

确实是对他一生学术活动要点和重点的极妥贴归纳，既反映了先生的现代意识，又反映了先生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扬。而先生毕生迄未中断研究的四个人物——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也确实是在宋辽金对立斗争时期政治、军事、学术文化诸方面错综复杂关系中的关键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这几个人物，辅之以重要的制度，把整整一代历史的研究都带动起来了。这在断代史研究中是极具个性特色的。

在这次闲谈中，恭三先生还谈到后来在《自序》第四节以沉重笔触写下的“所不解者”那段文字的内容。恭三先生自谓

对岳飞生平及其事迹，“用力最多”，确是实情。先生对有关岳飞资料的审核、鉴别、考证的成果，具有拨开重重迷雾的澄本清源作用。先生提出的把岳飞研究提高到学术研究水平上来的基本要求：“不能专从诛恶扬善的观点出发，而应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对有关资料〕加以对证分析，使一些真伪杂揉、是非歧互的记事真能水落石出，真情大白。”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值得先生地下欣慰的是，后人的岳飞研究，包括曾经受到先生批评的那部资料丰富翔实的传世力作《校注》，实际上都是在先生如上正确见解的指引下进行的。其间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虽然彼此互有歧异，但后人在将它与先生的成果一起都视作更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时，一定会从中作出正确而公允的判断和抉择，先生的业绩和心血是绝不会被抹煞，也是抹煞不掉的。

为邓先生祝寿

郝斌

邓先生的脾气，我们都知道。单说祝寿这件事吧，直到他老人家八十八岁那年，我们都有点坐立不安了，才串联起来，计议一番，觉得不能再兜圈子，得直截了当向邓先生当面提出不可了，哪怕一个钉子碰回来呢。平时，杨讷在邓先生面前的面子最大，这件事自然落在他的身上。他也觉得没有把握，但是愿意鼓起勇气去试一试。事先，他准备好了一通铺垫的话，见面之后，话头刚刚转到祝寿，就被邓先生劈头拦断。邓先生说“过生日的话，现在别提。不是不过生日，我考虑过了，从一百岁那年过起。”杨讷说，先生脸上的表情，比答话还干脆、还坚决。

我们这一班，1953年进入北大历史系。1954年，听邓先生的中国史，宋辽金一段。平时，听讲、看书，偶尔有个课堂讨论，一切按部就班，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没有什么深刻印象留下来，倒是朱仙镇之役、王安石变法，翘首已久的几堂课，听得有点失望：没有什么热闹，同想象中的距离颇远。此后，除去过年过节，再没有同邓先生接近的机会。

1958年，毕业前夕，赶上“双反运动”。“双反”的本义，我记得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之后，不能忽视无产阶级肌体自身存在的弊病。用口头语言来表达就是：不要以为

打退了“右派”的进攻，我们身上的毛病就也被打掉了。因此，要整改，要拿出同反击“右派”进攻一样的勇气去反对自己身上的毛病。具体说就是要“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头反了几次，不知怎么，一来二去，就为“拔白旗、树红旗”的口号所代替。在历史系，“拔白旗”，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资产阶级史学方法”。于是，我们这一群，哄哄嚷嚷，写大字报，开批判会。在一片革命气氛中，甚至连毕业典礼都没有举行。这次“拔白旗”，我们又接触到邓先生。

不过，这次运动有政策。一是只批观点不批人，就是说，不能点名道姓；一个人的观点，可以批，几个人的观点，相同或相近，也可以合在一起批。二是“背靠背”，不能象批“右派分子”那样当面开火。开始，是从胡适、蒋廷黻的著作里找出几句话来批，批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或者说当时也没弄清楚。总之，运动有点冷冷清清。冷冷清清，这是运动的大忌。不久，有一种解释：胡适、蒋廷黻的观点虽然自成体系，这两个人同现在的青年学生毕竟已是隔代之人。批判他们，对学生来说，难免如同隔靴搔痒，虽有教育意义，也不会很大。而系里的几位老先生，观点、理论虽不如胡、蒋周详完备，但离学生很近，批判他们的观点，学生一定震动很大，“教育效果好”。何况，几位老先生本是胡、蒋的及门弟子，观点一脉相传呢。这个解释很令我们信服。对策也就从这个解释中自然产生。于是，一声号召，全系学生翻讲义，翻笔记，从中寻找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这一下，几位老先生几乎人人有份。而邓先生的“四把钥匙”首当其冲，成了现成的靶子。所谓“四把钥匙”，就是邓先生主张研究中国史，必需掌握年代学、历史地理学、职官制度和目录学，他说，这是走进中国史大门的“四把钥匙”。我们的批判之词，开始是“忘了马列主

义这把金钥匙”。跟着，辗转升级，说“四把钥匙的实质就是取代、排斥马列主义这把金钥匙”。

毕业之后，各奔东西了，留在历史系的，同邓先生的接触日渐增多，离校的，或教书，或研究，也不免常读邓先生的文章。岁月流逝，我们由青年而中年，又由中年而近老年了。大概到了中年的时候吧，阅历渐渐多了一些，该当如何待人处事、待人待己，有了一点体会，不知不觉间，对邓先生，打从心里尊敬起来。比如说吧，读了邓先生有关王安石、岳飞的著作，想起当年听课的那种不满足感，多么幼稚，不要说史学殿堂，就连门槛还没看到；体会到“四把钥匙”是治史的基本功，缺少一把也要事倍功半，再想起当年的邓先生，对批判并不接受，但对我们从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待之如常，这个时候，心里的感觉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邓先生是个率性的人，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都落在脸上。说起话来，用语明确干脆，绝少含混之词。

1979年，邓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认为，教学混乱多年了，目前的状况简直不能容忍，必须大力整顿，尤其是基础课。谁可以上台讲，谁必须下讲台，邓先生有决有断。而且今天定下来，明天就去办。他跟我说过：“基础课，第一个该上台讲的我，可我这个岁数了（七十二岁），精力不行了。精力要行，我不能推托。能上台的还有两位，可他们上不了台。这是可惜的事。其他人，还有谁？可课不能不开呵！我从外边请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保住这门课。”那个时候，“群众说了算”的余风还相当浓厚，邓先生这样做，今天回头来看，不仅有魄力，而且有担当。我当时是历史系总支书记。我受环境气氛的羁绊，没有完全支持邓先生。邓先生不满意，约我到家里说：“我当系主任，我得负责任；你是总支书记，

我希望于你的是支持我，不是扯后腿。你支持我做事，我才能负责，扯我后腿，我就负不了责——那就你负责。”话语的分量很重，可脸上一片慈和。邓先生采取的措施，是教学上的一场拨乱反正。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因此，对邓先生这番谈话的良苦用心也就没有体会，我当时看在眼里的只是一点：邓先生的慈和态度。“文革”期间，在“牛棚”里，我和邓先生同处三年。我的感觉是，我们彼此相知，是在这段时间。“牛棚”最后一个月，只剩了邓先生和我两个人，监管也大为放松。那是我们无话不谈的时候，甚至，莫名其妙，产生了“留恋”这片小天地的感觉，而发怵“到群众中接受改造”。再后，到江西鲤鱼洲劳动，编到一个班里，我们不能深谈什么，但在只言片语、生活琐事之中，彼此的感情也能得到交流。大概是这段交往的缘故吧，邓先生说完之后，我还是坚持了原来的看法。我认为，邓先生的办法不是“自力更生”。但不便生硬搬出这四个字。“自力更生”与否，在当时有特定的政治含义，可以上纲到路线问题。我还认为，这个做法得罪人太多，没有顾及“多数”。这个话，也没敢直说。因为，走不走“群众路线”，也是原则性问题。总之，这类太原则性的话，都不能说。恰巧，在此之前的几天，报载一条消息：日本常年从中东进口石油，由于什么原因，交通受阻，油价大涨，日本存油无多，工业大受掣肘。我借助这条报道作比喻说“万一哪天‘进口石油’来不了，‘国产石油’也有情绪，怎么办。”邓先生说，从现在起，该进修的去进修，该备课的去备课。不过，我注意到，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脸色已经有变，面部肌肉都有点抖动。接着说，“本来该留你吃饭，今天就不留了。”我知道今天非同一般，邓先生真生气了，只好悻悻退出。在此之后，对邓先生的决断，我在心里虽仍有保留，但是不再说什么。直到

78级、79级学生越来越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学习能力之后，我意识到，如果原来那种不规范的、游击式的教学方式整顿而不彻底，不只对不起学生，就连任课老师也可能被轰下台来。——这时，我才体会到，邓先生显示出来的，不只是魄力和决断，更可贵的是那种决不随波逐流的精神——诸如此类的事，一件一件，让我对他不能不心生尊敬。

八十八岁寿辰将到的时候，杨讷再次试探，邓先生居然首肯了。但有条件：不要张扬，只在邓先生寓所近旁，朗润园里唯一的小餐馆里聚会一下就行了。十几个人，有从云南远来的戴静华，有在京的几个同学，还有邓小南和她的女儿杉杉。大家挤在一间小屋里，勉强站起身来，第一杯酒，祝贺了老人家寿辰，邓先生连声道谢，也要起立还礼，但他因身躯宽大，椅子紧靠墙面，移动不得，才没有站起来。此后，就再没有什么祝寿的话了。倒是我们，久不相聚的老同学东拉西扯，谈话没有主题，邓先生也跟着我们说西说东，就象我们中的一员。邓先生就是这样，严肃的时候，真可以叫作不怒自威，这是他感情生活的一面。另一面，他又是慈祥而幽默的长者，有说有笑，亦庄亦谐。就连我们学生时期的轶事趣闻，自己都忘了的，他还记得，说起来有声有色。甚至，给他的学生，给他学生的学生，送一个绰号，也是常有的事。这个时候的先生，说得那么高兴，笑得那么开心，简直天真得像个孩子。我们在旁边看了，也不能不深受感染，由衷地为他高兴。那天，在座的有周南京，我们常到他家聚会。他的夫人郑允飞是新加坡归侨，也是历史系毕业，烧得一手南洋风味的好菜。我把话题说到这儿的时候，邓先生兴致盎然，居然说他也想尝尝，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天气渐渐暖和了，周南京夫妇在家里准备了自助餐。邓小

南一手搀扶着老爸，一手提着一瓶茅台酒，如约而至。一进门，邓先生就指着周南京说，“隔了这么久了，我以为说话不算数了。想打电话问你，怕你不好意思。今天总算等来了。”那天聚会，人多房间小，一半人在屋里，一半人在院里，出出入入，别成情趣。周氏夫妇的菜肴，名不虚传，这一餐，邓先生确实吃了不少。

九十大寿到来，杨讷再去见邓先生，邓先生说，“何必非得生日那天，往后推，哪一天都行。”——过生日都可以往后推，恐怕也是先生性情豁达、不拘小节的一个反映吧。四月五日，一个休息日，邓先生的两位女公子，邓可因、邓可蕴以及我们十多人，大家乘一辆面包车，来到植物园。还好，当天的气温是摄氏25度，邓先生兴致很高，不停地走，不停地走，边走边聊，直到我们都走累了，几次提出，该找个地方坐一坐喝杯茶，邓先生方才点头。林华国早已打听到了园内饭店（曹雪芹餐厅）的所在，大家围坐一桌，照例先起立为先生祝寿，先生照例起立道谢。席间另加了一个祝寿项目，邓可蕴和我各为先生清唱一段京戏。这顿饭，足足吃了二个小时，尽兴而散。

忆邓广铭师二三事

周宝珠

1961年9月至1962年9月，我从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跟随邓先生学习宋史，这在我一生中都是一件难以忘却的事情。进修期间，先生对我谆谆教诲，耳提面命，使我受益匪浅，而先生的人品学问，在我耳闻目睹之后，更使我万分敬仰。一年的进修时间太短了，尽管我拼命学习，但仍感向先生学习到的东西太少了，我多么想把师道南传，传到河南，可惜识薄学浅，哪里又会胜任呢？这一点使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好在，我回校工作把基本方向确定了下来，教中国古代史的同时，重点定在宋史，这不仅是我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也是学校地处开封社会工作之所需。开封为北宋首都，北宋在中国古代史的地位又是那么重要，不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社会事务，我都应当把学习宋史、研究宋史，作为我的一种事业，一项社会责任。为此，每遇到工作中的难题，我就利用过去的师生关系向邓先生请教，并能及时地得到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从而与先生的情谊日益深笃，没齿难忘。今趁北京大学历史系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纪念邓先生冥诞之际，特就萦绕在我心头的事，追忆二三如下。

我在北大进修期间，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正主编

《中国史纲要》一书，书稿初成，立即受到校内外的的好评。而《纲要》的辽宋金部分，则是由邓广铭先生执笔撰写的，这一部分是新中国第一次建立起来辽宋金教材体系，以宋为主，辽、宋、金三史并列，很有特色。有一天，高教部长杨秀峰到北大视察工作，曾向邓先生提出，要他撰写一部宋代的断代史，以补断代史中宋史这一缺门。然而，邓先生却婉言谢绝了。当时，北大历史系的许多同仁，都劝邓先生接受这一任务，认为非邓先生莫属，并说：“《纲要》中辽宋金部分已写出十几万字，稍加扩充，即可成稿。”邓先生回答说：“十几万字看来像一滴油，稍加水，便不成其为油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反映出先生的治学态度多么严谨，一丝不苟，不愿加半点水分。不久，这部教材正式出版，成为国家教委向全国大学历史系的推荐教材，它以简明扼要、阐述精湛而著称，高校中不少人认为，《纲要》写的像“压缩饼干”，没有半点水份，这评价正与邓先生撰写的初衷是完全一致的。后来，我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的自序中看到有这样的话意，述说他自己晚年还萌发要继续写作的“非非之想”中，“也竟未敢把撰作辽宋金史的事包括在内。”邓先生是一代宗师，宋史泰斗，这是公认的，他晚年对辽宋金史仍然一再提及，虽未能实现，其精神还是令人感动的。

第二件事，是“文革”期间，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整个文化教育出版等部门，都受到极大的干扰。记得在1974年下半年，人民出版社的两位同志跑了不少地方，想找单位编写一本辽宋夏金史或宋史，最后到河南同有关领导谈妥，在河南省委及开封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抽调人力，组成了一个三结合的编书小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忽然有人谣传，当初这本

书是江青让编的，一时间弄得编书组人心惶惶，几欲停止。1979年初稿写成后，我们邀请了国内十几位宋史专家来开封参加审稿讨论会，邓先生慨然允诺。在这次讨论会上，邓先生义正词严驳斥上述传言说：“这本书是我推荐周宝珠、陈振他们编写的，与江青毫无干涉。”人民出版社的约稿编辑也证实了此点。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人民出版社组织书稿的底蕴。我们根据邓先生的建议，删除原稿中辽、夏、金等部分，只保留两宋，独立成一体系，定名为《简明宋史》。

这里我要补充说一点，在审稿会期间，我们请邓先生游览了开封的名胜古迹，参观了开封市博物馆等处。邓先生是第一次来开封，游兴很高，他谦虚而幽默地说：“我不到开封，就没有资格搞宋史。”我们住在开封的人，不仅从中领略到邓先生治学的谦逊态度，更深知这句话的含义和份量，先生是在鼓励我们抓住地方优势，为宋史研究承担应有的责任。然而，我们自感遗憾的是，当1985年《简明宋史》一书出版时，书稿仍未达到先生要求的应有质量，有负先生的信任。不知何时能弥补这中间的过失，以使先生能含笑九泉！

另一件事，是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海正式成立，并举办首届学术研讨活动。那次会上，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略论吕惠卿》，这是受邓先生《王安石》一书的启发而写的。会议期间，我向邓先生汇报了读《王安石》一书的一些体会，想借机向先生请教。邓先生在1953年时出版了一本《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出版，不足五万字，把王安石政治家的风度颜貌及主要政绩清晰地展现出来，使人耳目一新。修定再版后，内容更加丰厚，读后令人有一种突出的感觉，除了感到邓先生学术功力深厚、论述精当、颇多新义之外，那就是提出了许多令读者思考的问题。我

曾不解地问先生许多问题，如书中点睛性地提出过吕惠卿、章惇等人的才学及变法中的态度和作用，本来是先生可以轻而易举解决而写进书中的事，为什么不加以发挥呢？先生笑着说：“一本书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不能写满，就是要给读者多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让读者有发挥的余地，这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对问题会更加深入地去研究。”经先生这么点拨，哦！我才恍然大悟，除我受启发写《略论吕惠卿》一文之外，又指导过我的学生写过论述章惇的文章，也是受先生启发而为的。写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宗旨，牵扯到的问题很多，作者不可能都一一去自己解决，也没有这个必要。除基本问题必须解决之外，有不少问题只需要点破，给人以启发，让读者去探讨、发挥，效果会更好。这也是写书的一种技巧，一种高明之处。能引起读者兴趣，参加讨论研究，作者何乐而不为呢？话又说回来，这不是一般写书者所能做得到的，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力，没有大手笔的气派，那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高屋建瓴，驾驭全局，指使若定，才能如是。

总之，邓先生对我的教诲是多方面的，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是无私的，他之所学恨不得倾囊奉献给学生。因此，先生之高才门人遍中外，能继承光大先生之业者滔滔皆是也，而唯我资质顽钝，如鸭在后，愧疚之余，以求先生及同仁之恕。

恩师恭三先生为我的学术研究指路

——刘凤翥

我青少年时期，生长在河北省盐山县王朴村，对各学界的知名学者一无所知。1957年夏，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9月17日我到校报到。9月21日下午，系里在教室楼（后称二教，今已拆除）的一个大教室举行迎新会。就在这个会上，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向新生一一介绍我系各教研室的老教师，当介绍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邓广铭教授时，身材魁梧、四方大脸的邓先生站起来向新生致意，大家鼓掌欢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先生的名字，也是第一次拜谒邓先生尊颜。开完大会之后，各教研室在文史楼继续小型迎新，新生可自行前往参加。我先到系主任翦老的办公室拜会翦老，接着又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拜会各位老师。邓先生又一一向我们几个新生介绍本教研室的各位老师，记得其中最年轻的是周良霄先生。邓先生还向我们谈了学习中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这是我初次坐在邓先生面前，聆听他对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师阵容和有关学习历史的宏论。虽然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至今犹历历在目。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一年级的学生一入学就得投入“反右派”的斗争。按上级规定，一年级学生入学时已经过严格政审，不划右派，但必须

旁听高年级的“反右”斗争。我们班就旁听五年级的“反右”斗争。该年级把一位云南来的女同学戴静华划为“右派”，其“罪名”之一为她曾对同学说“批判胡适时，有关领导逼着邓广铭先生汗流浹背地写批判文章”云云，她的同学则在下边小声说，她是邓先生的得意门生，所以了解情况，而主持会的人则说，批判胡适是在冬季，“汗流浹背”不符合事实云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训，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58年春，乘“反右”之余烈，各高等院校又展开了“双反”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有关方面鼓动学生之间互相贴大字报，也煽动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记得高年级的同学在文史楼给邓广铭先生贴的大字报中，说邓先生讲课时宣称职官、目录、地理、年代是治历史的四把钥匙云云。

邓先生还没有给我们讲课，他的名字通过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贯入我的耳朵之中，用“如雷贯耳”的成语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1958年的大学生活的课堂秩序全被运动、劳动、教育方针大辩论、“大跃进”等苛捐杂税打乱了。直至1959年春才稍好一些。邓广铭先生和陈仲夫先生给我们讲授辽宋金史。邓先生虽有讲义发给大家，但他讲课时并不照本宣科，讲课极为生动、灵活。他的课是大家极愿意听的课程之一。对史学界有争论的问题，他不仅讲自己的观点，也客观介绍他所不同意的观点，如唐宋是否有庄园制、“糺”字究竟怎么读，是汉字还是契丹字，等等。世间还有契丹字一事，我是在课堂上首次听邓先生说的，这对我此后终身从事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不能不说是最早的启迪。

1959年春，为了引导史学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翦老率先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邓先生闻风而动，立即组

织全系师生筹划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他一再号召正在听他讲课的我班同学积极参加，并一再督促落实此事。班干部虽再三号召，怎奈无人敢报名。大家总认为这是高年级的事，不是二年级学生干的事。为了向邓先生交差，学习委员就瞒着我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临近开会前三天才通知我，叫我赶快准备发言。我只好临阵磨枪式地进行准备，翻了翻《三国志》，看了一下当时报刊上的有关文章，用一夜时间写了一篇将近一万字的发言稿。大意是说曹操有功也有过，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是非分明。

1959年4月24日下午，在化学楼的一个大教室举行我系第一次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当年5月8日又举行了第二次）。黑板上除了写有“曹操问题学术讨论会”之外，还用粉笔在黑板两侧各画了一个分别为红色和白色的京剧脸谱式的曹操像。会议由邓先生主持，他先讲了主办这次讨论会的意义，接着说这是一次师生结合的讨论会。报名发言的不仅有老教师，也有青年教师，还有二年级的学生刘凤翥同学，接着他按发言逐一念了发言者的名字。这时我才知道，所谓学生，只有我一人而已。顿时紧张得不得了。翦老是第一个发言，我还注意听了一下，后面的发言我就没有心思听了，心中直盘算如何闯过这一关。当论到我发言时，我就走到前面低着头一个劲念稿子，还念了两三个白字，就坐在我对面的翦老还替我纠正。我把稿子念完之后，翦老和邓先生带头为我鼓掌，翦老还上前与我握手。会议结束时，翦老说，今天的会开得好，所有的发言全部发表。今天来参加会的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同志，今天的发言全部交给《光明日报》，就对不起《文汇报》了。

邓先生当时正任《光明日报》“史学”栏的主编，他在编辑这组发言时，让我把稿子再修改一下。学习委员朱学习与陈

智超一起代我把稿子改好交给邓先生，很快就在当年5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学术讨论会，也是平生第一次发表文章。由发言时的紧张、害怕，变成了永恒的愉快回忆。这对我此后的学术生涯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从四年级第二学期，教学秩序又步入正轨，我与另外12位同学被分配在中国古代史专门化。邓先生和向达先生等当时北大知名的史学大师分别给我们开设专题课，5月12日开始，邓先生给我们讲土地制度史。我与邓先生的关系更密切了，经常去邓先生的家中请教问题。

1962年4月5日下午，邓先生结合他自己写《岳飞传》和《辛弃疾传》的经验给我们讲写毕业论文的方法。他说，他从北大历史系毕业之后留在北大当助教，每年春季放春假七天，他就利用毕业后的第一个春假写了《辛稼轩年谱》，当时市面上已有梁启超的《辛稼轩年谱》发行，自己既然做此事当然力争有新东西。邓先生说，当时我之所以有一定的把握，是因为估计到当时梁启超太忙，没有时间细找史料，他所用的资料肯定都是容易见到的大桌面上的一些史料。有的学生批判我的四把钥匙，当时我只用了一把钥匙，那就是目录学的知识，就超过了梁任公。我想，凡是辛弃疾待过的地方，当地的地方志中可能有材料；辛弃疾的朋友多是名人，多有文集传世，他们的文集中也可能有辛弃疾的材料。我就到相关的地方志和宋人文集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许多梁任公没有见过的材料。例如辛弃疾是否结婚，梁任公认为“不可考”，我则考出辛弃疾在何时何地娶了谁的妹妹，生了几个孩子，一下子放了一个不大的“卫星”。文章发表后，一炮打响。邓先生这一下午的经验之谈，使我们终生受用无穷。

临毕业时，我们专门化的业务鉴定评语均由邓先生写。由于邓先生的提携，大家被分配的工作岗位都不错，我也得以考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读研究生。

毕业后，我仍经常去邓先生家中请教问题，“文革”时期除外，每年都去几次。

1997年7月，邓先生因病住友谊医院，我听说之后去看他。他对我说，手术很成功，计划8月2日出院。他还问我辽史学界的动态，我说新出土了韩知古后人韩匡嗣、韩德威等四人的墓志。邓先生说，韩知古一系与辽王朝同兴衰、共荣辱。韩氏家族的兴衰就是辽朝的一个缩影。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是永别。

我要永记邓先生的教诲，学习他的品德，把他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谨以此来纪念恩师恭三先生。

走近邓先生

杨 讷

邓先生极少做寿，但在去世前三年里，两次接受了我们五三级部分同学为他做寿的请求。

第一次是在九五年，他八十八岁，我们提出为他做米寿。他起初不同意，我们再三说明这只是一次极其简单的师生宴聚，他才勉强应允。时间是三月十二日中午，地点在朗润园北招餐厅。参加的同学有戴静华、萧曼、郑家馨、周南京、郝斌、吴宗国、何龄修和我。邓先生由邓小南和外孙女林杉陪同出席。餐厅虽然为我们准备了单间，但房间既小，陈设又差，绝对称不上雅座，吃的也都是家常菜。之所以选这个餐厅，无非图它近便——距邓先生寓所不到二百米。席上唯一能让人看出是寿宴的，是从校内另一餐厅订制的一份生日蛋糕。不过，简陋的饮食并没有减少大家的兴致。席间师生说今话旧，谈笑风生，其乐也融融。

第二次在九七年，邓先生九十岁。我们又提出为他祝寿。这次他没有反对，只是说，“我们春游去吧。”三月中旬，天气尚寒，故而推迟了些时候。四月初从气象预报得知近日天气转暖，我们便定在五日游。那天上午九点多，一辆面包车把我

们从朗润园带到植物园。其时小南携女去美国，陪伴邓先生的是可因和可蕴。这天天气少见的好，植物园内真是个风和日丽，鸟语花香。邓先生穿着可蕴新近给他买的米色春装，显得格外精神。我们这群年逾花甲的男女弟子随着九十岁的老师边走边谈，款款而行。中间在茶座饮茶小憩，最后至曹雪芹故居餐厅用餐。与两年前的寿宴相比，上的依旧是家常菜，但用餐环境好多了。宽敞明亮的大厅用屏风隔成两半，我们这边仅此一桌。隔着窗子，可以看到新绿的嫩柳和盛开的桃花，还有远处平缓的山坡。在这样的环境中用餐，自不会在意菜肴的高低。邓先生胃口很好，食量不让我们这些弟子，高兴地讲了一些往日的趣事。可因、可蕴说起京剧，郝斌自告奋勇，唱了段黑头戏。还有人追忆年轻时代的梦幻，慨叹人生苦短，往事不再。数小时无拘无束的欢聚，其乐也洩洩。除非知情，谁能想到这样一次春游竟出自九十老人的倡议。

二

我们这一年级的学生是五三年入学的，五八年毕业。五四年下半年我们二年级，邓先生给我们讲《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在这以前，我们已经上过张政烺先生的《先秦史》和汪篾先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课，免不了把三位老师做些比较。张先生那时四十岁出头些，他的博学强记是出了名的，我们入学不久就听说了，但他不擅言词，讲课非他所长。而且张先生根本不赞成西周封建论，可是讲课必须按西周封建论讲，实在让他为难。汪先生那时年轻，很能讲，但把握不住进度，讲到自己特别有心得的地方往往失之过细，以致学期终了，课程未完，后来再补发部分讲义。三位老师中，邓先生年纪最长（其

实才四十七岁，按现今标准，仍在年轻教授之列），也最有授课经验，进度把握适当，讲义发得及时。三位老师讲课都十分认真，但对待学生宽严不同。张先生对学生很宽容，学生有错，点到为止，不多指摘。邓先生是有话即讲，不留情面。那一年试做学年论文，有位同学论文中用了“仁宗崩”三字，邓先生就在课堂上指出“崩”字是封建时代用语，今人写文章不要用，弄得那位同学很不好意思。后来我们明白，张先生和邓先生对学生都是爱护的，其宽严不同是他们个性所致，但当年并不明白。我们时不时还听到从高班同学或年轻教员那里传来的一些议论，说邓先生在学业上对人要求如何苛刻，批评人时用语如何尖锐，等等。对邓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方法，那时又不太理解，故而“大跃进”时我们班上有些同学积极参与了对邓先生“四把钥匙”说的批判。直到毕业，我们同邓先生的关系并不密切。

我有机会同邓先生长谈，始于五九年。那年历史博物馆建新馆，我在四月初被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派去参加工作，给隋唐组组长阎文儒先生当助手。过了两个月，邓先生也被请来，担任隋唐宋元大组顾问。邓先生来了以后，我逐渐同邓先生谈上了，这才发现，过去我们有点畏惧的邓先生，竟是无话不可谈、无话不可与谈的。尤其是在十月历博正式开馆以后，许多外来支援工作的人回原单位去了，只留下少数人以备陪外宾和首长参观，我和邓先生都在其中，这份差使相当清闲，我们交谈的机会更多了。我从邓先生谈话中知道了许多事情，学到不少东西。然而好景不常，我从历博回到历史所后，劳动加运动，一晃十几年，中间很少有机会去看望邓先生。直到七五年我被借调到《历史研究》杂志社工作，去看邓先生的次数才又多起来。这时我注意到，我们同学去看望邓先生的也愈来愈多了。其实邓先生还是邓先生，他为人、处世、治学是

有一定之轨的，不大随世风转移。只是我们年纪大了，阅历多了，感到邓先生之可敬可亲，密切了师生关系。后来邓先生两次同意我们为他做寿，原因就在这里。

三

我很惭愧，至今没有通读邓先生的全部主要著作，但我对邓先生的治学精神多少知道一些。研究历史、讲授历史，对邓先生来说不是职业，而是事业，他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他治学严谨，重视实证，反对空谈。“严谨”两字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而邓先生一辈子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出于严谨，他在八十六、七岁时还亲自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查阅资料。出于严谨，他不肯在别人的著作上随便挂名。出于严谨，他从不插足自己不精不专的领域。他自己严谨，也要求别人严谨，故而不能容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做事马虎。我想，这是他被人目为“苛刻”的原因之一。

邓先生在指摘别人时的确用词尖锐，甚至使人难堪，但他是直率的，没有埋藏什么恶意。他用词之所以尖锐，部分由于他的个性，部分是受前一代文风的影响。看看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健将，喜欢用尖锐言词写作或辩论的，人数真不少。他们对别人尖锐，也能承受别人对自己尖锐。邓先生从事著述起于三十年代，自然会受那时文风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邓先生看问题是否都正确，对别人是否完全公正，那是另一回事。邓先生本人并不认为自己都对，否则就不会一再修改自己的文章了。

1998年8月于温哥华

邓先生鼓励我当好北大图书馆馆长

林被甸

尊敬的邓先生离开我们已快一年了。邓先生是一位公认的严师，可是在我同他多年的接触中，感到他又是一位可亲可近的严师，对学生、对教育事业有一副难得的火热心肠。在他鼓励我当好北大图书馆馆长这件事情上，使我对这位严师“可亲可近”的一面，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1993年夏，学校要调我去当北大图书馆馆长。由于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时大有历史系故土难离之情。后来领导上说可采取“离乡不离土”（保留在历史系的编制）的政策，我又担心自己力不胜任，挑不起这副重担子。在我心绪不宁，顾虑重重之时，历史系我的师长们都积极鼓励和支持我，邓先生就是其中极为热情的一位。

一次，我去拜访邓先生，邓先生给我讲了好多有关他自己和图书馆的故事。原来，他与北大图书馆有着一份特殊的情谊。他年青时就很向往北大，1930年秋，从山东老家来到北平。因大学招生考试已过，就与一位在北大预科念书的早年同窗好友共同租沙滩一间民房居住，靠借用来的一個借书证出入北大图书馆，饱览群书。邓先生说，他是先成为北大图书馆的读者，而后才成为北大学子的。1932年，他正式考入北大，更与图书馆昼夜相伴，丰富的馆藏使他受用不尽。他的毕业论

文《陈龙川传》，就是在北大图书馆完成的。也可以说，他毕生从事的宋史研究是在北大图书馆起步的。

当他听我诉说到馆长走马上任就面临盖新馆等繁重任务时，他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连声说：好事，好事，机会难得嘛！他随即回想起六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当时他刚进入北大，看到北大图书馆馆舍陈旧简陋，内心十分不平，遂给当时的校长蒋梦麟写了一封信，建议北大应盖一座可与北京图书馆媲美的新馆舍，并为校长出谋如何筹集款项等等。可见邓先生当年就是一位壮志凌云的北大学子！由于盖新馆舍已列入校方计划，所以他上四年级时宏愿居然变成现实，一座宽敞明亮的大楼拔地而起，条件大为改善。他甚至有幸在新馆借得一间个人专用阅览室，包括整理艺风堂历代拓片等大量研究工作就是在那里进行的。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这样幽默地写道：“‘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全唯此室是用，它使我真正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乐趣。”谈起当年北大图书馆老馆员们如何热情周到而又便捷的服务时，他充满了怀念之情。当然，一旦讲到图书馆的服务时，他又不免又要进行今昔对比，数落今天图书馆如何如何不尽人意，如中午、下午各阅览室要闭门，高声驱赶读者，以及工作人员由于不熟悉业务竟然回答前来借阅的读者：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史通》，只有什么“通史”之类的笑话等等。这类“今不如昔”的慨叹，我在邓先生及其他师长那里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谈话间，邓先生认真地对我说：“图书馆对一个大学来说太重要了。你知道吗，不少学者是向往北大图书馆而投奔北大的，也有的则由于留恋图书馆才没有离开北大。”在我起身告辞时，邓先生握着我的手说：“图书馆需要有责任心的人来干，我相信你会干好。”

邓先生的一席话，的确深深打动了。尤其是对人对事都

“严”字当头的邓先生，不仅“认可”了我，而且如此耐心开导，热情鼓励，使我骤然间感到勇气倍增。我决定接受任命，暂且放下多年从事的教学和研究业务，从头来做对我完全是陌生的图书馆管理工作。至今，我到图书馆已有五年，可以说自己对工作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在馆内同仁共同努力下，各项业务也有了一些进展，但在读者服务方面仍然有很多未尽人意之处。现在回忆邓先生当年的嘱咐，内心不免感到惶恐和不安。

在我担任馆长以后，有两件事直接得到了邓先生的帮助和支持。

一件是向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索还胡适善本书和书信文件。1948年底胡适在离开北平时，将他的私人藏书和信件全部寄存在北大图书馆。1954年中宣部资料室取走了胡适的大部分书信文件，以后转到了近代史所。1964年文化部又决定，将胡适的一百零五种善本书送交北图，一千九百二十四件书信文件送交近代史所。而胡适早在1957年已经写下遗嘱，将他的全部藏书和书信文件无偿捐赠给北大。按照政策，北大理所当然是胡适全部藏书和书信文件的合法拥有人。索还工作在我任馆长之前，图书馆已经开始进行，复制来了胡适遗嘱的复制件。我到馆以后，开始与北图的领导接触。对方表示理解北大的要求，但希望得到上级领导的指示。1995年2月我请张芝联先生牵头联系了北大七位政协委员，向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联名提出议案，要求尽快将北图和近代史所得自北大的胡适藏书和书信文件归还北京大学保管。同时，我趁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机会，直接上书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请求中央领导关注和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听说，李瑞环同志对北大反映的意见很重视，当天就批转给国务院。国务院秘书局就我的上书征求

文化部和社科院的意见时，近代史所竟然完全否认他们现藏的胡适书信文件是得自北京大学，而声称是他们于1950年进驻胡适的原住宅办公时直接接收的。对于近代史所的这一作法，我是没有想到的，胡适寄存私人藏书和书信文件的事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如何澄清事实的真相呢？当年曾经了解胡适藏书寄存北大情况的人，绝大多数已经去世，最值得庆幸的是有邓先生在。当邓先生听说近代史所复函指责北大反映的情况“不符合实际”，连连摇头，他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6月14日，邓先生亲自写了证明材料。其中说：“1948年年底，当时北平和平解放的局势已定，但解放军尚未进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郭松年等人到东厂胡同一号把胡氏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等一律装箱，共装了一百零二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战争期内，把所有藏书送往天津银行保险时所做的），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此情此景因我当时仍然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所以全得亲眼目睹。现虽已事隔四十多年，但我的这一记忆必不至有误。”邓先生的证明彻底澄清了这一历史事实的真相，为北大向中央领导、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申明自己的要求提供了依据，也给我的工作以坚实的支持。胡适一生酷爱图书，痴心访书、藏书，是民国时期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因此，邓先生分外珍惜散失的胡氏藏书，他曾对我说“胡适藏书很珍贵，如果集中起来，就是一个收藏丰富的高水平的文史哲阅览室。”可能正是由于胡适善本书和书信文件本身具有极高价值，使得与对方单位达成将这批藏书和书信文件退还北大的共识困难重重，至今尚无合理的结果。但是，不管怎么说，北大索还胡适善本书和书信文件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愿邓先生的这一遗愿，有朝一日能够实现。

另一件是整理馆藏拓片。北大图书馆收藏的金石拓片达五万份，是北大的一项重要财富。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就曾安排罗尔纲整理过五年之久，抗战前邓先生也曾直接参加过这一工作。1985年邓先生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图书馆当时的副馆长郭松年请他为主编，以北大中古史中心名义，在古委会立“拓片史料发掘整理”项目，首先对图书馆的拓片进行整理编目。由邓先生主持的这一项目，获得了古委会的资金支持，由此得以聘用必要的人员，图书馆的拓片整理编目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长期以来，这些数以万计的拓片，仅用布包裹，分置各处，尘封虫咬，无法利用。现在，有了项目经费的支持，经过胡海帆、汤燕诸同仁的辛勤工作，五万份历代拓片全部整理编目，分装于三千个匣套，分类上架，取用十分方便。1996年古委会领导前来检查工作，见到一排排整理有序、摆放整齐的拓片，对我们的工作甚为满意，不仅在《古籍整理》刊物上发文介绍，而且追加了一笔新经费，使拓片整理工作，在邓先生工作的基础上得以继续进行。邓先生对我说，我已快九十岁了，干不动了，下一步你来做吧。于是我充当了此项目的新申请人。今年“五四”百年校庆时，还编辑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大型图册，这些成绩都是和邓先生所花费的心血分不开的，也是今天我们可以告慰邓先生的。

邓先生十分关心新馆工程建设情况。1997年春节我前去拜年，他送了两份新作《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刊《台大历史学报》第二十期）给我，其中一份是送给北大文库保存的，还亲笔签了名，从字迹看，他手颤抖得更加厉害了。他关切地问起新馆工程进展情况，我告诉他，大楼外壳已全部立起来了，看上去挺雄伟的。这次新馆建筑特别考虑了古籍保存的

需要，地下两层主要用于存放古籍，并采取了全空调设计、自动化安全监测和消防报警等先进装置。为了更好防虫、防潮，把从美国帕卡德基金会募捐所得的五十万美元，做了一千个樟木柜子用于存放古籍。这样，至今散置于各楼阁的古籍，就可以集中统一存放，做到一步到位，一劳永逸了。打个比方，北大古籍身价虽高，以前只能住个招待所，以后就可以住进星级宾馆了。邓先生听了异常欣喜，连声说：做得好。现在，一座传统民族风格与现代建筑和谐统一的新馆大楼已耸立于燕园的中心，新老馆连成一体，成为亚洲大学第一大馆。一生关心北大图书馆建设的邓先生若九泉有知，想您一定会与全体北大师生一起高歌同庆吧。

道德文章 长为师法

——怀念邓广铭老师

许怀林

今年春，惊悉邓广铭先生仙逝，不胜悲怆。邓师是我国宋史泰斗，一代宗师。他为历史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前进；他等身的学术著作，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将流芳不朽，永远造福后来学子。当此怀念邓师恩惠之时，想起欧阳修《祭尹师鲁文》之言：“自古有死，皆归无物。唯圣与贤，虽埋不没。尤于文章，焯著星日。子之所为，后世师法”。邓师的道德文章，著在简册，昭示世人，长为师法。

5月28日，邓小南教授寄来《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治史丛稿》二书，我顿时心悟，这是邓师晚年心血结晶之一。先生的《王安石》序言写于1997年3月9日，以90周岁高龄，勤力著述如此，于世能见几人？1943年1月27日陈寅恪为邓师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说：“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又说：“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实践，

证明陈寅恪的评议完全正确。我辈于此既叹服大师的深邃洞察力，也景仰先生建立新宋学的功绩，以及他超人的果毅志愿。

邓师毕生殚力竭智于学术，“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仅以笔者个人的经历，即能映见一斑。

笔者在邓师的学生群中，是进修生，属“杂牌军”。1961年10月至1962年10月，我在北大历史系进修，向邓师学宋史，同伴中有开封师院的周宝珠同志。我俩邀约一起去拜见邓先生。当时先生和我们随意攀谈，没有生冷严峻的气势。他的平和态度，消除了我的拘谨畏怯心理，谈完之后虽然意识到任务很重，却没有日子难捱的感觉。一年的进修生活，在紧张而顺畅中度过。这以后我回到江西师院历史系，承担中古史教学工作，通过书信继续向邓先生请教。但是我们的联系不久就被“运动”切断了，先是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接着是搞半工半读，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下放农村插队落户。

1973年，我“复钩”回校，一边搞“运动”，一边做些恢复教学的准备事务。大约是1975年的春天，我试探性地给邓先生写信，请教有关教学、教材等问题。很快，收到回信，邓师在4月27日信中写道：

“接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我于1969年冬到江西鲤鱼洲的北大农场（后改分校），到1971年6月又调回北京。在这期间，我曾几次到南昌，也想了种种方法希图能与你一晤，却终于未能打听到你在哪里。”

那时确实是打听不到的。1968年10月20日，我被下放上饶地区铅山县插队劳动，在“好人不下放，下放无好人”的舆论压力下，我们整天埋头劳动，哪有心思筹谋其他。一年之后，

邓先生来到的鲤鱼洲，虽然紧接着南昌市中心，但是江西师院下放后剩余人员正忙于拆迁至井冈山，校园内人心慌乱，只有房舍依旧。

对北大农场的事，邓先生谈到多次，而且每次都要说到运书的经过。他说：江西师院搬迁之际，图书馆藏书将处理一大批，送往江西造纸厂去化纸浆。北大农场的人得知这个消息，赶紧开车去要了好多捆（箱）。后来这批书随分校进京，成了北大的藏书。所以，现在北大图书馆有着江西师院图书馆章的书在出纳流通。察先生语气，不无歉意，故而每次我都接口说，这总比投进化浆池好，是不幸中之万幸。

二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师精神振奋，及时将清算“四人帮”散布在史学领域的流毒的动态告诉我。1976年11月7日来信说：

“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集团，为党除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普天同庆，举国狂欢。在江西省因‘四人帮’插手要打倒江渭清，也曾一度出现过黑云压城情况，所以，在揪出‘四人帮’之后，人心当特别感到欢快。来信说‘大家革命劲头更足了’，自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

十天之后，11月27日又来信告诉我：

“上周末，我们古代史教学小组的几个同志，就‘四

人帮’在史学方面所制造的混乱，以及如何加以澄清的问题，漫谈了一次，虽并未做出如何明确的结论，但有些看法是值得加以重视的。”

他列举出五六个方面的看法，例如：

“不能把儒法斗争作为一条贯串在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的线。甚至，从战国一直贯串到西汉也未必无问题”；“历代所发生的革新与守旧之争，前进与后退之争，爱国与投降之争，每一次是各有其特定内容的，不必一概归结到儒法斗争上去”；“说法家爱人民，把儒法斗争也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等等，全都是出自‘四人帮’的胡诌。”

这个时期通信的内容，谈得最多的是批判“四人帮”问题，同时通报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编印信息，帮助我们做恢复教学活动的准备工作。

“拨乱反正”以后，邓先生的科研节拍更紧凑了，而治学态度仍然是严谨缜密。他在给我的信中一再考证临川《王氏族谱》所载王安石两封家书的真伪问题，随时注意揭露“四人帮”借口研究王安石而实则毒害文化学术界的阴谋所在。凡属学术问题，先生都坚持言必有据，坦言看法，不主观武断地下结论。例如，关于《字说》中对于“除”字解释的理解，他说：

“这是从杨时集的《字说辨》中看到的，杨时对《字说》此条的辩驳全文为：‘一日之顷，一身之中，而有阴中之阳，阳中之阴，新新不穷，未尝相除也。有处有辨，

与阴阳异矣。’他也没有对‘处’、‘辨’二字作任何解释或辩驳，不知宋代人是否常常把处辨二字并提（我却无此印象）。从王安石的其他论著中，也许能找出有关此二字的较恰当的含义出来，这却又是我平时从未留意的事。我现时只把此二字当作‘因’‘革’二字的代用字，也不能保证其必有几分正确性。且写来供你参考吧。”

邓先生对“处”“辨”二字的理解是精当的，然而他自己认为难保有“几分正确性”。这是过分的谦虚？不是。这是学者的诚实。他定下的要求首先有两条，一是宋代人是否常常并提“处”“辨”二字，二是遍查王安石的论著，找出有关“处”“辨”二字的更恰当的含义。邓先生“未留意”与“无此印象”的缺憾，不知现今有谁能弥补上？

凭事实说话，不妄下断语，是邓先生一贯的作风。王安石故里在何处，是研究王安石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争执。一说主临川县，一说主东乡县。邓先生以其学术威望被推上裁判者的位置。面对现实，他坦诚而严谨，尊重史实，解剖自己。1984年7月27日来信说：

“上周内，临川县的两干部为王安石（故里）究在临川抑在东乡的问题前来问我，他们以《王文公集》中《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为据，证明王之家宅在临川城内。我觉得这是最硬的证据。当即与之说明，我过去主张东乡说，一则是根据蔡上翔到上池拜王安石像，二则‘文革’中各报刊也多说王的故居现已划归东乡县了。现在看来，可能只是王安尚的后裔移居东乡了。”

事实确是如此，王安石在《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中就是这样说的：“临川之城中，东有大丘，……吾庐当丘上”。东乡县志编委会1989年出版的新县志《人物志》称：“王安尚……其后裔世居虎形山乡上池。”情况已经明朗了，然而邓师不满足于高明的推论判断，而是要将结论落实在细密的研究基础上。他广搜资料，精密考核，于1984年冬写成《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初稿，又谨慎考虑了七八年，1992年8月重加修改定稿，才发表在1993年第2期的《北京大学学报》，圆满地解决了这个争议问题。

三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以后，我获得较多的机会于会议中和邓师晤谈请教，相应地减少了通信的次数，于是，先生的精言粹语往往因为我聆听时的疏忽，或事后追记的零乱而散失。现在回想起来，后悔莫及。在仍能找到的文字记述中，以1993年3月杭州会上的晤谈，印象最为深刻，我追记的也最详细。这次聚会杭大同志主办的“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25日晚饭后，我与顾文璧先生一道去看望邓先生，坐定后我们汇报了自己的生活工作简况，邓先生随即畅谈自己的写作计划。他说还要再写四本书和若干篇论文，我听了异常惊喜。先生时年已是86岁高龄，依然精神健旺，思维敏捷，我为老师的身体健康而祝福，为老师超人的工作干劲而钦佩。相形之下，自己年轻而碌碌无为，感愧痛切，因而对这次先生谈话的记忆特别清晰。事后我写的日记有如下的内容：

“93. 3. 25，晚饭后，与顾文璧老师一道看望邓广铭先生。他说到一些往事：

陈寅恪晚年眼瞎了，凭记忆写文章，自己口说，由别人笔录；钱穆晚年也瞎了，凭口述写《朱子新学案》四大卷，只是比较空。他晚写的“天人感应论”，季羨林先生说这是他顿悟了。

邓先生说这些是在以前辈比况自己，激励自己，所以话锋随即转到他自己的心愿，他说：

关于《王安石传》、《岳飞传》、《陈亮传》、《辛弃疾传》，都需要重写。《陈亮传》是毕业论文，要修改了。《王安石》更需要改写。1972年9月22日，田中访华，毛主席说你这是‘三不足’。现在的科学技术完全能了解宇宙天象，自然界变化，可以‘天变不足畏’；历任日本首相都反华，你却来访华，是‘祖宗不足法’；你这次来，美日反动派肯定是反对的——田中说，这次美国人没有反对——这是‘人言不足恤’。毛主席谈话传出来以后，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的记者们即来要我写王安石，限三个月写好，赶在传达学习‘最高指示’的高潮中。我觉得时间太短。他们说只要改写过后面的，其余的照旧版排。我认为不行。

1973年初写好了修改稿，出版社用新四号字印出清样，交大家审读，共同的意见是没有贯穿儒家斗争，需要修改。改写到74年，再交审查，意见是没有批林批孔，不好向读者交代。我说王安石怎么和林彪联系得上，他是尊孔，不反孔。他们给了我《文汇报》的一篇社论，说就照这个意思修改。无奈，我就照那样子加写了结尾部分，交出去了。印好出版已到75年。后来毛主席看到了，对封面题签感兴趣，认为字写得好。其实这是集王羲之的字。……这就是王安石那本书的情况，怎么能不要修改呢？

鉴于邓先生的眼睛已有疾病，视力很差，看书写字时必须

戴眼镜再加放大镜；听力也很差，二三个人说话还可以，人多了就不行，我插说：‘您就把刚才说的，写一篇跋语，附在书后再版。’先生毫不犹豫地否定：‘那怎么行，要改写！’

邓师还说：还有《辨奸论》，须写论文，辩论清楚它是邵伯温假造之作，而不是苏洵之作。

邓师的计划太宏大了，顾文璧老师和我都听得十分投入，唯恐漏掉，更怕有人来打扰，所以一直没有注意时间，后来一看表，已是深夜12点！我们赶紧敦请先生休息，不无歉意地告退。第二天与别的师友谈及，都批评我们太不应该。”

——重温这段记忆，不能不更加增添景仰邓师的心情。先生治学勇猛精进，老而弥笃，他的计划庞大，却是务实的。人已耄耋，而勤奋写作不减青年。1995年《国学研究》第3卷刊出邓师的《〈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2.1万余言，全面剖析清楚了《辨奸论》的真伪面目。九十年代中，邓师将七十年代的《王安石》进行了改写，于1997年3月9日，写毕《王安石》一书的序言，胜利完成了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心愿。这部23.7万字的新著，人民出版社于97的10月出版。出版前夕，邓师于9月18日附志说：“我从今年七月初至今一直住在医院内。”谁也没有想到，先生此后竟没有出院，离开了史坛！

新版《王安石》是邓师奉献给中国史学园地最后的一朵鲜花，人们在尽情品赏之时，犹见先生的音容笑貌。而我每读该书《序言》，耳边就又一次响起先生93年3月25日深夜的畅谈，但是心中却有一股酸楚，那是我最后一次聆听先生教诲的时候啊！

“画疆自守”与复兴宋学

——纪念邓恭三先生

郭正忠

恭三先生仙逝之际，我正重病缠身。未能与他作别，心下总觉遗憾。我于先生，始终执弟子之礼；先生待我，则不啻师友之诚。回忆往事，宛如昨日；翻检旧笈，思绪纷繁。这里仅略事叙议，作为对先生的怀念。

一、考辨史事，卓然有识

恭三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对宋代史料的精熟和卓越的辨识能力。他一生考订和辨析过的宋代史事，数量惊人。而每澄清一事，都是他的一次快乐和享受。先生最重要的考订活动，大略是三人和两志。即有关辛弃疾、岳飞和陈亮史事的辨析，以及《宋史·职官志》与《宋史·刑法志》的考证。

早在1937年，即他三十岁那年，发表了“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陈寅恪获读该文，即“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5页）。关于岳飞与陈亮的研究，亦不仅穷尽了几乎所有的相关史料；而且，洞悉了各种原始和转手资料中的重大讹误。尤其是岳飞之孙岳珂编造的种种不实之说——如“拐子马三人相连”说，“朱仙镇之捷”说，“日发十二道金牌班师诏”说，

“太学生叩马谏兀朮”说，等等；都经他考证而还其本来面目。（见《岳飞传》（增订本）附录：《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及《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后者见《文史》第八辑，1980年3月。）

可惜的是，世人对学术性考证文章的留意，远不若对于历史小说和通俗读物的观赏兴趣。经先生辛苦考证的伪案，往往原封不动地讹传下去。而接续同类课题的研究者，竟也一仍其旧贯。

自1980年宋史学会成立以来，邓先生一直在倡言史料的重要性，以反对空泛议论和批判轻视史料的极“左”思潮为其主调。至1987年年会的开幕词和第二年出版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前言”，乃在“理论运用的实事求是”之外，又开始强调“使用资料的实事求是”。（《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至7页。）至1992年年会及次年选编论文集时，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史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为题，在开幕式上提出一种口号：“在理论战线上我们必须反左；在史料的处理上必须反左，还必须防右。”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邓先生担任会长的最后一届宋史年会。他以八十五岁之高龄，在宋史学会领导成员中引退。他借用时下流行的政治术语而提出上述口号，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他以自己多年处理史料的宝贵经验，谆谆告诫人们：

“把与有关某一课题的资料搜集得真正达到了‘穷尽’的程度，这也仍然只是一种最初级的工作，如对这些资料不加考辨，概予信从，那就成了冬烘先生。”（《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代前言”，第4页。）

先生平生研究宋史的一系列贡献，原来并不是仅仅植根于史料的搜集和精熟；更重要的，是他对史料的考订之功与辨析之识，超乎他人。

二、自我纠正，重谈“宋学”

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当然不止于史事和典制的考证。对于“宋学”的总体把握和深析，是他倾心用力的另一方面。在这方面，他对“宋学”的理解，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认为“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1页。）至84年杭州宋史年会，他重新作了《略谈宋学》的发言。当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又就同一问题作学术演讲。直至第二年编定头年年会的《宋史研究论文集》，更有进一步的充实和发挥。

他写道：“我在此首先纠正我自己的一个错误提法。由翦伯赞主编，于1962年首次印行的《中国史纲要》，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是由我执笔撰写的，我在这一部分的《两宋的哲学思想》一节中，开头便说道：支配两宋三百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我现在必须说，上面的这几句话是完全说错了的，是亟应加以纠正的。”（《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他接着指出：“理学”，是直至南宋前期才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自然更不能说它对整个北宋一代产生过什么支配作用了”。“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理学是从宋学

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同上，第2—3页。）

先生这年，已然78岁。上距他那“错误提法”，已过了23年。一位老年学者敢于如此尖锐地揭示自己中年时代的疏失，其学术勇气与坦诚襟怀，不能不令人肃然振撼。

按照我的理解，“宋学”一语至少有两重涵义：其一，是指整个宋代的学术，甚至包括宋人的学术心态在内。陈寅恪就曾在这种涵义下使用“宋学”一词。其二，是指宋代以哲学思想为主体的学术流派。邓先生这里讨论的，即是这后一种涵义的“宋学”。

据我回忆，邓先生在那次年会上，并不仅讨论过“新儒学”涵义的“宋学”，而且，也谈过更广义的“宋学”，即宋代的学术文化。他曾用八个字，来形容宋代学术文化之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话一出，台下便有人窃窃私议：或以为先生高估“宋学”，未免藐视了元明清三代。或以“后无来者”可衍至今日，更置“社会主义”学术文化于何地？大约是因为有这许多顾忌，这八字评估终究未见诸文字。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的提法，则略加修饰与限制，曰：

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它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序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另见先生《自选集》第162页。后者略有删节。）

其实，即令是原来的八字评估，也自有其道理。那不仅是他多年研治宋史的高度概括性结论；而且，也是对陈寅恪等前

贤共识的发挥。只是随着时世变迁，陈寅恪的见解早已被人淡忘而已。

1943年初，陈寅恪作《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正序》。他写道：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此为世人所共知，然亦谈何容易耶？……

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陈寅恪此处断言华夏文化“造极”于宋，并未附加任何约束性副语。揆其“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以及“近年之学术”“将来所止之境”乃“宋代学术之复兴”云云，可知宋代学术之“造极”，不仅俯视元明清三代；而且睥睨“近年”。换句话说，即无论是元明清三代，抑或是1943年左右的“近年之学术”，均未“复振”至两宋“造极”之局面。唯其如此，他才

把“将来所止之境”，归结为“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三、“画疆自守”，第一功臣

陈寅恪一方面提出了复兴“宋学”或建立“新宋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他又深知这一目标的实现殊非容易。实际上，那并不是一人一世所能达到的境界。至于他对恭三先生寄予的厚望，邓先生一生也未曾忘怀。

恭三先生区别于其他大陆前辈宋史学者的一大特点，是他穷毕生之力，只用于宋辽金史的研究，特别是集中精力于宋史的研究。（类似的情况，当然还有陈乐素先生及其高足徐规先生等。）他解释自己这种“画疆自守”式的研究生涯说，那是“自己学力局限使然”，“根本不具备淹通古今中外的条件”。（前引《自选集》“自序”第2页。）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开拓更广阔的学术领域，大约也同陈寅恪的上述愿望有关。

为了“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他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他长期置身于宋代史事典章的考索，并倡导从“四把钥匙”入手的研究方法。除了个人奋斗和引导学生外，他又与其他前辈同行联系，通过宋史研究会来推动“宋代学术之复兴”。关于“宋学”概念的自我纠正，是他晚年为“新宋学”建立而作的另一件大事。

这篇题为《略谈宋学》的文章，其副标题为《附说当前国内的宋史研究情况》。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明确指出：

儒家的学说……是在大量地吸收了佛道二家的义理加以充实之后，才得焕发了新生命，形成了新儒学即宋学。

以及由宋学而又衍生出来的理学的。这一事实，对我们当前研究宋史的实践，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要想使宋史的研究能有日新月异的飞跃发展，是必须有大量新血液的输入，使之起本质的改变才行。当然，这不只是有关宋史研究的问题，就整个中国史的研究来说也全是如此。（前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第15页。）

他把“宋学”，称为“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同上，第3页）；并以宋儒突破汉儒“寻章摘句”的史事，来启发宋史界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端正并树立崭新的学风。他所谓“大量新血液的输入”，则包括“把历史学的研究与社会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等横向联系起来”；“既突破了极左思潮所制造的那些清规戒律，也不再受到来自外界的那样那样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包括宋史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同上，第18页）。

任何一位学者，都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恭三先生也和别人一样，是从极左思潮的笼罩下蹚过来的。大家都不会忘记那些令人难堪的岁月，那举国风靡的浮夸和谎言，那千军万马倾倒在“五朵金花”的讨论。所幸的是，由于客观形势的改变，也由于恭三先生和几位前辈的极力倡导，相当一部分后来者（包括我本人在内），及时放弃了空泛无益的论题，转而全力投入具体的研究之中。如今宋史学界俊采星驰，佳作如云，不能低估恭三先生在端正学风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恭三先生晚年，每以未“写一部详瞻丰富的辽宋金史出来”为憾。其实，他为“宋代学术之复兴”所作的事，已经够多。陈寅恪先生所期盼的“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固然还有待大家努力，但在宋史学界，他也实在堪称“最有功之一人”。

纪念邓广铭教授

陈学霖

本年元月，邓广铭教授以高寿辞世，海内外学人对这位博学鸿儒，一代宋史宗师都深深敬悼，纷纷撰文追思抒怀。愚生也晚，数十年来居处海外，虽然在上庠时已拜读邓教授的史学大著，心仪已久，但到八十年代初始有机会亲沾风采，聆听高论，而此后亦只有两次见面和维持间歇的通讯，所以从文字以外认识实在很有限。不过，这些短暂的聚会和断续的通讯都有特殊意义，使我留着深刻的印象，现在藉征稿之命写下来表达我的思怀。

有机缘认识先生与美中学术交流的展开有密切关系。1975至1983年间，我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教授的身份，获美国学术联合团体（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辖下的中国文化研究小组（Committee on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委任为成员，而小组任务之一是推动与中国同行的学者交流。1979年秋间，其时“文革”结束数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与社会科学研究合署（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辖下的近代中国研究小组（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组团赴华访问，加强对中国学者的认识和发展两国的学术联系。时间定在79年12月底至80年元月初，为时三

星期，访问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和广州。全团共十余人，由密芝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孟罗（Donald Munro）教授及纽约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毕士特（Burton Pasternak）教授出任正副团长。中国研究小组成员随团的有孟罗、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和我，分别代表哲学、古典文学及古代史，而我是两名华裔团员之一（另外是史坦福大学法律学教授李浩）。

行前我们将拟访问的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名单交主方参考。在北京，除却社科院的单位和属员，还列出一些任教高等院校，特别是北大、北师大、人民大学的资深学者。我希望会见的，便是以邓先生为首的几位北大名学者，而先前已请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业师刘子健教授代为介绍（刘师为旅美宋史名家，认识先生并有联系）。我们一行于79年除夕抵达北京，稍事休息即于元月2日拜会社科院的领导并分组与辖下的单位座谈，互相介绍研究项目，及探讨互访与合作的种种问题。我头一天就拜访历史所，会见过熊德基副所长和属下各研究室的主任如陈高华、王毓铨、王戎笙等学者。第二天，我们全体团员与社科院以外的北京地区学者会面。由于人数众多（约有二十多位），大家据着一张长桌的两方对坐谈话，由于事先安排，我与邓先生正面对着，因此在短短的三十分钟内，有很多机会交谈。除却互相介绍科研的环境和项目，我们的话题环绕互识的学人的近况（特别是49年前后去国或迁往台湾的学者），中国史学研究的趋势，和中美两地学人互访交流的机会等等。先生予人的印象是恳诚朴实，坦率直言，对后辈和煦亲切，一席谈话感觉如沐春风化雨。由于行程紧凑，座谈言犹未尽已结束，因此在宴会时我争取坐在熊德老和邓先生之间，俾有机会与二老再聊一刻。座中我对先生说，敝团已准

备一份微薄的礼物，相信先生会喜悦的，那是一套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编辑，美国学术联合团体赞助出版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六大册（1974年初版），先生闻讯高兴极了，说大陆学者从前也想过编制，但因条件关系未能进行，这套参考书将大大推动宋史的研究。这次聚会到此为止，虽然时间短促，但收获良多，为以后的交谊奠下基石。别后逾年，王君主编的同类书《元人传记资料索引》（1979年初版）面世，我又以美国学术联合团体的名义寄上一套，先生非常高兴，时常向学术界提及。

数年后，我与先生再会面，这次是在84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宋史研讨会上。国际性的宋史研讨会，是五十年代由法国巴黎白乐日教授（Prof. Dr. Etienne Balazs）主持的“宋史计划”所推动，此计划虽因白氏于1963年猝逝而夭折，但催生了国际宋史研讨会，前此已在德国和日本举办过两次。这回香港的会由刘子健师策划，他鉴于过往的会都没有中国学者参加，而且，大陆和港、台的宋史学者，当时也由于政治的干扰，未能往来沟通，于是从美国亚洲高等教育联合基金会募得经费，发起在香港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由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这一次国际宋史研讨会因此在多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为中外学术交流竖立一个里程碑，由于宋晞先生已有专文报道（刊于台北《大陆杂志》第七〇卷第五期〔1985. 5. 15〕），在此不赘。这次到会的学者，来自美国的是刘子健、笔者、罗文、Brian McKnight、Hoyt Tillman、陶晋生；德国的是Klaus Flessel、澳洲的是王赓武；中国大陆的是邓先生、陈乐素、漆侠、郦家驹、王曾瑜、朱瑞熙；从台湾来的是宋晞、王德毅、黄宽重、梁庚尧、张元等。香港中文大学成员参加而提交论文的，都是历史系的先后同寅，包括全汉升、赵效直

(全、赵是时任教新亚研究所)、张春树(是年从美国密芝根大学休假出任中大历史系客座教授兼系主任)、李弘祺、罗球庆、王玉棠等。会议由张春树担任主席,共分三天举行,议程据论文的性质分为十二组,上下午分三场在中大会议厅及个别教室举行。邓教授宣读的论文是《〈大金国志〉与〈南迁录〉两论》,指出二者都是南宋人编集的伪书,不宜采之考史,甚得在座的专家学者认同和好评。由于论文众多,议程紧凑,而众多学者又长期未曾见面,大家尽量利用会议内外的时间进行讨论和交谊,兴致极高,非常热闹,是一次难得和极成功的学术讨论会,而这次又是大陆学者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在香港与台湾及外国学者接触,故此对推动学术交流有特殊意义。我这次因为时间关系,未暇与先生促膝长谈,不过有机会亲聆学术报告和会后为中大历史系的演讲,畅论宋朝文化的特征,使我受益良多,加深对前辈学者的景仰。

87年,我又再与先生聚首,这回是到内蒙参加会议路过北京时特别拜访的。是年7月中旬,我应内蒙古大学邀请,到呼和浩特市出席蒙古史会议,在北京有两天空档,于是便请友人联系,到北大探望邓先生,先生欣然应允。记得那天是星期三或四的下午,友人安排一个陪同,把我送到先生寓所。抵步之后,先生迎我到书斋雅座,稍事寒暄,便熟落的打开话匣,视我如常宾。先生很关注他的至友刘子健先生的近况,盼望他能保重身体发展国际宋史研究的网络,也垂问我的金史研究的进展(多年来我与德国明兴大学的资深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合作译注《金史》)。我询问先生的工作,他说忙于关照国内的宋史会议,参与编辑论文集,并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修订王安石、陈亮等传记的旧作,清除在当年不良的气候影响下,作出的偏离史实的观点和论说,实行“拨乱

反正”云云。这一次谈话印象殊深,使我体会到前辈治学守道笃实坚毅的奋勇精神,但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的聚会,现在可欣庆的是他能活着见到大部分愿望的实现!

一年后,我有个机会蒙受先生赐教。88年夏间,台湾学人编集为陶希圣先生祝寿的《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国史释论》在台北出版,内里收有拙作《范成大〈揽辔录〉传本探索》一文,跟着我把一份抽印本寄给先生。这篇文章是考察南宋范成大,在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归来后撰写的《纪行》《揽辔录》的流传版本。是书簿录记载原称二卷,但现存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及陶宗仪《说郛》卷四一的都止于纪行部分,只有一卷,并非全帙。我根据近人对范氏著述的研究,特别是孔凡礼之《范成大佚著辑存》(1983年版),有不同的看法。孔书指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曾征引《揽辔录》十余条,而大半出自《会编》本附于范书卷后之《族帐部曲录》,因此我推测此卷应是《揽辔录》原书二卷本今人认为已佚的部分,理应出于范成大之手。8月间,先生寄来一信,说这一说法有问题,认为从年代或内容来看,《族帐部曲录》断非范氏所作,而是出于金人之手,与稍后出的张棣《金虏图经》所收之最后一门相同,认为李心传可能系从《会编》误钞,以为属于《揽辔录》部分(此信留在美国寓所,不过记忆犹新)。我很感谢先生的指正,不过经过反覆思考,只能接受《族帐部曲录》并非范成大所作的意见,不以为李心传误抄《会编》,认为他寓目的可能是一本以《族帐部曲录》为《附录》的《揽辔录》,如是便符合簿录二卷本之说。去信后未见回覆,谅先生也同意这个见解,不然,以先生之忠于典籍、捍卫史实的性格,断不会放过荒谬的论点。后来我把文章这部分修订,收入拙书《宋史论集》(见

后),在页258—59及注17将这一事说明,并向先生的雅意申谢。

93年元月,拙书《宋史论集》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这是我首部宋史论文的结集,其时是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席的第二年,香港与大陆接连,邮递方便,所以我把芜作寄呈先生很快就抵达。5月底接获覆信,欣悉他老人家在百忙中认真细读,除却礼貌上恭维几句,还指出第一篇论文的一些错误,可见前辈治学的严谨和对后学的提携,使我十分感动。此信仍夹插在拙书的手订本,谨抄录如次:

学霖教授史席:

大著《宋史论集》与前附手示,早经收悉,只因于3月末自杭州归来之后,经常为日常琐事及各种会议所干扰,使我不能把大著一气读完,而只能断断续续地拜读。迄于今日,方得读毕全书。读完各篇之后,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您在着手任何一篇著作之际,搜采全都极其丰富,持论全都十分精审,读来受益良多,至感敬佩。只有在第一篇《大宋国号与德运》中,鄙意以为,第二十四页第二行所征引之宋高宗改元建炎诏语,应作如下之标点:

“盖尝指日以誓诸军,使前迎而后请;不憚沥血而檄率士,冀外抚而内亲。”(拙书作“盖尝指日以誓,诸军使前迎而后请不憚,沥血而檄率士,冀外抚而内亲”)第二十五页第八行下“中条山”之注文,似应改为:“指绵亘于今山西省境内之中条山”(拙书作“河北沧县以北”),因第十行所引《系年要录》之文,既有“河东之民,心怀本朝”句,又有“金兵之在河东者稍稍北去”句,故此中条山必不在河北沧县境内

也。

小小失误,大手笔亦所难免,故敢贡其刍尧之见,盼能恕唐突为幸。专此,敬颂

教安

邓广铭拜启

1993. 5. 17

前辈不吝指正,感到非常荣幸,随即去函致谢,但没有覆音。95年初,先生托人带来一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内页上款写着:“陈学霖教授指正,邓广铭拜奉,1995年元月”,可见老人家的诚意。本来,是时我和先生有机会在香港碰头的。事缘是年5月,中文大学属下的新亚书院,为纪念创办人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百龄冥辰,举办研讨会,出席者除亲属外,都是与钱先生有密切关系的学术界故旧。邓先生亦以北大旧友的身分获得邀请,遗憾的是以健康关系恳辞,缘慳一著。我那年亦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暑期忙于整理拙书《刘伯温与哪吒城》的校样,无暇回港参加盛庆,错过与钱先生故旧聚面的机会。

96年春天,拙作在台北出版,那是我二十多年劳形钻研的成果,虽然与宋史不着边际,但因为关涉北京史地文化,因此冒昧寄了一部请先生过目。一时未有音讯,未几却接到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来信,告知为庆祝邓先生九秩华诞,准备编印学术论文集致意,邀我撰稿,闻讯十分兴奋,于是开始命题构思。当时我因为备课检读宋金史籍,注意到赵彦卫《云麓漫钞》里面一些罕见史料,其中一则记载岳飞于建炎四年(1130),拥军回驻常州宜兴县张渚镇时,在人家的厅事屏风上题字的事,先生一篇辩论传世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

伪作的论文也用上，所以决定作一篇考证《云麓漫钞》史料价值的论文呈献。不料下笔不能自休，到把十则史料注释完毕已近四万字，而篇幅所限是一万字，逾额三倍，只好抽出金代部分，改题为《赵彦卫〈云麓漫钞〉之金源史料》，按时寄去编辑委员会，至于全稿（包括宋史部分）则改投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于是年冬季刊布。

是年底我接到邓先生一短简，说已收到拙作《刘伯温与哪吒城》，语多嘉美，并告知已收到贺寿论文，表示感谢。手头存有此信，谨钞录以为纪念：

学霖教授：

前承惠赠大著《刘伯温与哪吒城》，近日方得拜读完毕。读毕之后，钦佩不已。不论就搜集资料之广博来说，或就各章所包罗的内容之丰富来说，全都尽美尽善，既可作民俗学的杰作看，又可作历史学的杰作看。多年心血，成此晶体，谨向先生遥致贺忱！

我一向奉守不做寿之戒约，今年乃由台湾友人首倡，大陆朋友亦随声附和，遂乃有此征集论文之举。昨闻大著亦已寄到，拜悉之余，感愧交加，特此致谢。顺颂

教安

邓广铭拜启

1996. 10. 11

97年初，在我收到祝寿论文集后，便立即去信向先生致贺，并附寄那篇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发刊的《赵彦卫〈云麓漫钞〉之宋金史料》，但是没有覆音。香港回归祖国未几，北京传来先生因病住院的消息，当时大家都有点担心，惟

有默默为他祈福。不幸过了年未久，便接到北大历史系的计闻，始知先生已于元月10日辞世，心情一时翻腾，久久未能平复。4月初，北大友人来访，转交先生给我的两本书，一是他的史学论文结集：《邓广铭治史丛稿》，另一是他的旧作第三次修订本：《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后者还夹着一张印刷的条子，书道：“学霖先生：谨以新出拙著拜奉，请于便中审正为荷。邓广铭（签名印鉴）”，其下并有哲嗣邓小南教授亲笔一行：“小南遵父嘱代呈。”我翻检二书，出版日期为97年6、7月，其时正是先生住院期间，犹有精力处理著作的安排，并且指名惠及于泛泛之我，宁不为前辈之胸怀风范深深感动？

邓教授是寰宇尊敬的前辈学者，我过去二十年间虽然只有三次晤面的机会，但是荷蒙先生过爱，屡屡赐教，并指示与国内学者建立学术联系，受用不尽，高情厚谊，曷胜铭感，谨此志之，作为一个宋史后学对先生的最崇高敬礼。

1998. 6. 10，于香港中文大学

恭三师指导我研究辽宋夏金史

李锡厚

我在上大学以前，所能掌握的历史知识很有限，对历史学家，更几乎是毫无所知。关于恭三师，最初还是从我的语文老师高振琳先生那里听说的。那是在我要离开沈阳来北大报到向老师辞行时，他对我说：“你到北大读历史系，可以见到邓广铭先生，他是研究辛弃疾的专家。”高老师喜读稼轩词，并在教学之余不断钻研，恭三师出版的《稼轩词编年笺注》等一整套有关辛弃疾的著作，他都认真研读过。尤其是《辛弃疾传》那篇前言所反映的对读者、对学术负责，因而勇于批评和争论的精神更是使他感慨系之。

进入历史系以后，虽然见到了恭三师，不过能有机会单独向先生请教，则是在读大学四年级以后。当时我选了先生的《宋史专题讨论》，和曹中英兄每周在先生家里上一次课。第一次去上课时，先生对我们解释说，“专题讨论”是五十年代初学习苏联开设的，最初称为“习明纳尔”。先生用他特有的幽默感解释这个外来名词说：“习明纳尔，用中国话也能讲得通：你学习明白了，（知识）就归你了。”先生非常重视对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他给我们逐字逐句讲解过《宋史·职官

志》的序，并让我们对照着《文献通考·职官考》阅读《宋史·职官志》，从而不仅了解宋代职官制度的基本知识，同时还可以知道这方面基本资料之间的异同和关系。从这次课上，我懂得了引用资料要溯本求源，不能拿过来就用。此外，恭三师还就他即将要发表的文章《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等等，向我们讲解怎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恭三师主张学术研究应从检验别人的研究成果入手。先生很重视这一环节的训练，他给我们讲了最初他自己是怎样发现前人在辛弃疾研究中的失误、并且鼓起勇气写文章批评梁任公的。他让我们写读书报告。我当时读某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探讨西夏历史问题的文章，作者引用《长编》卷一一五宋仁宗景祐元年十月乙丑中关于描写赵元昊袭封以后服饰的一段文字，并加了标点：“（元昊）始衣白窄衫，毡冠红裹顶，冠后垂红结绶。”我读了以后，觉得那段文字不通。于是就找来《长编》查对，而原文的确如此。我又查了百衲本（当时还没有标点本）《宋史·夏国传》，发现同一段文字在这里作：“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经过对比，我认为，《长编》那段文理不通的文字显然不足为据，而《宋史·夏国传》则是可靠的。总体上说，《长编》成书在先，比《宋史》更具史料价值，但长期以来流传的只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残本。那段文字在爱日精庐活字本及后来的浙江书局本上，都是一样的文理不通。作者仅仅据此，判断元昊的服饰与吐蕃赞普相类，似乎不足以服人。我将这些看法写成读书报告，恭三师看了以后没有说什么，但为我改了错别字及病句，因此我知道他是很仔细地看过了。

1962年秋季，我读五年级上学期，正在考虑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有一天恭三师告诉我说，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王静如先生来过，他要招研究生，让恭三师给推荐学生，主要条件就是俄语好。恭三师告诉我说：“我已经把你推荐给王先生了。”我由于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所以当时对恭三师说：“王先生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对外文要求很高，我恐怕不行。”恭三师说：“矮子里面拔将军吗。况且你在班里外国文还算好的，我了解过。”听先生这么一说，我也就没有再坚持己见。我当时跟先生提出，既然要准备考西夏史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否就选择关于西夏史的。先生同意，让我一边作论文，一边准备考试。

学习断代史，恭三师要求我们要熟悉整个时代的基本史实，而不是仅仅以论文题目所涉及者为限。先生当时对大学低年级的基础课教学很不满意，认为我们学过的通史、断代史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有关辽宋夏金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知识。有一次恭三师提及黎澍先生曾对他说：“你们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到近代史所都得回炉，都需要重新打基础。”我想这可能正反映出老一辈历史学家对当时个别人鼓吹的“以论带（代）史”学风的不满。恭三师要求我们阅读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他认为此书虽不属于宋史资料，但作为教科书阅读还是不错的。当时刚出版了这部书的标点本，先生要求我们每读完一卷自己能复述出这一卷所记载的重大事件，而且读的时候要注意发现其中断句不当之处。

记得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在1963年春季开学后不久进行的。

总的感觉是那次考试对我来说似乎很轻松。我想，我主要得益于在恭三师指导下近一年时间读书的收获。考试结束后，我才集中精力写论文，初稿写出后，恭三师看了很不满意，主要是枝节横生，论述问题不集中。先生一再要求“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自然需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现在回想起来，我写的东西也实在不成样子。先生要求我重写，我表示时间已不允许。针对这种情况，先生说：“如果就现在这个稿子修改了事，只能得三分，最多得四分。”我一听，知道可以不重写了，于是回答说：“就这样吧。”

论文交了以后，就宣布分配方案了，我被分配到黑龙江，而且我们几个北上的同学约好马上离校去报到。我去恭三师家里告别。先生事先已经知道分配结果了。他又对我说起考研究生的事：“你考完以后，我一直以为基本上就定了。”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深感恭三师和王静如先生，还有我自己，都书生气十足。当时虽然也有考试，但并没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之说。其实我能否读研究生，跟考得好坏毫无关系。恭三师在无可奈何之余，仍不忘记嘱咐我要坚持研究历史，他说：“到东北可以搞辽金史，资料不多，容易找到。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来信。”

历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反应往往迟钝，思维敏捷如恭三师者也不免如此。当时正是“重提阶级斗争”之时，举国上下已经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历史学界即将首当其冲。我以为恭三师对此并无先知先觉，而且很可能是不知不觉，因此他仍然一心想着他的学生们不应在北大历史系枉读五年。他想不到我到东北教中学以后，正遇上知识迅速贬值，到六十年代末期，为人师表者已然沦落为三教九流之末了。不过，我仍然没有忘记恭三师的教诲，搞辽金史仍然是我的梦想。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举粉碎”之后，我终于有机会离开北国那个长期笼罩着排外情绪的名叫安达的小城。1978年秋季，我即将年满四十周岁时回到北京当了研究生，而且仍然选择了民族所，只是没有搞西夏史，而是按照恭三师当年的建议，搞起了辽金史。

三

我在年届不惑以后实际上又回到恭三师这里当学生了。教过书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身教胜于言教。”我深深地感到，这些年恭三师对我不仅有言传，而且更重要的是身教。首先是先生作为大学问家的豁达、大度，深深地感染了我。“文革”结束以后，我和赵葆寓兄第一次去看望恭三师，我们发现他对自己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当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无愤愤然之情，只是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说：书损失了一些，都是些近年的出版物，线装书倒基本上没丢。当时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承担起系主任的重担，在浩劫之后与全系师生一道重振北大历史系，正是所谓“奉命于危难之际”，除了恭三师还有谁能如此。

恭三师认为，研究历史的人得有思想。没有思想，必然人云亦云，见风使舵，一见风向不对，甚至不待别人声讨，自己就“和平演变”了。我觉得，他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讲的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史德”问题。他非常珍惜晚年所能享受到的学术研究的自由，坚持真理，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些年他不断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人争论，而且也鼓励学生们这样做。

恭三师很看重教学工作，他有一次对我说：“你们历史所

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教过书。没有教过书的人，写文章往往不为读者着想。”著书立说与传道授业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古代学人的传统，恭三师是自觉地继承并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的。他是一位严师，我在与恭三师接触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两次受到他的鼓励，但更多地是受到他的批评和否定。然而我深深地体会到，他的批评和否定，才是对我在探索历史奥秘的漫漫征途上的最有力的扶持。不过，如果不是师生关系，他却往往会吃力不讨好。有一次恭三师对我讲了这样一段往事：五十年代中期，东北某大学的一位先生（今已作古）写的宋辽金史讲义准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将原稿交恭三师审阅，恭三师发现其中错误甚多，并据实指出，结果出版社决定退稿不出了。后来那位先生知道是恭三师提了意见，就一直耿耿于怀。恭三师说：“他不知道我这样做正是保全了他的学术声誉，试想他那本错误百出的书真的印出来会怎样呢？”遗憾的是恭三师的善意不被人家理解。我想这可能与那位先生不了解恭三师的为人有关系。像这样出于“保全”之意而阻止我发表文章的事，只有恭三师和我的一两位至交同学做得到。最近一次是为先生祝贺九十大寿论文集写文章，我当时正在思考土地所有制的理论问题，于是就写了一篇空对空的文章。先生看了以后对我说：“你怎么写这样一篇文章？得重写一篇。要是不重写，我就把你这篇发了，丢身分可别怪我。”其实我自己倒并无“身分”可丢，但作为恭三师的学生，拿这样一篇他不喜欢的文章给他老人家祝寿，实在大不应该。我立刻重写了一篇。先生对我是负责到底的，他说：“你那篇文章不仅别在这个文集上发，而且我劝你永远别发。”

八十年代初，恭三师说过：“我现在隋唐史和辽金史都不搞了，只搞宋史。”缩短战线，调整战略，正是为了更有效地

扩大战果。他最后十几年在宋史领域真是硕果累累，在中国历史学界，恭三师晚年的生命之光恰似一道光彩夺目的晚霞。他晚年虽然不搞辽金史了，但仍然对辽金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大汉族主义，认为应当充分重视辽朝的历史地位。他说，当时西方知道有契丹，却往往并不知道有宋朝。因此无论从立国的先后次序还是就其在世界上的影响而论，辽都应排在宋之前。所以在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时，他将这一时期的断代史称为“辽宋夏金史”。

有一次，我和恭三师谈到“断代史”，我说国家分裂，历史不能分裂。辽宋夏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如同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样。我们的历史学界是将魏晋南北朝史作为断代史研究的，辽宋夏金史也应作为断代史研究：宋史、辽金史以及西夏史都是这个断代史的组成部分。别的断代史都只有一个学会，宋辽金史却出来两个学会，这不是把我们统一国家的历史分裂开了吗？先生说“是这样。我早就向陈述先生建议将辽金史学会和宋史研究会合并，并请他出任合并后的会长。”先生还让我找陈智超兄商量，将辽宋夏金史是中国历史的断代史的问题写成短文，并由先生和我们两人一起署名。这件事我一直拖着没办，原因是我觉得把我自己的名字与恭三师的大名连署在一起，是绝对使不得的。

学人本色 史家风范

——耿云志

我在辽宁大学读的是哲学，故对史学界专家学者知之不多。但邓先生的名字我早知道了。六十年代初，李光灿先生来做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讲学之风始稍稍兴起，当时历史系曾请邓先生去讲学。因两系活动安排不一，我未能去听讲。但历史系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听后，对邓先生甚佩服，说邓先生于宋史极熟，所见极有深度。从那时起，我知道邓先生是国内宋史的权威学者。

我同邓先生相识，全是因为我研究胡适的关系。1985年，我的《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书销得很快，到86年下半年就很难买到了。我自己买了二百多本书，很快也就送朋友送完了。大约是1987年春，中国史学会的王汝丰先生对我说，“北大的邓先生，托人买《论稿》一书，没有买到，你还有没有书送去一本？”我的书受到邓先生如此注意，我自然很高兴。但我手上已无书了。我特写信给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蔡济生先生，他得知我是为送邓先生而要书，乃尽力帮忙，从该社自存书中提出一本寄来。这时还有另一件事，使我感到有必要去拜访邓先生。当时在统战部工作的陶斯亮女士跟我说，胡适故乡提出报告，要求给胡适故居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征询过邓先生的意见，邓先生很希望由学界出面开一次学术讨论会或座谈

会，从而开创一种适当的气氛。我本人虽有此意，但一时无从做起。为此，我也想同邓先生谈一谈。大约1987年5月下旬，我写信给邓先生，希望约个时间去拜访他。邓先生刚刚访问日本归来，6月27日他复信给我，表示“极度欢迎”，并告诉我他的住址和电话。7月7日，我第一次去拜访邓先生，送书给他。那时，邓先生身体、精神很健旺。他非常高兴，说他已经见过我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所以听说出书，就想买一本。结果没有买到。我很惭愧，未早来拜访、求教。邓先生非常坦诚。虽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契。邓先生认为，我的胡适研究，能注意做到跟踪式的研究，而且追踪得相当深入。这很不容易。他一再讲，“并非因为当面谈话，就夸奖你，而是实事求是。你的研究是最深的。”我告诉邓先生，“因为我们研究所图书馆，收藏有胡适的一批资料，我在75年就看过这些东西，这是难得的有利条件。胡适的著作，我也还看得不全，例如水经注考证的稿子，有数百万字，我只看了一部分。我觉得，胡适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甚多。我很想早些把胡适的材料整理发表，一则可让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都有机会了解胡适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有怎样的思想和主张。二则，可让有志于此的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做更深入的研究。”邓先生非常同意我的意见。

当谈到举办学术讨论会时，我们都感到，心有欲而力不足。

这次见面，邓先生谈了一些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一些小故事。我记得的有：

一、邓先生说，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去世，要补选院长。陈寅恪先生说过一个意见，他认为，如果要选一个人文方面的学者，就是胡适先生；如果要选一个自然科学方

面的人，就是李四光。但蒋介石最后决定要朱家骅来代理院长。

二、邓先生说，1948年12月，北平被解放军包围，西北清华大学一带已处于解放军控制之下了。13日，南京来电称蒋介石派飞机来接胡适和一些学界名流。胡适请陈寅恪先生与他同走。打电话到清华园，回话说，陈已进城数日了。胡适很着急，问邓先生（时邓先生帮助胡适编辑《大公报》的文史周刊，与胡先生同住东厂胡同一号院內）：“你有无办法找到陈先生？”邓说：“他有可能在他大嫂家里。”邓即去找，果然在。陈先生要睡过午觉再过来。邓先生回到东厂胡同。胡适正在焦急，说飞机已到，如何是好！不一会儿，陈先生到了，遂即收拾去机场。但到了宣武门，不放行。打电话找傅作义，找不到，只好返回。胡适说，若明天仍走不成，就不走了。陈寅恪说：“我走不走本无所谓，只是小米我吃不来，没有美国的药，我受不了。胡先生与当局方面关系太多，恐怕不能不走。”邓先生回忆说，当时学界曾流传说，中共方面于北平解放后，拟请胡适做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说不定此话胡适有耳闻，所以才说，走不了就不走了。当时毛子水曾有一说：“谁得天下还不得用知识分子？”第二天，傅作义得知情况后，特批准为胡适开放城门，并用司令部的车子送胡适等出城到机场。

三、邓先生说，他听人说，国民党撤到台湾后，蒋介石的两个儿子，尤其是蒋经国，对胡适特别忌恨。因为，有一次胡适与蒋介石谈话，谈到胡思杜发表声明断绝与胡适的父子关系的事。胡适说：“思杜是个傻瓜，不如经国聪明，知道改悔”（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也发表过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此事，蒋经国一直耿耿在心，视胡适为异己。

这几件小故事，都很有意思。虽细节不易找到旁证，但基

本情况是符合实际的。

这次见面以后，我同邓先生的来往便很多了。

我同邓先生谈的关于召开胡适学术讨论会的事，我一直都在努力。按我当时的想法，胡适先生与北京大学关系最深，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服务于教育界，故第一次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由北大出面召集最为合适。而邓先生于胡适离开大陆前几年与之交往最多，由邓先生出面倡议亦最得体。我曾以此意征询邓先生意见，1988年5月10日，先生回信给我说：“你的这一倡议，不但赞成，而且深为感激。但由我来承担筹备之责，则甚有困难。……而筹备胡公的会必然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体。”他建议我找社科院领导谈此事。但此事直到1990年才开始有了头绪。那年5月间，在胡绳同志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我有机会直接向胡绳同志谈起我想举行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的想法。胡绳同志要我在下周一次会上提出讨论。5月16日，仍是由胡绳同志主持，有丁伟志同志（时任副院长）、高德同志（时任科研局史学片负责人）、王庆成同志（时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和张椿年同志（时任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参加的一个小会，我较系统地报告了我的想法，得到与会者的赞同，胡绳同志也表示了赞同。此后，再用近代史所的名义提出正式报告，胡绳同志作了批示。从而一切筹备工作都上了轨道。我把这消息告诉邓先生，并告诉他已定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他非常高兴。1990年12月4日，他在信中说：“会，我极愿参加；但文章十之八九写不出。”1991年，恰逢胡适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在胡适的故乡安徽绩溪顺利地举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因交通不便，邓先生未能与会，他在10月8日的信上说：“绩溪之会竟不能照原定计划前去参加，藉得聆听国内学者的高论，实在非常遗憾，也非

常抱歉。”但邓先生特为会议发了贺信，还提供了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

整理出版胡适资料的事，更费周折。此事，也是由我起草报告，由近代史所报到院里，得到胡绳同志的批准。但因经费不易筹集，所以迟迟未能落实。这期间，庞朴先生曾费心费力帮助联络。事虽未成，其意可感。也是到1990年，方才有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但他们的力量有限，直到92年，得一家印刷厂的直接合作，资料的整理与编辑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1994年底，这套大型资料终于出版，书名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四十二册。

1992年7月，国内研究胡适的朋友二十余人在燕京饭店聚会，对胡适研究做了回顾和展望。当时路过北京的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唐德刚先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先生以及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的台湾朋友陈宏正先生也曾与会。我特地委托可靠的朋友将邓先生接来参加聚会，此外并请来王子野同志到会。在这次会上，大家形成两项共识：一是要筹备编辑《胡适全集》，二是要筹办胡适研究的不定期刊物。此次会后，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两项工作上。《胡适全集》的工作，从调查、搜集胡适所有言论著作入手，制定工作计划，草拟全集分册目录，以及联系版权事宜。此事直到1996年告一段落，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工作基础。办刊的工作亦非易事，从联系出版社，到组稿，都需花费许多时间、精力。好在经费有陈宏正先生赞助，不用我多操心。1994年第一期稿子齐备，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春见书）。这两项工作，都得到邓先生的大力支持。第一辑上就有邓先生口述、闻黎明笔记的《我与胡适》一篇大文。

为了支持我的工作，邓先生还亲自出面帮助我们获得高等

学校古籍整理小组的资助，使我们搜集和整理胡适资料的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1995年春，我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全书送给与胡适关系十分密切的北京大学。北大方面特为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时已八十七岁高龄的邓先生参加了这个仪式。他在发言中很有感慨地说：现在，仍有大多数人完全不了解胡适，前年北大编印一本《北大名人手迹》，其中胡适的手迹竟然一份也没有收。胡适先生遗留在大陆上的材料，幸亏保存在近代史所，得到耿先生的充分注意，进行整理，编辑出版，我们今天才能见到这样一部极有价值的书问世。

96年以后邓先生的体力、精力都觉不如以前，97年下半年，他病倒了。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是1997年12月29日。那时，邓先生的头脑已不很清楚。我告诉他，我从近代史研究所来。他马上说：“那，你是跟耿云志在一起了？”我微笑着说：“我就是耿云志。”直到这时，邓先生才完全清醒过来。接着他就跟我谈起胡适研究的事，还提到他从前常常提起的在美国的梁容若先生。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护士来治疗，我就告辞了。想不到，十二天后，邓先生就永远离开我们了。

在邓先生的追悼会上，我提着冻僵了的毛笔书写一付挽联：

立身忠廉诚信始终学人本色

治学勤谨和缓一代史家风范

这决不是溢美之辞，邓先生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写于1998年4月18日

追忆邓广铭先生

——佐竹靖彦

从九十年代起，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去北京。到北京总有幸去先生家登门造访。记忆中的先生一直是精神矍铄，除了有些耳背之外，并未给人以年逾古稀之感。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在我们每次谈话中，先生似乎从未因倦意或敷衍而漏听或遗忘过什么。这种对近期发生的事所具有的极强的记忆力，连我或与我同龄的人有时恐怕都自愧不如。因为耳背，其女邓小南教授把我的话简明扼要地用清晰而明亮的声音不断地在先生耳边重复，又怕我听不懂先生浓厚的乡音，时不时把先生的山东腔用她纯正悦耳的普通话复述给我。本来山东方言并不算是难以听懂的，可是先生在这点是非常的“顽固派”，先生自己曾经告诉我，他的一个女学生上他的课，经过一个学期以后仍听不懂他的话，就打趣地说先生的话对她来说简直是外国语。邓小南教授帮助我当翻译，会话就有了缓慢的节奏，使我充分享受到谈话的乐趣。

记得在数年前的一次拜访中，我不揣冒昧地向先生提出自己对井田制的一些看法。先生认真倾听着，其领悟的敏捷度丝毫不给人以衰老感。当邓小南教授把问题的要点复述给先生之后，先生不时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提出中肯的意见。此时邓小南教授也相当紧张，我窃推测她也认为我的意见有可取之处。

我觉得能在此杰出的父女面前提出自己的看法是我的荣幸。

最后一次见到邓广铭先生是在去年（1997年）5月。当时我作为客座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呆了三个月。那年的北京与往年不同，4月末已经非常热，雨水也很大。我似乎是在一个阴天拜访了先生。说来惭愧，那年出版了庆祝先生九十岁华诞的纪念论文集。我本来很想为该文集写点什么，但正赶上手头有些杂事，竟在不知不觉中误了征稿期限。等我准备提笔著文时，友人告诉我，论文集已进入了出版发行阶段。

那天，我很沮丧地来到先生家。先生并不在意，依然是那张慈祥的笑脸，并欣然将已出版的论文集赠予我。我更感歉意。其实，那位友人已向我透露，先生对此出版计划略存不满之意，他认为既然是纪念论文集，应该在百岁寿辰时出版更为合适。可大家劝说百岁当有百岁论集，现今中国形势大好，我们不妨先庆祝先生九十华诞。我听到此消息以后心中才有些轻松感。当时见到健壮而硬朗的先生，我对百岁论文集的能够出版更是深信不疑。

那天不凑巧，邓小南教授不在。先生漫谈中国宋史研究的形势，有时涉及到一些学者的轻薄之风，也有时追溯到三十年代之往事。我正津津有味地聆听先生的话，窗外忽然袭来一阵骤雨，一会儿就成一场倾盆大雨。

我初次拜见先生是在1966年1月。作为日本年轻中国研究者代表团之一员，我在1965年10月来到中国。那时正值“文革”的前夜。同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发表了批判吴晗的文章。虽然当时我并不了解他的用意，可我至今仍保留着当时暨南大学油印的那篇文章，算作一个历史的见证。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所想拜访的先生们，有些容易见到，有些言称有病，非常难见。邓广铭先生与侯外庐先生很自然属于后者。最后得

到批准，我一个人拜访了邓广铭先生。在这位仰慕已久的史学老面前，我请教了有关宋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基本史料。遗憾的是，我终于难改怠惰的天性，当时先生所推荐的周必大文集至今没有认真读过。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也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先生似乎对什么事情怀着一种恐惧感。在当时充斥着毛泽东那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名言的环境下，连我们这些本无关联的外来客也很为那种“勇敢”的气氛所感染，自然对先生的那种感觉更添几分费解。

先生向初涉学域、并不堪称学者的我征求对自己研究的批判性意见。尽管现在回想起来，仍为当时的失礼而出一身冷汗，当时我的确是说了些什么，至于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想不起来了。不过，我很清晰地记得当时在我的启蒙老师、已故汪篈先生面前，提出过我对中国学者有关宋代役法研究的批判性意见。所以，那次也很可能提出同样的问题。当然，汪篈先生在肯定了我提出的宋代役法具有地方分权性质意见的同时，又对王朝组织役法此事本身带有的中央集权性质，予以了正当的评价。汪篈先生的这一意见，在当时大部分中国学者都持普遍意义的封建社会论、或变态性封建社会论的状况中，可谓独树一帜。记得当时邓广铭先生只是谦虚地听取我的看法，似乎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随后，1982年我利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留学的半年之际，再访先生时，他已回复了其柔如水、坚如钢的本性。实际上，先生具有那种即在工商界或政界也极罕见的刚毅的秉性。

先生曾任过北大校长胡适的秘书。我窃以为，此种经历，能经得起“文革”的考验是一种奇迹。或许只有像先生那样具

有柔如水、坚如钢的本性的人，才能出现这种奇迹。如果说他有旧时中国实力派宰相的那种顶天立地的坚毅气概，大概是一种极为形象而又贴切的形容吧。

1985年在杭州举行了宋史国际讨论会。这次由先生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成为后来宋史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起点。来自美国的学者有当时在夏威夷（Hawaii）大学的马伯良（Brian MacKnight）、康乃尔（Cornell）大学的毕德森（Charles Peterson）、亚利桑那（Arizona）州立大学的田浩（Hoyt Tillman）等三教授以及依利诺斯（Illinois）州立大学的埃布利（Patricia Ebrey）教授和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韩森（Varelie Hansen）两位史学界女杰。再加上若不看肤色、仅凭那口流利的中文简直令人易与中国人混淆的科罗拉多（Colorado）大学的何瞻（James Hargett）和杜克（Duke）大学的戴仁柱（Richard Davis）两位教授，真可谓人才济济。日本宋史学者除了著名的草野靖氏和几位春秋已高的长老教授以外，全员出席了大会。

谈起日中美三国的学术交流，还有一段渊源可述。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的刘子健教授一直献身于宋史学术事业。1989年，日本的衣川强氏主编出版了《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此论集使用日语、英语、汉语等三国语言，征集了中国大陆、台湾、欧洲和美国等地的优秀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论集由邓广铭先生作序。先生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为刘子健教授建立在渊博学识基础上的学术研究予以了高度评价，同时强调当代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

仅就宋史而言，在此之前，由法国的白乐日（Etienne Balazs）、尔吾（Ives Hervouet）两教授及日本的宫崎市定教授与佐伯富教授组织的宋史研究机构（Song project）曾产生过

极大的影响。因此，最初致力于宋史的国际学术交流的竟是诸外国的研究者。当然，此事就当时中国学术界所处的环境而言也属无奈之举。但是，围绕中国史研究的国际交流，只有以中国为中心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从这个角度而言，当时以邓广铭先生为会长、在杭州举行的宋史国际讨论会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后，以陶晋生等学者为中心在台北召开的1990年的“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国际研讨会与1996年的“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也均以宋史为研讨的中心，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此我想坦率直言的是，长期孤立于世界学术交流之外的中国，以现有的机制，若想成为世界宋史研究的中心，仍存有若干问题。

邓广铭先生在刘子健教授论集序言中触及到中国长期孤立于国际世界之外的事实。他对从五十年代以来的近三十年间中国大陆因“两耳不闻域外事、两眼不触域外事”而产生了大量的“孤陋寡闻之人”的现状，表示了坦率而深刻的反省。正是在这位对本国孤立于国际学术界现状抱有痛感的先生的率领下，中国的宋史研究以积极的态度步入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轨道。我们也深感中国距离国际宋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已不遥远。

先生学术研究的重心在于以对职官制度及书籍的深刻造诣为基础的宋史方面。但究其本意却又似偏爱于王安石及岳飞的研究。不难想像，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际开始中国史研究的先生，热衷于岳飞研究，源于其为岳飞强烈的爱国之心所感染，而倾力于王安石研究是否又基于先生强烈盼望中国通过自力更生而自强之意呢。

先生很重视王安石在以理学为中心的宋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他对王安石摒弃先儒章句训诂、以义理来认识现实的思想

予以高度的评价。先生对于超越传统、以义理对待现实的王安石之学是非常赞赏的。先生似乎在王学的研究与与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理论同出一辙，都是义理与现实的结合。

另一方面，先生也赞同王安石三教合一的立场。但在先生，所谓三教合一应该是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对道教与佛教加以兼容。因此，先生与那些孤陋寡闻之士不同，他以宽广大达的胸襟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但又绝非盲目的追随，而是从充分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立场出发，将之融合于本国文化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先生是中国理念的坚强的捍卫者。平日温和的先生在对王学的理解上却表现了执着而坚定的信念。

先生在拥护王学的立场上，一直是“顽固派”。参加1985年杭州讨论会以后，梅原郁、斯波义信、柳田节子诸氏与我一起商量，决定继续持久地进行日中学术交流，并决定由梅原郁氏申请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金以邀请邓广铭先生来日。本来申请学术振兴会的资金是非常难于成功的。但此时因为先生学术成就卓越，一申请就得到了批准。先生到日本之后，先后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东洋文库分别进行了学术报告会，并在后二次报告会上，由我当了翻译。先生在此次访问日本诸学术单位时，无论在报告会还是宴会上，都显得精力充沛而和蔼可亲。日本学者都非常佩服先生在学术立场上的自信，特别惊叹先生对王学的坚持不移的立场。

现在回想起来，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夜所表现出的恐惧感，正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对狂风即来之预知，同时又是预感到自己不得不振奋精神面对现实的表现。

人们说无视恐惧的事实，盲目地“大无畏”或又为之“魂不附体”都为凡人之举，而能正视与面对这种恐惧的人，才堪称真勇者。先生真可谓此种真勇者。

缅怀邓广铭师

王曾瑜

我最早知道老师的大名，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读初中时。一些男生往往喜欢读古代演义小说。记得一位同学对我说，新近出了一本《岳飞传》，里面说的是真人真事，同《说岳全传》迥异。我当时怀着好奇心，去图书馆借阅了邓广铭先生的名作。直到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老师与新生的见面会上，由系主任翦伯赞先生一一介绍系里的教授，当邓广铭先生向新生们起立致意时，我才初次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先生。虽然事隔四十余年，青年时代许多带有浪漫色彩的幻想已难以追忆，但我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并且最终选择了宋史的专业，无疑是受了邓广铭先生《岳飞传》的影响。

人们通常认为，大学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但是，对我们许多代学子而言，只怕很难有充满甜意的回味。从1957年冬，在一位著名的左派校长（此人“文革”时又成了著名的右派）领导下，从大规模处分右派份子开始，历史系的57级学生接连三年，就是在几乎不间断的体力劳动和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其中包括参加对前校长、一位著名的耿直学者马寅初先生的大张挞伐，低级无聊的人身攻击，学业近乎完全荒废。在陈伯达“厚今薄古”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史的课程被砍伐到了薄乎其薄的地步，还比不上高中历史课的简短课时，根本

不容老师们作较系统的讲授。记得邓广铭先生只能简单地讲了几个问题，最后作了一次课堂讨论，就结束了通史课宋史部分的讲授。

如果说，在此三年间，还能从邓广铭先生那里学到一点东西，这主要是在一份揭发批判的大字报里，介绍了邓先生提出的治史四把钥匙，即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批判者言道，邓先生单提四把小钥匙，却忘记了马列主义这把大钥匙。这可谓是在不正常年代中的特殊传授方式。我当时作为一个并未入门的学子，只是怀着一种新奇感，记下了先生的治史箴言。但此后的实践证明，要真正理解邓先生的治史箴言，却并非易事，自己在治史过程中还是走了一段弯路，这留待后面再说。

北宋末年的开封民谣说：“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直到三年可怖的大饥荒降临神州大地，才不那么强调阶级斗争，而稍开言路。我们则是在忍饥挨饿的境遇下，转入了最后一年半的正常学习。我有幸在邓先生的指导下，写作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

尽管算是调整时期，师生双方其实都有一些难言的苦衷。从老师方面说，由于动辄发动学生揭发和批判老师，青年教师揭发和批判成年教师，不能不对学生产生戒心。他们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不传授知识，当然是不尽为师之责，而传授知识，又很容易被扣上传布资产阶级学术的铁帽子。我们在政治上虽然十分幼稚，但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能够理解老师，却又不便对老师们说穿。从学生方面说，我们57级损失学业最多，大家也风闻老师们的私下议论，认为57级学生的程度最低，这对我们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最初单独接触邓广铭先生，不免有一点畏怯和顾虑，但

很快就打消了。人们回忆说，在老师们说话顾忌甚多的时代，邓先生是历史系最敢于直言的老师。有一次，他特别告诉我说：“周扬对我说，从此以后，不要再提‘白专’了，‘白专’的用词不准确。”虽然只是寥寥数语，即使在当时，我还是能体会到老师的苦心和诚意。

给我印象更深的，还是邓广铭先生有一次专门给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讲授他的治史经验。记得邓先生在讲台上，情绪很好，精神饱满，他谈到了对岳飞和辛弃疾有关史料的不同处理方式。辛弃疾的史料少，必须有闻必录；而岳飞的史料多，就无须如此，而应当选择重要的史料。他特别详谈了自己依赖史学的方法，博览群书，广泛网罗，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大大突破了前人对辛弃疾的研究，一举成名。夏承焘先生虽然对辛弃疾研究积年，也甘愿对一个本不知名的后学，转赠自己的全部积累。这些都是老师的往事，却又是学生们的新闻。如果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论调，这一次讲授，足够承受好多顶政治帽子，诸如“贩卖资产阶级学术观点”、“鼓吹成名成家”、“和党争夺青年”之类。我们这些学子，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但是面对着诚心求教的学生，邓先生却是不金针度人，就不足以快意。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回想起来，我当时虽然对邓先生的讲授听得津津有味，在相当程度上也不过是听个热闹而已。依我现在的体会，老师著述繁富，自不待言，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首推辛弃疾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文史不分家，降及近代，已是非分家不可。然而研究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却是文中有史，史中有文，如果没有史学根底，只怕难以作出深入的、有份量的研究。邓先生研究辛弃疾的成就，是提供一个范例，不仅在于文史结合，更在于以史为

主。如果邓先生不依赖他倡导的四把钥匙，不依赖于广泛网罗史料，进行缜密考证的方法，是不可能将辛弃疾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水平的。

邓广铭先生研究辛弃疾的成果，有四部著作传世，即《辛弃疾（稼轩）传》、《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诗文笺注》。人们可能以为后两部当归入古典文学类，其实并不完全确切，“编年”两字即是史学。这四部著作，形成了研究辛弃疾的完整体系，大体可说是登峰造极之作，岂但前无古人，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研究辛弃疾当然不是全无深入的余地，但后来的研究者，也许永远达不到更上一层楼，将上述四部著作取而代之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邓广铭先生的四部著作是研究辛弃疾的史家绝唱。

岳飞是位对后世影响极大，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但千百年来，后世为他杜撰的事迹，便愈来愈多，愈来愈离奇。人们熟知的岳飞形象，大抵来自《说岳全传》，其实已非历史上的真实形象，而成了半神半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国学大师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其意是说古代的历史，包括人物事迹，往往不断地经后人的附会和伪托，时间愈往后，则虚构的成分愈大。传世的岳飞故事也出现同样情况。且不论《说岳全传》和戏曲中的岳飞已大致背离史实，而后人伪造的事迹、遗墨之类，也比比皆是。

在有关岳飞事迹的传世史籍中，岳珂为祖父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居于独尊的地位，在此传记问世后的七百几十年间，人们一般都将这份传记当作百分之百的信史。其实，《鄂王行实编年》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有意抹煞岳飞与宋高

宗的矛盾，也有为岳飞虚美的成份，还有不少错讹和疏漏。如果说，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讨论，是破除了对三皇五帝等的迷信，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上古史的科学研究。那末邓广铭先生敢于对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提出质疑，破除对这份传记的迷信，并且广泛网罗宋人载籍，对岳飞事迹重新进行考订，剔除后人加于岳飞的神的虚饰，而还其人的面目，也是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岳飞的科学研究。他的论著有《岳飞传》（增订本）和编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的若干论文。此后的研究者大体都是沿着邓广铭先生开辟的通道行进。

以上顺便谈了对邓广铭先生两项重要学术成就的个人看法，以下还是按时间的顺序，继续自己的追忆。回想起来，大学生活中最后的一年半时间，可以说是自己治史的起点，是在学术研究中结束爬行，走向直立行走的起点。记得后来邓广铭先生曾对我说：“其实我对你的指点并不多。”这句话说了一方面的事情，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指点虽然不多，却具有关键性。记得我几次学业上陷入困境，老师只用几句指导性的言语，就足以收到拨云见日之效。一个人治学入门最困难的阶段，也许是从爬行改为直立行走。没有邓先生的扶掖，自己就很难结束爬行阶段，这是应当终生铭感老师的。

我最初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尽管我已大致具备了读《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能力，面对这部卷帙庞大，而又夹杂着不少宋代俗语的史籍，一时如坠九里雾中，对其中的俗语感到吃力和费解。邓广铭先生的指导十分简单，他只要求我从宋仁宗庆历时开始阅读，并且取出自己所用的线装书《长编》，我只见书上的每一条记事，邓先生都做了提要性的批语，以便于检阅。他要我不必存在畏怯心理，也不要性急，开始不妨慢慢地读，读后回味一下本段的提要。按

照先生的提示，我终于较快地度过了这个难关。

邓先生指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王安石的免役法。面对浩繁的宋代史料，我又感到不知如何措手。邓先生的指导也是十分简单，认为短短一年时间，不可能胡乱翻书，要我重点看《长编》的宋神宗部分，他说，自己的那本《王安石》（指五十年出版代的）没有多少书目，可以按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注释中提供的书目，查找原始史料。我按邓先生的指示去做，不但初步学会了做资料卡片，还开始积累了一些版本目录知识。

在大学时代，就听说邓广铭先生发表过《宋史职官志考正》。1962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自己尝试着将百衲本《宋史·职官志》与《宋史职官志考正》对照阅读，结果却是看得眼花缭乱，虽然勉强卒读，而收获甚微。其故非他，按我当时的学力根底，并不具备吸收和消化邓先生这份重要研究成果的能力。但我因而产生了对宋代官制的畏难情绪，认为自己既然重点研究经济史，不妨绕开官制。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经济当然是基础。但就研究历史而言，正如邓广铭先生早已昭示的，官制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我不遵老师之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畏避官制，直到发现自己的若干学术错误与官制知识不足有关，才痛下决心，重视对官制的了解和研究。这确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963年间，我还能去看望几次邓广铭先生，并且从他那里索取了一本油印的《宋人文集目录》的小册子，保存至今，这对我后来按图索骥般地阅读宋人文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自1964年后，由于连续不断的劳动锻炼，“四清”和“文革”，十多年间，师生之间的联系便告中辍。其间唯一的一次接触是在1966年“文革”初期，正值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

秋，我们被组织去北大看大字报，不意正在此地遇到了邓广铭先生，彼此都只能噤若寒蝉似的点了点头。十一年后，邓先生通过胡志宏女士带讯，特别对这件事作了解释。其实，真正需要进行解释和道歉的，应当是我这个学生。

大致自1973年开始，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我们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所的人员，得以自河南返回北京。我也在艰难的条件下，重新开始了治史。历史研究所的丰富藏书，按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命令，不得动用，我只能经常去王府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一次，我偶而见到了邓广铭先生在抗战期间出版的《韩世忠年谱》。这虽是半世纪前的旧作，时至今日，仍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且不论此书所搜罗的丰富史料，即以邓先生在书中论证了韩世忠妻梁氏史册无名一事而言，实为不可能被推翻之铁案。然而至今杜撰梁氏名红玉，不但出现在诸如戏曲舞台上，甚至还出现在辞书中，以讹传讹。正如邓广铭先生在此书的序例中说：“方今士林通病，在束书不观而好纵谈史事。即如创作之文固应与考史之作殊种，然若以‘历史剧’或‘历史小说’为名者，则终以大致不肯于史实为是，乃近今所有涉及韩氏或其夫人梁氏之作品，大都肆臆妄为，不稍考核。”半世纪前的这段精当的评论，对如今众多的历史剧之类，无疑仍是一针见血的针砭。邓先生撰此年谱，时年仅三十六岁，并且正处在艰苦抗战的时代，工作环境有诸多困难，而其功力之深，见识之高，仍足以使今人惊叹。我后来曾多次向邓先生提及这份年谱，但邓先生显然对年谱并不满意，所以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所附主要著述目录中，并未列入这份年谱，足见邓广铭先生对自己要求之严。

1977年，我终于重新踏进阔别十余年的母校校门。多灾

多难的校史，在某种意义上确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我初次见到老师，第一句问话是：“邓先生，这些年还好吗？”邓广铭先生的回答却是意外的简单：“我能活过来，就不错了。”尽管只是一句话，我还是不难体会他感情上的巨创深痛。后来，他曾对我说：“在‘文革’最厉害、最乱的时候，我总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状态，不正常的状态总不会持久。”这说明他在艰难的境遇下，还是对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前途、中华学术的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

“文革”结束后，邓广铭先生先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和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依我的片断接触，老师是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来对待这两个岗位。他决没有指望利用历史系和宋史会为自己做点什么，他的考虑是为这两个单位做点什么。在世风日下的今天，面对着利用一官半职，为自己一点鼻子尖的利益全力拼搏的事例，如同车载斗量，我不能不感叹和敬服老师精神境界的高尚。

邓广铭先生主张改进历史系的教学，就亲自在历史研究所请了十名北大毕业生，回母校讲课。他为此自己出钱，宴请包括我在内的十名学生。当我见到已经年逾七旬的老师最后去柜台，不免感到过意不去。中国很快就进入一个公款吃喝风炽盛的年代，回想起来，邓先生当年化私为公的行动，自然而然地成了对世风的针砭。

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活动，就是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的首次年会。邓广铭先生以会长的身份强调说：“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这表现在：不但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有关宋代史事的论文，比之其他各代显得少些，甚至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宋史专著也迄今无人撰写出来，而其他断代却多已有了。在国外，例

如在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中，其每年发表的有关宋史的论文和专著，也比我们的多。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就很难谈到质量。因此，关于宋代史事的研究，还亟需我们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去生产成品，去培育人材，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段话集中表现了老师承认落后，而决不甘心落后，努力推动宋史研究的暮年壮心。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并为邓广铭先生所亲见，也足可告慰他的一份苦心。

“文革”以后，年事已高的邓先生已经不可能活动在历史系教学的第一线。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培养宋史研究的后继者。有一回，我到邓先生家，发现他在给研究生批阅宋代史籍的校点作业，确实使我感到吃惊。众所周知，对古代史籍的校点，当然是研究生的基础训练。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又可说是史学入门的小学生作业。老师那样的大学者，居然宁愿放弃重要的工作，不惜对此类作业花费时间，精心批阅，一丝不苟，若非亲见，是我根本无法设想的事。邓先生对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是十分严格的，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答辩的八字方针，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当然，所谓宽，也决不是无原则的将就。

目前的一种流行风气，就是主编热，确实已经造就了一批学术活动家，他们热衷于名利，陶醉于出头露面的各种活动，而淡泊于研究。牛顿说，他的成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而若干中国名流的嗜好，却是踩在其他学者的背上。利用一点知名度，到处组织别人为自己写作，空头主编满天飞，一套套卷帙大得吓人的著作和丛书，其实却根本没有足够的学力、精力和时间，真正对全书的质量负责。粗制滥造的作品不难得到的书评广告，有知名度的人当主编，就更难得到中肯的批评。邓

广铭先生却并没有卷入到此种时尚之中。师兄陈振曾向老师提议，由老师出任主编，召集学生们合撰一部大型的宋史，却被老师所回绝。邓先生宁愿从事个人有限的著述，决不将自己的研究计划落实到学生们的身上。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邓先生被授命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卷的主编，为完成国家任务，八旬上下的老师才找了几个学生和学者当助手，但他决不当空头主编，对全书的质量是克尽己责的。

邓广铭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不仅在平时，就是逢年过节，也并不休闲。我有几次去他家拜年，仍然见到他在伏案工作，确实使我感动。特别是他在临终前住院期间，我几次探望，都见到他用口授等方式工作。他在病床上唯一的追求，就是早日出院，回到自己的书案。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确是邓广铭先生终身奉献史学研究的写照。

在邓广铭先生住院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两件事。有一次，他对人介绍当年当陈寅恪先生助手的情况，虽然已是半世纪前的往事，而老师作为九十高龄的老人，仍然十分动感情，竟在床上涕泗横流，泣不成声。我作为一个年近花甲的后辈，也不能不为老师对祖师的深情所深深感动。另一次，是老师听说他的同学、我的另一位老师张政烺先生病重，在病床上大哭，一定叫他的二女儿可蕴前去看望。我想，这两件事十分典型地体现了邓先生身上所具备的中华传统美德。两位老同学，相距仅有数公里，却已不可能在辞离人世前，再最后相会一面，这不仅是老师们特有的遗憾，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哀痛。当我将邓广铭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告知张政烺先生时，张先生尽管患有老年痴呆症，还是伤心流泪，令人感痛。

邓广铭先生以高寿离开人世，并且享有了他应有的哀荣。他作为一代宋史研究的宗师和泰斗，其道德文章，为我们树立

了光辉的楷模。秉承师教，努力工作，推动宋史研究的进展，这应是对邓广铭先生最好的纪念。

永远的老师

——邓广铭先生二三事

黄 葵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图书似海，名师如云，是一个培养卓越人才的摇篮。我1959年入学古典文献专业，给我们传道授业的名师，大多是享有盛誉的校内外专家学者，其中邓广铭先生是我印象最深、交往最密、获教益最多的老师之一。

补教通史

当年的北大历史系，教师人才济济，教学、科研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当时，齐燕铭同志（国务院秘书长）与金灿然、翦伯赞、魏建功一起筹建古典文献专业时，就曾想将其设在历史系。后来虽然设在中文系，但对于古典文献专业的中国历史教学水平，要求不得低于历史系。因此，“中国通史”这门课程，是与历史系共同上课的（一、二年级合班上课），记得上课的老师有张政烺、田余庆等先生。后来，为了充实基础，又独立“开小灶”，开了专题课，请游国恩讲《左传》，请翦伯赞讲《汉书》研究，请吴晗讲《明史》研究，请聂宗岐讲《中国历代职官制度》，请柴德赓讲历史年代问题，请史树青讲古代风俗研究，请周一良讲日本汉学研究，请贺昌群讲汉简研

究，请许大龄讲典章制度，请阎文儒讲敦煌研究，请宿白讲唐宋刻书业等等。

齐燕铭同志十分关心专业建设。他得知“中国通史”一课，前详后略，对中古以下讲得很少。他指示，要请一位有研究的专家补上宋辽以后的历史课。对中古以下历史最有研究的专家，首推邓广铭先生。当时，魏建功先生（时任副校长）登门请邓广铭先生，邓先生欣然应允。邓先生不仅精讲了宋辽史，还下及元明历史。他是名教授，认认真真地补上这门基础课，令教师和学生们的倍感钦佩。他上课十分认真，有周密的教案，并在讲课中指出研究路子，列出参考书目。我们有问题找他，他总是放下自己的工作，十分热情耐心地解答，并曾把他自己的藏书借给过我。我们中古史知识的基础，就是邓先生这样一点一点地给我们打下的。

我当年对宋代词人辛弃疾很有兴趣，知道邓先生在这方面很有研究，便去请教他。邓先生非常谦虚，说自己研究不深，还有不少疏漏。他将他编著的《稼轩词编年笺注》给我看，并说他即将修订。我后来还专门去买了一本，可惜没能好好去读它。直到前些年我编著《辛弃疾词精华》（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时，才翻出邓先生这本书，把它作为我编选、注释、今译的主要依据。自己在编著中，认真读邓先生的书，仿佛先生就在旁边指导着我一样，倍觉亲切。我在《前言》中特别作了说明：“作品大都按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为序排列……”应当说，我的那本小书，只是在学习邓先生著作后的一个习作。

扶掖后生

邓广铭先生作为一位老师，始终不忘师生之谊，永远在教导、帮助他的学生。我出校门三十多年，始终接受着邓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他是我永远的老师。

每次回北大，我都要去看看邓先生。先生见我去，总是那么高兴，那么热忱，那么慈祥。他同我谈为人、治学，谈事业，谈研究，谈古籍整理出版。邓先生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我在巴蜀书社供职，有许多谈不完的话题。每次谈话，他都关心我的工作、学习和研究，并恳切指导我如何抓好研究，如何抓好出版质量。我每次从邓先生家里出来，总感到是上了一堂指导课，得到了很多收获。

邓先生关心着学生成长，特别是学术上的成长。如果我们有了那么一点成绩，先生总感到高兴，鼓励我们，并严格指出不足之处。我曾编著过几本小书，送给先生的每本书，他都认真看过，总来信肯定成绩，并指出其中的不足处，乃至编校中出现的错字。邓先生那么大年纪，那么忙，他这样细致地审阅，使做学生的感激不尽。

1991年，邓先生审读了我的《孙子导读》和《陆云集》后，还给四川省出版系统高级职称评委会写了推荐信。他从两书的整理、编著进行了分析评价，充分肯定成绩，亦指出了不足，竭力推荐我评编审（正教授级）。这事，我并没有去请求先生推荐，但先生想得到，写了详细的推荐信，自己签名盖章，还亲自跑到历史系去盖了公章寄出。同时给我来了一信，鼓励我申报编审职称。我看到信，十分激动，流下了热泪。可能由于有了邓先生举荐，次年我在局系统正高指标十分紧张的

情况下评上了编审。我感谢恩师，也感到恩师对我寄予的厚望，我只有努力上进，才不致辜负先生的殷切希望。

先生扶掖学生，不止我一个。据我所知，还有不少人得到了邓先生的荐举。因为邓先生为人忠厚、治学严谨，从不虚捧虚吹，他的话很有分寸、很有份量，因此人们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我的学弟张大可，原在兰州大学任教，教学、科研均有显著成绩。八十年代末，评定职称，许多单位还是论资排辈，他五十的人了，还被认为“年轻”，虽有《史记研究》、《中国文献学》等多种著述，评教授仍评不上。邓先生认为应当扶持有作为的年轻人才，便给兰州大学写了推荐信，建议将其评为教授。大概由于有邓先生推荐，高评委会很快就通过了张大可同志的教授职称。张大可和我谈起邓先生，真是感激涕零。

邓先生对学生这样，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四川大学古籍所原所长曾枣庄教授得悉邓先生仙逝后，立即电话告诉我，并说，邓先生对他有特别的帮助，有特殊的恩泽，是邓先生支持了他们所，帮助了他，指导了他。他永远忘不了邓先生的恩德。对于邓先生的逝世，他感到很痛心。大凡与邓先生有过交往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一丝不苟

邓先生作为一代史学大师，治学十分严谨，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管面对什么人，也不管什么场合，他坚持原则，铮铮直言，不苟合世俗之论。他的为人治学，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风骨，因此人们格外敬重他。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的《全宋文》，是在邓先生亲切

指导下搞起来的。全书180余册，1亿多字，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最大的断代文化工程。记得1987年第一册首发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许多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首发式座谈会。会上，人们都纷纷祝贺，称赞《全宋文》，一片颂扬声。待到邓先生发言时，他不讲套话、空话，他扼要肯定了《全宋文》的价值和成绩，接着语重心长地讲，要努力把好书编纂好、出版好，对于小的疏漏也要注意改正；并举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和不足，作了具体分析。例如第一页第一行的“六年”应作“元年”，他认为可能是写小传的人“元”字写得不规范，误排作“六”字，责编、校对都没看出（后来查核原稿，果如邓先生所言）。就这样，邓先生讲了近一个小时，指出了书中不少错讹。他的发言，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人们听了，都很佩服。

邓先生为人治学，恰如戴震所言：“为人不作媚时语，独守真知启后人。”对于学术问题，他不趋时附和，唯真理是求；不放过错误，也不偏激苛求，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恰如其分。大约是1990年，有位记者采访了他，谈到古籍整理出版时，邓先生又讲到了《全宋文》，他全面肯定了它的创举，是一项伟大工程，肯定了它的搜集详尽、体例完备、校点精到、编印上乘，同时也批评了社会上一些不负责任滥出古籍图书的情况。记者没弄清楚，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古籍图书的质量问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误将邓先生批评社会上的滥出书扯到了《全宋文》身上。邓先生看见该文，立即给记者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文章曲解了他的本意。同时指出，为了维护作者和出版社的名誉，必须纠正，赔礼道歉。后来，那位记者又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称赞《全宋文》的首创之功和编印成绩，婉转地作了订正。邓先生又向四川大学古籍所

曾枣庄、刘琳做了说明，表示歉意。这一件事，体现出邓先生人格高尚，对人宽厚，对事情实事求是、对学问严肃认真的高风亮节，至今人们传为佳话。

长者风范

邓先生对学问十分严格，待人十分厚道，有一种令人敬重的长者风范。

作为学生，去拜望老师，总得带点小礼物，例如水果、茶叶、水酒之类。每次去，邓先生总是拒收，并说，师生相聚，就很好了，不要有那些世俗之气。对于酒，他是坚决不收的。茶，是邓先生唯一的嗜好，所以我后来便只带一点茶叶去看望他。就这样，他还要批评你两句。我打趣说：按照孔子之制，学生应呈“束修”；我未奉“束修”，到老师处总要喝点茶吧。先生虽然领受，但还是有些不高兴。当然，话题谈到学问，也就过去了。

1988年秋，邓先生到成都开会，去看他的人很多，先生想去看望的人也不少。为此，四川大学开了一个会，将治史方面的老先生请来，听邓先生讲史学研究问题。我陪同邓先生去的。讲完后，邓先生说，他没见到徐中舒先生，一定要去看望。当时徐中舒先生已年逾九旬，是耄耋老人，因身体不好，见人不识。历史系同志劝邓先生不要去了，邓先生坚持要去。我陪他到了徐先生住所。当时，徐先生双目板滞，神色木然，正在喝牛奶，奶水掉在衣襟之上，全然不知。邓先生来了，恭敬地再三问候他，他旁若无人，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徐先生亲属和我看了很着急，邓先生却像对高亲一样，毫不介意，笑着对徐先生说起五十、六十年代相处的事，徐先生仍然没有反

应。后来又谈起三十年代在上海相聚之事，这时徐先生忽然插话，说当时还有某某人。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人老了，越近的事越记不得，越是早年的事越清楚。出门时，邓先生很感欣慰，说：“见到徐先生，很高兴，三十年代的事，他还记得。”这次拜访，好像满足了邓先生的一桩心愿，他高兴地回来了。

会议中的一天，邓先生问我住在何处，他要到我家看看。我说，学生本应请先生，但寒舍偏远，条件很差，免了吧。邓先生坚持要去，我只好安排了一辆车，陪邓先生到原玉林新村住处。那天很不巧，地下水道堵塞，粪水漫溢，进门都不好下脚。邓先生旁若无事，踩着垫好的砖石，一步一步地进了门洞。我扶着邓先生，感到不好意思。邓先生毫不在意，到了敝舍中厅，看着墙上悬有字画，书房摆满书架，很高兴，还夸说房子清雅，是读书写作的好地方。看看书房，翻翻书，又畅谈起做学问的问题。坐了不到一小时，先生要走了，因为晚上有会。我爱人送上一听茶叶，先生硬是不收，后来只好硬塞在车上囑人给先生了。临别时，邓先生还向我爱人和女儿再三致谢，真像慈父、慈祖一样。

邓先生走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存留在人们心目中；他的丰富的著作，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精神风范，成了人们效法的楷模。邓先生留下的，我们应当承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邓先生的教诲，他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壁立千仞 海纳百川

——忆邓广铭先生二三事

——龚延明

人生苦短。身如在前，声犹萦耳，邓广铭先生竟然已离我们而去。

一位历史老人，一代史学大师，匆匆地走了；放下了没有修改完的《辛弃疾传》、《陈龙川传》，怀着对亲友的眷恋，拴着对这个变革着的世界的牵挂，走向那冥冥不可知的另一个世界……

而在他身后，留给世人的是无量功德，那启迪人们智慧的真理，激发人们学术良知的正直，桃李满天下的无限春色。

老人是一座山，我们仰慕他的学问，仰慕他的操守；老人是一粹然长者，以奖掖后进为己任，面对学问的高山，始终鼓励我们去登攀、去逾越。

我感到幸运，在有机会得到老人鼓励和提携的后进辈中，居然是其中的一个。

一、崇高的学术品格 严格的学术精神

我相信人生机遇，风云际会。

1940年，正当邓先生在大西南丛山峻岭之中，在文史大师陈寅恪身边，埋首于《宋史职官志考正》撰写的时候，我刚

刚呱呱堕地；1956年，我报考北京大学，没有被录取，失去了做邓先生弟子的机会；1974年，当邓先生以宋史泰斗蜚声中外的時候，我才脱下军装，重返校园。年龄、经历的相隔，本无缘与老人相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宋史专家陈乐素教授回杭大执教。我调进了由陈先生挂帅的宋史研究室，开始静心致力于宋史研究。于是，邓先生的著作《岳飞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王安石》、《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邓先生的论文《论赵匡胤》、《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黄龙痛饮”考释》、《宋史职官志考证》……等等，一本本，一篇篇，摆上了案头，日夜“咀嚼”，成了我汲取宋史知识的一个源泉。

少了许多披荆斩棘之艰辛，少了许多荒野寻径的迷茫，我沿着邓先生开辟的宋史研究道路，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迈进。步邓先生后尘，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写了《岳飞》、《王安石》、《宋太祖》三种历史普及读物，其时，刚刚踏进宋史研究门槛，所接触的宋人原始史料未多，自然还谈不上深度，甚至出现把《南宋书》作者“钱士升”写成“黄士升”的差错。这一切，想必邓先生了然在目。但对我处于初级阶段研究所产生的毛病或偏差，没有呵责，而是佑护，引而不发。比如，在《岳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一书中，我提出“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邓先生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为此又在《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五期）发表了《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专论，重申了他的观点，丝毫没有摆专家权威的架子，完全是一种平等的学术讨论。在我早期岳飞研究中，由于考索功力不足，对岳珂撰写的《行实编年》等有关岳飞资料，信手引用，缺少辨证，从而导致对岳飞的评价过分夸大，

“锦上添花”。邓先生又没有直接批评我，而留待在岳飞研讨会上，针对此种现象（此种情况不止出现在我一个人身上），作了专题报告，其中一节，特别提出“不应把纪念岳飞作成一种造神运动”，对岳飞孙子岳珂的著作，不能轻信。

邓先生的良苦用心，我心中明白：一方面，他是多么希望岳飞研究后继有人，为此，十分注意保护后进研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坚持岳飞研究的正确道路，对岳飞研究中出现的偏差，决不放过批评，始终不懈地致力于“把对岳飞研究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提高到现代科学研究的水平。”

八十年代初，杭大宋史研究室为了统筹研究工作，对宋史研究进行了分工，我确立了宋代官制研究的学术方向。不久，以徐规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申报的《宋史补正》，列入了浙江社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根据学术分工，我理应承担《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可是，一旦付诸实施，我又不免诚惶诚恐。宋史界都知道，在四十年代，邓先生已推出了《宋史职官志考证》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并得到陈寅恪先生的极高评价，陈先生四十年代预言邓先生将成为宋学第一人，也早已应验。既如此，我这个于宋史研究涉足未深的无名之辈，去续作《宋史职官志考证》，能免“狗尾续貂”之讥吗？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适逢中华书局总编赵守俨和中国古代史编辑室主任傅璇琮先生来杭。这两位都是通观文史全局的专家。我就带着复杂的思绪，去向他们征询。赵先生肯定了我选择的学术研究方向，并说：“中国古代官制史研究园地较为荒僻，正待有志者去开辟耕耘。我真诚地希望你从事官制史研究，只要努力，总会出成绩，并愿早观其成。”傅先生指点则更具体，他说：“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终究有限。……专门研究则以断代为佳，你可以选择《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为苦练基本功的阵地，逐步

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在‘深’的方面把根扎得更深，争取站到学科前沿。”并针对我的疑虑，又说：邓先生是宋史权威，为学术界所公认。他的《宋史职官志考证》，是开山之作，但这不等于《宋史职官志》研究工作已经终结。邓先生自己也不这样看。限于抗战时期资料不足，还有不少遗漏。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过对《宋史职官志考证》和《宋史刑法志考证》需重新进行增补。现在你去挑起这副担子，应该说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你年轻，精力充沛，研究条件又好，只要能刻苦钻研，在邓先生《考证》的基础上，必有新创获。我与邓先生有学术上的交往，深知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他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十分关心宋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你的研究工作，只要脚踏实地，做好了，会得到他的肯定的。听了两位学者一番真诚之言，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但还不能完全放心。我又想通过邓先生的高足、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王曾瑜同志，征询一下邓先生本人对此事的意见。很快，也得到了曾瑜兄的回信，他在信中说：“问过邓先生了，他对你从事《宋史职官志补正》课题研究，并无异辞。”曾瑜兄鼓励我把这项研究工作做下去，并把我的论文《〈宋史职官志〉校正略论》，推荐给《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至此，我的顾虑打消了，信心大增。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我安下心来，沉潜于考索。经过五年伏案不辍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宋史职官志补正》书稿。在该书的“例言”中，我特别写上一笔：“在这部专著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华书局副总编傅璇琮先生真诚指导和帮助，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王曾瑜同志热情的鼓励和关切。”指的就是这件事。

1991年，《宋史职官志补正》出版了，我立即将新书奉寄给邓先生。傅先生、曾瑜兄的鼓励，毕竟不等于邓先生本人的

态度。我最担心的仍然是邓先生对我所做的工作的评价。只有经得起邓先生严格审查，才能证明我做的工作没有失败。后来，我终于从邓先生的女儿邓小南处获得最早信息，邓先生用四个字——“过硬之作”，肯定了《宋史职官志补正》，我悬着的心，放下了，感到了长途跋涉者历尽艰辛到达目的地的喜悦。

作为省“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必须组织专家进行成果鉴定。经过有关方面提名，省社科规划办聘请了京、沪五位宋史专家组成鉴定小组，由邓先生任成果鉴定组组长。1992年10月底，成果鉴定意见书寄回杭城。省规划办立即告诉我：“鉴定组对《宋史职官志补正》予以充分肯定，评价很高。”特别使大家感动的是，86岁高龄的邓先生，自己亲笔撰写了两份鉴定意见，一份是个人的鉴定意见，一份是综合五位专家评价的鉴定意见，两份鉴定表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丝不苟。邓先生在个人鉴定意见中写道：

半世纪以来，我曾撰写《宋史职官志考证》一文，重点在于抉发该《志》所有材料的来源及纂修者们因不熟悉两宋官制沿革而造成的诸多谬误。……然因写作时限短促，思考多有不周，故在刊出之后，自行检校，亦惊诧于其中颇多极不应有之疏失，其后日本学者官崎市定在为佐伯富的《宋史职官志索引》所作序言中，对拙文的失误之处亦间有指述。这说明，我的那篇文章只能算作开“大辂”之先的“椎轮”。然而“大辂”却一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八十年代内，国内学者中，才有杭大历史系的龚延明同志出而专心致志于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他除已先后对此课题发表了多篇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外，更以五个春秋

的时间和精力，写成《宋史职官志补正》这一巨著，对该《志》的遍体鳞伤，细致周详地加以核查、比证，每一条各都有理有据，说理都极精当，证据都极确凿，所以也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此后之研究宋代职官制度者，若能以此书作为案头必备之参考书，不唯可以不致为《宋史·职官志》中那些歧互杂乱的记载而浪费其时间和精力；而且，在诵习此书的过程当中，还可以领会到：龚延明同志的这一著作，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境地，这是只有很深厚的根柢、很广博的知识才能做到的。

我转引邓先生的评语，决无借邓先生龟勉之语，以炫耀自己之意。在邓先生这座“高山”下，无论是学术造诣、抑或学术品格，我永远是一名“登山者”，永远是学生，只有不断地学习、进取，努力地去攀登。我想要揭示的是，邓先生在科学研究面前，勇于无情地解剖自己，实事求是，从善如流，决不护短，对历史负责的高尚的学术精神；以及对他人的成果，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以人划线，是则是，否则否，以褒扬为主，以奖掖后进为己任的大师风范。其襟怀之坦荡，宛若光风霁月；大家之器度，仿佛大海涵涌。宋史研究会学风正，成果多，新人不断涌现，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有口皆碑，这是靠邓先生带出来的。我和宋史界同仁，都为有邓先生这样优秀的学术领袖而感到幸运，但一想到，宋学的开创者、宋学繁荣局面的推动者——邓先生，遽然离我们而去，禁不住黯然神伤：如此重大的损失，还能弥补吗？

二、高擎岳飞研究大旗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984年10月，由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和杭州市园文局岳庙管理处联合发起，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成立了岳飞研究会。邓广铭先生是当代岳飞研究开创者，也是把岳飞研究推上科学研究轨道的元老功臣。岳飞研究会特聘请他为顾问，邓先生欣然答应。邓先生始终关注岳飞研究会的活动。1988年10月，第二届岳飞研究会在河南汤阴召开，邓先生特地写了一封贺信，祝大会胜利成功。

在邓先生倡议下，91、93年连续两届岳飞研讨会，成了以海峡两岸岳飞研究者为主体的，有日本、美国、韩国等外国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扩大了岳飞研究的国际影响。

特别是93年在杭州举行的“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盛况空前。使全体与会者最为激动的是，八十七岁高龄的邓先生亲临大会。邓先生铁下决心，奋然南行，了却最后一次去杭州参加岳飞研讨会的夙愿。他诙谐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出远门参加的学术活动。我写过《岳飞传》，又担任了岳飞研究会顾问，而一次也没有参加岳飞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说不过去呀！”一言一语，洋溢着先生对岳飞研究的关注，和对岳飞研究会的真诚支持。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邓先生作了《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专题报告^①。邓先生提出了“岳飞是一个造时势

^① 邓广铭《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纪念岳飞诞辰8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刊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

之英雄”的独到见解。他说：“我以为英雄造时势也同样是寓有理性的一句话，尽管这样的局面不像时势造英雄那样地经常出现。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纪念岳飞，就是因为他是一位能够造时势的英雄人物。”邓先生这个观点，建立在史学基础上，不但闪烁着唯物论真知灼见的光辉，而且显示出邓先生活到老，学到老，永不自满，不懈地探索真理的坚毅精神。邓先生在报告中，还针对岳飞研究中存在的“锦上添花”、对史料运用缺乏辩证的现象，提出了“不应把纪念岳飞作成一种造神运动”。为此，他考辨了岳珂编造的关于岳飞的一些子虚乌有的“嘉言懿行”。这一个报告，言简意赅，融“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于一炉，给全体与会者树立了科学地研究岳飞的榜样。

三、慈祥和蔼的长者 谆谆善诱的良师

1993年后，因工作关系，几乎每年我都要去北京。每次去北京，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是我必往之地。在幽静的10号公寓，聆听邓先生的教诲，是一种特殊的学术修炼，是体味人生真谛的一种参悟。

邓先生晚年，因听觉失聪，有时交谈，不得不请小南当“翻译”传话。为了不打扰小南做学问，我尽量少提问题，反而有更多时间倾听邓先生侃侃而谈。他讲的一些话，包含着人生哲理，使我反复体味，隽永难忘。

1995年秋，在北京开会期间，正在北大攻读的、我的儿子龚刚，仰慕邓先生大名，跟我一道前往拜访邓先生。和往常一样，邓先生对来访者总是十分热情，彬彬有礼，尽管行动已变得迟缓，但他的思维仍然清晰、敏捷。这一次见面，邓先生把话题集中在如何治学上。他讲：“在学问面前，必须严格；

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我喜欢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学生，不喜欢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的学生。”他说，做学问，必须严字当头，不能取巧，必须在掌握第一手资料上狠下功夫；而不能贪图快捷、省力气，做“二道贩子”。他讲述了自己如何要求博士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儿子听了邓先生这一席语重心长的教诲，感触至深。他说：北大学生都知道邓公是“严师”，果真名不虚传。邓先生的“严”，严得有理、也有度。邓先生的“严”，决不是惩罚，以逞一时之快，而是对学生深层的“爱”，和对学术发展的高度负责精神。

1994年春，我女儿也去拜访过邓先生。回忆起那次拜访，她印象最深的是：邓先生虽然年事很高，他的谈话，却能放能收，思路十分清楚，这是与其他差不多年纪的老人，绝不相同的。此外，邓先生是一位充满智慧的老人，幽默、风趣、慈祥、和蔼，是她接触过的老前辈中，最可敬、最可亲的老人之一。

邓先生的一生，几与二十世纪相始终。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中国，从困顿走向改革的中国，锤炼和造就了这一位世纪爱国老人、一代史学大师。他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的历史。他把毕生精力和智慧献给了历史科学，献给了祖国人民，献给了人类进步事业。生命有限，精神无限；国籍有界，学术无界。天不假以年，邓先生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传世之作，和他的高尚的学术精神、学术品格，已凝结成永恒，它将越过时空，永久地放射光辉。

时值周年忌辰，后学谨撰此文，烧化于邓先生灵前，权以寄托对先生的缅怀之情和哀思之痛。

忆恩师

李裕民

1998年1月10日，宋史界一颗巨星殒落了。恩师邓广铭教授走完了九十一岁的人生旅程，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还有无限的追思。

三十五年前，我国首次公开在全国招考研究生，当时我正在杭州大学求学，受徐规先生指点，对宋史甚感兴趣，在师友的鼓励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报考了邓师的研究生，此时离结束报名仅1小时。考试四门课，复习时间只有一个寒假，我每天苦读，仅除夕回家住了一天。考完后，只觉得宋金和战一题答得较满意，其他没有把握，便全力以赴写毕业论文《刘恕年表》。过了几个月，论文刚写成，邓师通过学校要去了我的论文。8月，正当我在老家等待毕业分配时，忽然接到学校通知，我被录取为北京大学研究生了，便返杭大，将消息告徐规师，师友都为我高兴，那年招生数极少，浙江省考上文科研究生的仅两名。我当然十分兴奋，北大是我向往已久的名校，邓先生是我十分崇敬的大家，但看到通知单上还有复试二字，心中颇感不安，甚至还考虑要不要带行李。

几天后，我到了北大，来不及欣赏校景，便直奔朗润园，当我敲邓师家门时，心似小鹿乱跳。见到邓师，问起复试事，邓师说这就算正式录取了，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恩师将《刘恕

年表》还给我，上面还有几处红笔批注。又指点我：一、要看基本史料：《宋史》、《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二、要了解学术动态；三、要掌握马列主义理论。

先师的一席话，深深印在我脑海里，要想专业上有所成就，必须下工夫打好基础。我当时每月42元助学金，15元寄家，10元多吃饭，剩下的钱几乎都去买书了。每天除了必要的体育活动外，全部心血投入书本中。第一学期，去听恩师给本科毕业班讲宋史专题课。共讲了八个专题，每讲前，先分发原始资料，再讲自己的见解。先师擅长考证，又重视理论，善于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反对将理论作为标签，生搬到中国来，如土地国有制说与庄园制度说；反对将现代党内斗争生套到古人头上，如有的人对王安石的研究。

我每周都去先师家，聆听教诲，但每次都很拘谨，不知该说什么话，正好吉林大学李春圃先生来进修，于是常常随他同行，他们谈话比较随便，我在一旁听着，偶然插几句话。谈话内容很广，学问而外，也说一些有趣的故事。如解放初，毛泽东曾邀请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去中南海看戏，门卫颇注意人的长相和穿着，有的教授一进门，便被指挥往后至。先师身材魁伟，进门后，被引导到前排坐下。一会儿，进来一、二十人，戏即刻开演。此时身旁位置还空着，有些奇怪，往近处一瞧，毛主席在正中，那一边是周总理，往后一看，都是副总理和老帅。这才发现坐错了，却又怕打扰大家看戏，不便移动，心情不安，戏也没看好。

平静的书斋生活并不长，1963年底，大抓阶级斗争，成千上万的师生干部被派往农村搞“四清”。我和先师去的是通县农村，穿着统一发下来的旧军装，先师这身打扮看起来很象

是将军模样，以至于有些农民围着他，要求讲一讲当年红军长征的故事，先师只有笑笑而已。第二年、第三年我连续被派往顺义县搞“四清”。1966年5月初返校后，又去昌平县太平庄分校，5月25日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分校师生全都回校闹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开始了。老专家都成了反动权威，挨批斗，被抄家，先师也在劫难逃。有人找我去抄家，被我一口拒绝了，我说：“我不干那号事。”有的学生更不像话，乘机将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送给先生的画也抄走了，先师让他将拿走物品留下清单。“文革”后，先师找他要，他推说丢了，至今未还，先师说起此事，非常痛惜。

1968年7月，我被分配到山西大学工作，第二年又被发到附小办初中班，当时“文革”还在继续，但我坚信“文革”终将结束，学术还会复兴，因宋史书籍大多于“文革”中丢失，于是转攻古文字学。从1973年到“文革”结束后，先后刊布了多篇研究古文字的文章。这一领域与宋史相去甚远，以至有外国友人问先师，这是不是就是当年宋史研究生的我，先师当然给予肯定的回答。“文革”后，我去北大看望导师，正好路上相逢，先师介绍同行的老先生：“这位是顾颉刚先生。”又把我介绍给顾先生，还说一句：“成绩卓著。”我不好意思地回答：“离经叛道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史学大师顾颉刚，“文革”中他也遭厄运，此时他们谈笑风生，看不到一丝阴影。

1984年，我下决心回到宋史领域，加入宋史研究会，并赴杭州参加第三次年会，这当然是先师乐意看到的好事，我的论文《杨业考》被收入年会论文集中。先师在编后记中表示“愿做一个志在千里的伏枥老骥”，期盼我们写出质量更高的大块文章来。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鞭策。

1991年，佐竹靖彦教授与我等四人联合创办了国际性学术杂志《中国史学》，刊载欧美、日本、大陆、港台的论文和动态，大陆由我组稿，创刊号发表的大陆文章作者有陈高华、梁太济、张邦炜三教授，我将创刊号寄给先师。先师回信给予相当的评价，信中说：“接到你与佐竹靖彦教授合编的《中国史学》，稍加翻阅即感到所收载的文章大都质量较好，印刷也非国内刊物所能比拟，但其中并无老兄的大作，却不解何故。”我解释说，现在办杂志的先登自己的文章几乎成了通例，但我不想图个人好处，这杂志既交流各地信息，也在表现各国和地区的水平，我只想为表现大陆的中学学者最好水平而无代价的出点力气。

1992年初，我在日本内阁文库意外地发现了司马光《日记》，2月24日，日本《每日新闻》作了报道，其他报刊纷纷转载。此事立即引起先师极大的关注，3月23日，先师给我写信，说：

今天又在《报刊文摘》上看到它从香港大公报转载一条报道，谓老兄在日本内阁文库发见一部残缺的《司马温公全集》，其中有《目录》与《手录》，此消息想必可靠。我于1987年在东京时，也曾到该文库参观过，并托该文库的长泽先生影印过一部宋僧文集，但匆忙中并未见到温公全集，此书既有《目录》《手录》，自极可贵，不知你是否已托该文库代制缩微胶卷？……不知此书为何时刻印，其纸张残损程度如何？

我告以《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将在日本影印出版，届时一定立即寄上。先师于9月6日来信云：

其全集，既系在日本影印，当较在华易办，不知何以迟迟不能印出。

四月间开封之会，你本说要去参加，后来竟未能去，据闻系因临时生病之故，亦不知确否。明年杭州纪念岳飞的会，我打算届时前往，原因是，自岳飞纪念会成立以来，我一直未参加过，而我答应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参加一次，我现已届风烛残年，明年如不去参加，则深恐此一诺言之实践，将成为“它生未卜此生休”的事了。盼能在杭相晤长谈。

我因病错过了一次与先师会面的机会，先生如此关心，岳飞会我决不能错过机会。1993年3月，在春光明媚的西子湖畔，师徒又会面了，先师说：老了，出门终须人陪着，这次会后再不参加北京以外的会了。先师十分关心宋史研究的前景，主张加强海峡两岸的中青年学者的交流，建议我和黄宽重教授组织一次两岸中青年学者座谈会。他对黄教授的印象很不错，说他对大陆情况比较了解，评论也客观。我与黄教授正好是一组的召集人，他很热情爽快，也非常赞同先师提议。我们两岸十几位学者开了半天座谈会，大家畅谈了个人研究情况和设想，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不久，影印本《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在东京出版，正好我幼弟德群在北大考古系当博士生，儿子李立考上北大宋史研究生，便托他们捎去。9月15日，先师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给我写了一封信：

由令弟令郎共同送来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收领

了。我目前正在校对《学术论著自选集》的稿子，其中有一文引用了司马光《迂书》中的《道同》一短文，但过去所用《传家集》与《温国文正集》在此短文中均有错字，以致我在引用时并未完全弄懂，接你赠书之后，急忙查找，竟立即得到解决，文中谓“王者必立三公，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处乎内，皆王官也”，而“二公”二字，《传家集》与《温公集》均译作“三公”，这叫入如何理解？文中又谓“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何道而王，由何道而霸。’道岂有二哉！”此与题目之道同正相应，而《传家集》与《温公集》则将一个“何”字改为“王”，另一“何”字改为“霸”，这又分明承认有王道与霸道之分，与“道同”不相应合了。因此，急将旧稿加以改正，引用书也改为《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何快如之！今特走笔向你致谢，其感谢不只因得此一部新书也。”

一般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易为此激动，而急功近利的年青学子更难理解为校正二、三个字的兴奋心情，这唯有将一生献给学术的大家才会这样。看着略带颤抖的字，写的分外大的“何快如之”，志在千里的老骥形象顿时呈现在眼前，令人敬畏，令人仰慕，令人叹服。

去年冬天，我去北京开会，不料，却得到一个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先师身患绝症住院了。我急打电话问小南师妹，证实了这一消息，我记下地址，打算看望。小南再三叮嘱，只可寒暄，莫谈他事。一天，我约了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研究生王茜一起去友谊医院，因为先生已不能进食，便买了一束鲜花，愿他早日康复，先生见我来了，很高兴，只是为静躺不能干事而烦恼。我劝他耐心养病，很快会好的。临别，我想照相留念，

先生说：“这里不好，以后回去再照。”我明知道这并不现实，但也只好作罢。过了两天，我又和学兄杜经国去看他，他记性仍很好，外表几乎看不出有何病，依然为几件未完成的著作而着急，因为，学问，就是他的生命啊！

小南告诉我，医生说他的病超不过今年了。回校后，我跟摄影家魏德运说：“赶快去，再晚就看不上了。”又叮嘱“要照相，别征求意见”。他忙带着以前给邓先生拍好的大照片，急匆匆地赶去了。过后，告诉我，邓先生已昏迷几天了，说也巧，他去时，邓先生神志很清醒，看看他拍的照，笑咪咪的，魏赶紧抢拍了一张，这是先师一生中最后的留影。

恩师，安息吧！我会永远记住您的大恩，踏着您的足迹，不畏任何艰险，兢兢业业为学术奋斗终身！

1998. 6. 30 于西安

风范永存

——缅怀邓广铭先生

张邦炜

邓广铭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我并不感到突然，但去电讯局发唁电时，仍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回想去年秋天，我到北京友谊医院探视先生，这位学术老人尽管重病缠身，但仍侃侃而谈。他谈话的主题依旧是学术，并以其新近出版的《治史丛稿》相赠。先生不能进食已达数日之久，只能卧床将息，但他定要起身在书上题字，在场的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王春梅女士、邓先生的女儿邓小南教授和我连忙劝阻。然而性格倔强的邓先生坚持用他那颤抖不止的手，在书上题写了20个字。先生颇为感慨：“谁知我们两人的第一次单独交谈，不是在家中，而是在医院。”并叮嘱我下次再来北京，一定到他家中作客。小南教授送我走出病房，面带愁容，指着书上的题字对我说：“这或许将是最好的纪念！”殊不知数月之后，这20个字真成为邓先生最后留给我的最为珍贵的纪念品，而我再也没有可能应先生之邀，到先生府上，拜望我素来十分敬重的史学前辈。忆及此情此景，怎不叫人伤感！

我平生深感遗憾的是，由于自己学业基础欠缺，虽有意但无缘做邓先生的学生。我到北京不止一次，总觉得先生太忙，从未到先生府上，向先生请教，以致痛失良机，同先生接触极少。然而邓先生作为宋史学界的泰斗和一代宗师，其学术沾溉

所及并不局限于其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我这个与先生长期素昧平生的后学，也曾受到先生的鼓励、关怀、扶持和指教。

记得1964年我在西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时，学校将毕业论文送请邓先生评议，因先生正在乡下参加“四清”运动而未果。第二年，我将论文中的一小部分改写为短文《关于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寄与《光明日报》，得到当时担任《史学》专刊编辑组长的邓先生认可，很快予以刊载。这对一个史学青年来说，实在是个极大的鼓励。此后，我虽远走西藏，从事新闻工作，但志趣所在，依然是历史，与此不无关系。

还有一件往事，尤其令人难忘。“文革”结束之初，我因故仍下放在西藏贡噶县东拉区作文书，友人朱瑞熙研究员对此颇为不解。他向邓先生述说此事，先生当即表示应尽力争取将我调到北京，并通过有关人士嘱托西藏地震史资料组负责人，请他设法。我在喜马拉雅山中、羊卓雍湖畔，从瑞熙的来信中得知此情，简直喜出望外。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位声名卓著的大学问家竟如此关怀一个素无往还且处于困境中的无名小卒！后因北京的户口问题与西藏方面的缘故，工作调动一事虽未办成，但我对邓先生的感激之情永世难以磨灭。

在雪域高原生活15年之后，我终于得以回到故乡，并在四川师大历史系执教，但学业早已荒疏，亟待得到前辈的扶持与指教。此后，我多次参加以邓先生为会长的宋史研究会年会，每次提交的论文都被选入先生主编的论文集。邓先生先后主持两次国际宋史研讨会，我都在应邀出席者之列，既受到教益，又感到幸运。有位出身北大历史系的亡友生前曾直言相告：“邓先生对学生素来要求严格，而对你们则相当宽厚。”这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邓先生为人或许有条原则：亲者严，疏

者宽。邓先生主编论文集，态度极认真。先生曾发现我所写论文的误讹、不当之处，并嘱其助手张希清教授写信告知，让我修改后再刊登。

我虽无缘在课堂上接受邓先生的教诲，但多次聆听先生在宋史年会和国际宋史研讨会上的讲演。先生的讲演每次都精彩，并对宋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如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宋学与理学混为一谈，先生在讲演中首次提出“应当把宋学与理学加以区别”，并公开承认自己从前所说：“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是完全说错了的，是亟应加以纠正的”。这种胸怀与勇气，对于一位史学名家来说，实在太难得。八十年代之初，先生在讲演中曾呼吁宋史学界：“赶紧以最大努力去生产成果，培育人材，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最高水平。”这对宋史学界同仁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激励与鞭策。在先生的倡导和组织下，改变宋史研究滞后状态的努力而今已初见成效。

先生虽去，风范永存。愿我们与先生一样，以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具备独到的见解和考索的功力作为追求的目标，为促进宋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添砖加瓦，去完成先生的未竟之业！

1998年5月31日于成都

贤师风范 嘉惠后学

——忆邓广铭教授二三事

管成学

1998年1月20日，突然收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来信，信封下“邓广铭教授治丧委员会”几个醒目的大字，使我的心为之一颤！中国史学界的一颗巨星殒落了，宋史研究的宗师离我们而去了！

我与邓先生只见过三次面，主要是通过书信接受他的教诲。但是，他嘉惠后学循循善诱的贤师风范，他关心史学基础研究老而弥坚，至死不忘的献身精神，他对后学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都使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许多生动的往事，都足以激励我们献身史学，奋发向上，勇往直前。

第一次聆听邓先生的教诲

我第一次见到邓先生是38年前。1960年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邓广铭教授应东北师大校长丁浩川和历史系主任万九河教授的邀请，到东北师大讲学。

为了能看清楚邓先生，我早早地走入会场，在第二排占了座位。也许是第一次听全国名教授的学术报告吧，38年过去了，邓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邓先生慷慨激昂的话语仍言犹在耳。

邓先生在那次学术报告中，所讲的问题，对我后来的治学与教书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我一遍遍地吧邓先生的主张讲给我的学生，让他们像我一样地受益终生。

邓先生讲的题目是“王安石变法”。

使我终生受益的问题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邓先生说：在讲正题之前，说几句题外的话。今天来听讲的都是现在和未来的史学工作者。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邓先生提出要有高尚的史德，列举了“秉笔直书”、“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等许多史例。后来，在“文革”中批判史学界“反动学术权威”，批儒评法，强迫人说假话时，我都想到过邓先生所讲的“秉笔直书”，甘愿献出生命的古代贤贤。

邓先生指出史学工作者第二个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在史识上要有真知灼见。他又认为在史学研究中，能够高瞻远瞩选择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课题，是在史识上有真知灼见的具体体现。

他说自己是研究宋史的，并认为对宋代历史曾经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对当代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宋代历史事件，都应该首推王安石变法。所以他才研究这个题目，讲授这个题目。38年过去了，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关于改革的争论，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史学工作者和政治家们都从王安石变法中取得借鉴，吸取经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邓先生的那次学术报告。

邓先生提出的第三个素质是史才，他列举了渊博的史学知识、正确的史学理论、优美准确的文笔，都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才能。当1989年邓先生批评我们在《苏魏公文集》中出现的错误时，我又一次想起了邓先生的上述三项要求，30多年

来，一直努力提高自己，但却没能达到先生的三项要求。

1993年夏天，我已从一脸稚气的青年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者，到邓老家里向先生重提那次学术报告，85岁高龄的邓老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次学术报告的内容，我真为先生的老而不衰感到惊喜。

邓先生的指教与批评

我与邓先生的书信往来，是因为1987年中华书局要出版我们主持校点的《苏魏公文集》。苏魏公是苏颂的谥号，苏颂是宋代的宰相和科学家。为了请教《苏魏公文集》的版本、校勘和注释的一些问题，我们开始给邓老写信。

宋代的古籍研究，正是邓老之所长。对我们求教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以一一解答，对提高《苏魏公文集》校点本的学术质量给以极大帮助。《苏魏公文集》周必大的序言，就是邓老提供的。

《苏魏公文集》校点本的出版，是为了配合1988年在厦门市同安县（苏颂故乡）召开的第一届苏颂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为了把这本书发给到会的海内外苏颂子孙。全书的校点、注释和校对工作都十分匆忙，出现了一些错误。

邓老发现错误后，立即写信告诉我们，写得非常具体，标明某页某行某字。邓老在学术问题上，是一丝不苟的，要求非常严格。当时，他正任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又在会议讲话中，批评过我们的疏漏。可惜的是，《苏魏公文集》一直没有再版，邓老指出的错误，至今还没有得到改正。

1993年，红旗出版社准备将《纲鉴易知录》译注出版。我再次登门向邓老请教，并请他俯允做我们的顾问。当时，邓

老手中的工作太多，没有答应，说让他考虑考虑。后来，他还是写信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并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这次见面，邓老一定要请我到他家旁边的小饭店吃饭，我当然受宠若惊，深感荣幸之极。席间，邓老谈到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的专家校点二十五史时，他与吉林大学历史系罗继祖教授同住一室。罗老谈到他家收藏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其版本比中华书局所用校点本更好。邓老一直对此书念念不忘，很想将此书加以整理，公布于学术界。

他问及罗老的身体状况和通讯地址（罗老是我在吉林大学任教时的教研室主任）。当时罗老已身患癌症，回大连疗养了。一个月后，邓老又给我写信，重提罗老家藏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可见他对史学基础研究的关切，真是老而弥坚啊！

1997年初，我再次拜访邓老，向他请教《纲鉴易知录》全译本的体例等问题。邓老第三次提到罗老家藏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说他正忙于重新编写过去出版的书，暂时无暇顾及《长编》一书，深以为憾。不久，邓老就辞世，他对史学古籍的关心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邓先生与《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

1987年末，我将自己有关宋代科技史的几篇论文寄给邓老，请他指教。

1988年1月12日，邓老给我复信。他在信中，邀我参加他主持的“辽宋夏金政治文化制度史”项目，撰写科技史的内容。我再一次受宠若惊，立即开始工作。

我因为给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系的本科生和自己所带的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科技史”和“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概

论”两门课，很快就将写作提纲寄给了邓老。

邓老详细地审阅了提纲，对写作的体例、内容和文字风格提出了要求，又让我尽快写一份样章给他。我用两个月时间，写成了“宋代两颗科学巨星——沈括与苏颂”一章。邓老读后，给我很大鼓励。特别是关于苏颂的考证与研究，他认为“发前人所未发”，很有价值，让我尽快完成全书的写作。

我到1989年暑假，如期完成了《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初稿，呈邓老审定。邓老除对少数地方进行修改外，充分肯定了全书的写作。后来由于特殊原因，邓老主持的《辽宋夏金政治文化制度史》没有完成。邓老又鼓励我寻找出版社，单独出书。1990年4月得到吉林科技出版社的支持，《宋辽夏金元科技史》终于出版了。

我的书架上，放着《纲鉴易知录》译注本和《宋辽夏金元科技史》两种书。前者是我主持的篇幅最大的书，后者是中国自己写的第一本断代科技史。两种书中都有邓老的心血和汗水，每次看到这两种书，就想到邓老的谆谆教诲，有时竟潸然泪下。

邓老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高尚的师德风范，他不朽的学术著作，他致力于史学的献身精神，都已永留人间，并在他千千万万的学生身上发扬光大，为实现他的遗志而奋斗不息！

1998年5月20日

写于长春师范学院

中国科技史研究所

温馨的忆念

胡戟

我最年长的老师邓广铭教授以九十一岁的高龄逝世，哀悼之时，他的高寿总还给了我们一点安慰。四十年来不断的师教留下许多回忆是温馨的，使我觉得邓师没有走，他仍以灿然开朗的音容笑貌活在我身边。

1959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后成为邓先生的弟子，他那著名的年代、地名、职官、目录治学四把钥匙论，使每个学生受益非浅。“文革”中有人以“偏偏不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把金钥匙”来无端地横加指责时，老师以沉默相对的方式坚持自己的意见，正确的东西老师是决不轻易放弃的。这二十年，我不知多少次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这一治学要诀，嘱学生要尽量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时空概念和人物的社会角色，学会无师自通地研究学问的本领。当研究生们都学会熟练地排出六十甲子，使用朔闰表换算阴阳历日，用作考证历史的辅助手段时，我心里便有一种传承邓先生衣钵或火种的愉悦。曾有一位年届50岁的历史教授很不好意思地来问我这一年代学问题时，我很感慨邓先生等北大老师重视基本功教育的远见。

还记得上宋史专题课讲到宋太祖宋太宗时，邓先生饶有风趣地批评“太祖”、“太宗”的简称，说他们又不是我的祖宗，为什么要叫太祖太宗，一定要加个宋字，称“宋太祖”、“宋太

宗”。在当时动辄抓辫子的风气下，老师们上课都极为谨慎，字斟句酌一言不苟，难得有如邓先生这样的幽默调侃，所以我留下很深印象。直到现在，每当讲或写到唐代诸帝想简称高祖、太宗时，邓先生的话就会响起在耳边，提醒我别错了祖宗。

1963年在周一良先生动员我们报考研究生的会开过以后，汪篪先生把我找去，让我报考哲学系汤用彤先生，讲汤先生希望有一个历史系的学生跟他学，并说了许多佛教史研究如何重要的话。乍听此事，我心中很茫然，在那个革命热潮汹涌澎湃的岁月里，要一头扎到佛经里去是很难的事。但当汪先生说出这是和邓先生商量过，他同意了的话以后，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对老师们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的感受，那感觉真是好极了，虽还没有勇气马上答应，也再没有推辞。可叹汤先生不久便病逝了，我无缘就读于这位国内外敬重的前辈膝下，还是步入汪先生之门继续研读隋唐史，但从此一种亲近感把我和学生心目中威严有加的邓先生一下子拉近了。

“文革”中我被分配到内蒙，在那厌学厌教的混乱年代，不愿进学校，于是下了厂矿，一干十一年。邓先生代替不幸去世的汪先生关怀我。“文革”后归队之风乍起，老师就找到从北大支援内蒙，当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胡钟达先生，跟他讲了我的情况，让他把我安排到内大去。随后内蒙科委一位副主任到我所在的乌海市时，在报告中批评当地把一个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留在煤矿搞腐植酸是胡闹。这件事促成了我归队，不久便顺利调到西安，回到隋唐史学界。邓先生从教半个世纪，学生何止三千，竟能为一个在边疆荒僻山沟里的学生操心，真是师恩浩荡。

归队后，有一天邓先生到西安开会，我去止园饭店看望

他。那夜长谈中邓先生回忆起“文革”中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让他最难过的是一些研究生也去抄他的家。当时谁去了，谁最凶，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不言而喻，对我这个仅仅是没有参与那种悖逆行动的学生心存温爱。告辞时，先生送我，用他刚从日本回来还习惯保持着的礼节，竟站在门口对我连连鞠躬，我惊惶不安地一边回礼一边赶快走开了。1995年邓先生送我他的《自选集》时，题字称我为“仁弟”。我跟学生多次讲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永远不要做对不起老师的事，一旦做了，终生做不起人。

1994年以来，我在陕西师大开了一门名为“史学名篇选读”的课，想通过一批名家史学论文的阅读，让学生领悟学术研究的真谛。编印的教材中收入了邓先生的《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一文。应该如何讲好这篇文章，我曾向邓先生请教。先生让小南回信，寄给我先生关于宋学的另外三篇文章。先生对宋史和宋学研究的开拓性贡献，陈寅恪先生早有定论，1943年他为邓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便已指出：“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同学们对邓先生的“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没有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等重要论断尤其感兴趣，瞻前顾后比较着讨论。特别是在《略谈宋学》一文中，邓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在此首先纠正我自己的一个错误提法”，就是在《中国史纲要》中《两宋的哲学思想》一节里，原来有“支配两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提法，先生声明：“我现在必须说，上面的这几句话是完全说错了的，是亟应加以纠正的。”真正是“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坦诚承认自己学术观点中的错失，更见大家风范。这使学生们非常感动，有的同学作业中写道，“上这门课，不仅学到了知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还学

到了应该怎样做人。”要向大师们学，不要向他们的徒弟学，确是至理名言。能够传承邓先生、汪先生、田先生、张先生等老师们的学问，是我的荣幸，也是我对师恩的一点点回报。

1997年12月2日我奔丧在北京，临回时获悉邓先生重病住院，可能出不了院了。我着急地在开车前两小时赶到友谊医院，那天是星期二非探视日，说服门卫让我见老师最后一面。当带着鲜花进入邓先生病房，看到老师虽打着吊针，却神志清楚，没有痛苦，像往日一样健谈，我很感安慰。但老师一再埋怨医生总也不说什么时候让回家，还有几部书稿要修订时，我内心很是悲凉，知道那已是不能够的了。心中想着春蚕丝尽蜡炬成灰，口中一再安慰先生身体一直很好，不要着急，书可以在以后慢慢写的。时间到了，我只得走，怀着可能是永别的悲伤，连连向卧床的老师深深鞠躬，邓先生在床上作揖还礼。

那天我们最后的话题是一起回忆大前年邓先生88岁好年头时执意请我去北招吃铁板牛肉之事，当时先生怎么也不肯让我付帐。邓先生这时说以后还要请我，我说下一次一定是该我请您了。我很难过地这样说着实际不可能有的“下次”，但愿这能给老师一点宽慰，一点美好的想念。

今后只要看到铁板牛肉，我一定会忆及老师，想起我们那四十年间与日俱增的师生情谊。

1998. 4. 12

告慰先师 以飨读者

张惠芝

80年代初，我调入出版社工作，当时就想：如果有可能，将为史学界的老前辈和史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问世尽微薄之力。90年代，我有幸遇到了有思想、有眼光、有魄力的社长。他提出要在文史哲和自然科学领域出一些大学问家的全集。而我或许是由于学习历史专业的缘故，有兴趣的恰恰是还很少有人涉足的史学界。那么，史学界首选谁的全集来出版呢？我们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我是196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学习的，第二年就开始面对面地凝神聆听邓广铭教授的“宋辽夏金断代史”的讲授，还不时地听他的专题讲座。那时候，邓先生已是我在历史系教师中崇拜的偶像之一。先生满腹经纶，有极好的记忆，许多史料都能背诵如流，运用自如，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早在30年代，邓先生的《〈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就受到南北大师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著名学者的好评。他写就的《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诗文抄存》三书，已奠定了在史学界的地位。正如漆侠先生在《读先师邓广铭教授〈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文中所说：“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蜚声于国际学术界的，则是他在宋史方面的迈越前人的成就。40年代初，陈寅

恪先生以师长的身份对先生奖励有加，誉之为：‘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证，先生依然屹立在宋史学界，引导后继者继续向学术的高峰攀登。”正是因为先生成就卓著，我们最终确立和选定了他的全集来出版。这样才使我离开学校 30 年后，又走近了他，继续做他 90 年代的学生。

1996 年初，我和我的同仁兴致冲冲地走进邓先生的家。先生在书房里接待了我们。我环视着满屋子的书：线装、盒装、精装、平装……心里道出：“啊！这里真是‘书屋’！”崇敬之情又油然而生。我的心踏实了，就像回到了家，回到了“湖光塔影，书海师林”的这个家。我端坐在先生的书桌案头旁。心想：有先生的直接教诲，事情总会好办，我毕竟是他的学生啊！于是我说明了为其出版全集的来意，望求施教。先生当即严厉地拒绝说：“出什么全集呀！我计划一年修订一部著作，几十年前的著作一字不改的重印不可行！”又哈哈笑着说：“我还在啊，怎么会有全集出版？”紧接着先生向我们讲述了《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的修改情况以及修改各部著作的打算。我目睹了先生在原书上的眉批、旁注以及隔三差五夹注的大小不等的字条。此情此景，使我缄口无语，心里却不能平静。这位 90 岁的老人，至今仍终日伏案，笃学不倦、精益求精。这分明是献身学术的精神！这分明是严谨治学的情操！这位近乎与世纪同龄的先生的“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进取精神，将产生的是教育当代、惠及后人的无穷的力量和巨大的影响。此时此刻映入我眼帘中的一幕幕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将永不磨灭。

在争取出版邓先生全集的过程中，我的力争可说是锲而不舍。从出版角度，特别是在 20 世纪末，我认为出版大学问家

的全集、文集是有积累传承文化和繁荣学术的积极现实意义的，再加上学生对先生丰厚硕果的那份爱戴。为此，我曾多次到邓先生家，但每次只要一提起出版全集之事，先生总是采取“不合作”态度。一直坚持“改好一本，送你们一本”的原则。如果这是“固执”的话，那么透着的却是先生严肃的治学精神，我发自内心的十分敬佩，十分感动。先生最终明确答复我们出版他的全集是在他病入膏肓之际。

1997 年 10 月 7 日，先生曾有一信给我和我社领导，这大概是先生的最后一封长信了。这封信是邓先生在病榻上口述，由沈乃文先生记录、打印，又经邓先生认定亲笔签名、签定日期而成的。邓先生在信的开头就说：“上月承蒙你来友谊医院探望我的病情，非常感激，但未及多谈，你就匆匆离去，使我深感怅惘。”这封信我曾读过多遍，每每读到这里都非常难过，都感到先生还有许多教诲想说、要说，而我却因为先生病笃的样子暂时走开了，永远地听不到了。在这里我想告诉先生，其实我没有“匆匆”走掉，真是怕累着先生，而到另一间会客室与沈乃文先生，还有先生的小女小南在一起商量论文的编辑整理工作。在我离开医院时，所以没有再次道别，也是为了让先生能多休息一会儿、我想先生是会原谅我的。

邓先生在信中说：“我在医院里治身体上的病，但我还有一块心病，就是今春贵社为我印了那样厚重精美的《九十祝寿论文集》，不仅使我十分感动，而且凡看到《论文集》的学术界朋友无不为之感动，这使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如何清偿此事，成为我心头一块大病。贵社的目的本来是要我把《全集》交贵社出版……”这段话使我轻松，又使我沉重。轻松的是学生总算做成了一件使先生和学术界比较满意的事情，沉重的是学生又为病魔缠身的先生增加了“清偿此事”的“心病”。此

时刻我非常理解先生的心情，那实实在在是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感啊！先生在病榻上仍然在时时思虑怎样尽好对社会的这最后一份责任。关于如何编辑论文，先生想将六十年来陆续发表的论文按以下三种专题进行编辑整理，在信中做了以下精辟指教：

我现在想到：1. 宋代人物论集——王安石论集、岳飞论集、辛稼轩论集等等，可达五六十万字，其中有许多是被我自己所孤芳自赏的，也曾引起过学术界的广泛注意。2. 宋代史籍论集——论司马光著《涑水纪闻》、论《太平治迹统类》、论赵汝愚编《宋诸臣奏议》、序《三朝北盟会编》、序《辛稼轩诗文笺注》等等，可达二三十万字。3. 近现代出版的一些文集、丛刊的评论集——评施蛰存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评郑振铎编《世界文库》、评梁任公著《辛稼轩年谱》、评韩侍桁翻译《十九世纪文艺思潮》、评梁启勋著《辛稼轩词疏证》，（后一篇论文甚短，当时曾引起南北文史学大师胡适、陈寅恪、夏承焘的好评），全部可达五六十万字。以上论文发表的时间虽相距远近不同（有写于50年前的），但全都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写作的，而且大致都有作者的独到意见，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到今日也大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搜集、编辑、整理这许多文稿，以我九十岁的年纪绝难胜任，每一项都必须请贵社十分内行的人承担，不知此事对贵社是否可行。

邓先生在信中提到的“以我九十岁的年纪绝难胜任”的专题论文的搜集、编辑、整理工作，我可以宽慰地告诉先生：现已由您的弟子们在您的编辑思想指导下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艰苦努力圆满完成了。

邓先生在病榻上，仍以他聪慧、敏捷、缜密的思维，提出对学术界、出版界有现实意义的完美设想。如信所云：

对于《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诗文集》的整理、注释，我虽然至今没有作到完善的地步，但迄今为止，海内外还无第二部可以代替的著作。我如稍加整理，把《稼轩词编年笺注》改成定本，在印制方面精细加工（例如：夏承焘的序文可以改用手书墨迹，收入茅盾对于此书的评论信函等），把《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辛稼轩年谱》合并为《辛稼轩全集》，单独印行，并作较好的装帧，估计在海内外都还有一定的销路。《稼轩词编年笺注》过去已经销行30多万册，但是销行的潜力我估计还是有的。

邓先生的这一设想与我们出版社的初衷可说是一拍即合，并促使我们最终下决心，除出版全集外，还同时推出《辛稼轩全集》、《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辛稼轩年谱》、《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涑水纪闻》、《陈亮集》等单行本。这部分单行本的封面设计也于年底安排就绪。先生可以放心了。

邓先生严谨治学六十余年，当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和横遭病痛折磨时，仍然以这种附身于他一生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各部著作的继续修订，以完成新的见解和新的体悟的补充，达到更高的水平。邓先生在信中这样写道：

《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较大。贵社计划把几传原样重印，我认为不可行。我一生治学，没有当今时贤的高深造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变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书。这几传我未向任何出版社做过承

诺，现在虽然已经开始撰写，一心为贵社写好这几传，但年老体弱，只希望明年能陆续把《岳飞传》、《陈亮传》写完，然后贵社再把《王安石》和《辛稼轩传》推出，《王安石》那时也许另有修改、补充之处，这似乎也不失我们原来商量的用意……。

当学界受到市场经济冲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浮躁心态时，邓先生坚如磐石、笃志史学、无坚不摧、孜孜以求，令人感动不已。

先生走了，但是给学生留下了编辑他的全集的谆嘱。我曾给邓先生回信，向先生做了保证：“全集的出版可按您设计的方案”做，“《辛稼轩全集》可单独印行，对于其他几部专著，我们也有单独印行的打算，并做精美的装帧；我社已配备了三名责任编辑（包括我在内）负责您的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十分尊重您、尊重您的意见。再次请您相信我们会将您的全集做好，至少能达到《祝寿文集》那样的编校、印制水平。学生定会竭尽全力使您放心，让您满意。”

我和我的同仁将以先生的治学精神，将先生的一生精湛研究成果完好地保存在全集里。已经拟定的十二卷目录如下：

- | | |
|-----|------------|
| 第一卷 |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
| | 韩世忠年谱 |
| 第二卷 | 岳飞传 |
| 第三卷 | 陈龙川传 |
| | 辛弃疾（稼轩）传 |
| | 辛稼轩年谱 |
| 第四卷 | 稼轩词编年笺注（上） |
| 第五卷 | 稼轩词编年笺注（下） |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辛稼轩诗文笺注

涑水记闻

陈亮集

中国古代史讲稿（隋唐五代史部分）（1954年印本）

五代十国宋辽金元——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和民族矛盾复发时期

（原为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七章）

两宋辽金史

（原为求实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讲座》，两宋辽金史部分）

宋朝

（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宋朝”部分）

第九~十二卷 专题论文（约200篇）

目前，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同仁的主持下，遵循先师的嘱托，已经完成了全集的编辑整理工作，前八卷正在对清样进行校对，后四卷即将发排。我们要以高质量的编校、精美的印制和装帧，完成全集的出版工作，以告慰先师，以飨读者。

与邓广铭教授对话

—田 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

当我回想起与邓广铭先生 1981 年以来的交谈时，一种混和着哀痛与喜悦的情感涌上心头。这哀痛不仅是因为先生于 1998 年元月 10 日离开人世，也因为我个人的一个极大的遗憾：未能在先生最后时日里见他一面。我真的很想再一次当面向先生表示我的敬意，与他再一次交谈。除了我确实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从先生那里学习外，我深深的失落还缘于我们以前的对话是那样地广泛、深入并坦诚，这是我很少能与其他宋史学家的交谈中享受得到的。我一直将先生当作知识和精神上的导师，而不久他便待我如同事、朋友。去年我通过电话向先生祝寿时，他称我为他最好的“老外”朋友。我将永远珍爱先生的赞语，怀念先生对我的友情。在我和先生的交谈中，尤其是当我听到别人谈论起先生时，我感到先生特别地向我敞开，从而能体验到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担忧与期望。我之所以愿意与大家分享我与先生的对话，是因为我深信这些对话不仅可以为先生的生活与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解，同时也是先生的一部分富有教益的遗产。这遗产有他对中国宋代研究所承负的重担，又有他对研究所抱负的希望；而且，他对学术的投入将激励、唤醒我们，我们也以此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我们共同的研究兴趣之一在于陈亮（1143—1194），正是

这一点最初使我们彼此注意，以后一直成为连接我们之间的特殊纽带。我的专题研究《陈亮论公与法》（Chen Liang on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Law）（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4）就是敬献给邓先生的。从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课程，那时第一次念到先生的《陈龙川传》，该书于 1944 年在重庆出版。这是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当时的署名是邓恭三。七十年代中期，在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的谈话中，我才得知邓恭三就是北大的邓广铭教授。当然，七十年代中美史学界之间的学术交往仍然寥若晨星，我只能读到先生的部分著作。

1981 年 5 月，我终于有机会来中国考察。刚到中国，不知该如何与学者联系，我便在到达北京之后，发送了几封电报。邓先生回电邀请我到北大和他见面。我除了呈送几篇最初写的讨论陈亮的文章之外，还提出希望以后能重返北京作一年研究。尽管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我与许多学者，包括郭绍虞、邱汉生、缪钺、陈智超等教授之间的交流甚欢，但先生对我研究的特殊兴趣和宽容使我特别地与先生亲近。我们除共同推崇陈亮之外，先生还赞成我对诸葛亮（181—234）在历史中成为英雄的过程进行考察的研究项目。

我在 1982 至 83 学年度休假时，获得了美国科学院的美中学术委员会及富布赖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重返中国的愿望实现了。美中学术委员会安排我与北京的哲学所接洽，但那时，中国正在反精神污染，这使哲学所不太愿意与一位研究诸葛亮的西方学者交谈。幸运的是，当我通过电话向邓先生告知这一情形后，先生便安排我搬进北大勺园。很快我就能欣赏并感激北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学术交流的接纳。住在北大，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与先生离得更近。在那年八月我们最初的交谈

中，有一次先生说道，学术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使双方都能打开眼界，拓宽视野。由于基金延长，我在北大连住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他几次提到要打开眼界，我知道先生真的力求开阔每个人的视野。下面的例子或许能反映出他期望拓宽视野的某些片面。

邓先生支持我的第二个研究项目——即找出在女真金统治下中国北方道学流传的材料。北宋时以洛阳、开封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道学在1127年女真征服中原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看来，这个说法非常不合逻辑。《宋元学案》把金当作“黑暗时期”而忽视金代的文化成果，其原因在于它认为在蒙古灭金之前，金统治下的北部中国没有儒学的流传。根据这一权威材料，只是到1235年蒙古人把赵复（约1206—1299）从南方掳掠到北方时，朱熹（1130—1200）的思想才传入北方。1982年8月，我到北京后不久，就向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提出过我对《宋元学案》记载的怀疑，但他轻视我的怀疑，认为这出于我的无知：这个老外是不是太天真了，以致于不知道儒家的政治取向，这种取向使所有儒者理所当然地逃离金人统治，仕进于南宋朝廷？尽管我的怀疑便如此被一位资深哲学家当作无知而完全忽略，邓先生却仍然就我对金人统治下文化发展的传统记载的疑惑与我进行讨论，他的胸怀向这些新的观点（乃至我的一些奇谈怪论）敞开，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没有直接拒斥我的问题，而是鼓励我去找出证据。那时我已着手从一些金代学者，如赵秉文（1159—1232）、王若虚（1174—1243）、李淳甫（1175—1231）等人的文集中收取材料；但我所找出的材料仍然是零砖碎瓦，不成统系。先生勉励我继续收集资料，要作好小心求证的工作。而且，他还多次向我询问我的发现，每当我有些许的进步，便鼓励我继续努力。

我向美国关于金人统治下的文化发展的第一次讨论会递交了论文，刘子健教授读后，敦促我以中文的形式在大陆发表。

1984年初，邓先生读到了这篇文章的中文稿，便很快看出我是如何组织这些散乱的金代史料，翔实论证1190年左右金人统治下在汉人学者中的道学复兴的，他非常高兴，认为我的研究填补了理解中国历史的空白，并评论道，我的研究将打开中国学者的视界。他说，发表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它使中国学者能够关注这一新的观点，并能对该时期的文化做出比我更详尽完全的叙述。特别在邓先生和邱汉生教授的赞许下，我的文章不久便在中国流传，并被《中国哲学》接受发表。1991年我在太原参加辽金史研讨会时，师道刚教授的论文特地引用了我的文章；而且，他猜想该文的作者是一名华裔，以这种方式对我表示称赞。另外还有五篇会议论文讨论了辽金统治下的儒学影响问题。所以从这一具体的事例便可看出，邓先生所抱的通过往来来打开眼界的期望正逐步得以实现。Stephen H. West教授和我利用中国晚近的研究及其成果，修正并扩充了我们的会议论文集，以《金人统治下的中国：论金代思想文化史》（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的标题出版。

1983年，邓先生向我表达了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期望。他希望中国的历史学家能真正克服对异族统治下文化发展的传统偏见，能充分认识到这些朝代的历史，如辽、金史，实际上是中国整个历史中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他称赞我能突破宋史学者为自己框设的边界，投入相当精力对金代史料作详尽的梳理。我和先生共同研究陈亮，而陈亮的名声出于他对“夷狄”，特别是女真人的攻击，也出于他主张发动抗金战争。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都站在前面促进宋史学者研究金代史料，把金朝

的文化发展看作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便成了一件有趣的事。邓先生慨叹在中国宋史研究会和辽金史研究会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与沟通。事实也确是如此。1991年我和陶晋生教授从北京的宋史讨论会赶到太原参加辽金史会议时，我们就发现仅有宋德金教授一人同时参加两次会议。回到北京后，我向邓先生报告了会议的情况，我们都伤感中国史学家断代之间的分隔。然而，1998年在宁夏举办的讨论会却显而易见地表现出在这一方面的进展。

在1985年的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上，发生了另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故事。这件事关涉有些学者对我和邓先生之间相互交流的态度。在我住在北大的两年内，先生多次与我就陈亮研究有过讨论。虽然他已多年未曾写过有关陈亮的文字，却未停止阅读与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先生长期思考的与我来北京前发表的论文有许多相似的看法。看法的相似和先生的鼓励使我更有信心在研究和所发表的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更进一步。例如，我反对大多数七十年代主张陈亮是法家的研究成果；而且，我找出材料证明陈亮是一名儒者，还相当地尊重朱熹。在1984年的《陈亮反儒问题辨析》一文中，邓先生提出了相近的论证和论据来分析陈亮的所谓反儒问题。就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先生交给我这篇文章的初稿。我决定写一篇论文着重研究我们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在1985年杭州会议上将我们的讨论向前推进。我将该文的中文稿提前寄达先生，使他和中国的同行能够看到。到杭州后，得知先生作为大会主席自愿担当我的论文的评议人，这令我非常兴奋。论文的关键是提出我对陈亮的看法，认为陈亮从1168年到1178年之间处于他学术思想发展的道学阶段，而到了八十年代则变成为一名向朱熹的许多主要论点发出挑战的功利主义儒家。在会议的公开讨论中，我

们就分歧的方面和原因自由发表了见解。在公开讨论及随后的私下交谈中，我确信邓先生是欢迎并欣赏我们之间互相尊重然而却是真诚的“辩论”的。先生喜欢真正的学术交往，希望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能因此而打开眼界。然而，一两天后，就在我乘车前往绍兴参观历史遗迹的路上，我无意中听到一些中国学者在聊我和先生讨论的话题。一位颇有资历的历史学家认为我文章中所谈的都很正确，如果我保持沉默的话，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了。另一位学者说：“田浩不知道我们从不当面反对邓先生。”听到这些，我不禁感到悲哀。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我知道先生是多么地喜欢讨论，包括讨论一些我们仍有歧见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话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先生的一些最亲近的同行竟觉得在讨论中不能反驳先生的意见。由此，我所悲哀的是先生一定体验到了那种孤寂。其二，我的悲哀还来自于我对先生的尊敬竟被他们当作不敬了。我非常钦佩邓先生，我们之间可以公开地交流意见，但所有这些交流却被一些人看作对先生的不敬。汽车上的谈话提醒我，就讨论问题的方式来说，中国和美国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在杭州与先生的讨论有两个结果，这使我再次确信先生是宽容学术交流的。当1987年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出版时，先生写了《略谈宋学》作为文集的导言。在文中，先生有理有据地提出要区分宋学与理学；所以，我们现在比会议时有了更多的观点上的相似。第二，中国宋史研究会再次举办国际讨论会时，作为大会主席的邓先生又选择评议我的论文。这次会议于1991年在北京召开，我向会议提交一篇论文，讨论朱熹与陆九渊（1139—1193）的“无极”“太极”之辩。到北京后，我拜访的第一个人当然是邓先生。在他的家里，先生让我看了新

近写的《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我记得当时自己很窘，此前我未读过该文。幸运的是，先生立刻为我就他文章中与我的论文最为切近的部分作了一个概要。虽然有时我是一个被人当作颇多奇谈怪论的学者，但这一次先生却高兴地指出我对朱熹的批评不太充分。更为重要的是，邓先生谈到汪应辰（1119—1176）的几通书信，在信中汪应辰抱怨说，是朱熹把二程打扮成濂溪（1017—1073）的弟子的；我们最多只能说二程年轻时曾受过濂溪的影响。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当然断言周敦颐和二程之间严格的师承关系。朱熹的回答是，二程兄弟“受教”于濂溪的断语是从著录于二程语录中的吕大临（1044—1093）的引语来的。而且，朱熹也承认汪应辰对濂溪和二程关系的看法。不过，朱熹却并未对其《伊洛渊源录》中的叙述作任何改动。邓先生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朱熹回避了对他的材料引用方面的合理挑战，并且故意根据颇可置疑的史料来歪曲道学的起源。就象1985年会上的情形一样，我们在公开讨论之前就得便私下交流看法。更甚于前一次的是，我从先生的思考和材料中受益良多。我能将先生论文的思想吸收进我的书中，据此对已经交付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书稿《朱熹的思维世界》（Confucian Discourse and Zhu Xi's Ascendancy）作了一些修改，这使我感到幸运。

毫无疑问，我们之间合作的成果最为人们所知的当属为学界贡献一部陈亮著作较为完整的版本了。在七十年代，我有幸最先利用《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一书。这个十三世纪的珍本藏于台北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该书有一些现代版本尚未收入的陈亮著述。所有的现代版本，包括1974年的中华书局版《陈亮集》都以人们所知的一个最早的版本为底本。而该书刻于1616年，已是明末的本子。这些现代版本有三十卷内容。

然而，据说陈亮之子在编辑其父文集时，共得四十卷书。叶适也在1204—1214年间为该书写过序跋。而且，据马端临（1223—1296）《文献通考》记载，陈亮著述四十卷，外加四卷补遗。如此，从十三世纪起，便有近四分之一的著作逐渐佚失。《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一书使我能够恢复几乎所有的佚文，其中最著名的为《人法》，陈亮因此文而通过1193年的礼部考试。我主要运用这些“新发现”的陈亮论著去扩展我们对十二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陈亮思想的理解。我在写作《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 Harvard, 1982）时，就运用了这些材料，这使我能够证明从1168年左右到1178年，陈亮经历了一个道学阶段。

待邓先生看到我送他的《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他那关于陈亮著作的渊博学识便立刻充分展现出来。先生据此检查了陈亮一封奏折中的一段文字，他很早就怀疑该段文字讹误脱漏，先生的怀疑为这本十三世纪的书所证实。过后不久，先生又和我讨论《陈亮集》中的《三国纪年》序如何不同于保存在十三世纪本中的原序的问题。十三世纪本的序言与吕祖谦（1137—1181）致陈亮三通书信中所讨论的内容相合。邓先生指出，他一直怀疑陈亮的序言被人改动，以使之与朱熹对三国的解释更加一致，且这一改动不迟于明代。十三世纪本再次坐实了先生对文本的疑问。邓先生的分析刊载于《历史研究》。先生还利用这个十三世纪的版本，增订了七十年代的中华书局本《陈亮集》。当先生的新版《陈亮集》于1987年出版时，陈亮的著作便能为各地的学者所利用。

关于《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一书，先生对该书的序文抱怀疑的看法。该序被认为是建安某位叫饶辉的人写的，序

中标识的日期相当于公元纪年的 1212 年。在七十年代我开始利用《文粹》时，我当然希望确证它的真实性，因此请哈佛大学的洪业、杨联陞两位教授看过该书的缩微胶片，还请我的老友王德毅教授检视台北的原本。三位专家皆认定这是南宋晚期的本子。得到他们的证言，我便没有怀疑该文本的真实性，包括书中的序文。邓先生以其明察秋毫的辨别力注意到该序文没有提到陈亮、叶适二人；而且，序文没有反映出它与该书的内容之间有任何特别的联系。邓先生推证说，该序只是因为提到“二先生”而被人们误植入书中的。他还论证道，该选本应出现在叶适死后，且在叶适文集刻印行世之后，所以 1212 年的日期更增强先生的怀疑。邓先生关于序文所下的论断见其 1987 年《陈亮集》增订本《出版说明》。我以为先生的文献梳理极有理据，故而采用他的观点。姜长苏先生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翻译了我的第一本书《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996 年秋，我读完姜先生译稿后，为中国读者重写一篇新序，并简略讨论了邓先生的研究是如何丰富我对陈亮的理解的。除了赞成他对 1212 年序文的怀疑之外，我还特别地接受先生对 1178 年龙川狱事的考订（见《陈龙川狱事考》）。

邓先生怀疑《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引起浙江师范大学的方如金教授对文献作进一步的研究，讨论该书的编者问题。在方教授等人所著的《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一书中，方教授发现有史料提及吴思齐（1238—1301）曾编选《陈亮叶适二家文选》，且吴思齐的祖父为陈亮之女婿。因此，《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与《陈亮叶适二家文选》可能是同书异名。方教授的推论较为可信，不过我们仍然不知饶辉到底为何许人。更重要的是，何时、何因

木刻原版被重置新题以及因何缘故原编者及书的原名湮没不显，仍然是较大的问题。如果该书果为陈亮的曾外孙吴思齐所选，似乎印者会乐意藉选家的身份来证明编本的可靠性。而且，《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编者显然想迎合应试举子准备科举之需。除了保留陈亮在太学中及科举时所作的大量论文外，正如其题名“圈点”所示，该书圈点了一些精采的段落。而吴思齐愿意把声名如此卓著的先辈的文章编成供市场售卖的赚钱选本，这实在有些令人难解。无论如何，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邓先生是如何为后来的研究开辟蹊径的。

对培育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关心可能是邓先生与我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他感叹中国的史学传统正处于被割裂的危险之中。在八十年代，先生将希望全放在北大和其他高校的研究生身上。到了九十年代，虽然先生仍有许多不很满意的地方，也已有相当的信心，认为传统已经被北大和中国其它高校的一些年轻学者所继承。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我劝说先生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以继续尚未完成的宋人文集篇目索引的编撰出版工作，通过这一研究项目来强化对北大研究生的训练。与该项目的展开几乎同时，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立了。

邓先生的一些年轻的同事可能并不完全清楚中古史中心的历史，也不了解先生对他们的训练与研究的深切关怀。除了珍视先生为我们留下的遗著，我希望我们将永远怀念先生为提高北大和中国各地的历史研究水平所作的贡献。虽然先生的愿望和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但我们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我们都将珍惜与先生的对话，在对话中，我们进一步扩大了眼界，认识到学术交流与合作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多种可能。

邓先生与第一次两岸学术交流

李弘祺

第一次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可以说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所主办的。1983年刘子健先生告诉我说他已经从美国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筹到钱，希望在香港筹开国际性的宋史会议，邀请各地学者参加。当时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因此马上回去向校方报告。

这件事得到了中文大学马临校长的支持，顺利召开。由于这是第一次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学者正式共聚一堂，所以两地希望参加的人都很多。大陆学者请邓广铭先生提名。邓先生是宋史界的大老，因此他很容易就把名单准备好，共有五人，中大历史系照单全收。台湾方面由宋晞先生提名，经过调整，也来了五位学者。加上各地来的学者，一共有廿名参加正式会议，发表论文。

这一次会议虽然在学术上不算成功，但由于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见面交流，因此格外具有意义。当时郑德坤先生还在，担任副校长的职务，对于文史哲研究和教学，他是全校最有权力的人。他对于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视，因此在招待食宿方面，历史系得以全力以赴，让各地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邓先生当时虽已过古稀之年，但精神、体力仍然很好，由

陈乐素、王曾瑜、朱瑞熙及邝家驹等先生陪同，格外显得他学术成就的高超。

会后聚餐，宾主欢乐，开怀畅饮，不在话下，而全汉升先生适接到台北长途电话，知道膺选台湾中研院院士的头衔，更使得快乐的气氛平添更多的喜悦。

我以后有多次见到邓先生，深感他那永远年青，不畏争议的个性。他听说我和内人陈享也都上过姚从吾老师的课，很高兴地说，我们都是一师之徒。可见他的率真。

去年十一月我难得到了北京，知道他已因胰脏癌入院，遂赶去看他，张希清老弟陪我们夫妇同去。邓老看见我们，十分高兴，情溢言表，使我们感到受用得很。他仍然像平常一样地兴奋，大谈他和人家打笔战的事。那知道再不到两个月，他便遽然去世，令人怅惘不已。

为筹备1984年的宋史会议，我们曾通信多次，继而见面，而后由私淑而成了忘年之交。邓先生坦率的个性使我十分佩服；而我们得以共同参与了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共聚一堂的会议，更十分值得纪念。邓先生以过九十之龄而遽归道山，已属长寿，但他的学术和识见则更将远过这区区的廿世纪。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恭三师与辽宋西夏金史研究

张希清

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文化革命”后第一次招收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我即考到业师邓广铭恭三先生的门下；1982年毕业后，又留在先生所创立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先后追随先生近20年。近20年来，受先生的耳提面命甚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现仅遵照一些学长的建议，试将先生对辽宋西夏金史的研究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以纪念先生仙逝一周年及冥寿九十二周岁。

先生在辽宋西夏金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建树。其最早及最突出者，是关于宋代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他的第一部宋代英雄人物的传记，就是以南宋爱国主义思想家陈亮为传主的《陈龙川传》。这部著作完成于1936年，至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先生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仔细体会陈亮所处的南宋时代的氛围，切实地描写了陈亮的心理、思想、行为等等和那个时代交织着的错综关系，从而展现了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

气魄，抒发了陈亮抗击金人、报仇雪耻的爱国热情；同时，对陈亮这样一个独立特行的豪杰人物倍受侮辱和惩罚，困顿蹉跎以至于死的悲剧，表示了愤懑和同情。

《陈龙川传》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先生作为大学毕业论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先生生前多次说过要加以修订，但因疾患不治之症，未及了却这一夙愿。不过，先生晚年根据美国友人田浩教授提供的宋刻《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对明刻三十卷本《龙川文集》进行了重新整理，成为目前最完备、最准确的《陈亮集》（增订本）；同时，撰写了《三十卷本〈陈龙川文集〉补阙订误发覆》一文，为进一步研究陈亮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另外，先生在晚年还撰写了《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陈亮反儒问题辨析》等重要论文，澄清了被历代学人误解了八百年的一些重要问题。

先生撰写传记的第二个英雄人物是南宋的爱国词人辛弃疾。1937年，先生以《〈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为学术界所瞩目；随后，潜心研究辛弃疾，撰写出《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三部书稿，为学术界所称许。如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就称赞《稼轩词编年笺注》“钩稽之广，用思之密”，令人“惊为罕觐”。尽管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诸多大师的褒扬，先生并未丝毫自满于已经获取的成就，而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数十年如一日，严肃细致地对待稼轩生平的研究与稼轩著作的整理工作，多次增订再版。

其中三度修订补充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即是先生半个多世纪研究心血凝聚之结晶。书中尽量将涉及到稼轩词本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考索清楚，把词章的写作背景交代明白，从而使诸多词作因联系于具体生动的历史情境之下而更

加显得意蕴深邃、警动鲜明。先生在对稼轩词进行笺证的同时，还把词中所征引的往事、使用的典故、成语等等一并作出注释，凡其确为脱意前人或神化古句者，皆为之寻根扶原，注明出典。其考订、笺证与注释，皆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高水平学术篇章，茅盾先生读了《稼轩词编年笺注》之后，由衷地称许这是一部“传世之作”。该书与先生改订于九十年代的《辛稼轩年谱》、《辛稼轩诗文笺注》以及五十年代出版的《辛弃疾（稼轩）传》相得益彰，堪称完璧。

二

陈亮、辛弃疾固然是两宋与辽金对峙时期的重要人物，但都并未处于政治、军事斗争旋涡的中心。于是，先生又选择了北宋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南宋最杰出的军事家岳飞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1944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举国上下掀起抗日救国的民族战争的高潮之中，先生应重庆胜利出版社的约请，撰写了《岳飞》一书。第一次“努力要把岳飞传记的述写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上来”（《岳飞传（增订本）·自序》）。1945年8月15日，侵华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恰恰是《岳飞》一书印成发行之时。这一巧合使先生十分兴奋，他后来回忆说：“此事使我既感高兴，又感荣幸，且将永记不忘。”

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先生两度对岳飞传记进行大幅度改写。先生在《岳飞传》（增订本）的《自序》中写道：“我的愿望是：通过这本书，能把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勾画出来，把他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都能如实

地、真切地描绘、表述出来，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读过这本英雄人物传记的人们，都认为作者不但圆满地实现了这一愿望，而且开辟了一条研究岳飞的正确道路。

先生对于岳飞的研究，除了三写《岳飞传》之外，还陆续发表了《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南宋对金斗争的几个问题》、《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等论文十余篇，解决了一系列多年聚讼纷纭的公案。

先生三写《岳飞传》，前后用了将近40年；而他四写《王安石》，则前后用了将近半个世纪。1953年，先生曾写过一本《王安石》，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突出地提出了王安石所主张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原则，以为这虽然是由司马光、范镇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发出来的，实际上却是最真切地对王安石的传神写照。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曾称赞他访华的勇气，与宋朝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的“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为相似云云。于是人民出版社即派人与先生商谈，希望把1953年出版的《王安石》扩充重印，先生则坚持要作大幅度的修改。当先生1974年交稿之时，出版社认为先生的书稿对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映得太不够，要求增强“时代气息”。先生只好把全书又做了一番修改，审查通过之后，到1975年7月才得以出版，书名为《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先生又“三写王安石”，努力把凡是已经觉察的那些受“评法批儒”毒化、污染、影响之处，一并加以廓清。另外，又添写了《附说与“三不足”有关的两个问题》一节和《断西夏右臂的河湟之役》一章。这一修

订本于1979年5月出版。

十六年之后，先生又对《王安石》（修订本）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历时两年，于1997年10月出版，书名也改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先生认定：“王安石既有军政韬略，又有施政才能，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之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迫切需求的。”但是，南宋以来，倾泻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以莫须有的罪状来丑化王安石的种种谣言谤语，虚记枉载，以及对王安石的一些高超言论和卓越业绩的歪曲湮没，迄今几近千年而未得昭雪。先生“四写王安石”，就是要彻底“清除所有积淀深厚的污染，改变千百年来所铸成的对王安石的那些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想凸现出一个抖落所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使其能够以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目的终于在先生九十华诞前夕实现了。该书如漆侠先生所说，通过阐述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摧制豪强兼并”与“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和变法实践，突出体现了他作为杰出政治改革家的风采。

先生身患重病住院医治时，还不顾病痛的折磨，在病榻上审读《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清样。先生对王安石的研究，真可以说是“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了。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生命不息、写作不已的治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三

先生晚年对宋代文化的研究十分关注，用力甚多，并对宋代文化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一文中指出：“实事求是地说来，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所不能及，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自选集·自序》中又指出：“宋代的文化学术，较之它的前代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从其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之并驾齐驱的现象来说是如此，从其每种学科中都先后出现了造诣高深的学人与论著来说也同样如此。”

在学科方面，先生着重研究了难度最大的哲学。从唐代后期到北宋中期，产生了一个新儒家学派，它无论对当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把这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理学。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指出：“如果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适的。”“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然后论述了“宋学又是儒释道三家的学说，经过长时期的互相交流、互相斗争、互相排斥、互相渗透、互相摄取的一个产物。”最后又概述了在建立宋学进程中的几名最突出的人物。这篇论文对宋学的论述高屋建瓴，提纲挈领，是先生数十年来对宋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总结，可以说是一部“宋学大纲”。

在学人方面，先生着重研究了王安石。先生在很多文章中都强调了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明确指出：“王安石援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特别是援

佛老两家学说中的合乎‘义理’的部分以入儒，这就使得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大为丰富和充实，从而也就把儒家的地位提高到佛道两家之上。因此，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这也是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另外，先生还研究了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问题。从南宋朱熹以来，大都把周敦颐作为北宋儒家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认为他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二程是周敦颐的传人。先生经过严密的考察和论证，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通书》，都是他本人深造自得的著作，而决非受之于穆修的。”“二程决非周敦颐的学业的传人。”（《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他还指出：理学的开山祖师既不是朱熹等人所说的周敦颐，也不是胡适所说的司马光，而“只能归之于程颢、程颐和张载三人”。（《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在这里，先生又纠正了一个理学史上传承了八百多年之久的谬见。

四

一代史学大师傅斯年先生关于“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对先生的治学影响至深。先生晚年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者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

好，才不至于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象。”先生在谈到治学经验时，也多次阐释了这一问题。他说：历史研究的第一道工序是广泛地搜集史料，凡与所研究课题有关的资料，不论是直接史料还是间接史料，都要穷搜无遗；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对异说纷纭的庞杂史料加以比勘和考订，判明其精粗，辨析其真伪，并旁及一些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从现象看到本质，发前人所未发，得出有创见、有新意的结论。

先生不但以此谆谆教导后学，而且毕生身体力行。为了广泛地搜集史料和精细地辨析史料，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掌握这四把钥匙，才能具备研究历史的最基本的技能。舍此，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这是先生对傅斯年先生“史学即是史料学”的继承和发展。

先生在史籍的整理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问等职务，对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他还躬亲实践，《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及《陈亮集》（增订本）、《涑水记闻》校点本都是他进行史籍整理研究的代表作。

五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出，先生确实学问博大精深，不仅是辽宋西夏金史诸多领域研究的开创者、奠基人，而且能将辽宋西夏金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综观全局，把握其

发展脉络。六十年代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辽宋西夏金史部分，是先生执笔撰写的。这部分教材虽然只有十三万字，却是先生长期以来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结晶。它第一次建立了辽宋西夏金史的教材体系。其内容涵盖了辽宋西夏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行文简明扼要，精湛深刻，可以称为一部辽宋西夏金简史。

另外，八十年代前期，先生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从条目的拟定、撰写者的选择，到稿件的审查、定稿，先生都亲自过问，真正履行了主编的职责。此书虽然是“大百科全书”的体例，但完全可以当作一部辽宋西夏金的断代史来读。

先生尽毕生之力研治辽宋西夏金史，透过其涉及广泛、缜密精深的诸多著述，可以看出，他对于两宋在内外矛盾交织下形成的历史格局有着准确深刻的认识。对于北宋，先生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宋代的祖宗之法与变法改制等问题上；对于南宋，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民族矛盾及宋金战争等问题。先生一贯讲求史德，秉持学术品性，其研究方法注重“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强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勇于抒独得之见，标法外之意，而对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作风深恶痛绝。（《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

先生“是宋史研究的开山者与奠基者”（黄宽重语），他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杰出的研究成就、笃实谨严的治学精神与对学术事业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奠定了他在宋史学界的崇隆地位，被学界同仁誉为“空前的权威，当代的泰斗”（徐规语），是当之无愧的。

邓先生留下的一把钥匙

李孝聪

邓先生走了，永远地走了，但是他留下的一把钥匙，一把打开历史学研究之门的钥匙，始终留在我手上，成为永恒的思念。

我认识这把打开历史学研究之门的钥匙，还是二十年前刚刚踏进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时候。在经历了十年辍学之后，面对着高深的史学学术殿堂之门，望着那些浩如烟海的史料，我一时不知如何入手。正在彷徨之际，当时身为北大历史系主任的邓广铭先生为我们作了一次“如何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讲演，从邓先生生动的讲演里我第一次听到研治史学有四把钥匙：年代、职官、地理、目录。由于考取大学之前我在西藏地质队工作，本人又对地理学有着特别的偏爱，因此我自己将学历史的旨趣定在地理，其实当时自己丝毫不清楚这四把钥匙中的“地理”究竟是何等含义，只不过在读书时总将思路往地理上联系罢了。

当时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等几位专家的大著均未面世，有关历史地理的学术论文亦少有发表，于是我开始通读二十四史地理志以及清代学者对地理的考据类文章，一年下来我还是不知历史地理其所以然也。于是，我去向邓先生讨教，问他应该怎样理解和使用那四把钥匙之一的地理。

就是在邓先生家所在的朗润园10号楼206,就是在那张熟悉的写字台前,邓先生先问了问我从北京哪所中学毕业,不认识学校里教历史的冯先生,那冯先生曾是邓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过的学生,如果健在也该七十多岁了。又问到我为何去了西藏,在西藏做什么工作,走过哪些地方。问我的兴趣和特长是什么。然后他认为倘若对历史学有兴趣的话,从我本人的经历来看,今后选择学历史地理是最适合我的专业。但是当他得知我正在背地理志,他笑道:“地理志的考证是清朝乾嘉学者的功夫,我现在讲的四把钥匙之一的地理指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地理沿革,而是历史地理。就是谭其骧、侯仁之先生的研究,范围很广。你读地理志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局限在这一点,否则就倒退到乾嘉时代去了。”邓先生表示自己不是历史地理学者,建议我将来报考谭、侯二先生的研究生。临走,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为新近修订出版的《岳飞传》画几幅历史地图,也算是个历史地理的训练。我当然愿意,但是那时真不知道历史地图怎样画法。

邓先生先让我读他的《岳飞传》书稿和与需要插图的内容相关的宋代文献,再看王曾瑜等先生所写的论文,并拿出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八开本、内部征求意见稿),让我以它为底图。我发现邓先生文稿提到的一些小地名没有标在谭图上,例如: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出兵路线图,岳家军从襄阳向蔡州进军,在“牛蹄”、“白石”大败敌军,这两个地点是画出行军路线图的关键。而用现时的中国分省地图怎么也找不到,我那时还没有资格去地理系保密室查阅大比例尺地形图。邓先生知道后,借我一本三十年代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人编绘,上海申报馆印制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集》。我找到了那几个旧地名的位置,经过对比才

发现在六十年代以后那个地区已经沉没在水库下面,现时地图当然不会再标志了。当我画出地图并将旧地名查找的过程讲给邓先生听的时候,邓先生很高兴地说:你看,这古地址的考察和岳飞行军路线图的编绘不就是历史地理的研究吗?没有地理这把钥匙你怎么能说清楚当年岳飞抗金战役的细节呢?为劝勉我的学习,邓先生送我一套《四库全书总目》以资奖励。也正是那次画地图的实践使我有选择了历史地理作为学习方向的志愿。

对待年轻人的治学,邓先生除了言传身教,还总是想方设法为年轻人进入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创造机会和条件。大学毕业前,邓先生知道我的心思已是想学历史地理,力劝我拜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历史地理专家侯仁之教授为师,或去上海复旦大学投谭其骧教授门下。他建议我先聆听侯先生在地理系开设的历史地理与城市规划课,了解历史地理到底是怎样一门学问。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结识了侯先生,并决定跟随侯先生学习。那时候,邓先生还极力支持我们选学宿白、俞伟超等教授开设的考古课,从知识结构上多有些准备。毕业时,邓先生表示愿意留我在新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作助教,从此开始了自己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学术生涯。人的一生往往会有几次转折,尤其是在彷徨之际,往往就是由于有人伸出一双手或给予指点,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不会忘记邓先生当时的决定。

到中古史中心工作以后,邓先生指导我做《宋史河渠志》考证,他说初涉史坛,最好能仔细通读一部基本史料,以后用这部书为基底,与其它的文献史料比较,从而由约至博。譬如读《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其为基础并结合其它文献考证《宋史河渠志》,既可以熟悉北宋的历史,又掌握了宋代河渠水利

史的基本线索，再以此上溯汉唐下至明清，游刃有余。从此将我领进了门。邓先生对我的要求很严，如果两个星期未向他汇报读书学习的情况，他就会托人捎话给我：“李孝聪在干什么呢？让他来谈谈。”我的同窗好友李宝柱就常常作捎话人。后来邓先生主持校点《国朝诸臣奏议》，他的研究生们都参加，将方域、财赋门等卷也分给我一试。邓先生要求我们从抄写原文，练汉字入手，然后再誊至底本的复印件上。回想起来，那三年的功夫真没白费，仅就写汉字一点来看，至少后来站在讲台上写板书，心里不打颤。如今年轻人都习惯用电脑，不常练习写字，而写本民族的文字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同谭其骧先生相识是在谭先生来北京开会之际。当时邓先生与历史系主任周一良先生同邀谭先生给历史系的学生作学术讲演，藉此机会将我叫至谭先生面前予以介绍。以后邓先生又鼓励我将《宋史河渠志》的研究心得寄给谭先生的高足、专长研究河渠水利的邹逸麟教授求教，以让我多结识历史地理学界的老师。邓先生不仅督促我在文献功底上下功夫，而且还经常鼓励我去野外考察，他说：“你想真的学好历史地理，老呆在家里看书是不行的，就是弄你的‘河渠志’，也得到河边去走一走，看看今天与过去有了哪些变化。”正是在邓先生的支持下，1984年我有幸参加了唐史学会主办的“唐宋运河考察”，从浙江宁波走到河南郑州，整整44天，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观察、感受、理性思考结合在一起。而今，十多年过去了，无论教学或科研仍受用不止，要是没有邓先生的支持，历史系田余庆、吴宗国先生和唐史学会负责同志的帮助，那次考察是不会实现的。

当我在中心做助教的那些年，邓先生依然不止一次地鼓励我报考侯仁之教授的研究生，以实现学习历史地理的心愿。在

邓先生的支持下，最终我入了侯门。从那以后，我的大半精力都投入到帮助侯先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大地图集》城市图组的编绘工作。也是从那之后，邓先生常说：我这儿的宋史研究只有五个半人：张希清、杨若薇、邓小南、马力、刘浦江和李孝聪。那半个人就指我，邓先生说我只有一条腿站在宋史界，另一条腿属于侯先生的历史地理学。我明白邓先生不希望我把那一条腿也撤走，毕竟是他留下来的人，但是他也并不强迫我在专业上的选择，他多次表示：只要是认真做学问，跟谁都一样。我觉得邓先生最看重的是学问，任何一位学有所成的年轻人都会受到他的褒奖，反之如果学问做得草率则肯定会受到他的批评。

跟侯先生做学问以后，去邓先生家的次数比以前少了，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隔三差五派人来唤我去“汇报”。有时弄得我自己倒不自在，因为我毕竟还是中古史中心的老师，是邓先生麾下的成员，应该定期向他汇报工作。于是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凡去看他，必先选择一个有关宋史的话题，一则逗他开讲，我作为听者，比较放松；二则也迫使自己找些宋史的课题去研究，当然已经全部是宋代的地理问题了，让他既开心，我又有所得。诸如：宋辽界河、白洋淀与君子馆的环境，陕甘宁地区的宋夏边界，襄、邓州的地形等等。邓先生说：宋人不修长城，如何画界？如何守边？应从军事策略的运用与地理方面去找找答案。我感觉邓先生对这些涉及宋史地理的问题早已思之至深，但是因一直未能亲自去看一看而不肯下笔。言谈话语之间，也流露出对宋史研究在地理这一领域能有所探究的期待。

以后，我利用一些机会到河北、宁夏、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区做了田野考察，每次回来都向邓先生汇报考察所见，与

他探讨两宋时期的地理问题。每次他都饶有兴致地听，而且摊开地图来查看。在我遇到的非历史地理专业的学者中，像邓先生这样重视野外考察的还真不多见。后来，邓先生大概察觉我的另外一层心思，有一次他调侃地说：“你不必每次来这儿都谈工作，你是‘一仆二主’，我能理解，常来坐坐就好。你在外边做的研究我都知道，只要是认真做学问就行，手要勤，要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几句话弄得我反倒不好意思，还是“学问”这两个字，其间寄托着他的期盼，也暗含着鞭策。

1990年11月初我陪邓先生去江西上饶参加纪念辛弃疾的学术会议，届时他已八十四岁高龄，一路上他兴奋不已，他说：我研究辛稼轩经历半个多世纪，却从未到过辛弃疾最后生活过的地方，如何能真切地研究辛氏的活动与当时内心的感受呢？因此邓先生将此行看得很重，无论是在信州（今上饶市）走访茶山寺，寻觅辛弃疾曾寓居之所；还是去铅山参观鹅湖书院，凭吊陈家寨辛弃疾之墓，邓先生始终兴致勃勃。特别是瞻仰辛墓，因久雨初晴，汽车过不去，需要走几里泥泞的田间小路，最后还要爬上小山。办会的同志们临时扎了几副竹滑竿，想抬着邓先生等几位老学者走，可是邓先生说什么也不坐，硬是走上墓地所在的小山。下来后他对我说：“我一生都在研究辛稼轩，对他非常敬仰，怎能被人抬至辛弃疾的墓前呢？而且，我的年岁也还不老嘛。做学问也必得如此，靠人抬是不行的。”邓先生在考察途中说的这番至理名言，至今令我铭刻在心。

在我跟随邓先生治学的十几年中，对他提出研治史学应注重“四把钥匙”的运用，越发感觉精辟，受益良多，尤其是地理这把钥匙，开启了我通向治学之途的门径。我想这四把钥匙定会继续为初涉史坛的年轻学子们所看重，而以坚实的研究成果告慰邓先生在天之灵。

悼念邓广铭教授

梁庚尧

最早读到邓广铭教授的作品，是在台湾大学读硕士班的时候。那时获读香港崇文书店在1971年出版的《宋辽金元史论集》，这本论文集收集了早期文史期刊上的一些宋辽金元史论文，其中有邓恭三的《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读宋史王钦若传札记》、《宋史刘恕传辨正》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细密的考证，后两篇则是简短的札记，内容都十分扎实。当时刚刚起步研究宋史，对于宋史学界前辈的认识十分有限，仅从师长那里得知张荫麟先生，到了后来，才知道恭三是邓广铭教授的别字。

1981、1982年间，那时已经在台湾大学教书，由于研究市易法，必须先对学界关于王安石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当时海峡两岸的隔阂仍深，大陆的学术著作较难在台湾流通，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图书馆，是藏有较多大陆史学著作的地方。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友人那里，得知邓广铭教授著有《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漆侠教授著有《王安石变法》，于是借来阅读。漆侠教授是邓广铭教授的高足，也是后来才晓得的事。读邓广铭教授这一部出版于1975年的《王安石》，尽管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却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扎实学风，不过对于穿插在史实之间，一些和文

他探讨两宋时期的地理问题。每次他都饶有兴致地听，而且摊开地图来查看。在我遇到的非历史地理专业的学者中，像邓先生这样重视野外考察的还真不多见。后来，邓先生大概察觉我的另外一层心思，有一次他调侃地说：“你不必每次来这儿都谈工作，你是‘一仆二主’，我能理解，常来坐坐就好。你在外边做的研究我都知道，只要是认真做学问就行，手要勤，要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几句话弄得我反倒不好意思，还是“学问”这两个字，其间寄托着他的期盼，也暗含着鞭策。

1990年11月初我陪邓先生去江西上饶参加纪念辛弃疾的学术会议，届时他已八十四岁高龄，一路上他兴奋不已，他说：我研究辛稼轩经历半个多世纪，却从未到过辛弃疾最后生活过的地方，如何能真切地研究辛氏的活动与当时内心的感受呢？因此邓先生将此行看得很重，无论是在信州（今上饶市）走访茶山寺，寻觅辛弃疾曾寓居之所；还是去铅山参观鹅湖书院，凭吊陈家寨辛弃疾之墓，邓先生始终兴致勃勃。特别是瞻仰辛墓，因久雨初晴，汽车过不去，需要走几里泥泞的田间小路，最后还要爬上小山。办会的同志们临时扎了几副竹滑竿，想抬着邓先生等几位老学者走，可是邓先生说什么也不坐，硬是走上墓地所在的小山。下来后他对我说：“我一生都在研究辛稼轩，对他非常敬仰，怎能被人抬至辛弃疾的墓前呢？而且，我的年岁也还不老嘛。做学问也必得如此，靠人抬是不行的。”邓先生在考察途中说的这番至理名言，至今令我铭刻在心。

在我跟随邓先生治学的十几年中，对他提出研治史学应注重“四把钥匙”的运用，越发感觉精辟，受益良多，尤其是地理这把钥匙，开启了我通向治学之途的门径。我想这四把钥匙定会继续为初涉史坛的年轻学子们所看重，而以坚实的研究成果告慰邓先生在天之灵。

悼念邓广铭教授

梁庚尧

最早读到邓广铭教授的作品，是在台湾大学读硕士班的时候。那时获读香港崇文书店在1971年出版的《宋辽金元史论集》，这本论文集收集了早期文史期刊上的一些宋辽金元史论文，其中有邓恭三的《宋史职官志扶原匡谬》、《读宋史王钦若传札记》、《宋史刘恕传辨正》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细密的考证，后两篇则是简短的札记，内容都十分扎实。当时刚刚起步研究宋史，对于宋史学界前辈的认识十分有限，仅从师长那里得知张荫麟先生，到了后来，才知道恭三是邓广铭教授的别字。

1981、1982年间，那时已经在台湾大学教书，由于研究市易法，必须先对学界关于王安石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当时海峡两岸的隔阂仍深，大陆的学术著作较难在台湾流通，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图书馆，是藏有较多大陆史学著作的地方。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友人那里，得知邓广铭教授著有《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漆侠教授著有《王安石变法》，于是借来阅读。漆侠教授是邓广铭教授的高足，也是后来才晓得的事。读邓广铭教授这一部出版于1975年的《王安石》，尽管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却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扎实学风，不过对于穿插在史实之间，一些和文

章风格不相协调的文字，也深感疑惑。以后逐渐了解，当时的大陆学者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关于这一点，邓教授在他1997年新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序言里，也已有所说明。

没想到两三年后，就有机会见到邓广铭教授。1984年12月，经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安排，大陆和台湾的宋史学者同时出席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是海峡两岸的宋史学者多年以来第一次公开聚面。出席这次会议，结识了邓教授的另一位高足王曾瑜先生，从王先生那里，知道邓教授曾经举出研究历史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对于他治学扎实的认识更为加深。同时也得知王先生在1980年已发表了一篇《王安石变法简论》，看法和我有相近之处，而和他的老师并不一致。会议结束之后，两岸部分学者有一次聚餐，邓教授和王先生都参加了。席间邓教授谈笑风生，可以体会出来他对王曾瑜先生在研究表现上的肯定，因而认识到邓教授能够接受学生在见解上的相异，是一位胸怀宽阔的学者。邓教授曾谈及，他在北京大学求学，姚从吾教授刚从德国回来教书时，发生在课堂上的轶事。1968年，我在台湾大学读三年级，史学方法论一课的前半段也是姚从吾师教的，一年多后，他就去世了。其他台湾出席会议的学者，也多曾受教于姚从吾师。受教时间虽然和邓教授有早晚之别，却让人领会到两岸的史学研究也有共同的渊源。

从这以后，两岸学术交流逐渐频繁，同时也不必再由香港或其他海外地区作中介。再次见到邓广铭教授，是在1993年3月于杭州举行的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事前邓广铭教授曾经写信给逯耀东师，表达他期盼两岸年轻一辈的宋史学者能够多互相结识，逯耀东师因此嘱咐我应该前往。在这之前，

已经读过邓广铭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岳飞传》，了解他对岳飞及南宋初年的史事下过很深的工夫。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中讲话，显然对这次会议十分关切。在会中可以看出邓教授在大陆宋史学界的崇高地位，不过他的健康，看起来已不如八年多前初见时。这次到杭州开会，认识了许多大陆的宋史学者，包括邓教授的女公子邓小南教授在内，而通信多年的郭正忠先生，也在这时初次见面。会议期间，曾经在会场外安排了一次两岸年轻一辈学者的座谈，让人体会出来邓广铭教授对于晚辈的关心。

1996年，适逢傅孟真先生百龄诞辰。台湾大学历史系出版《台大历史学报》第二十期，作为《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邓广铭教授发表一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从这篇文章，对邓教授早年的经历有了较多的认识，得知邓教授在治学上深受傅斯年先生的影响，也曾追随傅先生工作。傅斯年先生对台湾史学界影响甚深，为人所共知。于是再次从邓教授的身上，领会到两岸史学界的共同渊源。同时在这篇文章之后，也有一点联想。傅斯年校长曾经提出“敦品、力学、爱国、爱人”八字和台湾大学师生共勉，后来“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成为台湾大学的校训。而邓教授所深研的宋代人物，如陈亮、辛弃疾、岳飞都是深具民族意识的爱国者。他们两人曾经历过共同的年代，时代的悲痛让他们共同感受到爱国的重要。邓教授在这方面可能也曾受傅先生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叙述傅先生关心他研究陈亮和辛弃疾以及推荐他写《岳飞》一书时，已经把这一点关联告诉了我们。我们可以认识到，邓教授的研究在扎实学风的基础上，还有他个人及时代的特殊关怀。

次年是邓广铭教授的九十华诞，海峡两岸及海外宋史学界

为他出版了祝寿论文集。翻阅书后所附邓教授主要著作目录，发现到1996年，仍然有学术论文发表，这一年他已是八十九岁。岂仅如此，他在1997年，也就是九十岁时，又出版了增订的《辛稼轩年谱》及修改过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他潜心学术而能至老不倦的精神，确实少有人堪与伦比。他不仅是终身没有停止研究工作，而且肯对旧作不断的加以修订。增订本《辛稼轩年谱》补述了许多史事，也订正了旧版的错误。以《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1975年出版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相比，在结构上和内容上都可以看出有相当程度的更动。此外，1983年出版的《岳飞传》，是他近三十年前旧作的增订本，据邓教授在自序中说，改写的部分要占到全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1983年时，邓广铭教授已是七十六岁。在这前后的十几、二十年里，直到他逝世之前，已经是如此高龄，而他还能够不断检讨以往的疏失，精益求精，这种态度，更是人所不可及的。

也是在1997年，由于一个机缘，我自担任教职以来所发表的部分论文，得以结集出版。我寄上一部给邓小南教授，并请她代为呈请邓广铭教授指正。当时邓广铭教授已在病中，病况时好时坏。但是他仍然将新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亲笔签名寄赐。从这件事情，再次感受到他对晚辈的鼓励与关心。在《邓广铭治史丛稿》的自序里，他引用了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关于考索之功、比次之书、独断之学的一段话，作为从事文史研究的写作规范，指出这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又说他最深恶痛绝的，就是章学诚在这篇文章中所批评，那种没有自得之见而“奄然媚世为乡愿”的作风。想来这不仅是他自我追求的目标，也是对晚辈的一种期望。

《邓广铭治史丛稿》从友人处转来，已是1997年底。1998

年初，就接到邓广铭教授的讣闻。邓教授的去世，自然是宋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不过就邓教授自己来讲，已享高寿，学术地位为人所共仰，治学态度与风格足以长为后辈典范，培育出来众多的人才，又有邓小南教授继承家学，应可无憾。受过他鼓励的晚辈，应该都会取法他的精神，在宋史研究与教学的园地上，继续努力不懈地耕耘下去。

也曾遥沐邓林霞

刘永翔

直到邓恭三先生逝世，我都没有机会和他老人家见过面，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人和我之间却结了一段翰墨之缘和师生之谊，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没齿难忘的。

恭三先生的大名，我在少年时就听父亲提起了。那时，中学的语文课本中选有辛弃疾的词，词中的志士之怀、豪杰之气读了令人精神振奋。深感兴趣之余，便找了一部白文辛词来读，但满纸典故，读去未免半懂不懂。父亲见了就向我推荐邓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展卷一览，稼轩所“掉”的那些“书袋”对我便不再是“拦路虎”了。自此，邓先生的博雅便深深地印入我的脑中。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由于父亲是“右派”，我家逃脱不了被抄的厄运。这本心爱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也和其他数万册书籍一起被红卫兵抄走，我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权利就这样被粗暴地剥夺了。但奇怪的是，尽管无书可读，向学之心却变得万分强烈，幼年时读过的一些诗词名句不断在脑海中浮现，目击“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辛弃疾那些悲愤的句子引起了我的共鸣。恭三先生注辛词是在抗战时期，面对的是外患；而我背辛词是在十年浩劫中，经受的是内乱。但人民的痛苦和文化的破坏所引起的万感交集则是相同

的。这时，看到我周围的知识分子被批斗，我常常想起恭三先生，先生肯定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了，也许现在正在炼狱之中吧。但愿他吉人天相，能脱此焚坑之祸。如果他们这一辈老先生不在了，中华文化就难逃灭顶之灾了。

“四人帮”粉碎后，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等到该做毕业论文时，本师徐震堃先生让我笺注宋人周辉的笔记《清波杂志》。我不想把这部书注成通俗读物，而是想使我的笺注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夜以继日地查找资料。清人翁元圻所注的《困学纪闻》、今人邓之诚所注《东京梦华录》和胡道静所注的《梦溪笔谈》成了我的样板，而恭三先生所注的《稼轩词》也成了我揣摩和借鉴的对象（1978年《稼轩词编年笺注》重印，我赶紧买了一本，快似良朋再晤），拙注中多方考据及以方括号括起所注词语之法即从邓注学来。这时我已获知恭三先生历经磨难，尚在人间。但我自愧才疏学浅，并不敢与我视若天人的恭三先生联系，只以不断获读他老人家的文字为满足。先生的文章或考史实，或申己说，语不空发，言必有据，无不给我以教益。所以凡听说先生有文章发表，必百计寻访，以求寓目。

《清波杂志》注成后，中华书局同意出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学术著作出版维艰问题，书稿自1983年寄出后，隔了十二年，才于1994年问世。

此书印行后，除熟人外，一直无人置评，我不免有一种如处寂寞之滨之感。1995年，忽有友人告诉我：邓先生的女儿小南女士买了一本《清波杂志校注》，邓先生读了很是夸奖，曾问注者是何人。你何不寄一本给邓先生呢？他可是不轻易称赞人的啊！

我听了十分惶恐，想不到这本不成熟的少作竟能入恭三先

生的法眼，也由不得细想，便取了一本《校注》，改正了一些印刷错误，邮寄给恭三先生。不意不久就接到了他回赠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感激之余，我立刻给老人回了一封信：

大著颁到，不胜惊喜。晚于尊集寤寐求之，而沪坝追购未得，方拟浼人访诸京国，而一旦竟获望外之赐，辄生何幸，见爱若此耶？翔慕公名久矣，幼读尊作《稼轩词编年笺注》，即惊叹于学海之无涯涘，而顿起私淑之心。嗣后每闻长者有所述作，即百计访求，以期一读。今将五十矣，治半山诗，尊撰辛词注及《王安石》二书犹并置案头日事揣摩也。辛注则爱其体例之善、笺释之精、考据之核，王传则取其评鹭之公、辨析之明、持论之正。此所谓折中于夫子也。顾晚虽早已视我公为师，而迄不敢通问者，乃深以杂学泛滥无归为愧耳。兹幸得友人为之先容，用敢呈其稚作，惟大匠运其风斤、正其谬舛，是为至盼。

鸿文快读，才之大、学之醇、识之卓、道之直，钦服无似。诸篇均足发千年之覆，开万古之胸，且笔端常带情感，气盛言宜，非特乙部之奇书，抑亦文章之佳构也。琅编拜领，感荷靡穷。翔少好词章，颇倾心力，后虽旁涉干史，而究非当行，自难出色，且于天水一朝职官，尤懵乎未省，虽亦暗中摸索，而苦于不得其门。近借得令爱小南女史《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一书，如获南车，顿澄迷雾，中郎有女，家学能光，此非仅儒门之福，亦学苑之幸也，敢为我公贺。今蒙大集之赐，翔得厕于可教之列，自此读史有疑，当可问津于公家乔梓矣。

信以外，又寄呈了父亲与我合注的《袁枚续诗品详注》一

部以求教正。

恭三先生的回信立刻寄来了，老人似乎看出了我的“欲炙之色”，把《稼轩词编年笺注》1993年的增订本和小南女士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一书也一并寄赐于我了。恭三先生在信中说：

接奉十月廿二日来教并惠赐《袁枚续诗品详注》，极所感荷。过情之誉，愧不敢当。我今已届风烛残年，耳聩手抖，精力衰飒，然而非非之想，时时在怀。因自昔年以陈亮生平为研治课题以来，不免濡染于他的“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放荡风习，不揣自身才学之陋劣，而妄欲对时贤之著述有所质正，此辛词编年笺注诸书之所由作。然而我于词章一道迄未涉足，故笺注辛词，始终只能雕虫而不能雕龙。即雕虫一事，迄今虽已屡加订补，犹未能稍愜私衷也（今特寄奉前年印行的《稼轩词笺》及小女谈宋代官制小册各一，均所以表示虔诚求教之意也）。近方在改写王安石传（清除其中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等类污染），以次再修改《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总希望把“失之东隅”者都能“收之桑榆”，唯不知残年余几，能否得遂所愿耳。

前月接奉《清波杂志》之校注本，读后极佩功力之深厚，实当今校点注释本之上上乘；今又接奉与尊翁合注之《续诗品》，捧读之际，确系爱之不忍释手，书中不只搜采广备，使简斋意蕴发扬无遗，而每段《小识》所表见的高见卓识益我神智，实亦当今述作中之所罕睹，叹佩，叹佩！

恭三先生对我这个从未见面的后辈的肺腑之言令我深深感动，而他对我的学步之作的称许又使我汗颜芒背、踟躇不安，所赠的两本述作则使我喜出望外。我当即修书致谢，信中说：“拙注少作焉尔（虽近方问世，实一纪前旧作），体例未纯，舛误尚夥，过荷揄扬，徒滋愧汗耳。宠赐尊注稼轩词及小南女史大著，日前领到，曷胜欣抃，自此寒斋又添双璧矣，容当细读，益所未闻。”接着我又请教了恭三先生有关陈亮以及治学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恭三先生接到我的信以后，寄了我一份《元一统志陈亮传考释》、一份《明妃曲辨诬》，我深知先生乃是示例以教，细加揣摩，不但解我之惑，且足授我以钥、指我以津。《元一统志》中的《陈亮传》所叙真伪杂糅，经过恭三先生一番梳理，取其可取、弃其可弃之后，这一材料才真正可为学者所用。《明妃曲》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之句，自南宋范冲以来一直为人诟病，恭三先生从探索“自”字的确诂出发，得出了此二句的正确含义，足关范冲辈之口，而祛后人疑。这种无征不信及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正是我们晚辈学人所欠缺，因而应该向前辈虚心求教的。

我深知自己的习作敝帚自珍是不行的，应该趁前辈健在时得到他们的指教，于是又从篋中取出旧作《新修南唐书陆游著祛疑》，加上新作《周邦彦家世发覆》一起寄给恭三先生。

恭三先生的信很快就来了，信中说：“接奉来教及大著两篇，读后极感先生治学之既精且博。周清真先人墓志，虽似从吕陶集中容易得来，然若非于王静安之著述熟贯胸中，则于吕陶之文亦必将等闲放过也。《南唐书》之著作权归属放翁，自更属确当之论。”有了恭三先生的认可，我对自己立论的正确与否有了信心，觉得沿着既定的治学路径走下去还是可以小有

所成的。

1997年秋先生寄来了北大出版社新出的《邓广铭治史丛稿》，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扉页上的题署一改以前“永翔教授”之称而改称“永翔仁弟”，“仁弟”乃是老师称呼弟子所用，可见恭三先生已把我视作门生了，我从未有幸听过恭三先生的课，且早已无此奢望，一向以一名私淑弟子为满足，没想到年届五十，竟得忝列门墙，真是何幸如之。这是先生对我最大的鼓励。我立即给恭三先生回了一封信。

大著颁来，不胜惊喜。大出望外者，在题署以“仁弟”见呼，翔私淑先生久矣，夫子之墙数仞，驽马之才，自恨不得其门，不意散材樗栎，今竟得蒙植入其中也。《治史丛稿》之赐，俾翔得见所未见、知所未知，如近皋比，如亲绛帐焉。大序所引章实斋“独断”、“沉潜”之语，翔亦自当书绅铭座也。

恭三先生这次没有回信，他再也不能回信了，北京传来了先生于1998年1月10日9时50分逝世的讣告，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我和恭三先生的师生之缘竟尽于斯，我再也没有面聆教诲的机会了。我含泪写了一付挽联，用电报发给小南女士：

直道挺儒林，矫俗唯凭孤剑勇；

雄才理天水，从公已恨十年迟！

我回想起恭三先生二年来对我的教诲，觉得挽联并没有把老人的岩岩气象、他对后辈的提携以及我对他的印象和感激之

情完全表现出来，于是又一连写了六首挽诗以寄哀思，现谨抄出附于本文之末，并将诗中的一句作为这篇怀念文字的标题：

官墙灼灼满蹊花，教泽何尝限绛纱。

我是孤舟江海客，也曾遥沐邓林霞。

休说春风坐讲筵，稠人一面亦慙缘。

新书累赠呼仁弟，愧煞无才继仲宣！

（昔蔡伯喈欲以书传王仲宣，余貌寝则同，才薄则异，固不足当之也。）

宋辽金史未研详，天水丛残偶涉将。

岂意巨儒青眼别，肯收樗栎入门墙。

直道如弦劫不磨，每闻误曲顾偏多。

知公欲矫儒林习，老尚横戈效伏波。

（先生晚年常作论辩之文，殆取孟子所谓“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之意乎？）

文章的是老波澜，笔底三长吐未殚。

准拟担簦来立雪，何期学海一朝干！

箕裘世业易凋残，多少青箱欲递难。

独有文姬传史笔，谅公天际足心宽。

（谓小南女史。）

1998年7月3日于华东师大

追悼恭三邓广铭先生

——木田知生

1998年1月10日，我们的导师恭三邓广铭先生因病逝世了。过了几天，通过张希清教授，噩耗终于传到了我国。后来，又接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治丧办公室发来的讣告。吾师住进友谊医院治疗的消息早已知道，我们受业生一直盼望着先生早日恢复健康。然而，因事情不如意而感到无比悲痛。

首次受教于邓先生是1979年的秋天，因此，笔者算是他晚年的学生之一。和邓先生首次见面时的情景，至今还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那年10月上旬，笔者初到北京大学校园，由日本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介绍，首先拜访了陈庆华先生。略作寒暄之后，陈先生就领着我走到未名湖北畔朗润园宿舍第十公寓的邓先生家里。与邓先生一见面，听到他的雍容大雅的话语，顿有心平气和之感。当然，那个时候，笔者来华不久，语言能力实在有限，谈不了什么深奥的内容，只说了初次见面的客套话而表示敬意而已。但是，邓先生那仪表堂堂的言谈举止、慈祥的面孔，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在北大历史学系学习的前后三年半的时间里，多次聆听过邓先生的演讲。其中有关岳飞《满江红》的演讲是特别精采的。我有几次专门拜访先生书斋而向他请教，邓先生总是不辞辛苦，细心赐教。还有几次同师兄张希清及孔繁敏两位先生一

起，恭听邓先生的特别讲授。当年，我不一定能够理解邓先生所说的全部内容，可是，对我来讲，这还是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在这些宝贵的时间里，屡次听到过有关学术的掌故。这简直是如邓先生曾经在昆明亲承陈寅恪先生的警欬一样，“对我来说，收获之大确实是胜过十年书的。”（《自传》）邓先生讲得洋洋洒洒，他的山东口音至今仍然留在我耳边。此外，完全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是，邓先生曾几次突然来访我的宿舍而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当年我在离北大南校门不远的二十六楼留学生宿舍住，先生或许散步途中顺便到来的吧，每当邓先生光临，我都感到惊慌失措。邓先生还有多次在校外的餐厅专门为我们设宴。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都不胜怀念，不禁黯然泪下。

除此之外，我回国就职之后，邓先生几次寄亲笔信来鼓励，并且还送我众多的新印古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历代名臣奏议》、《三朝北盟会编》（影印本）以及各种学术论文集。这一切，非我这样身为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所应享有，这是多么荣幸的事啊！

邓先生一生在学术上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他的三位恩师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先生，虽然都是国学大师而完全能够代表当代学问的某个潮流，但是，他们都不是宋史专家。邓先生自己开辟新的研究道路，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宋史的学者。1980年，宋史研究会成立，邓先生出任会长以后，中国国内的宋史研究的水平迅速提高了，这是万人公认的事实。关于宋史方面的丰硕伟业，会有众多师兄们详细介绍，这里不必赘述了。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在此特别要说明：邓先生在他的逾六十年的教学工作之间，获得了极为丰硕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优秀学生。除此之外，还值得特别加以强调的是，邓先生不厌劳苦而诲人不倦地指导了来自世界

各国的许多留学生和外籍教师。这种教育活动的确是一项不可磨灭而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邓先生门生众多，因而经邓先生的介绍和推荐，我也结识了不少宋史研究的老前辈和专家。这真是非常难得的恩德，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邓先生逝世前后，发表了多篇有关邓先生学术活动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我们能够了解邓先生的真正面貌，其中有不少我从未听过的消息，如邓先生对京剧的爱好等。邓先生的《自传》自然给了我深刻的启发，因为邓先生很少提到自己的履历，在此以前，未曾有提及他前半生的传略。

众所周知，邓先生关于抗金志士辛弃疾和民族英雄岳飞的研究是在抗战时期进行的，这项学术研究工作本身甚有现实意义。《岳飞传》原名为《岳飞》，初版于1945年，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刊行。邓先生在《自传》里写道：“迨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却又正是《岳飞》一书宣告印成发行之时。这两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远难忘。”这与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写作于抗战时期的情况十分相似。《自传》又提及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大决定南迁时的情况，他说：“我到昆明不久，适逢新印出的《辑本宋会要稿》因避免在沪日人的抢购，大量寄往昆明，对北大文研所的人以七五折出售，然而也还等于我的全部月薪。傅（斯年）先生却要我非买不可，遂即买了一部。”邓先生这句话，字字似剑，刺进肺腑，迫使我们日本人深刻地思考。倘若把它的含义置之不问而光想寻求表面上的学术友好交流，那说得过去吗？近现代中国学人的遭遇，我们日本学人也都必须反复地深思考虑。

1987年春天，应斯波义信先生的邀请，邓先生终于访问了日本东京。五月下旬，来访京都，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学术交流。其间，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以《朱陈论辩中陈亮王

霸义利观的确解》为讲题做过学术报告，受到京大师生以及留学生们（听众里面有不少来自台湾的学者、留学生）的欢迎。另外，在京大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进行过很有意义的学术座谈会，给出席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京大为了表示对邓先生的敬意，5月27日晚上，在京都四条大桥畔的中国餐厅“东华菜馆”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宴会，宫崎市定老先生（1901—1995）和佐伯富先生（1910生）等宋史专家，以及京大出身的约二十名学者出席了宴会。宫崎市定先生，当年满八十六岁，其论著之多、影响之大，以及地位之高，有点儿跟邓先生相似。出席宴会者，还有岛田虔次、清水茂、岩见宏、狩野直祯、竺沙雅章、梅原郁、砺波护、狭间直树、衣川强、杉村邦彦、夫马进等教授。

在京都访问期间，邓先生除参观了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所属的藏书楼之外，又到京大中央图书馆去参观、座谈。西夏文研究的权威西田龙雄馆长出面向他介绍了该校的藏书情况等。此外，邓先生还专门拜访京都阳明文库和奈良天理大学图书馆，入库纵观了不少的善本。邓先生虽然学术交流的活动如此繁忙，但是，仍尽量挤出时间去旅游，尽兴地浏览了京都、奈良地区的不少古寺庙和名胜古迹，如京都御室仁和寺、嵯峨清凉寺、宇治黄檗山万福寺以及奈良的东大寺、法隆寺等处。

邓先生曾经指出：掌握年代学、目录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四门学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因而把它们叫做“四把钥匙”，着重强调打好阅读古书的基本功。同时，特别重视史料的鉴别，反复主张“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些论说很有道理，笔者也痛切地感到开“中国史史料学”课程的必要，因此我在日本的几所大学里讲授了多少次，每次都发挥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邓先生在他晚年反复修订自己的学术专著《王安石》、《岳飞传》、《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陈寅恪先生《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永为我们的楷模。知识的增长确实要靠日积月累的不断努力，邓先生用自己的言行以及学术活动为我们示范。夜深人静，重新拜读邓先生著作，又看到他晚年的哆嗦笔迹的时候，心里充满着哀思。邓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蔼可亲的容貌，令我们受业生永远怀念。邓先生晚年再三嘱咐：“你们用武之地还很多，继续努力吧！”反躬自问，笔者碌碌无为，未曾有什么成就，惟恐辜负先生的期待。我要把邓先生这句话铭刻在肺腑之中，更加奋勇前进。兹谨作这一篇小文，以寄托哀悼之意。

缅怀恭三先生

——黄宽重

研读宋代历史的人，大概都看过邓广铭先生的论著，相信会被他严谨的学风和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认识他的人，更能感受到他耿直刚正的学者风范。我研习宋史的时间较晚，又受现实环境的限制，无法深入瞭解他的学行风范，只就知见所及，记录若干片段，来追念恭三先生。

1970年，我读大学三年级时，开始对宋史产生兴趣。我是中兴大学历史系第一届的学生，文学院在当时是草创阶段，专书期刊都很欠缺，加上受政治环境限制，对大陆学界的研究情形，所知无多。但我的老师李毓澍教授和孙克宽教授都介绍邓先生的宋史研究成果，我从旧的学术期刊中，阅读了一些邓先生早年的论文，仅知道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前辈学者。

1972年，我到台大读研究所，确定自己要研究宋史，而且以南宋晚期为研治范围。这时期两岸的宋史学者，研究的焦点，明显呈现重北宋轻南宋，有关南宋的论著不多。恭三先生和孙克宽先生、姚从吾先生有关南宋的观点，成为指引我学术成长的重要基础。我经常征引邓先生的论文，对他长期浸润在宋代史料，所发展出来的学术见解和眼光，深为折服。然而，也从他前后期作品的比较中，体会到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也要承受大环境的压力。

1980年，我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服务，对邓先生有深一层的认识。史语所的图书馆（即傅斯年图书馆）是少数由大陆迁到台湾，并且获准蒐藏大陆学术著作的图书馆。我在馆中看到邓先生所有重要著作，包括早年他在李庄完成，亲笔题名送给史语所的《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等书。经过打听，知道他与史语所有一段亲密的关系。

198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第一次国际宋史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邓先生。这次会议是海峡两岸宋史研究者第一次见面、交流学术意见，推动的过程相当曲折，但由于刘子健教授事先在两岸沟通得宜，使会议顺利进行。台湾的三位青年代表，张元、梁庚尧和我也有幸见到心仪已久的大陆前辈学者邓先生、陈乐素先生、酈家驹先生、漆侠先生、王曾瑜先生和朱瑞熙先生。从此和邓先生及大陆宋史界有较密切的联系。

1989年秋天，我趁参加重庆钓鱼城宋元史国际研讨会之便，访问北京。邓先生特别举办了一场座谈会，安排我与北大历史系的师生见面。当时北京的学术气氛相当低沉，北大师生尤其消极。我介绍台湾的宋史研究情形，并报告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筹备新的学术刊物《新史学》的状况，说明我们对推动学术的意见。当时，邓先生显然有很深的感触，发表了他对两岸学术发展的看法，说了许多重话。在当时的气氛下，能说出这样的话，是要有相当勇气的。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邓先生耿直与真诚的一面，了解他治学以外的另一种风范。

此后，我每到北京，就到北大拜访邓先生。见面多了，话题多了，对他的治学与为人，有更深入的认识，知道他是胡适、傅斯年的高徒，和他们关系密切。也知道他在1949年以后的处境及“文化大革命”时的遭遇。对身处政局骤变的学人调适新环境的艰辛，及知识分子的矜持，有深一层的体会。

恭三先生是宋史研究的开山者与奠基者。他自1935年撰写《陈龙川传》起，六十余年来，对宋代历史作了既深且广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兴趣广泛，研究课题横跨两宋，在人物传记、典章制度、政局变迁及文献整理上，成就尤高。由于长期浸润在史料中，又有缜密的剖析及考订，因此每篇论文均有新见，遂使他在宋史研究上获致极高的成就，是中国史有宋一代研究的开山者。邓先生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讲授宋史，指导博、硕士研究生，以其严谨笃实的治学精神，教导学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宋史研究者。1980年起，以他在学术界崇隆的地位，又负起领导大陆宋史研究会之责，实际推动学术发展工作。在他全力领导下，大陆宋史研究会不仅学术活动频仍，同时在整理和编纂、学术交流上，都有卓越的表现，是大陆中国史的研究社群中，颇有成就的团体。以邓先生六十余年在宋史研究、教学及促进学术发展上的卓越贡献，称他为中国宋史研究的奠基者，应是公允之论。

邓先生对学术品质相当坚持。他早年撰写的几本宋人传记：王安石、岳飞、韩世忠、辛弃疾、陈亮，都是研究宋史的重要著作，其中王安石、岳飞、辛弃疾更具代表性。不过，有的著作成书于1949年以前，可资补充的史料不少，有的论著则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写成的，学术观点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与他自己秉持的立场相左。对讲求学术品质的邓先生而言，深感不安，觉得在内容与观点上均须重新考虑。基于维持学术水准的信念，促使他在晚年积极重新修订书稿。《辛稼轩年谱》与《王安石》，都是在这一动力下，次第修订的。即使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与病魔搏斗时，还是奋力撰述，《王安石》一书就是在最后一刻完成的。这种坚持学术品质，不断修订改

正的精神，真是后辈学者的最佳典范。

这种秉持学术标准的态度，也表现在典籍文献的整理上。中华书局于1974年点校出版的《陈亮集》一书，是据明成化刊的三十卷本为底本。后来美籍学者田浩教授在台湾的中央图书馆发现了宋刻本四十四卷的《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邓先生据此一书与成化本比对，发现许多问题，乃重新点校出版（即1987年中华书局修订版的《陈亮集》）。此外，邓先生对赵汝愚编《宋诸臣奏议》一书的价值，非常重视，自八十年代前半开始，即与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进行点校工作，历经几番曲折，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宋刻元刊本的微卷，配以明印残本及北宋诸家文集等，进行校勘，前后费时近十年，才告完成。

这种对学术的坚持和耿介率直的态度，充分表现了邓先生的行事风格。邓先生的处事与治学态度是一致的，凡事坦白建言，直率陈述，毫不保留。虽然因此替他招来一些困扰，他却并不以为意，仍然说该说的话。几年前，大陆学界对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一事，颇多讨论，有些前辈学者甚为赞成，邓先生则持反对意见，并曾撰文发表于光明日报，引起热烈讨论。他曾将意见送我一一份，并且感慨的表示，在当前的环境下，谁也不愿说真话，以免得罪人，但他不作乡愿，认为应该秉持学术立场，表达自己的看法。邓先生这种坦诚直率的个性，在以人情为重的中国社会，并不讨好，自然难以迎合时好、附和现实，更易遭误会。但他秉持良知，方正的持论，也像一记警钟，提醒世人，充分反映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对原则的坚持。这种处事态度，除了值得尊敬之外，更值得我们省思。

邓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孜孜不倦，所存念的只有学术。他对自己的健康一直有信心，万万没想到竟遽而辞世，留

下包括对旧著的修订等许多未竟之业。对我个人而言,《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的整理及访问台北三件事,未能及早促其实现,不仅是他未完成的遗愿,也让我衷心感到抱憾。

邓先生长期研究南宋史,对《三朝北盟会编》一书用力尤勤,多方蒐集资料,希望早日完成点校工作,以嘉惠学界。《会编》一书的版本虽不多,但重要的二个本子却在中研院的傅斯年图书馆。由于环境的隔绝,未能蒐集齐全,影响全书的整理工作。邓先生为此多次向我表明希望获得此书,以为比勘。然而,当时史语所经费不足,无法专为此书拍摄微卷,始终无法应命。一直等到本所进行以扫描方式将善本书拍摄成光碟(光盘)的计划实施之后,在杜正胜所长的支持下,才优先摄制《三朝北盟会编》,并影印成书,以等值交换的方式,将《会编》送给邓先生。邓先生十分兴奋,交由北大副教授刘浦江兄进行比对整理。如今《会编》各种版本都已齐全,在浦江兄全力以赴下,点校工作大致完成,并获中华书局承诺出版。然而邓先生已等不及点校《会编》的出版,真是一件憾事。

《宋会要》的整理出版,也是邓先生未了的心愿。《宋会要》对宋史的研究价值,众人皆知,不用赘言。大陆学界早就有人倡议整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曾组织人力,著手规划,并将蒐集所得的资料,先行整理编辑成《补编》出版,但由于《会要》篇幅颇大,学界对如何整理,意见不一,竟至中辍。1994年,我和美国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访问大陆各重要宋史机构时,先拜访邓先生,他约了若干同道在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交换意见。许多前辈都提出整理《宋会要》,邓先生非常赞成,指出为促成此书早日出版,他愿以年迈之身出面召集、协调。我们均深受感动,遂以此议题,到各地征询意见。大家都体认整理出版的重要,并且提出许多

可行的办法,我和包教授也希望在海外协助此事。但终因无法有效整合,协调各方所提出的具体方案而作罢,使邓先生的愿望落空。今年(1998)5月初,我与包教授趁参加北大为庆祝百年校庆而召开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之便,再度与宋史前辈见面,并研商向高校古委会申请立项及补助。与会学者都知道《宋会要》的整理,不仅是学界共同的愿望,更是邓先生的遗愿,当年由于准备不周,错过良机,如今应积极合作,促其实现,否则难以慰邓先生在天之灵。但大家最为感慨的是:当年若妥善组织,有效推动,以邓先生的德望与学养,出面领导、整合,必能事半功倍。如今缺少一位受尊重的前辈领导,在推动点校出版上,将付出的劳力与心力,必将事倍功半。

邓先生治史受他的老师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先生的影响甚深,深入史料,发挥见解,他的著作也受到三位先生的肯定。1949年以后的革命风潮对他形成极大的冲击,但他是个自信的学者,在理论与史料中寻觅,形成他不左不右的治史学风,其实不出乃师的范畴。早期受限於政治环境,必须和胡、傅二先生划清界限。1980年,两岸学术交流活络以来,到台北探望师友、同道,及祭扫先师的坟墓,当为邓先生晚年的愿望之一。但先是受限於他的身分,等到政治条件放宽,我们积极设法邀他访台时,他感於一些前辈学者访台后,身体虚耗,便不敢贸然一试。1993年,杭州召开岳飞研究的国际研讨会,他在邓小南教授陪伴下,到杭州主持会议。会后,他告诉我以后不参加外地的学术活动,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放弃台北之行的计划,心情感到十分沉重。此后,他只有藉著文字,表达对恩师的感怀、思念之情。虽然1996年夏天,邓小南教授到台北开会之后,向他报告台北之行的感想,稍减他的遗憾,但未能实现探访故旧的心愿,终是一生的憾事。

难以忘却的思念

臧健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97年7月7日，星期一。

头一天晚上接到可蕴二姐打来的电话，说邓先生身体不适，已有三、四天吃不下东西了，并说先生坚持不去医院，经再三劝说，才同意第二天去校医院看看。我当时还有些不信，因为就在三、四天以前，我到先生家时，先生仍精神很好，侃侃而谈，并嘱咐我把《寿颂文集》再寄几本给一些老先生。

第二天早上到先生家一看，我真的是大吃一惊，才三、四天未见，先生明显瘦了，而着实吓我一跳的，是他脸上、手上、胳膊上的皮肤都变成了黄色。我的心紧抽了一下，这种黄色我太熟悉了，1989年我患胰腺癌的老父亲去世前，皮肤一直是这种颜色。先生已穿戴好坐在沙发里，看到我进门，说：“你怎么来了？用不着惊动这么多人。”我说：“听说您不舒服，我来看看您。”我到另一个房间，对可蕴二姐说：“先生情况不好，别去校医院了，必须马上上友谊医院。”我和可蕴二姐再次劝说先生。以往先生做了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主意的。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很不情愿地同意了。

看病之不容易是每一个去过医院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先生不愿去医院既是因舍不得耽误宝贵的时间，也不愿麻烦别人，另外他一生都很相信自己身体的抗病能力。

去友谊医院要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先生坐在司机旁，不时地和司机聊上几句，丝毫没有病态和倦容，我难以想象他是在以怎样的毅力坚持着。

经过一上午量体温、测血压、化验、B超等多种检查后，医生给先生的解释是，胆囊有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尽管医生认为先生的病情应立即住院，但终因没有床位仍要返回北大。车子开到十公寓楼下，先生坚持不要人扶，自己走上三楼，一边走一边风趣地开玩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让我吓破了胆了。”一语道出，我们都笑了。九十岁老人对待疾病的乐观情绪缓解了大家的沉重心情。

当天下午，友谊医院住院处通知第二天可以住院，先生才于就诊后的第二天住进了友谊医院高干病房。潘庆德去十公寓送他时，先生笑着和潘庆德握手，说：“没什么事，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先生正是以这种常人难以拥有的乐观与自信，面对疾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

从我进入北大历史系读书，亲耳聆听先生授课，到调入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直接在先生领导下工作，前后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大概是与先生接触时间长的缘故，先生在我心中，既是著名学者、宋史大师；又是耿介刚直，严厉固执的长者；还是风趣幽默、循循善诱的和蔼老人。与先生接触的时间越长，越会强烈地感受到先生那种不易为常人所具有、不屈服于一切世俗与传统、独特的人格魅力。

创办中古史研究中心，是先生晚年为弘扬学术、培养人才所做的一件大事。1982年中心一成立，我就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调来从事图书资料的管理工作。那时中心每年都以平均三、四千册的速度购进图书。1984年中心搬到文史楼三楼后，

随着图书的大量增加,阅览环境也逐渐有所改善。先生常来中心看一看,或查阅图书,或看看是否有青年教师坐在这里读书。先生常说,当年傅斯年先生创办中研院史语所,就是创造一个好的读书、研究的环境,让年轻人安心做学问,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学术骨干。言谈之中,表现出先生极望借鉴傅先生培养人才的经验,为多年荒废的史学领域多培养人才,快培养人才。而每次先生来,却常常是失望与无奈,因为他极少能看到有人坐在这里读书。多少次,先生长叹一声,坐下后,让我找来他所需要的书,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我看出先生的失望,常常解释道:“昨天,有人来查书了;前天,也有人来看书了。”先生开始还点点头,以后则不信。因为太巧的是,他一次也没有碰到过。我多次与中心的一些中青年学者讨论过,我说:“邓先生希望大家能每天像上班一样来这里看书,没人坐在这里,先生很失望。”但我也深深了解青年教师的苦衷,大部分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许多家务全要自己承担,在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同时,只能挤出时间来读书。先生希望让大家集中坐下读书的设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但中心越来越丰富的藏书,为中心的中青年教师提供了查阅、检索资料的便利条件,确实为中青年的学术成长创造了一个极好的环境。先生的苦心与期待在十年以后得到了回报。

先生创办中古史研究中心后,亲自主持了两项大工程。第一个项目是标点校勘《宋朝诸臣奏议》,第二个项目是编辑《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这两个项目我都亲自参与,并投入了七、八年的时间。

标点校勘《宋朝诸臣奏议》始于1984年。那时中心作为古籍整理单位刚刚成立两年。先生选定这一项目,既是国家古籍整理项目的需要,又是宋史研究的要求,同时作为青年教师

和研究生基本功训练的基础,因此先生的要求是严格的。项目一开始,先进行考试,待通过后,再请吴小如教授为大家讲授点校的基本功与基本方法。在正式点校之前,先生的另一个严格要求是,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点校的部分一笔一划地认真抄写一遍,其目的是一是练好字,因先生认为大部分人的字写得太难看,太无章法;二是为了让大家一字一句认真读懂文意。八十年代从事点校工作的人很多,但像先生一般要求之严格,并将一百五十万字原文一字一字抄下后再做点校的,恐怕再无第二例。从中可以体察出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之严谨与一丝不苟,以及培养青年学子严谨学风的良苦用心。先生自己正是从这样的训练开始走上治学道路的。尽管当时很多人对抄写的要求叫苦不迭,但待二、三年做完之后,特别是在以后的研究中,多数人都已深感点校训练的实惠,无论在版本、校勘、音韵等知识上,还是在对宋史资料的了解掌握上,都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编辑《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始于1986年。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先生就曾主持过此项工作,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中古史中心成立后,先生再次将这一项目列入规划。首先召集了一批从图书馆退休,但熟悉古籍的老先生组成编辑组,又从中华书局运回过去抄写的卡片(已很不完整),基本按照原来的分类,从传状部分开始,一部文集一部文集地做起。为了找到较好的版本,除了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之外,我和一些老先生多次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清华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以及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查找。几年下来,基本摸清了五百多种宋人文集的版本情况及收藏地,抄写了共计十余万张卡片。此项工作将全部宋人文集中的资料归纳分类,编为索引,对于宋史研

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先生果断地决定不惜人力财力，一定要做好。先生充分了解这一项目工程之大，十分关注每一步的进展情况。尽管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此书的出版一再拖延，但先生主持之功不可没。

在从事了近八年的古籍整理研究之后，九十年代初，我逐渐转入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为了了解妇女史的研究史，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收集了一万四千多篇研究论文，并将其分门别类编为目录。但由于妇女史的概念并不为传统史学界所接受，加之经费困难，很难出版。1992年，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答应考虑，但要求有著名学者的推荐信。为此我找到先生，说明此事，希望先生能为我写一封推荐信。先生一口答应，并在第二天就将信写好交给了我。当时先生写字手已有些颤抖，但仍工工整整地写满了一整页。先生在信中写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所有有关妇女问题的论文、专著和各种各样的资料，全都十分散乱，迄今还没有人把它们编为目录，加以统摄，使之分门别类，各成体系。这经常使得研究此类课题的人感到极大的不便。……如能将这部《中国妇女研究论著目录》尽速印行，即可填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个极大的空白点。”拿着先生的信，我心里深受感动。九十年代初，妇女史作为新兴学科，其研究刚刚起步，先生就不仅给予大力支持，还预见这将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领域，使我有了继续做下去的信心。此书作为第一部汇集中国妇女研究论著的参考工具书，被列入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选题，终于在1995年9月正式出版，并在第二年获得北大优秀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1994年，当我写的关于妇女史的文章《南宋农村“生子不举”现象之分析》一文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后，先生专门打来电话鼓励我。每每想起这些事，都使我难以忘怀先生的关心与教诲。

先生九十大寿的前一天，1997年3月15日，是个星期六。虽已3月中旬，仍是春寒料峭，刮着西北风。我们全家去看望先生。虽然先生早在一、二周以前就宣称不作寿，而且说3月15、16两日他都要出门，但我仍认定这样寒冷的天气先生一定会在家。

果然可因大姐给我们开了门。先生见到我们进门，热情地让我们坐下，招呼可因大姐给我们切前一天历史系送来的大蛋糕，关切地询问我女儿的学习，又和潘庆德谈起学校最近的外事活动。闲聊中，先生时常用风趣幽默的语言穿插一些老北大的小故事，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早就知道先生喜爱照相，而且尤其喜欢他1987年5月在日本京都访问时照的那张全身照，他让可蕴二姐洗了很多张，亲自签名送给一些亲朋好友。我们在两天前托懂摄影的朋友将此照片放大，并制作成油画效果一样的画像，我对先生说：“我们想送给您一幅画。”先生连声说：“一幅画，好，好。”我说：“这是一幅名人肖像画，而且这位名人您很熟。”先生又是连连点头。当我把照片拿出放到先生面前时，先生恍然大悟地开心地笑了，“就是这位名人啊！”先生很喜欢这张像，近看远看，还用手摸摸照片的油画效果，一边称赞，一边张罗着让挂起来。

趁着先生兴致很好，我们提出请先生和可因大姐到附近的一家很不错的圆明园餐厅吃饭，并再三说明，第一，圆明园的这家餐厅环境很好，而且离学校很近；第二，这家餐厅是新开的，先生没有去过；第三，反正到该吃饭的时间了，大家都得吃饭。在我们左说右说之下，可因大姐也表示同意，先生仍坚决摇头，说请他吃饭可以，时间要在4月以后，现在无论如何

也不行。在3月的日子里，凡属有作寿嫌疑之活动，先生一概回绝，这就是先生的脾气。

而4月以后由于忙，一直未能实现我们请先生的承诺。先生病重住进医院以后，或许是太向往医院外面的生活，一次问我：“你说要请我吃饭，怎么也不请了？”听了这话，难过得我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我说：“等您好了，我们和小南一起去。”但我心里已有预感，这也许将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先生不是普通人，他在三十多岁时就晋升为教授，并以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宏富的学术著作，被人们尊为宋史泰斗。而先生又是一个普通人，他一生都只追求做个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中国的传统极重人与之间的关系，讲关系，搞关系，处关系，人人生活在庞大的关系网中，靠关系办事，亦为关系所累，有时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不情愿做的事。而先生是我所遇见的从不为关系所累的人，他认为该说的话，无论对什么人，从不含糊躲闪；该做的事，无论谁反对，先生都要坚持。因此先生也难免会得罪人。而先生一生坦坦荡荡做人，直直爽爽讲话，却比任何人都活得轻松，活得年长。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往往不仅仅看他的学问，更看重他的人品。先生正是以他坦荡的胸怀、敏锐的洞察力、善良的人品、耿直的个性，赢得人们的尊敬。

尽管我到现在都难以相信，但先生确实是真的离去了，我再也接不到先生打来的电话，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山东口音，再也不能在下班的路上推着自行车，陪着先生在未名湖边漫步，更不能完成先生在一年前的嘱托：“等我到一百岁时，再出一本论文集，你还来帮我做。”以往的一切都成为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成为永远深藏在我心中的对先生的深深的思念。

言有终而恩无尽，吾师可知也耶？

——杨若薇

吾师恭三先生溘然长逝。虽九秩高龄，却依然走得如此匆匆，以至未能留一个机会，让我向他鞠上最后一躬！

97年8月27日，我专程从香港赶赴北京，直奔友谊医院。当日并非探访日，我是被特许进入的。当在综合病房见到坐在小桌前看电视的先生时，我不禁潸然泪下。“怎么是在这里见您呢？邓先生？”

在我与邓先生谈话的中间，医院安排邓先生转换住院病房，于是我陪同先生搬到了十号病房。那里，竟成了我与邓先生的诀别之处。呜呼！

在邓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了七年有余，出国大潮把我带出了国门，把我从邓先生身边卷走了。其后，又是七年有余。

我曾多次向先生表示，我一定会重回燕园，重回未名湖畔的健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先生晚年苦心创建、经营的这块学术圣地。但他老人家没有等到我归来，便撒手离去。留给我的，只是那无尽的慨叹与愧疚！

在邓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我是第一个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十五年来，邓先生时时在关注着我的学业，从我在他身边读书、工作，到远赴北美留学深造，直至随

同香港回归祖国。每当我接到一纸先生颤抖的字迹时，都感动得几乎要落泪。

先生之为师，真乃“传道、授业、解惑”也。与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无论是伴随先生往来于燕园十公寓与二院之间的路上闲谈，还是坐在先生书案旁洗耳恭听先生之侃侃长论，“解惑”之喜常令我雀跃不已。而先生的指点迷津，不但是为我解惑，更常解古人之惑、千年之惑。先生对辽、宋、金史研究中的诸多精辟论说，曾经指引我，今后将继续指引我在这一领域中不断探索，发覆闡微，创新立异。

“纠军”问题，乃治辽史一大学术公案。辽、金、元三代留下了对“纠军”的历史记录，但却好像一则未留下谜底的谜语，令后人苦思苦索。自清初以来，其更为中外治史之大师、名家所瞩目，辩述之论著不绝。然而，众说纷纭，致使问题愈发变得扑朔迷离，研究者无从入手，几近陷于绝境。我反复研读辽史，仍搜寻不到解决问题之路径，于是只好自甘罢休。记得那是在84年，我向邓先生讲述辽朝军事制度的研究计划时，邓先生说：“你研究辽朝军事制度，怎么能不搞清纠军问题呢？”

“这问题太复杂、太难了，研究下去恐怕也是白费功夫，一无所获。”

“难？其实没甚么难的。那个‘纠’就是‘军’。”

真的？！如石破天惊，使迷惘之中的我顿开茅塞。

循著“纠”即“军”之路，我找到了辽史研究上诸多以往无从解说的史实答案。于是，我发表了《辽朝纠之研究》一文。其中有一节为“纠是军的对音”。我在该节中构拟了辽宋时期汉语之“军”与契丹语“纠”之对音关系。当时，我重点论述的是，“军”与“纠”之间的音转是由于韵母部分鼻音/n/

的脱落。但对“军”与“纠”在当时读音中声母之相同未加详细论证。有趣的是，由于近年在香港工作，我竟在广州话的语音中进一步发现可以支持“纠”即“军”的对音之有力证据，特别是其声母的对应关系。

“纠军”之例，仅为吾师邓广铭先生为我解惑之一证而已。

“人非生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先生去已矣，弟子不知今后之惑，何处问解！

史学之入门，说易极易，论难又极难，甚或“难于上青天”。众多置身于史界之人，并非真入“史学”之门。邓先生深感史学入门之难，而为有志于学史之士提供了著名的“四把钥匙”。此一高论，真乃吾师为师之一大贡献。我读《辽史》，首先就得益于“职官学”这把“金匙”。虽说当今人们要冲破历史研究的旧传统，但终归不能置政治制度之研究于不顾。而职官制度，正是政治制度之核心。邓师自己身体力行，为辽、宋、金朝之官制研究做出了无可比拟的成就。我对辽朝官制的研究，正是受先生的“《辽史·兵卫志》‘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一文之启迪而开始的，随后则兴趣愈来愈浓。

人所共知，先生对学生，素以严厉著称，致使弟子们在他面前，就算是在闲谈之时，也每有应考之虞，因随时都会被问及诸如“《河南集》的作者是谁？有哪些刊本？”“辽代的石刻中怎么会出现‘×’字呢？”之类问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之际，恰又别开洞天，明了了又一发奋读书、思索钻研之方向。

记得参加邓先生主持的《宋朝诸臣奏议》整理工作之初，邓先生要我们将被分配校点的篇章用小楷毛笔一字一格地照抄在稿纸上，然后再做核校。那段时间可真苦不堪言。盛暑伏案

用小楷毛笔整页整页地抄书！可是，那次经历不但磨炼了我的意志、毅力，练就了坐“热”板凳的功夫，也打下了写繁体字的根基。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功夫”在我出国之后发挥了极大的效益。海外有人讥笑中国学人，“出了国不但不认识英文字，连中国字也不认识了”。因为国内使用的简体字在海外并不十分通行，台湾、港澳及国外的华人一直保持使用传统的繁体字，这使得许多初出国门的中国留学人员颇为困扰。如今想来，真多亏了当年邓先生的严加训导。此虽乃区区之小事，但亦可管窥先生授业之一斑。

严厉是对学问，而非对人。先生之平易近人，更广为人知。先生之家门，向为一切求教者敞开。来者不拒，随叫随开。十几年前的北京，通讯设备尚未足够发达，无法事前约定，便只有径直登门造访了，故邓先生家常有许多不速之客。就连我们做学生的，也未有一定之规，在图书馆读书，发现了什么问题，便迫不及待地深夜叩扰先生。有一次事后我才知道，在我与先生长谈一个多小时后，刚离开先生家，先生便嘔吐不止，接着病倒了数日。当时，先生与我的谈话，是强忍着巨大的痛苦的，而我竟丝毫未察觉到。

先生一生，受胡适先生之影响极深，其治史之方法，亦受胡适思想之影响甚多。四十年代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邓先生任职校长室秘书，与胡适交往甚密。在谈及往事时，先生时常提到胡适先生。记得先生向我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一次胡适对邓先生说，“有人说咱们两人的笔迹很相似，我今天才发现原因——原来你我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笔！”

邓先生生前从不赞成、也不参加为他举办的祝寿活动。在邓先生九十诞辰之时，师友们便只有筹划结集出版论文，以此向先生贺寿。然而就在我著手写作论文的那段时间里，我遭逢

了一场难以令人承受的重大意外，以致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执笔。论文集出版之后，在与邓先生的一次长途通话时，邓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那本九十万字的论文集里，竟然没有你的一个字！”我嗟唏之余，真切地向先生表示：“在您百年寿诞时，我一定会献上一篇让您满意的论文。”

话音尚未落，先生却已拂袖仙逝而去。又是一个让我没能实现的承诺！我欠先生的太多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及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要为邓先生出版纪念文集，我不知道是该写作一篇学术论文来报答吾师的教诲之恩，抑或是该写作一篇回忆录以寄托对先生的哀思，还是该写作一评价文章以发扬光大导师之学术业绩。但无论写什么，区区数千字如何容纳得了？每每提笔，千头万绪，不知要由何处开始，不知要写到何时才能搁笔。要说的，要写的，都太多了。

呜呼！言有终而恩无尽，吾师可知也耶？

1998. 7. 27. 于香港红磡

用小楷毛笔整页整页地抄书！可是，那次经历不但磨炼了我的意志、毅力，练就了坐“热”板凳的功夫，也打下了写繁体字的根基。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功夫”在我出国之后发挥了极大的效益。海外有人讥笑中国学人，“出了国不但不认识英文字，连中国字也不认识了”。因为国内使用的简体字在海外并不十分通行，台湾、港澳及国外的华人一直保持使用传统的繁体字，这使得许多初出国门的中国留学人员颇为困扰。如今想来，真多亏了当年邓先生的严加训导。此虽乃区区之小事，但亦可管窥先生授业之一斑。

严厉是对学问，而非对人。先生之平易近人，更广为人知。先生之家门，向为一切求教者敞开。来者不拒，随叫随开。十几年前的北京，通讯设备尚未足够发达，无法事前约定，便只有径直登门造访了，故邓先生家常有许多不速之客。就连我们做学生的，也未有一定之规，在图书馆读书，发现了什么问题，便迫不及待地深夜叩扰先生。有一次事后我才得知，在我与先生长谈一个多小时后，刚离开先生家，先生便呕吐不止，接着病倒了数日。当时，先生与我的谈话，是强忍着巨大的痛苦的，而我竟丝毫未察觉到。

先生一生，受胡适先生之影响极深，其治史之方法，亦受胡适思想之影响甚多。四十年代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邓先生任职校长室秘书，与胡适交往甚密。在谈及往事时，先生时常提到胡适先生。记得先生向我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一次胡适对邓先生说，“有人说咱们两人的笔迹很相似，我今天才发现原因——原来你我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笔！”

邓先生生前从不赞成、也不参加为他举办的祝寿活动。在邓先生九十诞辰之时，师友们便只有筹划结集出版论文，以此向先生贺寿。然而就在我著手写作论文的那段时间里，我遭遇

了一场难以令人承受的重大意外，以致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执笔。论文集出版之后，在与邓先生的一次长途通话时，邓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那本九十万字的论文集里，竟然没有你的一个字！”我嗟唏之余，真切地向先生表示：“在您百年寿诞时，我一定会献上一篇让您满意的论文。”

话音尚未落，先生却已拂袖仙逝而去。又是一个让我没能实现的承诺！我欠先生的太多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及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要为邓先生出版纪念文集，我不知道是该写作一篇学术论文来报答吾师的教诲之恩，抑或是该写作一篇回忆录以寄托对先生的哀思，还是该写作一评价文章以发扬光大导师之学术业绩。但无论写什么，区区数千字如何容纳得了？每每提笔，千头万绪，不知要由何处开始，不知要写到何时才能搁笔。要说的，要写的，都太多了。

呜呼！言有终而恩无尽，吾师可知也耶？

1998. 7. 27. 于香港红磡

回忆邓广铭先生

王小南

刚写下这个题目，就感到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想起去年此时，敬爱的邓先生他还健在。即使在他因病住院后，我也一直相信他会很快康复。1998年新年前我自国外发电信（Email）给他老人家拜年，小南还告诉我，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女儿的工作，说要给她买一本好的英汉辞典。他那熟悉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显现，就像刚才聆听过他的教诲一样。以往我出国，回国后总是要向邓先生作一次汇报。可是，这次我还没回国，他老人家却已离去。我真没有想到会在此时此地为他老人家写纪念文章啊！就权当我向敬爱的邓先生作最后一次汇报吧。

将近二十年前，我有幸由新疆克拉玛依的一名普通石油工人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本科就读。想到能上我国最好的大学，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看到我从小就崇拜的名人学者，真让我兴奋莫名，激动不已。邓广铭先生就是令我仰慕的学术权威之一。

当时邓先生是系主任，我有很多机会聆听他的讲话、讲座，受到他大力进行课程设置改革的恩惠。这一改革，使我们那几届同学都受益匪浅。我举两个例子。正如一所好的大学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一所好的大学也应该邀请来相当数量

的一流学者，使莘莘学子随时可以有向有关专家、学术权威请教的机会。有鉴于我们这几届学生专业基础差的情况，邓先生专门从北京师范大学请来了刘乃和先生给我们开“中国古代史常识”。这门课内容极为丰富，天文历法、地理、职官、姓名、字号、避讳、目录等等无所不包。刘先生备课认真，发给大家的参考资料很充分，加上她口才又好，不仅口齿清楚，而且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引文举例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教学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真诚铭感邓先生，是他为我们请来了高水平的好老师。

另一个例子是，为了加强史学基本技能的训练，邓先生又专门请来了著名的古典文献专家王利器先生给我们开“古籍选读”。王先生是以《史记》会注本为教材，教我们如何校勘考订史书。这门课的作业是选课同学合做“《汉书·艺文志》已佚及现存书目考”，我就是在做这门作业时向王利器先生请教才会利用《二十五史补编》的。

这些例子说明，当时邓先生大力拨乱反正，进行课程改革，完全是正确的、成功的。现在历史系老师们都认为77、78、79级学生的教学效果好，我想除了大家通常所说的生源特殊、教员努力等原因外，还应当特别标出当时邓先生进行课程改革的功绩。据说过去北大办学，就是从全国甚至国外聘请各科最优秀的人才前来任教，“严师出高徒”嘛。最近看到牛大勇写的一份有关哈佛大学历史教学的考察报告，其中也提到外聘专家、权威任教为其成功经验之一。所以仅此而言，邓先生就堪称优秀的教育家而当之无愧。

邓先生当时以70多岁高龄还亲自授课。我记得我曾听过邓先生在文史楼一楼阶梯教室的一次讲座，内容是讲宋、金关系。邓先生讲课特别平实简洁，明白易懂。例如其中讲到“拐

子马”。我以前也读过《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上面只说金朝的铁甲兵、拐子马之类的厉害，不知道究竟是甚么东西。邓先生讲到这里抬起胳膊对大家说：“拐子就是胳膊肘，两拐子就是两翼出击。”我这才明白，拐子马原来是一种骑兵阵势，并不是一种特殊的马匹或装备。

我们班当时每年过年都要组织在校同学给老教师拜年。每年给邓先生拜年时他总是说：“我们是师生关系，用不着这一些虚文缛节。只要你们学习好，将来有成就，我就高兴。”我当时忝附骥尾，随大家一起进门去，感到能这样接近夙所崇敬的大学者已经十分满足。邓先生给大家聊的甚么我都不太记得了，但总的印象是邓先生说话耿直，为人刚正。后来和邓先生接近的机会多了一些，每次听他谈话，都更加深我的这种印象。

1982年夏天我们要毕业时，曾经因为分配问题和系领导举行了一次座谈。当时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同学感到所分工作专业不对口。邓先生听了同学们的意见以后，并不是简单地要大家服从分配，而是向大家指出：本科生培养本来专业性就不应太强；本科毕业生也不必过分要求专业对口，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大家听了邓先生的解释以后，就都释然了。现在看来，本科教育是应该以培养通才、训练素质、树立人格为主。我们现在已经在强调淡化本科专业，从而与国际教育界接轨。显然，邓先生当年所说并非虚与推诿的官场话，而是他自己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之谈，是有科学根据、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

邓先生自己说过，他晚年做的最重要事情是建立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我听邓先生说，建立中心的本意是有鉴于学术发展的经验，要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条

件：这里资料集中，设施齐全，空间充裕，服务完善，环境安静；希望研究人员都能到这里来读书做研究，也希望能接待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和研究人员，大家互相激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我自己本科毕业分配新疆，两年后考回北大，一介学生而已，既未于中心之建立立功，亦未于中心之建设尽力。可我却大大受惠于邓先生所创立的这个中心，惭愧之余，对邓先生真是由衷地感激。1986年我在读研究生两年之后被推荐转为直接攻读博士，当时北大博士生是三个人一间宿舍，学习、休息难免互相干扰。迫不得已，我把困难反映给我的导师张广达教授，张老师请示中心主任邓先生，他特别批准我住进了健斋中古史中心的一个房间。我知道中心还在建设之中，我住进公用房会给中心工作造成很大被动。有一次我在未名湖边见了邓先生就向他道歉，邓先生却非常和蔼地笑着挥了挥手说：“没关系。只要你在这里把书念好了，这房子就算派上用场了。”听了邓先生的这番话，我当时心里那份感激就没法提了。实际上我家很快也从新疆搬来住到了这里，而且一住就是五年。我的整个博士课程、论文写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直到我毕业离校后90年底分了房子才离开。今天，我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以后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一些好评，其实我也应该把它献给中心，献给邓先生。

1989年我博士毕业，留到了邓先生创办并主持的中古史中心工作。正是有了这个中心，历史系才得以多容纳一些读书人来作学问。从这一点来说，邓先生泽被所及远远不止我一个人。

我虽然未能直接受业于邓先生，但邓先生是我的“举主”——我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是邓先生主持通过的。其实

读博士以后，我就开始受到邓先生严格学术训练的影响了。大家知道，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的内容是考《资治通鉴》，这是邓先生定下的规矩。我现在仍然要感谢这门考试，正是它迫使我不顾一切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认真地读了一遍这部卷帙浩大的编年史，作了四个硬皮本的摘录和笔记，从而打下了我今天做中国古代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基础。这门考试虽说内容限在《通鉴》范围之内，但《通鉴》除了差不多一千四百年的史实之外，还有“考异”、“臣光曰”、“胡注”，而考试的题目又可以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记得当时收集到先前同学考过的题目中就有两次问到“胡注”，一次问到“臣光曰”，因此我是半点马虎不得的。我的导师张广达教授于邓先生执弟子礼甚谨，他嘱我一定要用心准备，所以我当时提足了气。1987年9月的一个艳阳天，资格考试在二院大一〇八举行。邓先生主持，祝总斌先生和我的导师参加。记得邓先生的问题是“评‘三武一宗’灭佛”，祝先生的问题是“比较南北朝南北士族的不同发展”，张老师的问题是“从武德七年令看府兵制的演变”（后二题原题都较长，大意如此），还有一道选做题记不清了。我先回答了邓先生的问题。因为我在读《通鉴》的同时还参考阅读过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断代研究著作，周先生有一篇文章论及崔浩与国史之狱，给我印象较深，所以我能尝试从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状况等不同原因分析比较“三武一宗”的灭佛活动。对其他问题我也尽自己所能作了回答。邓先生对我的回答很赞赏，认为我确实读了《通鉴》，有史实，有分析，有见解，提议给我这门课程九十分。据说邓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也很少给这样的高分，我竟不意得此殊荣，真是终生难忘。后来师母徐庭云老师告诉我，考完当天张老师回家也非常高兴，认为我为他争了光。

留校工作以后，我本可以有较多的机会向邓先生请教，可我知道他老人家的时间很宝贵，通常不敢随便去打扰他。有时候因办事去见邓先生，偶然听他谈起一些故旧经历，我感到这都是一些近现代史的珍贵资料，希望他能写下来，他老人家总是不置可否，关心得更多的是学术问题。有一次说完事他问我：“吐蕃的这个‘蕃’字，以前在清华大学上课，吴晗先生念bo，陈寅恪先生念fan，你怎么看？”这可真是个难题呵！陈寅恪先生是我最崇敬的史学家，可这个字他怎么念fan呢？当时不容我作太多的考虑，我想我首先必须实事求是，于是我举出三条理由来说明这个字应该念bo而不念fan：1）汉语古无轻唇音；2）藏人现仍自称po ba；3）英语的Tibet很可能就辗转来自“吐蕃”一词。然而我这个人历来比较传统，一贯奉行“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信条，我不愿意因此就说陈寅恪先生不对，于是又解释说：“中古以后汉语语音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轻唇音，这个‘蕃’字现在在哪里都念fan。尽管吐蕃是一个专有名词，但就汉字而言，要求今人都用古音来读古书是不现实的，所以陈寅恪先生的读法也是有道理的。”这是汉字文化的特殊性。邓先生听了以后笑笑说：“你是专家，你讲的是对的。”我想邓先生主要还是对我治学态度的肯定。无论如何，邓先生这样的大学术权威肯定了我这样一个后生小辈的说法，当时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事情还不止此，后来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这本书，就是由邓先生力荐，北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资助，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可以说该书从写作到出版都倾注了邓先生对一个年轻后辈的关心。

1996年大年初二我去给邓先生拜年，拜贺以后邓先生就说：“今年过年我要发压岁钱。”说着就取出了一本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刚给他出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题了字以后送给我。我当时大喜过望，双手接过书对邓先生说：“我一定仔细拜读，补上宋史这一课。”我说的决不是虚伪的客套话，我深知自己基础差，知识面窄。前辈学者讲过，读书要读学术权威的书，因为读权威的书可以事半功倍。邓先生是宋史学界最大的学术权威，学宋史当然首先应该读他的书。而且我确实马上就仔仔细细地把这本书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因为我马上就要给本系新生上中国通史课，邓先生这部文集中有关唐宋史的许多观点甚至论据都对我备课很有帮助和启发。我读邓先生这部书的体会和收获主要有两点：第一，邓先生这部书虽然是一本论文选集，但是其中把两宋政治史的主要内容都涉及到了。不仅如此，邓先生从北宋所谓“祖宗家法”及南宋高宗的偏安思想深入剖析，终于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背后抓住了宋史发展的主脉，提出了自己对宋史独特的系统看法，令人耳目一新。邓先生经常强调合格的史学工作者对史料要有穿透力，而不能仅仅罗列史料、资料，我想，他大概就是要我们像他做的那样吧。第二，邓先生在给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稿》所写的序中提出了研究宋代历史文化的渊源问题，这对我有很大启发。宋代历史文化确实特殊，但不可否认，其渊源应该是在唐代。陈寅恪先生曾经讲过：唐朝的“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因以构成。”宋代所谓“祖宗家法”，不就是国势使之然吗？显然，邓先生的思路与陈寅恪先生是一致的。受此启发，我打算把自己对隋唐史的研究从西域扩大到周边，尤其是中原与东北诸族的关系，从而把唐史研究与此后一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联系起来。读了邓先生的书以后，我也开始注意到前人已在职官演变、经济发展、理学萌动、诗歌变体等方面做的联系对比工作，并在

讲课中向同学们做了介绍。我希望自己今后能继续在两位先生指出的学术方向上走下去，以告慰于邓先生。当然邓先生这本书里的考证之精当我也是非常钦佩的。例如“斧声烛影”那一段，那真凶可以说已经捉拿在案了，真乃发千古之覆的绝响。

1997年上半年我受本系派遣去韩国高丽大学讲学，其间，邓先生捎信给我，让我帮他找一本李氏朝鲜时代韩国人编的《精忠录》，复印或买旧书均可。几经周折之后，我在韩国著名的国家古籍图书馆“奎章阁”查访到了这部书。我与王元周、于心华二位合作，化了将近两个小时把邓先生要的《精忠录》全本复印了下来。那一天我们虽然没能按计划去更多的地方参观，但给邓先生办成了这件事，我心里感到特别愉快。

回国以后我把书交给邓先生，邓先生向我表示感谢并把复印费算好交给我，又向我讲起了他找这本书的原因和经过。原来邓先生五十年代读过该书，现在要修改旧作，却在国内怎么也找不到了，只好求诸海外。我当时对邓先生做学问精益求精表示钦敬之外，还劝他老人家注意自己身体，注意休息，他摇了摇头，然后告诉我，他计划要修订四部书，还要和年轻人比一比。可是，大概又过了半个月，他老人家就住院了。

以前经常可以在下午四点左右看见邓先生提个小布袋到二院历史系去取报纸信件，八十多岁的人，走路腰板挺得老直，端庄稳重，气宇轩昂（这是我以前多次当面讲给邓先生的话，现在他老人家再也听不见了）。前两年邓先生出门遛弯散步拄起了拐杖，开始我不免有些伤感，真不愿意看见邓先生显出老态。后来见邓先生迎风拄杖，在西校门内树下林间散步，真有青松不老之态，又让人感到鼓舞。所以我是怎么也没想到邓先生会病的。病了以后，我也相信他老人家很快就会康复。出国以后，我从英特网上查到了胡适纪念馆的网址，上面有一顿胡

适先生的半身照，和邓先生家客厅里挂的一模一样，但网上是彩色的。我知道邓先生特别尊敬胡适先生，就把这个网址连到了我的网页上，并发 email 给小南，希望转告邓先生，希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希望他老人家康复以后可以从网上访问胡适纪念馆。这一链接现在还保留着呢，可是敬爱的邓先生他却再也看不见了。

回想起我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过程，处处都受到了邓先生的关怀、惠助。我没有机会报答他了，就让我在这里再说一声：谢谢您，邓先生！

1998年4月16日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班纳—香槟）

关于《岳飞传》与胡适藏书

——没有实现邓先生心愿的两件事

——沈乃文

1997年夏天，九十岁的邓广铭先生因病住进友谊医院，召我到病榻前，嘱以修改他的著作《岳飞传》。邓先生说，首先是岳飞二十岁之前的部分要重写，因为这一段主要取材於《金佗粹编》。邓先生初成此书时三十八岁，当时认为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应该是有根据的；后来考知岳珂的记述靠不住，其中不仅有夸大和曲讳，还有相当一些文字不是史实，而是当时的传闻；因此，必须本着追求历史真实的原则，推翻重来。邓先生说，这项工作必须立即开始，他将意图口授给我，我去查核资料拟稿，然后由他定稿。我知道这项工作的份量，不敢一口应承。作为一位世纪老人，邓先生曾多次给我讲他的经历和见闻，三、四十年代那一段，有大量珍贵的学界史料，我曾多次劝他写回忆录，邓先生摇头，舍不得为此花费宝贵的时间；我曾协助搜集邓先生的论文旧作，希望尽早打出清样，请邓先生重新审改，邓先生也没有痛快地点头，仍然舍不得花费时间；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王安石传》、《岳飞传》、《辛弃疾传》、《陈亮传》四部书上。邓先生曾三次对我说，他给后人留下的主要是这四部书，“成也是这四部书，败也是这四部书”，对这四个人的研究，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我对宋史仅略知一二，岳飞史事也知之甚少，涉及邓先生这么重要的著作，我怕

做不好工作。邓先生向北大郝斌副校长、北大图书馆林被甸馆长提出,安排我作他修改旧著的助手,两级领导都同意,但没有解脱我正在担负的工作,加上我还参与几项校外的工作,实际上挤不出很多时间。林馆长见我顾虑,建议我请邓小南老师向邓先生提议,因为我对岳飞史事不熟,是否可以先搞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小一点儿的题目。小南老师从医院回来告诉我,邓先生说我还是实事求是的,可以先从我熟悉的版本目录学入手,先作陈亮文集的版本考订。

《龙川集》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为“四十卷外集四卷”,后代流传者以明成化年间龙川书院所刻三十卷本最早,并演化出明嘉靖、万历、崇祯、清道光、同治几个刻本。这个龙川书院的三十卷本与宋代的四十卷本是什么关系?宋代的《龙川集》原貌如何?是陈亮文集的版本疑难。清同治年间宗廷辅首先对此作了梳理;1984年邓先生校定增订本《陈亮集》,作有长文“陈龙川文集版本考”,此文1992年收入邓先生的《自选集》时,邓先生又重新作了修订和改写;1996年方如金先生撰“陈亮著作丛考”,文中据新发现的“龙川书院记”对邓先生的考证作了补证。可以说,再向前走的余地很有限。我细细地读了有关材料,觉得龙川书院本初印本和后印本的异同原由、龙川书院本是否有叙述其与宋版关系的序言,和宋版《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饶辉序的真伪三个问题还有探讨的余地,但在北京、外地、台湾和国外都找过以后,竟没有找到我所需要的突破这三个问题的材料。一晃,半年时间过去了。

1998年新年,我送花篮到邓先生病房,在邓先生耳边祝他新年好。邓先生略点头,一直沉睡,没有像往常那样开始“包场”(邓先生笑称对我谈一次话,为我的一次包场),这是

我见邓先生的最后一面。1月10日邓先生逝世,同日,张北地震。邓先生一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我也很乐观,即使邓先生住院,又被诊断为癌症,我内心里仍然认为他能支撑两年。邓先生逝世后,回想邓先生重托时的情景,我深感痛悔不已。我当时如果先接受下来,然后将邓先生的意图如实记录下来,今天哪怕是只能记录稿附在再版的《岳飞传》后,也能使读者了解邓先生研究岳飞的最后成果。依我对邓先生的了解,无疑,这份记录肯定会是首尾完整、广征博引、叙述从容的好文章。我知道,没能完成《岳飞传》的修订,对邓先生来说是怎样的遗憾;而且这些话本来也是可以不写在这里的;但今天,一切已经追悔莫及。

邓先生非常希望的,我也屡次请教邓先生,又久经周折,最后没能在邓先生生前实现他的心愿的事,我心里还有一件,是关于胡适先生的藏书。

胡先生于1948年底飞离北平,将私人藏书信件全部托付、寄存于北大图书馆。1957年6月4日他在纽约立下遗嘱,将藏书信件全部捐赠北大。1962年胡先生去世,但遗嘱之事北大一直不知道。我是在1987年后才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偶然看到此事,当时北大校内和图书馆内的人员对胡适藏书仅仅知道其中的善本书在文革前已经送交北京图书馆了。1992年12月北大图书馆九十年馆庆,我陪北图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唐绍明参观,说起此事。他说,你拿遗嘱来,我就退书。1993年3月北大图书馆庄守经前馆长访台,行前研究在台的工作,我建议寻找胡先生遗嘱。庄前馆长访问了台湾胡适纪念馆,该馆吕实强馆长要求北大出具公函。4月5日由我代拟了公函。5月21日吕馆长托罗荣渠教授带回复函,告知已请示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5月26日吴先生同意复制遗嘱

给北大。为了索回善本书，我查知当年的史事，是胡先生在仓促乘飞机去南京时，指派儿子胡思杜主持，后有毛准、王重民参加，由北大图书馆的郭松年、张光则、王幼忞等人将胡家的全部私人藏书和书信文件装成102箱，寄存于北大图书馆。1957年胡思杜被错划为右派自杀。1954年7月北京市人民法院批示北大：“胡适等文物书籍在保管期间，可暂作你校教学科研之用。”胡适藏书的大部分于1960年，小部分于1962年从沙滩北大图书馆原址搬到海淀北大现址。1962年4月中宣部通过教育部要求北大清点胡适藏书信件，8月周扬询问胡适藏书信件情况，北大图书馆将藏书情况报告校长陆平再告周扬，并报教育部高教二司。当在1962年第四季度，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决定将胡先生寄存北大的105种善本古籍交北图，北大剩存的1924件胡适书信文件交近代史所，其余藏书留北大图书馆。我查到1963年11月28日邓先生写给北大图书馆的信，文如下：“在准备拨交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中，《四松堂集》有稿本、印本各一，建议印本仍留北大图书馆；《万历绩溪县志》北京图书馆有此书，建议不必调拨，可仍留北大图书馆。今后凡有特殊原因，经校委会批准，确需调往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籍，建议请北京图书馆复制一份胶片给本校图书馆，以便我校师生利用。”这是邓先生想出的补救措施。1962年北大图书馆的报告中说，已询问过汤用彤、王重民、向达、耿济安、汪子嵩等，除只知三反时（乃文按：此事涂继武记忆是在三反前）公安部门借用过一些胡适信件，不知归还与否外，大部分胡适信件不知下落。1987年11月北大图书馆钱鸿均调查胡适藏书时，已不再提信件事。那么当时已经失踪的信件到哪儿去了呢？邓先生在1948年时是胡先生的秘书，与胡先生在东厂胡同一号院南北相对而居，我去请教邓先生。邓先生说，

有一条线索，1954年编印批胡适的资料，引用的书信和日记是从哪儿来的呢？我遵照邓先生的提示，查知当时中宣部资料室从北大取走了胡先生的大部分书信文件和日记，从中选编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之一》和《之四》。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书信文件和日记随黎澍转至近代史研究所。以后，近代史所在1979年整理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选》，在1985年整理出版了《胡适日记》。还在1994年影印出版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以每部26000元价格销售，因邓先生讲了话，1995年3月9日近代史所赠送北大一套，此为后话。1994年3月25日，林被甸馆长与北图交换过意见以后，由我代拟了北大致北图的公函，恳请北图依据中央有关政策退还胡先生藏书。北图表示理解，但又表示需要得到领导部门指示方可作出决定。1995年2月林馆长请张芝联教授联系了北大七位政协委员，由我代拟了向政协八届全国委员会提出的联名议案，提出尽快解决胡适藏书信件统归北大保管问题。同时，林馆长上书李瑞环同志，请求促进这一问题的尽快解决。林馆长的信由国务院秘书四局征求文化部和社科院的意见，北图承认上述事实，近代史所却完全否认。近代史所说，他们收藏的胡适档案资料一万五千余件，主要是他们1950年从解放区进驻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原住宅时，所得到的胡适匆匆飞离北平时未及带走的书信档案，仅有极少部分（约数十件）是六十年代初从历史博物馆征集得来的，和极少的另一部分是从其他单位处理的废品中发现搜集得来的。我为此再去请教邓先生。邓先生明确地说，他当年曾目睹装箱的全过程，装完箱后，“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6月14日，邓先生亲笔写了证明材料，其中说：“胡氏的藏书、手稿以及来往的书信等等，一律存放在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到1948年年底，当时北

乎和平解放的局势已定，但解放军尚未进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的管理人员郭松年等人到东厂胡同一号把胡氏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等一律装箱，共装了102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战争期内，把所有藏书送往天津银行保险时所做的），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此情此景因我当时仍然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所以全得亲眼目睹。现虽已事隔四十多年，但我的这一记忆必不至有误。”北大图书馆的老馆员王幼忻先生当年亦曾参加装箱工作，当时健在，他的回忆与邓先生完全一致。我还查知：1954年中宣部取用胡适书信文件是政治任务，不公开，没有手续，北大是坚决执行的，知道的人极少；且胡适藏书和书信文件当时仍存于沙滩北大图书馆原址楼上书库，而中宣部图书馆当时已经进驻了那座楼的楼下，取物就是从楼上搬到楼下。当时中宣部资料室的负责人黎澍和主要经办人刘立凯等均已去世。所幸原中宣部图书馆馆长高兴国当时即在中宣部，且与刘立凯等相熟，知道资料室的胡适书信文件是取自北大，高兴国为此出具了证明。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书信文件随黎澍转至近代史所，大概在近代史所也没有办任何手续。但是只要用1955年中宣部资料室编印的《参考资料》与1994年近代史所编辑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对照一下就可以完全清楚，近代史所现藏的胡适书信文件中的一部分就是1954年中宣部资料室取自北大的胡适寄存物。近代史研究所还否认1964年4月21日北大将剩余的1924件胡适私人书信文件送交该所，他们提出：说胡适藏书和书信文件于1962年由文化部分配给三家保管，有无确实根据？说胡适的1924件书信文件被分配到近代史所收藏，究竟有何根据？北大图书馆能否提出这些书信文件的名目及原由北大图书馆收存的原始依据？为此我再查知：北大保存有1964年致近代史

所的公函和胡适书信文件清单。当时草拟公函的校长办公室秘书钮友翁先生健在，为此出具了证明。钮先生告诉我，校长会议对送出这批书信文件并不情愿，校长陆平曾专门打电话与未出席会议的副校长翦伯赞商量。同样清楚，近代史所现藏的胡适书信文件中的另一部分就是1964年北大按文化部要求交给该所的胡适寄存物。1995年7月26日由我代拟了学校就上述调查给教委的报告。然而十分遗憾，有关史实虽然可以克服时间的久远得以理清真相，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胡适先生的善本书和书信文件所具有财产价值、研究价值和影印销售的价值，致使胡先生本人的意愿被置而不顾，北大的恳切请求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胡先生去世已36年，当年与胡适藏书有过关联的人已全部去世，邓先生是最后一位。今后能否尊重胡适先生本人的遗愿，由北大完整保存他的藏书和书信文件，并以一个专门收藏的形式提供给方方面面的研究者使用，使邓先生和关注胡适遗产问题的各方人士的愿望有一个完整的结果，我不敢说。我将事实记述在这里，是希望今后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不会由于见不到当年与胡适藏书有过关联的人，而对难以了解事实真相感到沮丧，我相信邓先生是高兴我这么做的。

转眼之间，邓先生已经逝世一年了，值得记、值得写的话还有许多，篇幅已经不再允许，谨以此深切地缅怀邓先生。

与邓广铭先生初识十分钟

韩小蕙

题记：

邓广铭先生仙逝了，终于没能如他亲口对我说的：“我不赞成做寿。要做的话，等我100岁再做。”

想起这句话就心里酸酸的，眼眶里也开始发潮，真的难过得很——虽然我与这位人品高尚的老先生，仅有一面之缘。

翻检出当年的文章，那是1992年我去他府上拜访之后写下的，那天恰值他的八五寿辰。重新读过，那已有些被岁月湮没的往事，重又浮出记忆的水面，变得鲜活起来……

那天我去的太冒失了——大中午12点半，邓广铭先生一家正在吃饭……

先前，全然不认识邓先生，连电话也未打过，连信也未通过，只知道邓先生是满肚子学问的大史学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要说交往，也算有过两次，全是“单相识”，一是读过邓先生发表在报纸上的短文，那文字中透出的书卷之气和对人生的洞彻，使我怦然心动。还有一次是听到一位学者说起邓先生的满腹经纶，单是那副心向往之的口气，就给了我强烈的感

染……

所以我满怀歉意，一进门就先道歉。其实并非我不懂礼貌，而是事出有因。那天，那所著名大学门卫森严，就是不让我进门。最后，好说歹说，死说活说，请示了有关领导，才终于开恩放了行——等我到宗璞先生处取了稿子，到吴组缃和金克木先生处拜望过后，再赶到邓先生家，已是午间休息时分。有心下午再来，怕又进不了大门，只好硬着头皮烦扰邓先生。

我的心情极度不安，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

而且，说来也巧或者说的不巧，那天，正是邓广铭先生八十五岁华诞。他的几代弟子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他祝寿，陪客一上午，他已有些累了。

没想到的是，当我说明是来约稿的，邓先生的女儿十分客气地将我让进门。邓先生首先便指着饭菜让我一起吃饭，见我执意不肯，他就立即放下饭碗，过来陪我说话。

他一下子就体察到我的不安，故意说了一句笑话：

“今天我出家。”

见我不甚明白，就又解释说：“我从来不赞成做寿，因为那不是又离死近了一步吗？往年我从来不让别人给我做寿，我对他们说，要做的话，等我100岁再做，那才真正是喜寿。可惜今天他们背着我，串通我的孩子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所以我说，‘今天我出家’。”

我笑起来，不安稍解，说到稿件的事情。

邓先生耐心地听完，和善地说：“我很愿意给你们写稿，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其一，我跟《光明日报》的关系可谓深矣，过去的史学版就是我们几个人编的，那还是60年代。其二，你要的文章我肚子里也有，还有不少呢。”

他随口就给我讲起一件往事：有一年，光明日报史学版上

开展了一场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就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当一个新生的皇朝建国初期，往往都对人民采取让步政策，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先生等几位编者认为这种让步是利于社会发展的，每次编排版面时，都把这种观点的文章放在上面。可是每次报纸出来时，却总是否定让步政策的文章排在上面，他们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过了好久好久，才知道，原来毛泽东主席不赞成让步政策……

邓先生生就个福相：宽宽的额头，胖胖的面孔，清淡的眉峰，和善的目光，儒雅的微笑，这一切集中在一张脸上，就令人想起寺庙里的释迦牟尼佛像。虽已八十多岁高龄，他却仍感觉自己是个壮年人，说话行事举止都还停留在六十岁的境界。感觉相当重要，感觉也是个十分奇妙的东西，邓先生自己认定年富力强，他就不但获得了从容应付世界的自信，而且也将此信息传达给别人，使世界也觉得他行。在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邓先生的孩子们根本就不来“管”着他，比如“该休息了”之类；而在其他耄耋老人家里，这种情况无不出现——不过，这到底是邓先生的身体好之故，还是邓门的家风好之故，我没太弄明白。

邓先生儒雅地笑着，很坦白地对我说：“你看，这些往事一段一段的，我肚子里有不少呢，写进文章里，我觉得也能有些意思。可是有一点，我现在有时候手有点抖，字写出来不成样子，就弄得一点情绪也没有了，这么着吧，我答应你，但你别给我限定时间，但愿我在有生之年能为你写。”

我觉得此话有点过于悲哀了。就转换话题，说起有关方面应该为象他这样的老专家配备秘书，邓先生也有同感。他每天要应付报刊的大量约稿，还有各种学术鉴定、论文审核、文化交流等等。而且，更主要的，他考虑的还不是自己的这点事，

而是象他这样的老专家已经没有几位了，不赶快“抢救”的话，他们就要把“好东西”都带走了。可是当他非正式地跟有关领导聊到这事时，领导却只说了句：“让你的孩子帮着弄呗！”

邓先生幽默地对我说：“我的孩子们还得奔他们自己的前程呢。”口气虽然很淡然，其幽默的底蕴却是无可奈何的悲哀！

我无语。他一时亦无语。后来我听说，邓先生一直笔耕不辍，计划还要重写《辛弃疾传》。他身边的这位有教养的小女儿邓小南，也已在史学界崭露头角，成为出色的宋史研究新秀。不过邓先生一点儿也没跟我谈及这些，当我问他是否写过自传，或者别人写没写过他的传记，他慢悠悠说：

“过去的人，像鲁迅啊、茅盾啊，写写他们的传记还有意义。他们以下的人，我看就没多大意思了。我从不写自传什么的，也不同意别人写。”

我的心一动：当了这么多年记者，似乎还没有听人讲过这样的话。我于是对自己说：“噢，这就是邓广铭！”

告辞的时候，饭桌上邓先生吃了一半的饭，已经全凉了。我歉然得很，又一次道歉。完全出乎意料，邓先生说的却是：

“我替我们学校向你道歉。希望你下次再来时，不至于再发生这种不愉快……”

一位多么有修养的老学者呀！

经过那池著名的湖水时，我停下来，默默伫立了一刻。春还料峭，湖水还萧瑟，温暖的绿色还没有到来。偶尔有几只似曾相识的鸟儿，绕着古塔飞翔鸣叫，不明白他们在唱些什么？

我想起了自己此生中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没能进入这座名重中外的高等学府来读书。那时我曾发愿：等我女儿长大，一定送她再来考；若她还考不上，那就让她的女儿再来考……

一度，这念头有所暗淡，但刚才对邓广铭先生的十分钟拜访，又使我的希望之火熊熊燃烧起来。我想，读书倒还在其次，关键这里是还留存着东方文化的精髓——由优良教养所培育出来的高尚的人格与心灵的高贵。

人可以随意地活着——痛痛快快地、忧忧郁郁地、热热闹闹地、寂寂寞寞地、壮壮烈烈地、委委屈屈地……但是，有一条千万不能忘记，这就是如邓广铭先生一样地善待人。

补记：

以上这篇小文发表于1992年第九期《现代交际》杂志。之所以在那里发表，我的意思是在我们九十年代的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年轻人，应该以邓广铭先生这样的老学者为楷模，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不承想，1993年初，我突然接到来自北京大学的一个厚信封，打开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邓广铭先生寄来的文稿——他真的还记得我的稿约，真的利用节日休息时间，为我写来了《我与北大》一文。文章以一位历史老人的平静口气，叙述了他与北京大学的一辈子的因缘关系：从他在家乡读书时即成为“北大迷”始，一直讲到 he 两度报考北大终被录取，后来留校任教，中间一度去复旦大学任教授，又自愿回北大任副教授等等，一一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口气虽平缓，却处处流露出他对北京大学这座中国第一大学堂的深深的敬仰与眷恋。文章写得好极了，氤氲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书卷之气，文字也漂亮，流畅隽永，给人无穷的回味与遐想。我兴奋极了，连忙换下已经拼好的副刊，将邓先生的文章以头条位置发表。

当年夏天，中央编译出版社约我编一本九十年代的最新随笔集，我复将《我与北大》一文收入其中，依年序排在冰心先

生文章之后。说实在话，是文为这本《新现象随笔》增色不少。

至彼时，在我心中，认定邓广铭先生乃随笔高手。我当然知道他是著名历史学家，尤以治宋史盛名于世，但那些史学界的专门学术情况，搞不清楚，也隔膜，不若《我与北大》一文，鲜活活地托起了邓广铭先生作为作家的形象——我当然认为邓先生不仅是学者，而且也是作家，话这样说事出有因：不是每位学者都能被称为作家的，有的大学者学问深厚，在其专业领域无人能匹，为人服膺，但行文却是学术式的，写不来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文章。而邓先生的行文一点儿也不干巴，我窃想，他若不治史学而专事写作，也会是大作家的。

如此，在1996年，有一家出版社紧急约我编一部学者随笔，我即也向邓广铭先生寄去约稿函。不几日，收到邓先生的亲笔回信，信如下：

韩小蕙同志：

接你9月20日来函，嘱我立即将近两年内的随笔代表作寄奉两三篇，拜读之下，我“立即”想到，你我终究是只晤谈过五分钟的友人，相知未免太少，我何尝是能写“随笔”而且是常写随笔的人？一篇《我与北大》，虽曾蒙你收入一本随笔集中，那也实在很不够格，而此外，连那样的文字我也不曾写过。与我同住在北大朗润园的金克木教授，是我六十多年的老友，人家的小品、随笔，年年丰收，我却只能甘拜下风，望尘莫及（从来也没有打算“及”，因为自知没有这种本事）。总之，我现在只能向你交白卷，而且过不在我，乃在于你对我之所知太少。只晤谈过五分钟，所知只能如此嘛。

勿草，敬祝
编安！

邓广铭

96年国庆日

我捧着邓先生这封信，一个劲儿发呆，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我早读过金克木先生的一篇文章，那里面说邓广铭先生在北大做学生时，便因一篇学生论文“得到文学院院长胡适赏识”。而现在，在他读、写、研究了一辈子之后的耄耋之年，他仍然认为自己“很不够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襟怀啊！

这同那些胸无点墨却硬要往名人行列之中挤、同那些不学无术却硬要炒作成为大家、同那些败絮其中却硬要摆出一副权威架式的形形色色的文痞、文混、文赖相较，邓广铭先生不啻为天上的仙人？

当然，望着这封字迹虬劲的信，我内心里最大的不安是自己打扰了邓先生，老人家已九旬，时日不多，还有许多研究课题未做完，我真是不应该劳烦他。

冲动之下，我又给邓广铭先生写了一封致歉的信。但在我即将把信扔向邮筒的一瞬间，我又犹豫了：这不是再次叨扰邓先生吗？我把手收回来，心里默默地说：

“等邓先生做百年喜寿时，再致贺信给他老人家吧……”

现在，邓广铭先生仙逝而去，我谨以一个“晤谈五分钟的友人”的身份，写此小文，敬献给当今之世为数已不多的大儒、真儒邓广铭先生。

1998年9月于北京南郊西马场

怀念邓先生

马力

今年1月出差回京，接到邓广铭先生去世的讣告，我虽已先知先生病情严重，心理有所准备，悲痛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息！十余年在先生麾下的一幕幕，在我眼前反复浮现。

我1982年考入北大，成为邓先生的研究生。但在此以前，76年我参加上海师大古籍整理工作后，便常听人们提起邓先生；78年入学人大历史系，开始阅读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对先生的学问学识愈发崇敬起来。因此缘故，我决定大学毕业后，攻读宋史专业，并真得有幸考入先生之门。

先生如何严格要求的种种故事，我早有耳闻。没想到我第一个学期的第一篇读书报告便让我亲身体验了这一点。按先生的要求，第一学期我通读了《资治通鉴》和《续通鉴长编》的一部分，选择了《论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一题为读书报告。我从《长编》及范仲淹、韩琦等人的文集中摘抄了几百张卡片，暑假时兴冲冲回上海完成了论文，还满心以为写得不错。可先生批回文章后，我看到先生用蓝笔在十余处做了批改，其中有的标点不妥，有的引文缺失、窜行，还有行文措辞有失准确、观点有误，等等。先生审读得非常仔细，还一一核对了上百条引文。学生写文章有缺点本是常事，但如此马虎却使我汗颜不已，而先生的批评更使我大吃一惊。先生专门召我去，指出：

我们这一代本因“文革”的耽误，文化底子浅薄，努力尚且成材艰难，何况不努力认真地去呢？如果这样下去，毕业都很难保！当时先生正全力组建“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在他心目中，中心至少要达到并超过以前史语所的水平，以此衡量，自己的确相差甚远。这件事给我的震撼很大，不仅使我看到自己与先生要求之间的差距，而且也使我真正体会到先生的认真、严谨和负责精神。经过反复修改，文章虽得以通过，但也只得到先生“有了进步，但无新意，不能发表”的评价。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马虎随意地对待学问，写作前必思量再三，写作时则反复斟酌，写完后还要一一核对引文。人们所说的北大的种种优良学风，先生都言传身教地教给了我们。

先生在宋史方面的治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作为一个学术权威，先生并不满足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孜孜不倦地发掘着历史的真实，追求着真理的完美。这是先生给我们树立的又一个榜样。以对王安石的研究为例，从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先生发表过许多文章，不断地在各个方面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传记也是改了又改，直至先生卧病之际，完成了最后一稿的修订。我的硕士论文中有一节叙述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改革目标，便是从先生的分析而来的。97年春，我去看望已九十岁高龄的先生，读到先生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令人信服地分析“富民”也是王安石变法的目标之一，使得我们对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有了更加完整准确的认识。虽然此时我已不再从事宋史研究，我依然深深地为先生这种永远追求的精神所感染，特向先生索要了一本，藏之以为自己永远学习的榜样。

做研究生期间，十天半月我便去先生家聆听教诲；毕业后留北大中古史中心工作，一月也要去先生处一次；下海以后，数月半载，我仍然要去看望先生一次。这不仅因为我由衷地尊

敬先生，而且还因为先生的知识广博，阅历丰富，交谈的话题兴趣广泛，近代掌故，学林佚闻，直至今天应如何改革开放，每次交谈都使我受益不浅。看望先生，成了我每次返京探亲时的一个必有的安排。想起97年春的一个周日，我携老母和妻、儿在北大校园内散步，恰巧遇见先生，先生邀我们去其家坐，我因怕人多添乱谢绝了先生，这竟成了在北大校园内与先生相见的最后一面！如果天上真有人间的话，将来我一定还要去看望尊敬的邓先生！

邓门从师杂忆

包伟民

198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师于邓广铭恭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自此至1988年秋季毕业，我得以奉侍先生左右，日聆师训。三年的耳提面命，使我从一个对史学只有一知半解的年轻学生，成了真正走进史学大门，基本能从事独立研究的史学工作者。邓门从师三年，是我就学经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今天回想起来，先生教导学生之循循善诱、德业兼及的一些细节，还历历在目。

早在进北大前，就耳闻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因此，我初入先生之门时，心理上可以说真正是既敬且畏。但没过多久，“敬”之心与日俱增，而“畏”之情则日渐消失。因为先生所严惟在治学，其他方面，则十分和蔼可亲。说起先生的严格，当时我们几个学生心中有一件事十分明白，撰写学术论文，诸如论题不当，逻辑混乱，文理欠通，史料有误等等差错，这一切都会招来先生毫不留情的批评，绝不可能通融过关。就是最基本的用词、句逗等写作基本功方面，也无法偷懒。我因为一手字写得太差，受到先生多次批评。用先生的话来说是不要求写得好看，但要求写得清楚。记得有一次先生还特意从书橱里找出他当年读书时所作的笔记，给我观摩。先生这一切的“严”，实出于迫切希望学生成材的慈爱之心。我们这些学生，

如果说今天在史学领域或多或少有一些成绩，确是受赐于先生的严格要求。但在治学之外，先生对年轻学生在生活等方面的关心与爱护，却更像是一位宽厚的长者。记得当时我为了避开交通高峰，在学期结束时每每提前几天离校，向先生请假，他一概准许放行。

为中国史学界多培养几个学生，是先生晚年的一大心愿，也是花费先生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我考进北大时，先生招收研究生已有多，门下已毕业与正在读的硕士生不少，在读的博士生也已有几位。但奇怪的是，先生似乎并不鼓励他自己的硕士生继续做他的博士生。后来听师兄张希清的解释，才使我明白所以然：先生为了多培养几个学生，希望多招收几名外校的学生。至于北大已在读或毕业的硕士生，认为既已在自己身边，一样可加以指导，至于学位不学位的，并不重要。这当然也可看出先生在学术上重实才轻虚名的态度。正因为此，先生对于门下的弟子，只要还堪造就，总是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希望他们能留在北大，留在自己身边工作，用以加强北大宋史研究的力量。但事与愿违，这十几年来世的变化，弟子竟是走的多留的少。这也是我这十年来一直感到愧对先生的事情。

当我进北大时，先生已不再正式开课，我主要是通过定期向先生汇报读书心得，来得到先生的指导。不过先生十分注意让我们多向历史系其他教师求教，要我们多选听一些名师的讲课。记得我曾选听过田余庆、王永兴、张广达等老师的讲课。这里只说先生本人指导我们这些学生的一些具体方法。

我在硕士生时期，就一直关注宋代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所以先生在我入学后，与我谈论当时宋史研究概况，经常提到有关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个具体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他本人对此问题的看法。起初我并未在意，后来慢慢领悟到这是

先生在向我布置任务，才专心钻研起来，并试着写出一篇论文，交先生审阅。第一稿显然并未达到先生的要求，他不仅指出了我论文的错误，并专门向我讲解了论文所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让我继续修改。得到这些具体的指点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终于真正理解了这个问题。论文第二稿交上去，就得到了先生的首肯。后来我从其他师兄弟处了解到，他们每人都有过这样的“命题作文”的经历，才体会到这实际上是先生培养学生的一个办法：通过命题作文，一步步地将学生引入史学之门，手把手地教给他们做具体研究工作的基本功。同时，先生也有意通过论文写作，看看新入门的弟子到底是否堪与造就。先生看重的是学生的实际研究能力，而不是他们考试的成绩。

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可以说是我从先生处所学到的几项最重要原则之一。记得有一次我到先生处汇报读书心得，那几天我正在读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先生问我有何发现，我提到了对书中所记关于南宋某一地方官设置问题的一个归纳性看法。不料先生说：这不过是一个枝节而已，读书应该关心大问题，从大处着眼，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到今天我自己教书时，总是把先生的这一番话，作为该书的一大诀窍，告诉学生。细想起来，先生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所强调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无不是从大处着眼而提出来的。具体落实到宋史领域，先生所一再强调的不应孤立地研究宋代，而应该对当时中国地域所存在的辽宋夏金几个政权同时展开研究的看法，就是一个例证。

说到从大处着眼，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先生一直强调的理论运用应该实事求是。正如先生在为他的学术论著自选集所

写前言中所说：“我所写出的文章，只是阐发我自己的见解，而绝无代任何一位圣贤立言的教条主义的八股文式的作品；而且只是实事求是地，以符合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绝不去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先生在平时对我的指导中，多次谈到了自己对所谓土地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宋代的货币地租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先生确定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全过程中地位问题的重要论据。根据我对先生这些意见的理解，就是我们不应该按照欧洲历史发展的模式，非得要生硬地在中国找出一个与之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本质而言虽是一元的，但其在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却是极其多样化、极其丰富多彩的。背离历史本质，用中国历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去印证理论大师学说之正确，实际上只能是帮倒忙而已。这些年来，我自己在史学研究中，也是力图坚持这一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

从细微处入手，是指研究历史应该正确处理史料。这也是先生所提出实事求是治学原则的第二个方面。重视对史料的校勘与考订，去伪存真，以得到正确理解，接近历史的真相，是我国老一辈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先生在这一方面给我的印象尤深。学生提交的论文，其所征引的基本史料，先生都不厌其烦地一一查对原书，其工作量可想而知，但先生从不马虎。记得有一次，先生在看过我的一篇论文后，特意对我说，其中有两三条资料所引到的书，放在书橱上层，太高拿不到，没有查对，要我到图书馆再去核查一下。先生不仅在指导学生研究工作中特别强调从细微处入手的重要性，他自己正是这样从细微处着

手来影响学生、感化学生。现在，我自己在从事教学工作时，每当有懈怠情绪滋生，就会不自主地想起先生，勉励自己。

说句实话，邓门从师三年，当时我更多的是将先生视为严师，其他方面考虑不多。离开北大后的这十年间，我对先生学术思想的体会与高尚人格的认识，才更全面，更深入。近年来，先生对一些学术问题之坚持原则，近乎于固执，以及对纷繁世事所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实有他人难以企及之处。而这正是我心目中的先生。

深切怀念导师邓广铭教授

——罗家祥

1998年1月10日，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尊敬的导师邓广铭教授停止了他在学术上似乎永无休止的探索，带着对学术的挚爱和对整个学术界的关怀，走完了他九十一年的人生历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先生逝世之前几个月，我便得知了先生的病情。1997年11月12日，我才得以赴北京看望先生。在友谊医院的病房里，终于见到了一别数载、时常令我梦牵魂绕的躺在病榻上的恩师。我长时间握着先生的手，先生激动哽咽，我亦百感交集，良久难发一语……回想起在先生身边求学问道的那一个个日日夜夜，先生对我不厌其烦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以及在我离开北京之后八年多的时间内先生以各种形式对我一如既往的鞭策、教导和关心，我要表达的感念之辞何止万语千言！

回到武汉之后，我虽然对先生的病情发展有所了解，也知道这一噩耗迟早要传来，但却仍在心底里为先生祈祷，期盼着先生能战胜病魔，创造生命的奇迹，重回朗润园十公寓那间拥挤、简陋的书斋，重新漫步在未名湖畔，继续他那没有止境的宋辽金史研究，造福于学术界。1998年1月12日下午，我正在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周国林教授家中，突然，电话铃响起，约两分钟后，周教授过来相告：古籍整理委员会来电，邓广铭

先生逝世。我禁不住悲从中来，凄楚难言。

在先生逝世以后的这段时间内，我时常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写一点文字，来彰明一位德高望重、在宋史学界有如泰山北斗的历史学家的独特人格风范，来寄托一个学生对导师的怀念之情。夜深人静时分，一次次翻开先生的遗著，一次次目睹先生的遗容，一次次回想先生对我的诸多教诲，无不唏嘘再三，潸然涕下，以致难以措笔——先生于我恩重如山，寥寥几行文字何足以道万一？！

我与先生的缘份始之于1985年6月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曾尽可能地拜读了先生与其他一些前辈专家的著作。先生的博学睿智、非凡的卓识与一代宗师的风采，无不令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后学产生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业师王瑞明教授在得知我有意进一步学习的念头后，鼓励我将硕士学位论文寄给先生，请先生作我的论文评阅人。先生是宋史学界的泰斗、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且当时亦有较多的社会活动在身，能顾得上我这个素昧平生的普通后学吗？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先生寄出了文稿。出乎意料的是，大约一个月后，时已年近八旬的先生审阅完我那篇长达六万字的浅薄的习作，并寄来了详细的评审意见书。先生在对我进行多方勉励的同时，亦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先生既肯给我的论文提出意见，我便得陇望蜀，致函先生，希望能有机会追随先生左右，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以期在学业上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86年9月，我通过了一系列入学考试，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以鲁钝之资，忝列先生门下，在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在先生膝下求学的日子里，我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先生作为宋史学界一代宗师的情操和风范。先生是学术至上型的学

者，学术是先生的生命之源，这一特点贯穿于先生学术生活和教学生涯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探索学术的真谛，先生是生命不息、自强不息的。

先生一生没有其它嗜好，唯一的嗜好便是读书和著述。早在三十年代，先生便以其勤奋、博学以及过人的才识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名流学者的特别看重，这在学术界已是众所周知。半个世纪过去，先生早已在史学界独树一帜，成为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但先生并没有停留于过去，而是更加勤奋地著书立说。在先生的晚年，他虽然身体健康，思路清晰，思维十分敏捷，但视力下降，阅读时必须借助高倍的放大镜；听力也明显减弱，遇有客人来访，时常必须有小南在身边陪同；最使先生感到不便的是在书写时手常抖动，十分吃力。即便如此，先生仍然唯书是好，笔耕不辍。

在追随先生的几年中，每当我有事去找先生，都见他伏在他那张堆满书报、拥挤不堪的写字台上，或用那只放大镜聚精会神地查阅着史料，或是用颤抖的手进行着写作。在我的印象中，每天从寓所到历史系办公室取信和邮件，藉此机会绕未名湖畔散步半小时左右，才是先生的一种休息（其实，那也是为了活动一下，以增强体力）。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向先生请教，先生手持放大镜，正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看到他是那样的费力，我问他何不请一助手，代为书写和查阅，先生告诉我：一则别人不熟悉情况，那样更麻烦；二则通过阅读和写作，自己也能娱悦身心，习惯了。当时我便想，先生也许是为学术而生存的。正因为如此，一直到逝世之前，先生每年都有新的成果问世。而这些成果作为先生晚年的作品，是他毕生心血浓缩和结晶，对宋代学术研究尤其启迪意义。

先生为中国的学术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直到生命

的最后气息。这句话决非寻常套用的溢美之辞，而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1997年11月我到北京时，曾两次去探视先生。第二次是在14日，我得以陪伴先生一个下午。那天，先生打完点滴后，感觉尚可支撑起来工作一会儿，便命我将床头的活动写字台移到床边，由小南扶他坐起。阅读完各地来函后，先生在一些文件上颤抖着签完名，又忙于安排古籍整理的有关工作，而后嘱小南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第二天我便离开北京去了广州，先生在他最后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忙到了哪一天，我不得而知，然而可以想见，只要一息尚存、只要稍有可能，先生一定会继续工作下去。

为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先生是海人不倦的。

王曾瑜先生在《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近一百年来中国宋史研究的状况作了精当的概括和分析，认为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同其它断代史相比，在“文革”结束以后二十年间已经跃居前列。毫无疑问，中国大陆宋史研究得以长足发展，长期担任宋史研究会会长的邓先生是功不可没的。先生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利用其独特的身份与地位为宋史研究鼓与呼，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气氛，不仅仅在于他领导、团结了一大批宋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脚踏实地地将宋史研究工作一步步引向深入，还在于他在培养宋史研究的新秀、培育人才方面也付出了极大的心力。

尽管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有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时间较紧，但只要有人登门请教一些问题，先生却总是不厌其烦，随问随答，侃侃而谈，常常长达几个小时，直到客人主动告辞为止。外地不少学术界的同行和年轻学子进京，因仰慕先生之名而欲一睹风采，我常常为之牵线搭桥。那时电话联系不太方便，不能与先生预约，但我熟悉先生的作息时间表，便带着“不

速之客”突然叩门，而先生不管当时有多忙，也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回答来访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无例外。先生对国内各地的来客如此，对一些外籍人士也无彼此之分。记得有一次，我带一名德国访问学者去先生处，先生根据这位访问学者提出的问题，从白乐日的宋史研究计划讲到欧美宋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国内宋史研究的状况，一一加以解答，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先生的渊博的学识和海人不倦的师德，令那位年轻的德国同行感动不已，以致于在许久之后还屡屡提及。1993年我去柏克利加州大学作研究访问，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魏斐德教授（Prof. Frederic Wakeman）曾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作过访问学者，谈及先生的学术与人品，亦深表钦佩。由此即可见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

我自己受惠于先生之多，则更是难以言表了。作为学生，我经常为一些问题去找先生求教，或在先生刚用餐完毕之际，或在中午先生午休之前，或在晚上九、十点钟，先生待我如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般，答疑解惑，谈古论今，从无一丝厌烦情绪。每次告别先生、沿着未名湖畔返回住所时，我是那样的心旷神怡，感觉到世界是那样的博大和美好，发现人世间的还有如此臻于至善至美的高尚情感，我的心灵似乎得到了又一次净化，人格也得到又一次的陶冶。

在追随先生期间，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他对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1988年我撰写毕业论文时，先生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了。尽管先生在阅读和书写时有如前所述的诸多困难，但先生却仍然分期分批、逐字逐句地仔细审阅了我那篇长达25万字的毕业论文，并将他的意见随手写在原稿上，对错字、别字及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先生也直接加以订正，几乎每一页稿纸上都留下了先生颤抖的笔迹，许多页面密密麻麻，

写满眉批和尾批，然后先生分几次亲自送到我的住所。1993年，我的这篇论文经过适当的调整和扩充，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在该稿的《后记》中，我曾写有一段文字，兹援引如下：

我尊敬的导师邓广铭教授，在该稿的撰写过程中，一直予以悉心的指导。先生以年逾八旬的高龄，对初稿的各部分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审阅，并亲自将审订过的稿子分期送还与我。每当我看到每一页稿纸上先生所留下的抖动的笔迹，每当我目送先生离开健斋（作者当时住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健斋）、看着他沿着鹅卵石铺成的曲径步履蹒跚地行进时，我心中腾涌起阵阵热浪！先生以学术上的严格、严谨著称，同时也对年轻学子充满了关怀、期盼之情。先生影响我们的不仅是他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而且还有他独特的人格风范与情怀。他的那些笔迹永远地留在我的文稿上，也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底。

这段话记载了先生当年指导我撰写毕业论文的实际情况，记述了我当年追随先生时的深切感受，也包含着我对先生永世难忘的无限感念之情。时至今日，文字犹在，而先生已经作古，再也不可能在我的任何习作上看到先生那熟悉的抖动的笔迹。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篇几年前的文字，泪水也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双眼！

其实，先生这种崇高的师德和人格风范何止体现在一篇毕业论文的指导上？在我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后的八年多时间内，先生何曾中断过对我的关心和挂念？我曾先后几次赴京出差并去看望先生，哪一次未曾得到先

生一如既往的教诲和指点？1996年4月我从美国回来后首次去看望先生，先生仔细问及我在美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并对我的科研工作提出了他的意见和看法。临别，先生送我他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论著自选集》，并在扉页题以“家祥博士吾弟指正”等语。他还告诉我，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他的《治史丛稿》一书，出版后他也会送我一本，请我“指正”。直到先生病重期间，我到医院去看望先生时，躺在病榻上的先生身体非常虚弱，连交谈也感困难，他不时闭眼休息片刻，然后断断续续地与我谈话，嘱我一定要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书，告诉我这部书的价值远没有被发掘出来。同时，送给我他新出版的《治史丛稿》，因为精力不济，他已不能题签，嘱小南学长代署——其时，距先生逝世不到两个月！先生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实在太多、太多，而我则难以报答点滴。记得有一次我赴京看望先生，顺便带去一包二两装的茶叶，而先生则嘱我以后不必如此，希望能多见到我的学术成果。先生逝世后，我未能赴京与先生告别；而原计划在1998年清明节去为先生扫墓，亦因故而未能如愿。弟子不才亦不孝，愿九泉之下的先生原谅我！

先生是一位学术至上的学者，于己于人，他始终是以一种高标准的学术尺度来衡量的。

学术至上，使先生不太讲究那些人际交往中的繁文缛节；先生的博学和通识，使先生足以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宋史研究领域的任何重大问题阐发他的真知卓见；求实求真、爽朗达观、直率明快的性格，亦使得先生对任何问题都一无所隐，畅所欲言。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我曾因一些小小的进步得到过先生的肯定；也或因表述不够严谨，或因史料处理不当而受到过先生

直率的批评，但不管是批评还是肯定，我都能异常深切地感受到先生对青年学子的一番殷切期盼之情，他希望他的学生都能在学术上有较大的建树，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对于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有所成就的后学，先生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和帮助。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赞许一些已成名者以及一些未成名者的著述，指出那些著作的精妙之处，也曾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是如何帮助那些不曾相识的青年后学。1982年，武汉有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在王瑞明教授指导下写了一篇与陈寅恪先生观点相左的《衙前考论》，深得先生赏识，该文经先生推荐刊登于中州书画社1983年出版的《宋史论集》上，几年以后先生仍曾提及该文。而作者唐刚卯（现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与先生素不相识。

如果说先生对他人在学术上要求严格，那么，他对他自己的严格程度则远远超过了对他人的要求。北京的书目文献出版社和山西分别出版过一套有关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的传记，所收录者均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界各领域的名流学者。这两种书的出版单位都先后一再约请先生写他的自传。以先生在国内外的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和影响，收入此书是当之无愧的，但出版社的盛情却一再为先生所婉谢。其原因，我几次听到先生谈及，他认为，他是没有资格被收入这类著作的，他觉得他一是没有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大的贡献，没有为中国的宋史研究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宋史学界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都是自己长期努力的结果，与他没有太大关系；二是没有比较满意的著作。又如中华书局很早就希望先生能将他发表过的学术论文进行整理，结集出版，亦不果。我也曾屡次听到先生讲到此事，他认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并没有多少自己满意的文章。先生所著《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与漆侠先生

的《王安石变法》可谓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双璧，曾引导为数众多的青年学子进入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堂奥，但先生却认为《王安石》一书存在的问题太多，多年间一再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予以修订，并且终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中将修订本《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完成。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先生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是何等的严格。

先生走了！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有。但是，先生留下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人格精神和学术风范。先生不曾立过事功，却以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立起了一座令世人景仰的丰碑。无数的后学也许难以逾越先生的博学与通识，却可光大先生的不朽精神。

愿九泉之下的先生安息！

邓广铭先生与北大藏拓片的整理

胡海帆

三十年代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下简称文研所）工作过的老人可能记得，当时松公府文研所考古室有一间平房，专藏金石拓片，里面收藏着北大购买的缪氏艺风堂拓片。正是那批拓片奠定了北大今日丰富的金石收藏的最初基础，也是它促使邓先生与北大拓片整理工作结下了缘分。

1936年邓广铭先生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史学系助教和文研所助理员，后者的工作是在考古室帮助整理艺风堂拓片，通过下面的一些旧事可以描述当时的状况。北大对金石拓片这种重要史料文献的收集早在二十年代国学门成立之初就开始了，著名的艺风堂拓片由国学门购入，以后又由新成立的文研所继承。购入的拓片需整理编目方能为学术研究所利用。因此，1934年胡适先生保荐其早年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罗尔纲到考古室工作，整理艺风堂拓片，并且在1936年配备了胡先生在北大的得意弟子邓广铭担任助理。罗尔纲先生在其《师门五年记》中写道：“适之师给我整理的计划是先编目录。由适之师定了一个目录表，印成卡片。每一种拓片要登记它的年代、地域、碑主姓名、撰人姓名、碑的高广、碑文行数和字数，碑文漫漶剥蚀的部分等等。碑的正面要记，碑阴碑侧也同样要记。卡片上还有附注一栏，专记工作时的发现。”这正是

当时他们整理拓片的情景。邓先生来到文研所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了，迫于形势邓先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文研所。整理拓片的生活虽然过去了，但是这段经历使邓先生对北大收藏的拓片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也促使着他晚年关注惦念着北大图书馆拓片整理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文研所取消，该所收集的艺风堂、柳风堂等三万余份拓片调拨至北大图书馆，燕京大学、中德学会等诸多单位收藏的拓片也相继汇入，加上图书馆自有拓片，截止至五十年代末，北大图书馆收集的拓片多达五万余份，在当时国内公私藏家中可谓名列前茅。但遗憾的是这批本应在教学科研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古代文献却因整理编目工作不善而束之高阁长达数十年，种种历史社会原因，使北大的拓片整理缺少必要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人们无暇顾及许多应该去做的事，以致整理工作或坎坷或停顿，饱受磨难。这种状况直至八十年代才开始改变，邓先生对这一改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文化事业方开始正常发展。1981年图书馆重新开始了拓片整理，但是，因为力量不足而困难重重。1985年，时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广铭教授得知情况后，对整理工作予以鼎力支持。他以近八十岁的高龄为北大拓片整理工作在古委会申请立项而奔走，最终从古委会申请到5.5万元项目经费，而且因为此项目使学术界受益甚广、意义重大，还被古委会列为重点项目，由邓先生担任项目负责人。从此，整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观，经费有了保障，编目力量得到加强，邓先生悉心指导，这一切都对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整理工作正常而稳定地发展。邓先生始终十分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谆谆叮嘱整理小组的同志们一定要保证编目质量，要对得

起后人，处处体现着一位老学者心系祖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在物欲横流、充满急功近利而古籍整理后继乏人的年代，他热情鼓励和赞扬整理小组的同志们甘于寂寞、长期坐冷板凳的敬业精神。

十年寒暑过去了，在邓先生和古委会的鼎力支持下、在图书馆整理小组同志的艰苦努力之下，拓片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有：第一，全面地确立了一套科学完善、符合馆藏情况的编目收藏体系；第二，完成了馆藏全部拓片的初步编目任务，馆藏拓片也开始向读者开放，这是图书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建立起按历史年代排序的拓片卡片目录体系，读者可根据目录检索全部馆藏拓片；第四，所有拓片依专藏、系列、装裱形式及年代先后科学排列，复本、摹本集中存放；第五，结束了馆藏拓片绳捆布包的历史，所有拓片均装袋入盒、妥善保存；第六，改正大量历史上遗留的差错或问题，如将文研所四十年代时部分打散的艺风堂专藏恢复以旧貌。回顾这些，所有参加过整理的同志都感到由衷的喜悦，然而人们知道如若没有邓先生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今日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可能的。

1996年以后邓先生由于年事太高，不再担任整理项目的负责人，但九十高龄的他仍关注着整理工作的继续进展，得知工作取得新成果，他总是非常欣慰。在我们告诉他为纪念北大百年校庆，图书馆将编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时，他非常高兴，并很愿意为该书作序，因为它是在多年整理基础上辛勤耕耘的结果，是献给母校的最好礼物。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意愿竟因邓先生突然住院、去世而未能实现，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校庆前夕，该书出版了，我们把它献到了邓先生的遗像前，以此表示我们对邓先生的敬意和最好的

纪念。

时光易逝，转眼间邓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半年多了，回首往事，我们深深地怀念邓先生，虽然他已经故去，但是他对学术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执着追求、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他为北大金石拓片整理工作所做的重要贡献永为后人所铭记。

重读敦煌书序 追念恭三先生

荣新江

在我大学毕业接着上研究生的那一年（1982），邓广铭（恭三）先生创建的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了。我虽然不是邓先生的直系弟子，但是，从上学期间到1985年毕业留在中心工作以后，一直受到先生的关怀和教诲。也由于我和邓先生的女儿小南大学同班，又和他的两个弟子同住一间研究生宿舍，所以也就得知许多恭三先生的“故事”，也常常有机会当面向他老人家请教。

邓先生由于长时期处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两大中心——北大和史语所，所以他经历了许多不同寻常的历史，也细致入微地了解许多学者的“故事”。每次去看他，只要你提一个话把儿，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有幸听到过他讲的胡适、傅斯年、周作人、齐白石、钱穆、翦伯赞等人的故事，相对来说，听得最多的，还是陈寅恪先生的往事。我毕业后受先生之命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协助他和其他几位先生编纂《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此书具名“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而实际上是邓先生自始至终地主持其事。我按他的指示联络学者，催促稿件，核对史料，并通校了三遍校样。每当有问题的时候，就去请教先生。文稿之外，少不了谈到陈寅恪先生其人其事其书，从他写出《辛稼轩年谱》后陈寅恪亲造其

门，到他冒着敌机炮火校对传送陈先生《政治史述论稿》校样；从抗战时傅斯年让他代笔写信请二陈（陈寅恪、陈独秀）到李庄来做学问，到解放军围城时胡适命他一定要在北平城中找到陈寅恪一家。虽然年届八十，但许多亲历之事他仍记忆犹新，陈寅恪先生的风趣言谈，娓娓道来，听之使人入迷。而前辈师友间的一些交谈话语，在今天看来，更值得珍视。

自去年夏天邓先生入院以来，几次去看他，他都说要回家修改他的书稿，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再来给我们讲“故事”。然而，当他离开我们的两天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不能再给我们讲下去了。从友谊医院出来，我走了很长一段路，心绪难平。很想就先生当年所述，写篇文章，叙述他和陈寅恪先生的交往。我虽然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个早就有的想法，但当我告诉他96年末我走访史语所时，恰好见到他们正在把邓先生给陈寅恪的信扫描到电脑中永久保存时，他感到无比的欣慰。

然而，当看到历史系和中古史研究中心纪念邓先生文集的约稿信后，我又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而想把邓先生对北大敦煌研究事业的关怀和推动写出来。因为晚年的邓先生，自有文化托命的感觉，一向视公事大于私事。所以，还是先把邓先生作为中心主任，对敦煌研究的贡献写出来吧。

我们中古史研究中心，一共十来个人，邓先生就像一位家长那样关心着每一个人的学习和研究。要照管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虽然年龄各异，却也不难。但要领导这样一个高知识结构的群体，却非易事。中心的人多是77、78年恢复高考以后入学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毕业的，研究范围从汉代的公羊学说进入到清朝的《四库存目》，而重点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史。邓先生专攻宋史，对宋代各个方面均有论说，成绩斐声中外。

他同时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胸怀，这也使得初期的中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邓先生在写于1983年9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序》中，说到新创办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拟从事的工作：“计划中所要致力的课题，一为属于这一时期的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二为外国学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三为古代史籍的整理；四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第三、第四两项工作最先上了马，而最先印行问世的则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我最初是被分配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组”中从事敦煌文书的研究，同时协助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这个组虽非中心的重点，却为初创期的中心编成五本《论集》，这是和邓先生的直接支持分不开的。这个刊物为了减少错误，雇人手抄。自第三辑开始，我参加编辑工作，主要是传送稿件到住在阜成门的抄者家中，然后取回校对。尽管我们费了心力，但仍有错误。而手抄影印的效果很差，阅读不便，给读者特别是海外母语非中文的读者造成很大麻烦。尽管如此，这几本《论集》由于在某种程度上说代表了当时国内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较高水准，受到海内外的广泛重视。一向以写批评性书评而闻名于海外的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先生，撰写书评，加以表彰。由此不难看出当年邓先生在中心草创期就著手办刊并支持它连续出版的学术眼光和魄力。经过十多年的人员变动和兴趣转移，今天看来，中心成员在上述四个方面都多少有些成果，而作为中心集体编纂的著作，则只有这五本《论集》和《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邓先生在《序》中接着说道：“敦煌吐鲁番的遗书和遗物，所涉及的方面均极广泛：历史的，地理的，宗教的，法律的，

政治制度的，社会风习的，学术思想的，语言文字的，文学艺术的，等等。这决非少数专家学者（即使是博学多能的）所能全部精通得了的，因而就有赖于斯道同行们群策群力，各攻一面或几面，以期各自有其突破点，我们则乐于为此类论著提供一个刊布园地。众擎易举，踵事增华，正是我们攻克这一学术阵地的最有效方法。”邓先生的意思，是想以中心的刊物作为一个开放的学术园地，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来对敦煌吐鲁番遗书和遗物，进行研究。从1982年出版的《论集》第一辑，到1990年的第五辑（也是最后一集），刊出包括中心成员及历史系学生、校内各系所、全国其他单位乃至海外学者的多篇论文，其中包括旅法敦煌学者左景权、杭州大学姜亮夫、山东大学王仲荦、中山大学姜伯勤、社科院历史所唐耕耦、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中国佛教协会周绍良、四川大学项楚等著名的敦煌学者的论著，使《论集》成为“文革”以后敦煌学复苏期的代表性刊物。我们编委会基本上按照邓先生定的原则，把《论集》变成一个开放的学术园地，团结了国内外的同行，集合起当时最有份量的一批敦煌文献研究论著，其中也包括本中心周一良、王永兴、宿白、张广达，本系祝总斌、吴宗国，本校季羡林、周祖谟、白化文，以及已故王重民先生的大作，他们的论文都在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对敦煌学有所贡献。

邓先生接着特别谈到敦煌文书的断代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这是他和宿白先生想努力推动的一个具体研究课题。中心成员薄小莹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初步努力，编成《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长春出版社，1990年）一书，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原有纪年的敦煌遗书，不论是文书还是题记，按年代顺序统编起来。此书是敦煌写本断代工作的第一步，提供了据以考订无纪年写本的标本所在。近年来，我们又高兴地看到香港中文

大学饶宗颐教授，正在组织相关学者，在中文大学新亚学院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和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支持下，著手对敦煌吐鲁番文献进行系统的排年工作，包括已有纪年和没有纪年的文献。目前已经出版的有，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和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两部，有关唐五代宋初的文献，也在整理考订编排之中。在国内对这类基础研究工作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我们非常希望饶先生的计划能顺利完成，我本人也拟为此计划贡献绵薄之力，因为这或许可以给倡导这项工作的邓先生以某种慰藉。

邓先生在这篇《序言》中还说到，“专就‘敦煌学’的资料整理和文献研究来说，北京大学是具有较久的传统的”。他举出刘复的《敦煌掇琐》，向达的两次敦煌考察，王重民的敦煌学系列著作，来鼓励后辈，“上述教授所已经开辟的路径，所已经作出的贡献，是我们所必须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的。因为，不在继往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开来的。”他列举北大的敦煌研究传统时，如数家珍，因为邓先生本人对“敦煌学”并非外行。邓先生早年就利用敦煌文书研究过均田制问题。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他的全集，小南让我看一部他成稿于1954年的隋唐史讲义。我惊奇地发现，在讲义最后全文抄录的为数不多的参考文献中，却有罗振玉的《补唐书张议潮传》，表明先生对敦煌资料的重视和充分利用。从言谈话语中我早就感到，邓先生受陈寅恪和傅斯年的影响很大，十分重视新史料，因此在他的研究和教学当中，也就十分关注敦煌资料，力所能及地利用这些新材料，并鼓励相关的同行或学生努力研究。邓先生的《序言》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强调北大具有的敦煌学研究传统，并要我们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今年正值北

京大学百年校庆，在邓先生《序言》的启发下，我写了篇《北京大学与敦煌学》，在校庆期间召开的汉学大会上，我仅就文章的上半（1949年以前）做了发言。事实上，当我把下篇的材料准备好以后，并没有敢动笔写出来，因为北大往年的辉煌，并不能映照今日的校园，邓先生等一代鸿儒带走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学问，而是北大在学林的许多“第一”。今日北大的“敦煌学”研究不容乐观。追念往哲，痛定思痛，微薄小子，岂可闲哉！

1998年6月29日于六院

永远的回响

——纪念邓广铭老人

——沈建中

这几天我一直在听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音乐，那悠远凄婉的旋律，触动着我难以形容的绵长感怀。我忆念起邓广铭老人，眼前情不自禁地出现幻影，未名湖畔，绿树深处，公寓里老人高大的身影似乎依然在书桌前忙碌。

今年春天进京城，那日下午依旧坐在老人书房的沙发上，静静地听小南老师述说邓广铭老人生命最后时光。面对挂在墙上我为老人拍摄的照片，几次想起身致哀，颇有些难为情，正巧小南老师去接待客人，我即起身默默表达我的哀思和敬仰之情。老人英容宛在。“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蓦然间再次注视此像，倘能使这位卓越老人的形象长留人间，或许会给我带来怦然心动的自豪和激动，因为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

往事历历在目，我的“世纪同行”摄影专题即将完成之际，倍感殊遇之恩，更加感激邓广铭老人对我的帮助，这些记忆并不久远。

1995年初春，首次轻轻叩响他的家门，随后坐在书房的沙发上，只听见隔壁小南老师大声地向正在吃饭的老人介绍我。没多时慈眉善目的邓广铭老人走进来，我清晰记得一切都顺畅地进行，至今仍令我感慨不已。走出公寓，我徜徉在未名

湖畔，四周绿树环抱，微风孕育恬静，回味刚才的拍摄和交谈，令我感受到这襟怀坦荡的老人，言谈似乎穿透遥远的历史空间，超越庸凡琐事，虽具渊博丰富的学识，却丝毫没有以长者自恃，而是让我平等自在地拍摄和对话。其间他的外孙女林杉好奇地在门口张望，我邀她与外公合影，从这张照片能见到严谨的老人还有天真的气质，表现亲情的此照成为我的得意之作。这些对立性情能大气地在他身上融和，富有非凡的人格力量，是我心向往之的真正大家风范，决不是流行的所谓“著名大师”。

回沪不久，一天在家翻到《胡适文萃》前页有胡适先生的照片，让我兴奋极了。因为那天老人曾指着贴在他书橱上的此照，问我这是谁，我回答不出，他含笑不语。此神情和语调回忆起来仍是那么美好，数日后我在给老人寄照片时恭敬地作了回答。

为学界文坛耆宿摄影，对于我来说好像艰难地穿过漫长坎坷的隧道，最要紧的是获得信任、肯定，同时能帮助介绍其他被摄老人，这种情形说难很难，说易也是可行的。邓广铭老人大度的性格魅力，使我在初次摄影的一来一往中，惊奇地发现了朝思暮想最为简洁的信任感，于是一次又一次地烦扰。他从不敷衍，于是我不断地得寸进尺。我深知邓广铭老人的名位，也曾有被别人婉拒的经历，无奈摄影采访之迫切，才使我鼓起勇气。

就在那年的初夏，老人应我要求帮助联系两位被摄先生。这是我第二次去北大，因在离他家较远的校门下车，汗涔涔来到朗润园已近10时，老人已请小南老师联系，有一个电话没人接，老人说我来一次不容易，叫我拿他的介绍信直接去，还怕我等急，让小南老师急速代写并亲笔签名。记得我拿着介绍

信临走时，感激地端起未及品尝的龙井一饮而尽，似源泉激发我的勇气，一路上心旷神怡，从而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拍摄阶段。

我在上海工作，去外地实在不易，一切都在节省中进行，对此老人给予我充分理解，常把为我写的介绍信寄来上海。一次给小南老师打电话向老人请教，为了我询问方便，她叫我直接通话，嘱我大声说得慢些，于是老人根据我的提问，象围炉话家常般耐心作答。时常期待此专题早日完成后，有条件就能专程从容地“恣意”讨教，想起曾在书中读到 he 早年在北大刚留校时与罗尔纲先生整理所藏拓片，我极为感兴趣，假如能亲聆老人的指导，那是多么幸运，可是如今已永远错失难得的学习机会，不由感喟遗憾不已。

我要为民族、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摄影，几经周折未能联系到，后来马学良先生陪我去了，期待许久的拍摄完成后，与其家人言谈中，意外发现林老和邓老是亲家。当我向邓广铭老人谈及此事时，他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孩子般的微笑：“早知道你要为林先生拍照，当然可以帮你联系。”此时我享受到老人朴厚、善待晚辈的亲切纯情。他喜欢我拍摄的照片，曾有褒言让我惶恐，也使我开始珍视这些照片。此后每次再访老人，虽然带着相机，却再没有为他拍摄。也许越走近他，就越觉得自己镜头表现的乏力，要选择更适合展现老人性格魅力的形式，却走进复杂的感悟而最终难以把握。

时常一知半解地阅读老人送我的深湛著作，并都经小南老师订正了排印的错字，对还没有能力发现差误的我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尤其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初次得到赠书的情景，老人接过小南老师取来的书准备签名时，先问是否改过错字。我绝对没有资格来谈论和称颂老人恢宏的学术成就，这并非出于客

套，但直觉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可以表述的。读过他字斟句酌的大著，还阅过一些与他观点相异的大作，由此体味出老人率真自然、特立独行的品格，他深邃且沉甸甸的笔下流淌的文字是浩浩荡荡、明明白白并毫不遮掩地直抒胸臆。我虽然没有系统研究老人纵横驰骋于学术界的人生过程，但阅读过关于他的资料，仔细深思，他一生执著地保持着学者的身份，特别是听到他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想回家继续未完成的笔耕，那份蕴藏深厚大气的自信和愉悦恬淡的性情，始终交相辉映，呈现极高的生命境界。

我仿佛觉得老人还健在，因为每次见到他都是那么慈祥爽朗，身健体康，似乎永远不会得病。回想起有次仍坐在这沙发上，凝视老人与我谈话的身影，好象有些背光，那神采更逼真形象地展现出他的性格力量，我猛然想起庄子《逍遥游》里描写鹏的气势磅礴之形象，“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不知何时，令我伤感的电影音乐早已无声无息，而深存脑海的哀思之旋律伴随鹏的翱翔之形象，会永远激越地回响。

1998年7月于谦约斋

不仅是为了纪念

刘浦江

1987年10月8日，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忐忑不安地叩响了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二〇六室的房门。举手之间还犹疑不定，虽说我在北大历史系念书的时候，正好是邓广铭先生做系主任，但恐怕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在我面前敞开的，是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大学毕业后，我一度游离于学术界之外。就在这一天，心中涌动着对学术的向往，莽莽撞撞地敲开了邓先生的家门。老实说，在这之前，不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能够跻身于北京大学的教席，我此行的目的，原本是想请邓先生介绍我去中华书局。没承想，待他仔细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当即决定要把我调到由他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然而校方人事部门对此发出质疑：北京大学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调进这种人合适么？他的回答是：不可以资格取人。据说他还为此找过当时分管人事的副校长。半年后，我相当顺利地进入了北大。

每一想起邓先生，总是心存一份深深的感激，刻骨铭心。可以说是一种知遇之恩吧。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没有高学历，当时也还没有在学术上做出任何成绩，仅仅见过一面，晤

谈了两个小时，就能预卜他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出他的学术潜能。我想说，邓先生确实不愧是一位大师。

但凡学术大师，大抵都有一双法眼。世俗学者知人论事，多半是依据资格轩轻高下，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洞察秋毫。而大师的本事，是在一个人未成气候之前就预知他的未来。当年胡适、傅斯年在邓先生未出茅庐之时就对他期许很高，那就是一种大师的眼光。

后来邓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傅孟真（斯年）先生提携年轻人真是不遗余力！”早年受惠于傅斯年的邓先生，说起这话来很是动情，那神情令我印象颇深。“文革”动乱结束后，中国史学界人材凋零，邓先生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来培养史学新锐，他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完全当得起“不遗余力”四个字。当年他创办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时，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词。前几年，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所作的一篇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后来我应《北京大学学报》之约，为“北京大学人”专栏撰写一篇邓先生的小传，邓先生在看校样时也在文章的后面加上了一段大意如此的话。看得出来，他对此是极为在意的。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正是有了傅斯年、邓广铭先生这样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才代有传人。

我不是邓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来不敢以门生自诩，恐有僭伪之嫌。甚至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都没有勇气站到邓门

弟子的行列中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中，邓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位引路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若是要编“学案”的话，我自认是邓先生的嫡系亲传。在邓先生身边工作整整十年，虽然没有听过他一堂课，但不知怎么的，一来二去，你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我对专业人材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怀疑。

邓先生要求学生素以严格著称。我真正见识到他的严格，还是到中心以后的事情。大约是在88年春天，邓先生让我写一篇题为《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的论文，初稿出来后，经他逐字逐句地审阅一过，稿纸上被圈改得密密麻麻。那时候他写字手已经有点发抖，写来相当吃力，为改这篇文章，不知花了多少工夫呢。想到这里，我非常感动，仔细修改后呈上二稿，不料还是没有通过。这篇文章最后足足让我改了五稿，才终于使他满意。

八十年代后期，人文科学开始陷入困厄，偌大的校园已经难以放下平静的书桌，许多青年学者成天都在忙忙碌碌地爬格子，当然，这与做学问毫不相干。说实话，为了生计，这种事情我也没少干，但我知道邓先生的脾气，所以从不敢向他走露一丝口风。后来我们编纂的一部《二十六史大辞典》请他做顾问，事情终于败露，他知道我参与了此事，从此以后一见面就说我不用心做学问，让我不得不安心来把冷板凳坐稳。今天回想起来，对邓先生又平添了一份感激。

邓先生属于“大师无师”的那一类学者。对他毕生学术事业影响最大的两位前辈学者，一是胡适，一是傅斯年。在他的晚年，书房里总是挂着一帧胡适的遗像。大学最后一年，他选修了一门胡适开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实习的成果是一部《陈龙川传》（此书后于1943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这部

传记作品颇得胡适的赞赏，胡适称“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但同时又说：“辛稼轩是陈亮的好朋友，你这篇传记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写得太少。”这就成为邓先生后来研究辛弃疾的一个重要机缘，而正是以对辛弃疾的研究，初步奠定了邓先生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

1936年，邓先生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留校做文科研究所助教。胡适曾对他说：“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这话让他记了一辈子。

1939年秋，邓先生应北京大学之召，辗转香港、越南到达昆明。这一时期，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巩固邓先生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邓先生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就在他到达昆明之后不久，适逢上海大东书局刊印的《宋会要辑稿》运来后方，给史语所和北大文研所的人以七五折优惠，可这仍然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全部薪水，当时家累较重的他，本不打算买，然而傅斯年却硬是逼着他买了一部。邓先生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次年，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决定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并让邓先生也一同前往，在李庄的两年多时间里，邓先生潜心于宋史研究，后来获得学术界很高评价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都是在李庄写成的。当时史语所拥有一个在后方来说藏书极为丰富的图书馆，抗战期间，这里实在是一方难得的世外桃源。

抗战胜利后，邓先生复员到北大史学系，还替当时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做过一段秘书。自46年秋傅斯年离开北平后，他们就再没见过面。建国初，北大数学系的江泽涵教授由美返国途中绕道台湾探亲，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还托江捎来

一个口信，要把他留在北平的所有藏书转赠给邓先生。近半个世纪后，邓先生重提这段旧事，不禁感喟道：“傅先生对我始终念念不忘！”

不管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史都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然而邓先生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走上了宋史研究的道路，并且成为本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不好理解么？学术重师承，但师承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惯常所见的，即师傅带徒弟式的，师傅手把手地教，徒弟一招一式地学。另一种是心领神会式的，重在参禅悟道。专业导师可以授业，但只有大师才能传道。邓先生与胡适、傅斯年之间的师承关系，就是这后一种。

熟悉邓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在他去世后，北大历史系为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而起草的一份《邓广铭教授生平》，称他为人“刚直不阿”。但在讨论这篇文稿时，他的女儿小南觉得这种千篇一律的悼词套语似乎难以表现邓先生的独特个性，建议改用“耿介”二字，她解释说：“他坚持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对的，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投机。”听到她对邓先生独特个性的独特诠释，在座的人都会心一笑。

邓先生的耿介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比如说他历来主张老老实实做学问，反对各种好大喜功的文化工程、出版工程。前些年，一部名为《文献大成》的大型丛书想请他做主编，被他一口拒绝。不仅如此，就在这部丛书已经得到国家批准并获得财政资助以后，他还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的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表示反对。后来发生的有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论争，可能许多人都还记忆犹新。94年7月间，他在《光明日报》上首先撰文反对这一庞大的出版工程，激起很大反响。因为有一批名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事，其中一些人还

是他多年的好友，所以家人都劝他偃旗息鼓，以免沾惹是非。而他呢，一如既往，决不改弦更张。当年12月，又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一文，重申他的反对意见。可能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和理解，加盟《存目丛书》的那些北大老教授们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与他发生争执。不过由他引起的这场论战，曾一度使得《光明日报》和《读书》杂志硝烟弥漫。后来说起此事，他依旧坚持己见，不改初衷。不管怎么说，这种耿介的特质总是令他显得那么凛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不能不尊重他的人格。

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一如他的个性。他治学以考据见长，以史识出众。他的见识往往别具一格，譬如关于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辨奸论》的作者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实话实说，他的观点并不都是对的，有的时候或许不无偏颇，然而他所研究的问题大抵都能自成一说，这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了。他的治学路子可以归结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是胡适极力倡导的史学方法。不过这话说着容易，做着却难。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是这样几类历史学家，一类是“小处着眼，小处着手”，学问固然很扎实，但器局终究狭隘了些；另一类是“大处着眼，大处着手”，虽然排场，虽然时髦，到底只是花架子而已；再有一类则是“大处着眼，无处着手”，严格说来，这一类是不能真正算作历史学家的。一个历史学家，若能真正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离大师也就相去不远了。

从建国前过来的那一代历史学家，一般来说都经过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史料功底相当深厚。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在邓先生来说，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建国后，由于政治对史学的强暴，实证史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史料被人蔑视，考据遭人嘲笑，历史学家声称要“以论带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邓先生仍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两年以后，“四把钥匙”说就在“双反”运动中被作为资产阶级史学方法遭到了清算，他甚至被剥夺了讲课的资格。而今再回头看看，那些卓有建树的史学大师，哪一个不是得益于实证史学的熏陶？

在北大历史系1997年春节团拜会上，邓先生极其率直地表白了自己的一段心曲：“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这话听起来颇有点自责的味道。这使人联想到他在“文革”中写的那部《王安石》，后来虽经修订，但依然有“儒法斗争”的烙印，以至于他到九十高龄还要再一次改写。

从“文革”中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点这样那样的尴尬。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对他们有一种不近情理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我总觉得，该忏悔的首先不是知识分子；应该诅咒的，是那种逼良为娼的政治环境。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明明是政治家的问题，却要把账算到知识分子头上；政治家总是对的，知识分子总是错的。从来就没有独立地位的中国知识分子，实在说来，能有多少左右大局的力量？

最后一次见到邓先生，是今年的1月7日。元旦前后，就听说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这次去，是向他作最后的告别。当时他已昏迷数日，身上插满大大小小的管子，脸上表情非常痛苦。我真不忍心正视他那枯槁的容颜，默默地站了十分钟就退出来了。

10日晚上八点多钟，小南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我父

亲今天上午过世了……”，电话那头传来啜泣声。过了好半天，她才接下去说：“不管怎样，在他也算是一种解脱。”是的，我想起了竖立在八宝山公墓告别大厅门前一块木牌上写的那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悲哀，对于生者才是悲哀。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邓广铭先生。

1998年3月，写于邓广铭先生九十一周年冥诞之际

邓广铭先生与他的精神世界

——欧阳哲生

1月10日上午九时五十分，邓先生走了。当我与小南一家人匆匆从北大赶到友谊医院时，先生的外孙女正伏在先生身上哭泣着，大家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看着先生安详的面容、紧闭的眼睛，全体在场的人都默默地低下了头。

先生的过世是意料中事。他是去年7月中旬住院的，入院后即作了检查，医生的结论是胰腺癌。获此讯大家就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北大的校园对老人家的病情似乎特别的敏感，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然谁也不忍将这一消息禀告先生。先生是一个自信的人，他一生几乎未得过大病，当然也很少住院。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一直很自信，我们也以为他能跨越百岁。此次住院，他的心全然不在病情上，牵挂的还是未修改完的《英雄人物传》。他第一次手术完后，我去看他，他握着我的手说：“这点小病，惊扰这么多人放下工作来看我，心里过意不去。”他想的还是别人。先生告诉我，医生对他的身体素质评价颇高，说手术是成功的，过一周他就可以出院。他不顾病情未愈，又兴致勃勃地谈及他出院后的修改计划，先生这种执着追求学术的精神，来探视的人无不深深感动。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先生晚年的豪言壮语，他总是风趣地说要发挥余热。河北教育出版社计划推出他的全集，

先生不愿将著作照旧付排，坚持要清除其中的“污染”，改正差错后再出版。不幸的是，除《王安石》一书完稿外，其他三种（岳飞、辛弃疾、陈亮）的修改都成了先生未能了却的遗愿。

我辈生也晚，与先生相见的时间也迟。我与先生的最初接触是在1991年10月下旬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一次“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邓先生是到会者中最长的一位，加之他与胡适先生学生加秘书的特殊历史关系，故他受到与会人员的特别敬重。先生的耳已不聪，听人发言有些困难，但他借助助听器全神贯注地听。讨论激烈时，他有时前倾身子，看得出他是在认真而吃力地听着别人的发言，当时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博士生，此次会议安排我首先作了一个大会发言，面对名家云集的会场，我不免有点紧张，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论。没想到我的发言，竟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面之缘促成了后来我的一次人生转折。一年后，我听说北大、社科院开始设置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我写信向先生求助，希望来北大深造。先生看了我的信和有关材料后，即向系里有关领导推荐。他笑着对周围的人说：哲生是一个“北大迷”，他想进北大的心情和我当年一样。

那年冬天，我登上北上的二次列车，到先生家中去探询有关招收情况。先生处事颇得体，他嘱我去拜访当时的系主任何芳川老师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田余庆先生，接受他们的考察。这一次赴京成为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北大很快决定录取我。这在别人看来是中国历史学博士后的“首班车”，对我来说却是“末班车”。从本科到硕士、博士，我与北大失之交臂，到博士后才进入北大，这中间的引路人是邓先生。而我与邓先生相识的媒介是胡适研究。

在“胡适学”圈子里，有几位公认的元老人物。邓先生、季羨林先生、罗尔纲先生、顾廷龙先生、王子野先生……，他们与胡先生均有密切的历史关系，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学者除了自己撰文写一些回忆性的文字外，还是“胡适学”的监护者和高级鉴赏者。胡适研究在大陆刚刚起步时，颇有不少禁忌，这些老先生的回忆文字常常能意外地起到缓和压力的作用。而当一篇篇、一本本胡适研究著作问世时，他们的几句画龙点睛式的评论，对同行的研究又有引导的作用。每次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每辑胡适研究丛刊的出版，都免不了请这些老先生作顾问。邓先生是胡适研究的热情赞助者，他先后口述了《胡适与北京大学》、《我与胡适之先生》，撰写了《漫谈我与胡适之先生的关系》、《胡著〈说儒〉与郭著〈驳说儒〉平议》等文，为推动新时期的胡适研究真正发挥了余热。

先生是老字辈的学者，其身上闪现着一个富有学养的文化人的魅力。据我的观察，在先生的精神世界中，有三个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一是北大的精神和学术氛围，二是他专治的宋史研究，三是三、四十年代他周围师友的影响。这三个因素分而观之，也许只能了解他的一个侧面；如合而观之，就能使我们深入他的精神世界。

先生是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后他除抗战时期在一家刊物（1942—1943年）和复旦大学（1943—1944年5月）有过四年的工作经历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先生在北大学习、工作达六十余年。在北大百年校史中，有他这样长久经历的人，恐怕是屈指可数，寥若晨星。

早在二十年代，先生还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时，在他老师的引导下，就开始阅读《胡适文存》等读物，成了一个醉心于北大的人。1930年秋，他只身来到北平，开始在北大旁听课

程，同时准备报考北大。翌年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先考入辅仁大学英语系。但先生去辅仁还是为了再考北大，因为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学英语的条件好。1932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改革招考办法，英语占总分的百分之四十，国文占百分之三十，史地占百分之二十，数学占百分之十。此一考试办法的施行，据说是因前一年胡先生在中国公学的得意门生吴晗报考北大，因数学成绩太差未取所致。无论如何，新的招考办法对邓先生是有利的，这一年他如愿以偿地进了北大。

三十年代的北大，在蒋梦麟、胡适、傅斯年诸先生的领导下，克服了各种困难，经过整顿，迎来了它的中兴期。邓先生常说，他的大学四年，从北大教师和图书馆中获益极大。当时北大教员阵容强大，仅历史系的专任、兼任教授中，就有孟森、陈受颐、陈垣、李济、马衡、傅斯年、钱穆、顾颉刚、蒋廷黻等名流学者，他们讲课引经据典，各具千秋。在这些课程中，有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方法导论”，从这一课程中，他听到了终身受用的命题：“史学即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胡适先生的“传记专题实习”，胡先生列出了九个历史人物供学生写作，邓先生选了南宋的陈龙川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胡先生成了他的指导老师。

北大图书馆此时已由红楼搬到松公府，设备先进，藏书丰富，邓先生常常泡在那里阅读中外书刊，1992年他自己撰有《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一文，深情回忆起他在北大图书馆读书的那些历史情景。

北大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受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诸先生的办学思想影响极深，学术空气浓厚，思想自由多元。邓先生对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北大精神、北大传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言谈举止中常常表现出“北大派”的遗风。他本

人治的是中国古代史，晚年出席一些座谈会，发言关注的问题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邓先生的专攻是宋史。确定这一志业时值抗日战争，日寇将侵略矛头指向我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先生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他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希望通过挖掘这些人物的爱国事迹，来激励国人的爱国情操。本来他早年曾经读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喜欢上了传记文学这种体裁，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在北大又得胡先生导其入门，进入传记文学这一领域。他从研究陈亮入手，以后还研究了辛弃疾、岳飞、王安石。其搜集材料之勤，考证疏理之细，真正是空前。他写人物擅于抓住其个性，如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陈亮的“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特立独行气概；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文字生动，笔法传神，故其书拥有广大读者群。他写这些英雄，自己也受他们的人格感染，并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

先生学术成果曾获得大师们的好评。胡适给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陈龙川传》的成绩是95分，称赞“这是一篇可读的新传记”。陈寅恪先生为《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指出“其用力之勤奋，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顾颉刚先生写作《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一书，于宋史研究一条评论道：“邓广铭先生年来取南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取的成就亦极大。……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茅盾读了《稼轩词编年笺注》后，亦称许这是一部“传世之作”。

在邓先生的人生旅程中，与不少名家有过师从关系。1931

年，先生还在辅仁大学念大学一年级时，沈兼士请周作人去该校演讲，先生本是英语系一年级的学生，也跑去聆听，边听边认真记录，到周氏的六次讲座完后，邓先生将他的纪录稿呈给周作人看，周作人校改了一遍，交给出版社，这就成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由来。周作人在书前的“小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使我佩服。”书出后，周氏将稿费700元全部送给了邓先生，邓先生用这笔稿费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邓先生是一个极讲民族情感的人，抗战以后，周作人附逆，邓先生时尚在北平，但他不再去找这位老师。收存在北平的居延汉简被爱国志士运走后，周作人向他查问下落，邓先生冷漠地回答他：不知道。

邓先生终身服膺的是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位恩师。胡先生是邓先生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毕业后，胡先生又将邓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做助教。经胡先生帮助，邓先生的《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胡适回到北大任校长后，邓先生成了他不挂名的秘书，两人相邻而居，常一起出入。邓先生协助胡适编《大公报·文史副刊》，又与胡先生、黎锦熙先生合撰了《齐白石年谱》。四十年代末，物价腾涨，教员生活朝不保夕，胡先生对属下的这位义务秘书颇为体贴，拿出一百美元给邓先生以示关照。胡适虽有各种社会兼职，但毕竟是一个学者，邓先生与胡的关系实也止于学术一层。但胡先生关于传记文学的理念，讲究实证的治学方法，却影响了邓先生一生的学问。

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一代学人（罗家伦语），接触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一股霸气。其学术生涯中最受人称道者并不是他的著述，而是他创办中研院史语所，是他二、三十年代对中国历史学正确而富有成效的领导。邓先生与傅先生有师生之谊，有许多相通之处。两人是山东老乡，身材高大，嗓音宏亮，说话直来直去，绝无遮掩，他们在性情上确为投契。抗战时期，傅先生推荐邓先生去复旦大学工作；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傅先生又拉邓先生回北大工作，帮助他料理校务。人们谈及北大八十年代初期创办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一事时，无人不敬佩邓先生办事的魄力。我心中估摸，当时邓先生一定借鉴了傅先生创办中研院史语所的经验。每次谈毕，起身向先生告别时，先生站立的高大身姿，常常令我想起傅先生的身影。在对待学问、对待学生、讲究气节、民族情感等方面，他们两人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提起陈寅恪先生，邓先生的神情会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抗战时期，他作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有两年时间曾听闻陈先生的高谈阔论，对此先生感叹地说“收获之大真是胜读十年书的”。从陈先生的处事接物方面，他看到了一位真正学者的风范。1948年12月，陈先生离开北平，即是先生找到陈先生，并将之领到胡先生处的。五十年代以后，陈先生在南国未再北上，但却仍有书信、口信予先生。傅先生去世时，陈先生作《读〈霜红龕集·望海诗〉》一诗，以示哀思，先生很快就收到了这首诗，并知为悼傅之作。先生尝喜将陈先生与钱穆先生比较，说两人晚年皆失明，钱先生著书随手写去，不注来由；陈先生写《柳如是别传》，凭记忆所及，字字有据。陈先生对学问的态度、学术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正是本着这种对陈先生的由衷敬仰之情，八十年代邓先生率先发起由北大中

古史中心编辑一册《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邓先生将手头多余的一本送给我，称誉“这是一本传述陈寅恪精神的书”。

几乎与邓先生谈过话的人，都会为他幽默的谈吐所深深吸引。先生善于言词，我以为一半应归于他自己的学养和自我训练，一半大概与胡、傅、陈等先生的影响分不开。尤其是胡先生，其口才与其著作一样，为当时的青年学生所倾倒，邓先生与之有过较长时间的关系，自然领受也深。

邓先生阅历长，涉世深，见的世面多，熟悉的轶事掌故自然也多，被人称为北大校史的“活档案”。我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对象多为邓先生熟知的人物，胡适、傅斯年等还是邓先生与之关系很深的人。加之我入北大的一段情缘，故常登门拜访老人家。我们在一起谈话的主题很自然地是围绕这些人物来展开，先生以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来证实或补充我书面上涉及的一些史事。如蔡元培先生逝世后补选中研院院长的经过，时蒋介石属意顾孟余，而学术界许多人则希望胡适回来。陈寅恪先生的意见是中研院院长一职，不能选一个秘书（指顾孟余）来干。如要文科，则胡适当首选，胡适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举世无双。要选理科，则李四光可选。可见陈氏的择人标准重在学术。

傅斯年与丁文江结交的经过，是邓先生喜言的掌故。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尝与身边人说：他要杀两个人，一个是朱家骅，因为他是蔡元培系统的人，此人太不争气，故该杀；一个是丁文江，因为他是敌对派系——研究系梁启超身边的骨干，此人才华出众，故也该杀。留学归国后，傅与朱成了工作上密切配合的朋友。后来傅斯年在胡适的寓所见到了丁文江，胡适笑着对他说，这就是你要杀的丁文江。事后，傅先生对胡先生

说：你的玩笑开得太大了。后来傅与丁也成了一对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我虽在胡适的《〈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读过，但经先生的现场重演，对傅氏的性情又有了一番更深的体悟。

邓先生与“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毛子水关系不错。三十年代他与傅乐焕、张公量一起协助毛子水编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南下到昆明时，他与毛子水往来最勤，他写的一篇《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其中就有毛先生订补的词句。毛氏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常出入胡先生家，在北大有“胡宅行走”之称。对毛先生的博学，邓先生常喜借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胡适进入北大之初，看到《新潮》上登载的一篇《国故学与科学的精神》，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一打听，作者毛子水竟是数学专业的学生，胡先生感叹地说，北大真是藏龙卧虎之地！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是先生用以自律的箴语。先生性格耿直，爱憎分明。以他的为人，在那些非常的年代里，自然难逃厄运。先生是二三十年代接受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早年读中国传统典籍，受过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又领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封”（封建主义）与“资”（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这些人在解放后接受“再教育”，经过批判、教育，斗争、团结，一个又一个轮回的“运动”，许多人都失去了平衡，或因过于刚硬而弃世，或因阿世曲俗而委身，留下了多少令人扼腕的遗憾。北大是敏感的是非之地，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若如布置给教授们的一道道“作业”。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先生袭来，他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在席卷神州的“文革”风暴中，先生又一次被宣布为“反动权威”，下放到江西

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劳动改造。先生艰难地支撑着，他从自己的宋史研究中寻找精神寄托，从他的“英雄人物传”中吸取精神的力量，倔强中有韧劲，谨慎而机智地避开一场场政治闹剧。今天回味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睿智而又多么不易的抉择！

我见到先生时，他已是八十五高龄的老人了，但老人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锋极健。我常常琢磨老人家长寿的诀窍。一次与先生谈话，见先生兴致甚高，我将话题转到身体保健这一问题上，先生很平淡地说：他并无什么护身之道，饮食、起居正常，爱吃水果，爱喝新茶，每日坚持散步，从不吃所谓“补品”。老人家说的都是体质方面的，其实精神上他的保健之道更值得借鉴：先生富有个性，也很倔强，但他从不心存芥蒂，凡事都能坦然处之。他晚年的心境、性情真正步入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有些人与你相处的时间不管多长，你对他都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有些人却能让你通过与他短暂的交往，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邓先生的魅力来自于他特别的个性，他谈吐的风趣，他断事的机智，他处世的达练。我与先生前后接触不过五六载，对先生所治宋史所知亦浅陋，然回想起亲炙先生的言教和身教的那些美好时光，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梁任公垂暮之年著《辛稼轩年谱》，走笔至“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即驻笔了。这是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稼轩祭朱晦庵文中的几句，先生以为这几句竟成为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梁任公自拟的挽词。他颇喜欢这几句话，在生命弥留之际反覆吟过多遍。最后，我想借这一对联，来祭奠先生的在天之灵。

1998年3月2日至4日于北大蔚秀园

说：你的玩笑开得太大了。后来傅与丁也成了一对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我虽在胡适的《〈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读过，但经先生的现场重演，对傅氏的性情又有了一番更深的体悟。

邓先生与“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毛子水关系不错。三十年代他与傅乐焕、张公量一起协助毛子水编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南下到昆明时，他与毛子水往来最勤，他写的一篇《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其中就有毛先生订补的词句。毛氏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常出入胡先生家，在北大有“胡宅行走”之称。对毛先生的博学，邓先生常喜借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胡适进入北大之初，看到《新潮》上登载的一篇《国故学与科学的精神》，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一打听，作者毛子水竟是数学专业的学生，胡先生感叹地说，北大真是藏龙卧虎之地！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是先生用以自律的箴语。先生性格耿直，爱憎分明。以他的为人，在那些非常的年代里，自然难逃厄运。先生是二三十年代接受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早年读中国传统典籍，受过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又领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封”（封建主义）与“资”（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这些人在解放后接受“再教育”，经过批判、教育，斗争、团结，一个又一个轮回的“运动”，许多人都失去了平衡，或因过于刚硬而弃世，或因阿世曲俗而委身，留下了多少令人扼腕的遗憾。北大是敏感的是非之地，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若如布置给教授们的一道道“作业”。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先生袭来，他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在席卷神州的“文革”风暴中，先生又一次被宣布为“反动权威”，下放到江西

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劳动改造。先生艰难地支撑着，他从自己的宋史研究中寻找精神寄托，从他的“英雄人物传”中吸取精神的力量，倔强中有韧劲，谨慎而机智地避开一场场政治闹剧。今天回味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睿智而又多么不易的抉择！

我见到先生时，他已是八十五高龄的老人了，但老人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锋极健。我常常琢磨老人家长寿的诀窍。一次与先生谈话，见先生兴致甚高，我将话题转到身体保健这一问题上，先生很平淡地说：他并无什么护身之道，饮食、起居正常，爱吃水果，爱喝新茶，每日坚持散步，从不吃所谓“补品”。老人家说的都是体质方面的，其实精神上他的保健之道更值得借鉴：先生富有个性，也很倔强，但他从不心存芥蒂，凡事都能坦然处之。他晚年的心境、性情真正步入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有些人与你相处的时间不管多长，你对他都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有些人却能让你通过与他短暂的交往，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邓先生的魅力来自于他特别的个性，他谈吐的风趣，他断事的机智，他处世的达练。我与先生前后接触不过五六载，对先生所治宋史所知亦浅陋，然回想起亲炙先生的言教和身教的那些美好时光，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梁任公垂暮之年著《辛稼轩年谱》，走笔至“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即驻笔了。这是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稼轩祭朱晦庵文中的几句，先生以为这几句竟成为梁任公的绝笔，实际上也就等于梁任公自拟的挽词。他颇喜欢这几句话，在生命弥留之际反覆吟过多遍。最后，我想借这一对联，来祭奠先生的在天之灵。

1998年3月2日至4日于北大蔚秀园

求实求是 学者风范

——刘玉才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邓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半年多了。但在内心总不愿接受这一现实，似乎邓先生仍会和往常一样，在某个下午，走出朗润园，绕道未名湖，漫步到历史系办公室，然后转到我们办公室，坐下同大家闲谈；闲谈过后，先生站起身，我还能扶着他越过门槛，步下台阶，目送他高大的背影远去。余生也晚，未能在课堂上聆听先生的教诲，但是机缘凑巧，大学毕业后在先生担任副主任的高校古籍委员会工作，也就有了许许多多当面请益的机会。先生以治学严谨享誉学界，在学术问题上实事求是，不讳饰，不敷衍，敢于正面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让某些人很难堪，也不放弃。但是先生为人却极其宽厚，总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特别是对待后学，往往勉励有加。在与先生接触的十多年中，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都学到了许许多多受益终生的东西。

日前，钤有先生名章的新著《王安石》摆在了我的案头，这是先生的女公子邓小南教授赠送的。睹物思人，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我特别记起了92年初夏对先生进行的访谈，当时的话题就是《王安石》的修订。先生坦诚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他求实求是的学者风范，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邓先生说，我在解放初期曾写过一本《王安石》，是四万

字的小册子，由三联书店出版。我在这本书里一开始就是谈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特点，也就是这一点，因为王安石历来遭受攻击最多的就是这“三不足”，在他进行变法的时候就是如此。

1972年田中访华，毛主席跟他会谈，说他这次访华颇有点象我们历史上的一位宰相——王安石。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有“三不足”精神。现在天变不足畏，大概不成问题，科技发展到今天，没有人再把天变与政事联系到一起。但是祖宗不足法，你的前几任首相都是反华的，你来访华，想使两国邦交正常化，这表明你也是认为祖宗不足法。毛主席还说，估计美帝苏修都不主张你来访华，而你不管这些，这就是人言不足恤。

毛主席谈话的记录传出后，人民出版社马上派人来组稿。他们跟我商量，叫我把原来写的《王安石》扩大，而且专扩大前一部分，即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后一部分就不用动了，争取1972年内出版，这样好销。我说不行，要改不能只扩充前一部分，后一部分也得改。因为那是1951年写的，现在是1972年，20年过去了，我不能白吃了20年饭，白接受了党的教育，没点进步。于是他们也就同意我通体修改。

1973年秋冬之际，我完成交稿。人民出版社打印了一个讨论稿，拿到北大历史系、师大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去讨论，共同的一个意见是反映“儒法斗争”不够，需要修改。关于儒法斗争，我说王安石法家思想是占了相当一部分，但他是以儒家面貌出现的，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反儒，这个道理讲不通。我只认为王安石是援法入儒，不认为他是反儒的法家。但是当时的大气候，要讲王安石反司马光，是代表了法家反对儒家。

这怎么可能呢？但是我写了，就照讨论时收集到的意见写了，因为你不这样改，就不能出版。

我改了之后，又来了第二次高潮，“批林批孔”。当时《王安石》书稿已经到了三校，出版社又提出说对“批林批孔”没有反映。我说王安石从没有批过孔子，跟林彪更没有发生什么关系。林彪没有批判或拥护过王安石，甚至有没有读过王安石的东西都很难说。本来“批林批孔”就是八股文所谓的截搭题，硬凑在一起的，现在叫王安石也批林批孔，太困难了。我说这很难写。他们就寄来了《文汇报》的一篇社论，是关于批林批孔与学术研究之类的题目，叫我照着写一段，作为全书的总结部分，增加一点时代气息。我就干脆选了《文汇报》的一段，一字不差地抄进去了。这样来回折腾，直到1975年书才出版。

我回忆这件事，就是因为当时的气氛下，大家都象喝了迷魂汤，甚至有人对我说，你是研究辛稼轩的，辛稼轩当然是法家了，你怎么不写篇文章表扬一下辛稼轩。我是为了要免得被划入黑作家之列，就顺从大气候写了这部《王安石》。但书内有些材料还是值得用的，所以“四人帮”垮了之后，人民出版社还照印，只是取消了有关批林批孔的一段，当然贯穿全书的还是儒法斗争的气势。1982年重排第三版，但那时的改动仍是小改动。第三版比第一、二版稍好一些，但是还有许多“文革”、“儒法斗争”时的习惯用语保留着，例如说司马光是顽固派的头子等等。我现在已经八十五岁，我自己搞出来的精神污染，贻害读者。我虽然没有被列入风派人物，可是跟着当时的歪风邪气走了。我现在仍在打算，要写出一本符合其本来面目的王安石传记，也勉强可说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添上一砖半瓦。因为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不论作为政治家、学

者、文学家，都是有很高地位的。因此我很想重新写本王安石传，但愿在我的有生之年，能使这一愿望成为现实。

那一年，邓先生是85岁。他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了对《王安石》的修改，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去年冬天，邓先生病重住院，我和同事前去探望。先生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乐观，在病榻上畅谈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旧著修订工作，希望早日回到自己的书桌旁。先生还让我们不要再来看他，说出院后来看我们。虽然医生认为先生的病情不容乐观，但我还是希望苍天有眼，再假年于先生，让他完成那许多未竟的事业，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但无情的事实是，先生没能再走出医院，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冬日里的告别

——追忆邓广铭教授

祝晓风

1月17日的北京很冷。寒风挟着肃杀之气敲打着我的面庞，冷痛之感驱走了梦意。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九点一刻，人已经来了不少。我按着指点放好花圈，然后，不由得怯怯地回望了一眼，老人静卧在鲜花松柏之中，像一座山。

去年秋天，邓广铭先生在友谊医院住院，我去探望时他还记得两年前我曾去北大拜访过。可是他躺在病床上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心头震颤，他说：“上次见面是在家里，这次是在医院，下次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人间。”此言果成谶语。短短三个月，邓先生与我们就阴阳两界了。老人当时平躺，头略向右侧，伸着手清清楚楚地说的那句话，那姿势那眼神，我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

1995年3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去北大拜访了邓先生。当时我刚刚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红娟写的邓先生的“人物故事”，叫做“严楔其学，苍柏其人”。此前，更因为在《光明日报》上读到过邓先生关于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文章，而对邓先生极怀景仰之情。那天老先生谈兴极好，从下午四点一直聊到八九点钟，中间老先生用餐，我自己去楼下的小餐馆糊弄点儿吃的。老人爱怀旧，所以那天谈的也多是三四十年的旧事，包括他与周作人的交往，还有胡适任北大校

长时处理学生运动的态度，当然也不免又谈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事情。但不论往事时事，邓先生都谈得清楚明确，并无暧昧之语。那天我手头没有带录音机和笔记本，只好在一份《中华读书报》上猛记。那天还有一大收获，是得了一本邓先生签名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两个月后，我给邓先生送去一本刚出的《读书》杂志，又长谈了一次。

去年那次，邓先生在病榻上也送我一本书，是最新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老先生起坐很不方便。支好小桌子、摆好书之后，老人握着笔又写不成字，因为手抖得厉害，他女儿握着他的手也不行。他写得那么吃力，像个刚会写字的儿童。中间停下来歇一歇的时候，他抬起头望着我们笑笑，十来个字足足写了一刻钟，而且笔画弯曲，字不成形。托我带给另一位教授的书，干脆由我代笔写好题词，邓先生只签个名。那天是10月9日，星斯四。那天，我亲眼看到一位九十高龄的学者从容地、极慢而又极快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当年，邓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发表，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云：“《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更何论探索其根据，比较其同异，藉为改创之资乎？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是其神思之缜密，志趣之果毅，逾越等伦（指此《考正》）。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时隔半个多世纪的现在，我们却正在告别。

在这本《邓广铭治史丛稿》的自序中，邓先生引述章学诚

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追求，即所作撰述，力求“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绝不“奄然媚世为乡愿”。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以及《〈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等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邓先生不苟且，不暧昧的学术品格，对历史负责的学术精神，以及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大家风范。也正如邓先生所言，他即使是写通常被看做酬世之作的序文，也不敷衍塞责，而是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严肃认真地对待。现在，既有“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又有学术良知如邓先生者大概越来越少了。这样一批各学科领域的开创者和顶尖人物的渐次退场，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种有形的损失，还更象征着一种精神的告别。这不能不使后辈学人的内心感到空虚。

当我们鞠躬向一位九十高龄的学者告别的时候，他也带着某种也许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具备的东西在向我们告别。从此以后，有些问题必须我们自己解决了。

深切的怀念

一、历历往事

邓可因

爸爸走了。以九十一岁年龄而辞世，称得上是高寿。但我们一直盼望着他能活到百岁，能成为真正的世纪老人。无奈天不遂人愿，留下了无尽的哀思和遗憾。

悠悠岁月，历历往事，不断在眼前闪现。以下所记，是几个侧面。

开明的家长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爸爸在家庭教育方面就是个“开明派”。在读书学习、兴趣爱好上，他对孩子不是生硬刻板的指令和干涉，而是生动细致的启发和引导。家里的气氛是民主的。晚辈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爸爸虽然会对其中错误的或与他相左的看法、做法进行批评，有时甚至给以讥讽，但从不会施以高压。我仿佛没有感觉过和他之间有“代沟”。我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初中时，回家谈起学校的一些老师和要好的同学，爸爸都很感兴趣，以至直到他的老年，还能

说出其中一些人的姓名和故事。

爸爸注意培养我们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他带我看京戏，让我集邮，教我读古典诗词，看中国名著和外国童话……我至今仍保存着他用毛笔书写的一组唐诗，第一首就是贺知章的七绝《回乡偶书》，那是1943年我们随妈妈从北京逃难到重庆和爸爸团聚后，他写了让我背诵的。当时我们全家远离故乡（山东、北京），是多么盼望回乡的一天啊！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由重庆回到北京。那段时间，跟随爸爸到东安市场逛旧书摊成了我的一大乐事。许多我所喜爱的书，如中译本《邓肯自传》、《道连格雷画像》、英文版《飘》、《小妇人》、《好妻子》等，都是在那里买的。当时在中学生中流传徐訏的《鬼恋》、《风萧萧》等书，爸爸不赞成我们看，说徐的作品“低级趣味”，但我还是看了，他也并不干涉。自然，我看后也觉得书的品位不高，这也是由于受了爸爸的影响吧。

我读高中时，爸爸和胡适、黎锦熙合编了《齐白石年谱》。初稿出来后，爸爸让我用毛笔誊抄。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一方面是让我练习毛笔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习前辈学者作学问的功夫。其间，为了了解、核实一些情况，爸爸于1948年9月26日带我到跨车胡同去拜访齐白石老先生，还带有胡适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我是帮助抄写白石年谱的，“想来瞻仰老先生的丰采……”。齐白石那年已88岁，仍精神抖擞。他同爸爸晤谈一阵以后，说：“怎样酬谢小姐呢？”经他的护士建议，他当场提笔画了一幅凤仙花，并题了款送给我；还找出一幅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题了款送给爸爸。在此之前，齐白石曾托爸爸从四川带回冬虫夏草，并以“冠上加冠”等画作为答谢。“文革”中，历史系一吴姓学生带人来抄家，上述等五幅画都被抄走。“文革”后，爸爸多方找寻，也未能找回。几

幅极有意义的名画被抢走而不得复归，成为爸爸晚年心头的一大隐痛。

幽默的性格

爸爸性格爽朗，幽默风趣。记得我和可蕴小时，爸爸常和我们嬉戏一堂，家里充满欢声笑语。直到八十多岁高龄，他还和小南的女儿杉杉一起高声背诵儿歌“唐僧取经咚那个咚，后面跟着孙悟空……”，到老仍不失“童心”。他天性幽默，涉事成趣，提起一个话头，就能引出他的一个以至一串逸闻、笑话和掌故。

1983年底，他准备与人合作写一篇学术争鸣文章，但想到在当时情况下，写这篇文章有可能要挨批判，于是给我们讲了一段往事，说他上小学时，习字老师叫凤玉书，是县长的亲戚，因他个子矮，学生给他起了外号。一次习字课上，本该临摹字帖，爸爸却信手写着老师的外号，说此人“以凡鸟为姓，以麟吐者为名，头戴瓜皮帽，足登自造斋布鞋……”（“凡鸟”即“凤”，“麟吐者”用“麟吐玉书”的典，“自造斋”指家里自制的鞋）。邻座的一位同学也完全照抄下来。凤老师看了很生气，向校长告了状。第二天，校长拿着白木棍教鞭走进教室，把他们二人打了一顿，还说要县长那里去告状。后来他俩向老师陪了不是，事情才算完。

这是爸爸小时候耍的一次幽默、恶作剧。到了老年，他又忆起这个笑话，是为了提醒合作者：即使对方比当年那位校长职位更高，举的棍子更粗，也不要怕。当然，后来形势变化，棍子并没有打下来，但爸爸童年时期的这段小幽默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1990年我赴美国探望女儿小航时，认识了一位美国青年查理，他学过华语，对中国很感兴趣。一次，他说想找一本最值得读的中国人写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的书，问我该读什么？回国后，我向爸爸说起此事，我说：“查理真会给我出难题。最后我向他推荐了胡适的《中国思想史》。”爸爸听后，不紧不慢地说：“你也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胡适从来没有写过这么一本书。”爸爸没笑，我可止不住笑了，笑爸爸的冷面幽默，笑自己的强不知以为知，以致误导了查理。再看爸爸，他依然没笑，只是告诉我，胡适写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只出了上卷。

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又是冷面幽默，这就是爸爸。

俭朴的生活

爸爸的日常生活是很俭朴的。衣着只求整洁，不追时髦；生活很有规律，特别是到了老年，何时出去散步；何时坐在沙发上打个盹，何时看书报，何时写文章，都像时钟般准确；饮食注意营养搭配，但不追求美味佳肴，对保姆做的饭菜，即使味道欠佳，他也没有什么挑拣，好像他从每天孜孜矻矻的治学中已吸取了足够的养分和滋味，对饮食就无所苛求了。

1997年春，爸爸让保姆小陈把他裂了口的棉鞋拿出去修，小陈说：你一个大教授，鞋破了买双新的嘛，还值得送去修？爸爸笑了，又对我们说了下面的故事：

“我是穷苦人出身，小时在农村，穿的鞋都是家里给做的，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买鞋穿，羡慕得很。上小学时，见有个同学（他爸爸在县里任职）穿着缎面鞋，更是羡慕。我的鞋和他的鞋相比，差了好几个层次呢。秋天到地里看坡（看庄稼），每

逢周末，看到在县城住校的高小学生路过村头回家，那叫看洋学生走过，算是一景呢。后来我也到县城读高小，在班上功课最好，总是考第一。那位穿缎面鞋的同学见我功课好，非要同我拜把兄弟不可……”。高小毕业后，同学们都以报考济南的中学或师范为荣，但全县只有爸爸一人考取了。

听了爸爸的故事，我们从中悟出点道理：爸爸这一辈子的脚印是怎么走过来的？素食布衣，不改其乐。一步步在学术道路上攀登，才是他终生的追求。

执著的治学

爸爸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他的治学精神。他提倡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地作学问，反对那种浮躁、取巧的学风。一位中年研究工作者请爸爸为他写一条幅，爸爸选了《孟子》中的一段话：“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这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个条幅（小斗方），写于1996年元旦的深夜，因为他说手的颤抖在夜间要轻一些。他希望研究工作者都能下苦功夫以求得真正的学问、高深的造诣。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爸爸穷毕生之力，研究宋史。他选择了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作为研究对象，为他们立传、钩沉、辨诬，对他们作出正确公允的评价，真可谓千年知己，一生追求。我觉得这些历史人物身上那为国为民、矢志改革、忠贞不渝等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也正辉映着爸爸的精神境界。

爸爸致力于治史，同时他也喜爱并涉足于文学园地。1933年他初入北京大学，就同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

学生王余侗合办了一个三十二开、铅印、每期十五页码的文学刊物《牧野》(旬刊),是公开发行的。第一期发表的由爸爸执笔的“题辞”,表明了这三位青年办刊的宗旨:“……雄伟的企图是没有的,浮夸的标榜也相戒弗为。所具有的决心,只想诚恳地从事于各个能做的工作,将各人在这人生的途程中所体验到感受到的一切,真诚地表曝出来,无论是社会的一角的解剖,是自身的衷情的诉说,是被噬时的绝叫或反噬时的怒吼,都按时汇集起来,呈供大家……。”爸爸在《牧野》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散文、译文、书评等作品,形式多样,文采斐然;被称为“汉园三诗人”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也发表了多篇诗作。刊物只出了十二期,但它留下了爸爸在文学道路上的足迹。

关于文、史的结合,我还想起一次难忘的午餐和一项未能实现的倡议。那是在六十年代初,爸爸听说翦老(伯赞)爱听张君秋的歌,而爸爸的一位老友同张有深交,于是由爸爸和这位老友牵线,在四川饭店设宴,介绍翦老夫妇和张君秋见面。我和妈妈、小南也去了。记得席上翦老力促张君秋演一演李清照。张说:若是翦老能写剧本,我一定演。爸爸也说,若真地一位肯写,一位肯演,将是文坛佳话。此事说说也就作罢了,翦老并没有像吴晗写《海瑞罢官》那样“破门而出”,否则又不知“文革”中会被扣上什么罪名呢。

近些年,爸爸以八、九十岁高龄,依然孜孜不倦,埋头伏案,拿着放大镜查书,用颤抖的手写字,经常笔耕到深夜。朗润园的灯光照耀着他笔下的铁马金戈、贤相能臣。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奋力写出了二十余万字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成为他人人生旅途终点的浓墨重彩。在将稿件交付出版社之后的一个傍晚,我陪他在北大校园内散步,他带着收获后的

喜悦说,对于能在如此高龄写出这部著作,“我很引以自豪”。我问他,与过去所写的“王安石”相比,这个版本作了多大修改?他说:不在于修改了多少,而在于格调不同了,对王安石又有了新的认识。有些地方也怕是太捧他了,但实际上并不是捧他,而是恢复了他的真面目。……我也对他戏言:王安石决想不到在近千年后,能得到你这样一位知音。

夕阳映射出老人硕大的身影。他把一生献给了治学和授业。

二、爸爸说:“真文人者实不相轻。”

邓可蕴

到现在我也不觉得爸爸走了。我仍时常下意识地将零钱按伍角一份份地放好,以便乘15路汽车去友谊医院陪爸爸。我女儿戴林也多次像过去一样,与她姥爷谈天说地,因为姥爷是她最景仰的又是最亲的亲人,醒来知是梦中事,于是大哭不止……。真的不能接受他是走了。

这篇短文,我只想记叙几件具体的事情。

“唯独请夏承焘先生题写书名才是”

1976年初秋,爸爸要我去看望夏承焘先生,并嘱咐我“见了夏先生要叫爷爷。他有大恩于我。抗日初期我从北平经河内去昆明找西南联大,特意到杭州去拜见他。那时夏承焘先生早已是全国有名的大牌教授,研究稼轩词多年。我带着自己在北大搞的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的材料,到杭州大学向他请教。我是小字辈,后学,刚刚开始两年。谁知他看了我

的材料，不仅称赞有加，而且竟将他自己搞了多年的研究（稼轩词的）材料，悉数交给了我！还说，有了你邓广铭研究稼轩词，我就可以不往下做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我上高中时，爸爸曾数次执着地说：“若出版我的稼轩词笺注，必须找、只能找夏承焘先生题写书名”。

我到北京朝阳门内路北一栋“简易楼”内，找到了夏先生和夫人吴闻女士，我刚说“夏爷爷您好……”，不料立即被老先生止住，夏先生说：“我长你爸爸九岁，只能兄弟相称，兄弟相称，叫我伯伯就行了”。临别时，他将写好的一首“玉楼春”和一首“调寄虞美人”让我带回给爸爸。这两首词，真是两位大文人磊落交情的写照，可感可泣。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玉楼春

中年避寇东遵海
送子西行歌敌忾
一编通袖稼轩词
磊落交情三十载

灯窗山妇兴遥慨
陈吕精魂风百代
待浮单舸向双江
共挈双筇临泰岱

一九七五年携家游京华 恭三先生枉顾回忆朗润园执别
匆匆十年顷偕吴闻答诣 吴闻忆去岁读尊著陈龙川传有感
于龙川东莱友谊为之制涕归途作玉楼春小词奉报 因忆与
恭三先生曩因商度稼轩词缔交迄今三十年矣

调寄虞美人

听秋客岁鹅湖寺，诗在风声里。今秋一路永康山，为
有水心同甫便忘还。

早年口熟天笺语，衰白惭章句。五峰云气走崔嵬，犹
有排闾余愤作风雷。

永康访陈龙川遗迹

夏承焘写上阙

吴闻写下阙

“张政烺真有才学”

1945年夏，我家住在重庆北碚镇上，我刚刚考完高小（五年级），有一天爸爸叫我过江（嘉陵江）到夏坝的复旦大学去领他的工资，嘱我看明白工资单上是不是发给邓广铭教授的，因为复旦的校长章益先生已告之爸爸自该月起定为教授了。爸爸在复旦讲授“中国通史”，由于教课效果好，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把教室换到大教室，最后换到学校的礼堂上课（1992年我出差去北碚，又特意过江看了复旦大学旧址以及已改做仓库用的旧礼堂），当时的系主任周谷城先生、校长章益先生对他很看重，在他去复旦任教两年后就提为教授了。

但到我上大学时，又知道爸爸在北京大学是1950年当的教授，我问这个中缘故，原来有一大段故事，直到90年代他还在向我们回忆这些事。

抗日胜利后，胡适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他未回国前，由傅斯年先生代理校长之职。1946年4月，傅先生要我爸

离开复旦回北大，帮他处理北大迁校诸事，但同时又坦诚地说：“你的同届同学在北平未到昆明西南联大的，现多为讲师，出国的回来也只是副教授，你在复旦当了教授，回到北大可不见得能当教授，还是做副教授吧。”爸爸认为能回北大是他的衷心所求，不在意正教授、副教授，当即辞别夏坝北上了。

在爸爸北返之前，傅先生已指派张政烺先生返回北平，意在及时为北大收购善本书。张先生是爸爸的同班同学，精于版本学，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即主管此业。当时傅先生也告诉张政烺先生回到北大做副教授。

胡适先生从美国回到北平后，看到北平的旧书店为求生存，竟然将旧书甩卖去做造纸原料，很是焦急，迅即向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要了一笔专款（抗日后国民党政府拟由胡适、傅斯年两位之一做教育部长，这两位均坚辞不允，便举荐了王世杰），用于在北平买善本书，以及时抢救中国的古代文化，并集中了毛子水（当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政烺等人去办。早在30年代，胡适先生讲课时曾说“《封神榜》的作者至今不知何许人”，张当时是历史系的学生，给胡写了一封信，“我可以考证出来谁是《封神榜》的作者”，并真的做到了。对此，胡先生甚为赞扬，对张的才学十分爱惜。所以，当张政烺先生将以教授衔受聘于清华大学时，胡适校长在北大校务会上说：“北京大学怎么可以没有张政烺呢，他是北大的教授。”

爸爸说：“于是我和周祖谟两人是副教授，余逊和张政烺是教授。余逊是我的学长，大我四岁，张政烺虽年幼于我，但他真有才学，别人比不了。”

去年在住院时，爸爸听王曾瑜先生说张先生身体不好，正在交涉住协和医院，爸爸叫我去张先生家看望，并且让我向张先生提起考证《封神榜》作者的往事，“相信他还记得的”。果

然，张叔叔听到我讲这些时，也会心地微笑了。

爸爸临终前拜托给季（羨林）先生的事……

1984年我从研究单位调入农业部工作，后又特聘为农村能源和农业环保两个学科的高级职称评审组的组长。我曾多次向爸爸谈到我们这行当基层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苦恼与无奈，谈到评职称全过程中，那些无意的和有意的对知识分子的伤害……，爸爸却总是重复着一个观点：要公正，要让真正有学问的人上来，要为他们能上得来而去力争。

爸爸在作为北大校级评委的年月里，他不在乎别人讲他“不识时务”，“太霸道”等等，他“顽固地”不赞同死板地按等级按年头排队，而把本已被“文革”耽误的人再耽误下去；他不赞同死抠名额限制，而将“限额外”的真正有学问的人摒置在外。他很庆幸当时的领导听进了这些意见，承受住了各方的压力，采纳了这些意见，爸爸说他们是尊重知识尊重有学问的人的那种领导。

去年12月，爸爸在友谊医院里听说学校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马上想到了一些人又将因为年轻、资历不够等等，而被忽略了他们在学科上已达到的水平，进而延误了晋升。于是，他叫我给季（羨林）先生打电话，代表他说：“请你像当年汤（用彤）先生擢识季羨林那样，去支持帮助这些年轻的学者”，“现在我躺在医院里，什么也干不成，以后要靠你（季）啊！”他看我有点发懵，就解释说，1946年季先生留学德国十年回来，经陈寅恪先生介绍到了北大，时年三十五岁，未及不惑，又不是北大毕业，但汤用彤先生睿智果断，不顾陈规戒律，力主聘其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多年

来，爸爸甚是感佩汤先生识人用人之气概。

第二天早上我到病房后，爸爸第一句话就问“打了电话没有，季先生说了些什么”，我凑到爸爸的耳边，告诉他电话打过了，季先生说请你放心，他会尽力去做，希望你早日康复。爸爸听了点点头，不再说话，闭上眼睛又在想什么，但我看到爸爸的眼角上流出了眼泪。

这就是爸爸在他走前，向他五十余载风雨共济的老友刻骨铭心的嘱托。

三、父亲最后的日子

邓小南

写下这个题目，心底再一次抽紧，平时总在憋忍着的眼泪，禁不住一下子涌了上来。

这半年来，我一直不敢想，一直不敢信，父亲真的远离我们而去了。家中他的书房、他的卧室，还是他熟悉的那些陈设；厚重的书柜中、宽大的书桌上，他常翻的书、常用的笔，也都一一照原样摆放，生怕他会临时因为找不到什么而着急。

寒冷而漫长的严冬早已过去，睡梦中，我却还是时时惊醒，问自己今天怎么还没到医院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学校里有的老先生因病住进了友谊医院，师友们前往探望，我却不肯去，不敢踏入那以往曾经带着既焦虑又期盼的心情迈入的电梯，不敢经过那曾经如此熟悉的八区十号病房。

我也曾问自己对于这种情感是否不应放任，师长亲友也时常劝我说父亲走得尊严安详。可我知道，大家曾经有多少话想向他说而终于不敢；我更知道，他离开他作了一辈子的学问撒手而去是多么不甘心。

长期以来，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对于他执著于学术的顽强精神、他特立独行的处事原则，应该说体悟较深；但真正加深对于他的理解，还是在他患病住院的这半年中。

父亲住进医院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家人、师友怕我着急，起初曾把消息瞒了下来。我得知音讯匆匆归国时，父亲已经动过了手术。那个又湿又闷的晚上，我带着女儿从机场赶往医院，在姐夫的陪伴下直奔病房。父亲看到我们，高兴之余似乎有点意外，第一句话是：“呦，回来啦！”随即又略带嗔怪地说：“本来没什么大毛病，你用不着提前回来。”看着父亲显得清瘦的面孔，面对他一如往日平静自若的神情，我提醒自己应该放松，安慰自己也许情形不像估计的那么严重；可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自己沿着喉咙吞咽下去的泪水，感觉到胸中搅动灼痛的强烈不安。

8月中，父亲短暂出院之后，又因为发烧再度入院。在家的那几天里，他曾经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制定了恢复工作的时间表：从阅读报刊开始，逐步半日工作，争取两周后步行锻炼；他急切地叮嘱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同志准备协助他修改《岳飞传》……以他的九十高龄，有如此众多的事情亟需着手，他在医院中格外焦躁，向主管医生、向校系领导、也向我们一次次提出出院的要求。

9月6日，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采取了紧急措置，一方面供氧、输液，一方面引流，右臂和鼻腔都插上了塑胶管子。即便如此，父亲的精神也没有垮。次日，他的老友、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及夫人来医院探望，起卧已经相当不便的父亲，以颤抖不已的手紧紧地握住笔，挣扎着在《邓广铭治史丛稿》的扉页签上名字，赠给德毅先生留作纪念。在其后的日子里，还有几次，父亲也是不顾我们的劝阻，为赠给其他几位

先生的著作亲笔签了名。有时，为了字能成形，他让我捏着他的手写。我感觉到他的手抖动得多么厉害。每次签名之后，他总是怀有歉意地说：“手抖，写得不好。”每逢此刻，我总要悄悄地背过身去，怕父亲看出我忍不住溢出的泪。

9月13日那天，父亲的病势稍趋缓和，听到前来看望的阎步克教授称赞他“精神挺好”，他回答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了。”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他不曾有一刻停止对于学术事业的追求。在他病情危重的时候，医生曾经既钦敬又心痛地抱怨说：“他插着管子还看书！来了人，还跟人谈学问！”在病床上，父亲为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文章，数次托人从医院中带出字条，条上的字迹扭曲叠压，令人读之心酸；他准备再度考辨陈亮文集的版本源流问题，反复思索着剖析问题的路径，打算与沈乃文君合写一篇寻踪溯源的文章；他考虑重写宋代几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斟酌着章节次第，甚至逐一排出了工作日程……

父亲人被“困”在医院，魂牵梦系的却是他在家中的书房。他告诉我，在他似睡非睡、神情恍惚之际，曾看见他那堆积盈室、无处不在的书。有次见他精神还好，又急于工作，我提出找一台便携式电脑，在病房中帮他写些小文章。父亲却露出不快的神色，责备我说：“你想到哪儿去了！离开我的书房，离开我的书，怎么能工作呢！”面对一心想着回到书房中去工作的父亲，我一时语塞。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校样，父亲坚持要看。起初他情况还好，《序言》部分，我先读一遍，他再读一遍。后来，他面部插了氧气管、引流管，手臂上在输液，仍然不听劝告，执意要我给他戴上花镜、拿着放大镜，把校样举到他的面前。此时此刻，我深深地体悟到支撑着父亲的那股精神力量，更加

理解了父亲对于大事、小事那种近乎执拗的认真。

对于身后之事，父亲几乎没有提及。但在他很少能再工作的最后时光中，他认真地回顾过自己的一生。9月25日那天，静静的病房中只有我和父亲两人。他对我讲了长长的一段话，沉缓的语调中，流露出他的思考、他的信念。那神情、那话语，令人刻骨铭心。

父亲说：“我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不愿意留下什么遗憾——自己的遗憾、对别人的遗憾和留给社会上的遗憾。”

他说：“我这些年做的事情就是要端正学风。学术都是不断发展的，我的认识也在进步。……我这个人，既非才子也非庸人，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人。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这几十年来，我在学术上没有停顿，一是因为有大师指导；二是因为一直处在学术中心；三是因为我所交往、包括‘交战’的，都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的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我都是扎扎实实去做，也许有错误，自己也认错。”

谈到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将他的全部著述结集出版的计划，父亲肯定地说：“几本人物传记都要改：《岳飞传》前一部分整个重写，后面有些部分可以从书中撤出来，单独成文；《陈亮传》也不难写，有个得力的助手，半年时间可以搞出来；《辛弃疾传》基础太差，还要多做一些准备。这些旧的书不能再印了，错误太多，留给后人可怎么得了！”

父亲的一生，应该说，有声有色，有棱有角。这一特性，一直坚持到他生命中的最后时日。10月1日上午，他对我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我知道，

他一向反对四平八稳，反对人云亦云；他所追求的，是特立卓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境界。

对于自己的业绩与影响，父亲有着客观的估计。有一次，我与他谈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一书中译本的序言，其中引述了父亲对于陈亮事迹及陈亮文集的考证意见，并且说“邓广铭教授是我的一位老师和朋友”，父亲感到十分高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詹纳尔（W. J. F. Jenner）教授请我转告父亲“我们海外汉学家都读他的著作”，父亲却笑着摇摇头，说“这怕是言过其实了。”数日后，詹纳尔教授又转达了杨宪益先生的话，称我父亲为“当今真正的历史学家”，父亲听后严肃地说，这正是他的目标。

在那段日子里，父亲数次与我姐姐提及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在他写于二十九岁的成名作《〈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中，曾经说道：“这是宋宁宗庆元六年稼轩所作祭朱晦庵文中的几句，然而这几句竟成了任公先生的绝笔，事实上也就等于任公先生自己写就了挽词。”六十余年之后，这段沉郁而又慷慨的话语再度浮现于他的脑际。父亲的所思所想，使我们感受到他回首学术生涯、直面未知处境时的复杂心情，也感受到他在濒危之际依然坚毅刚强的意志。

10月中旬以后，父亲的病情始终在反反复复，他的心情也愈益焦虑。尽管每次与人谈话之后他总感到头痛恶心，他还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讨论学术问题、交代学术工作的机会。除我们姐妹为他代笔写信之外，他还字字口授，由曾经协助他工作的张希清、沈乃文执笔书写了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函件，安排了《宋朝诸臣奏议》的出版事宜及他本人

文集的编辑工作。14日，他与刘浦江谈到新近出版的《辛弃疾诗文笺注》还要修改；26日、28日，提起《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他说有不少注释需要修订，并且几次说：“我现在还不能撒手人间。有这么多问题还都得改，现在呜呼哀哉可怎么行！”

以父亲的倔强秉性，他不愿意多想自己的病情，他只是一意前行，只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他曾经多次指着静脉输液仪器，对前来探望的校系领导和朋友们说：“什么事情都不做，成天看着这个，一滴、一滴，我真不甘心！”为了争取早日出院，从来不肯服汤药的父亲，咽下了一剂剂汤药；他强忍反复的呕吐，执意自己吃饭而不全靠点滴；只要能站起来，他就坚持在楼道中散步。住在隔壁房间的一位“老延安”，翘起拇指对我们说：“这老汉（指我父亲），真行！”

父亲长期不能出院，如何宽慰老人，成了医生与我们共同面临的难题。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依偎在他的床头，抚着他日渐嶙峋的手，劝他“既来之，则安之”，和他讲“欲速则不达”；一边在说，一边内心恼恨这般絮语的空泛无力。父亲焦虑而又无奈地点着头，与其说得到了启发，不如说这正是他每日里竭力说服自己的话。

面对闻讯而来探望的校系领导、朋友、学生，父亲只要稍有精神，总是谈笑风生。他憋不住满心的话，却又担心会耽误了人家的“正事”。因此，他总是嘱咐我们不要让大家来医院看他，他总是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事已经不好，干嘛还要牵累那么多人！”听说季羨林先生要来看他，他说：“千万别让他到医院来，告诉他，我们还是在朗润园见面。”臧伯母郑曼来看他，他“埋怨”说：“克家是个病人，离不开人照顾，你不该来！”漆侠先生来看他，他“责备”道：“你的病刚好，还跑

这么远来看我!”田余庆先生来看他,他说:“我这是小毛病,你的身体才该注意!”周一良先生手术后准备出院,一向不愿在医院中拍照的父亲,与周先生和正来探望的王曾瑜先生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张合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黄宽重先生前来探望,我们不敢告诉父亲他是自海峡彼岸专程赶来。他坐在父亲床畔,父亲紧紧握着他的手。想到两岸宋史学者自八四年在香港首次会面后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想到这将是永远的诀别,在场的人心中都很沉重。

12月中下旬,父亲有时已经神智恍惚,但凡他清醒之时,他仍然一如往日,敏锐地关注着学术界的研究讨论。20日,我为父亲带去了上海华东师大刘永翔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谈到了有关《辨奸论》真伪讨论的问题。我为父亲读信,他频频点头,不时让我重读未能听清的字句。片刻之后,他又说:“看看那封信……戴上大镜子(指放大镜)、小镜子(指眼镜)……”此时,父亲的视力已经相当差,他吃力地指着信上的一行行字迹,却终于难以辨识清楚。我不忍看他如此,便一字字指着,凑近耳畔,为他读了再读。读着读着,眼前的字迹愈益漫漶模糊了。

12月底,父亲说话已经困难,却仍然惦念着外面的一切。一天,我刚进屋,他便扭过头来询问什么,我一时没有听清,他便变得愈发急切。说了几次,我才明白,他是在问:“最近报上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过去,他常对人说,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确,各类电视节目,他只看新闻联播;家中订阅的多份报纸,他常要从头条读到末版。以往我们曾经为此与他开玩笑;而在此时,我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父亲在濒于弥留之际,心中似乎还惦念着许多事、许多人。偶尔开口,他曾问起系里青年教师欧阳哲生的职称问题,

他曾问起研究中心“臧健、小滕的女儿怎么样了?”他曾提起“中心要开一个会”;他曾拒绝接受输血,并且说“再这样(在医院中)住下去,历史系要‘破产’了”;他嘱咐待新版《王安石》正式出书,要请诸位先生“于便中审正”……元旦过后的1月3日下午,夏自强、郑必俊先生来医院探望,称赞新近面世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父亲听明白了,指着书对郑老师说:“送你一本!”这短短数字,是父亲表述清楚的最后一句话。

1998年1月10日,张北强烈地震的那一天,父亲默默地走了。带着他毕生的成就,带着他难以释怀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了九十一年的这个世界。

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父亲在晚年是否曾感到精神深处的孤寂。作为女儿,我从学业到处事,都不曾使他满意。这种愧疚,直到今日仍在啃蚀着我的心。我曾经顾虑,父亲那渴求思想交流甚至交锋、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是否能够得到一向感情深挚的朋友们的理解。

父亲辞世后,来自海内外各地雪片般的唁电、传真、信函,唁文中哀痛诚切的悼念,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

安卧在苍松翠柏、鲜花丛中的父亲,您可曾想到来自八方“高山仰止”、“国失导师”的悼文?您可曾注意到挽联上那“直道挺儒林,矫俗唯凭孤剑勇”的字句?您可曾听到您的几代学生在遗像前痛哭失声?您可曾读到几个月来您的老友和学生在报刊上追念您的文章?您可相信,您所追求的信念、您所希望执持的原则,会在后辈青年中舒展高扬?

亲爱的爸爸,安息吧!

编后记

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于1998年1月10日不幸辞世。先生以九十一岁的高龄告别了他勤奋耕耘终生的中国史学界，告别了他倾注毕生精力开拓扩展的宋史研究领域。

噩耗传开，震动了海内外史学界和文化界。对一代宗师邓广铭先生沉痛的哀思、崇高的敬仰、深切的怀念，随着一封封来信、一张张唁电、一份份传真，汇集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为了寄托至亲老友、同事同好、学生弟子以及家人亲属对邓先生的深切思念，更为了继承和弘扬邓先生严谨、求实、创新以及锲而不舍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在邓先生逝世一周年、九十二岁冥诞之际，出版一本邓先生纪念文集，是众心所盼之事。

征稿信发出后，得到了海内外多方面人士的热烈回应。写来稿件的作者中，有曾经受业于邓先生的学生弟子，也有海内外学术界的知名学者；有年逾九旬的学术界老前辈，也有三十出头的史学界后起之秀。近百篇来稿以真挚的情感、生动的笔触，缅怀邓先生的高尚品格、坦荡胸怀和丰硕业绩，显示了邓先生的非凡性格魅力和一代学者风范。

本文集纪念文章前后次序的排列，大致上以“序齿”为原则。但由于作者众多，且遍布世界各地，难以一一核实。如有不够准确之处，敬请鉴谅。

书名定为《仰止集》，是采纳了徐规先生的建议；纪念文集能够顺利出版，得益于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向所有为纪念文集撰稿的作者，向曾经发来唁电、传真的日本、美国、德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学术界朋友，以及所有为纪念文集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人们，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1998年9月